# 潘汉年在上海

黄祥豫 主编

目录

编辑说明

第一章：坎坷的人生

纪念潘汉年同志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党人魂——记潘汉年

潘汉年传略

第二章：从“小伙计”到文委书记

从三德里开始的友谊

潘汉年在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中

“左联”的成立与潘汉年的作用

潘汉年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文艺通信

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

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

第三章：在隐蔽战线上

为周恩来辟谣

忆潘汉年二三事

风雨话当年

潘汉年在上海“八办”

一个机要译电员心目中的潘汉年

潘汉年带我们过封锁线

记潘汉年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片断

第四章：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臣

潘汉年与邓文仪谈判概要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

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

全面抗战释

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

第五章：统战能手

解放前夕的两件秘闻

他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潘汉年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的贡献

潘汉年为我们设计走向进步的“高架桥”

对潘汉年夫妇的一段回忆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代表

潘汉年与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

争取新的和平展开新的斗争

加强团结和努力扩大统一战线

第六章：新上海的副市长

印象深刻的领导人

潘汉年是上海工人的贴心人

上海人民的“好当家”

潘副市长对新闻工作的关心

潘汉年与上海镇反

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

关于“五反”运动情况

上海商业改造问题（节录）

第七章：共和国的大冤案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潘扬案件”始末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最后岁月

乌云散尽现忠魂

沉冤昭雪英名永存

潘汉年冤案的前前后后

第八章：情谊永存

陈云与潘汉年

潘汉年与宋庆龄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

潘汉年和刘晓在抗战期间的亲密合作

于伶心中的汉年

第九章：抹不掉的记忆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

对潘汉年同志的片断回忆

好党员潘汉年同志

怀潘汉年同志（诗）

战士“覆盆”廿七载

许涤新与潘汉年的交往

潘汉年和董慧

敦厚长者“胡越明”

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

导言

1996年1月12日，是潘汉年同志诞辰9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了这本《潘汉年在上海》，介绍潘汉年的事迹，着重介绍他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反映他的革命贡献、高贵品质、革命才干和优良作风；力求使潘汉年这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再现在人们面前。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1996年1月1日

页数: 571 页

定价: 30.0

装帧: 精装

ISBN: 9787208021723

编辑说明

一、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对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对敌隐蔽斗争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96年是他诞辰90周年。为反映潘汉年一生的品格、才干、风范和功绩，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学习他，研究他，我们编纂了本书。

二、本书的编纂是在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具体指导、督促下进行的，得到国家安全部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老同志伍修权、陆定一、黄华、罗青长、童小鹏、于伶热情地为本书题了词。不少领导和老同志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文章。对此，谨致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三、本书严格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编纂过程中曾查阅、核对有关档案材料，访问了不少老同志，力求做到全面、准确。本书还以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为准绳，努力体现通知精神，完整地再现潘汉年的形象。

四、潘汉年一生的主要活动阵地在上海，但他的踪迹也涉及香港、延安、淮南等地，本书以反映他在上海的活动为主，也适当反映他在其他地方有关联的活动。

五、本书以收录老同志的回忆录为主，兼收少量研究人员、作家的专题文章以及潘汉年本人的文献等，根据潘汉年生平活动的轨迹分成9个部分，以冀对潘汉年的活动有个立体的、全方位的反映。

六、本书收录的回忆录，其中有一部分曾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在收录本书时，作者作了某些增补、修订；但有些老同志已去世，他们的文章由编者作了必要的删节或修订。回忆录中有些内容不同侧面的交叉或技节问题上的不同说法，仍保留原样，希望读者谅解。

七、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国家安全部谢建华、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中共江苏省宜兴市党史办等曾给予大力帮助；上海档案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一大”纪念馆为本书提洪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谨表衷心感谢。

编者

第一章：坎坷的人生

纪念潘汉年同志

①本文原载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陈云要求夏衍写的，是国内首篇披露潘汉年光辉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个别时间作了订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1982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①，正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①中共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①和主编了《幻洲》杂志。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①当时“创造社”出版部的地址是宝山路三德里A11号，所以他们就用“A11”作为刊物的名字。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

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二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和这之后一个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一个发起人名单。

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李一氓、李初梨、阳翰望、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

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中国互济会]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大会， 1519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

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时，干的是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小开”。“小开”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我再一次遇见他，正是“七·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

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声，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地和前线工作。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

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①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

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②同志说的）。

①“八·一三”抗战开始时，陈诚、张发奎、罗卓英是淞沪前线三个兵团的指挥。

②刘少文，当时任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那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

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

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

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

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

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

现在是20世纪的80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王尧山

①本文原载1982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订，并增加了第3部分。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和保卫工作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很大的功劳。

我是在1936年至1942年间和汉年同志在上海一起工作的。1942年秋，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全部撤退到新四军军部。汉年同志为了确保刘晓同志和我的安全，亲自安排并亲自护送我们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1942年至1944年我和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工作，他那时任华中局社会部部长。上海解放后，又和他在一起工作，直至1955年他被审查为止。此后信息全无。想不到从此就生死永别，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

潘汉年同志为创立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在1925、1926年前后，他参加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在上海建立的左翼文化团体“创造社”，积极编辑、出版进步书刊，为开拓新文化阵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汉年同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同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促成了白区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化阵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扩大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加强了党对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1929、1930年前后，他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发表题为《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署名文章，扭转了当时党内在文艺工作方面的缺点，使左翼文化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汉年同志代表党团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与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和贡献。汉年同志既尊重鲁迅，又善于团结鲁迅。对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充分的、高度的评价。随后，又把各左翼文化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他在这些左翼组织中，担任了中共党组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使新文化运动坚持了党的领导和正确方向，因而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和汉年同志的一系列活动是分不开的。

他在1951年10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首先应从政治上认识鲁迅的杂文风格。他完全赞成冯雪峰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把政论化成为诗而又丝毫也不减弱思想的深广性和政论的尖锐性与直接性的，却是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简直空前的新的创造。”在文章中，他更明确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就是由于“他是坚持劳动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点，也就表明了汉年同志本人所坚持的无产阶级立场。

文章中还有一段说明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深透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鲁迅主张打‘落水狗’的言论，是早在1925年发表的。这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中，表示这种对敌斗争必须坚决彻底，反对任何麻痹倾向与自由主义，是如此坚定不移，是多么可贵的空谷足音。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可惜，汉年同志对鲁迅先生所做的大量工作，到现在还找不到史料。但仅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评价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他是多么深刻的理解鲁迅，多么充分的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政治作用和艺术作用，以及他又是如何虚心地抓住了一度对待鲁迅的错误倾向，既严格要求自己，又严格要求别人。

1933年夏，汉年同志到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汉年同志参加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发展，对红军中的宣传工作，也都作出了贡献。他既有白区文化运动的丰富经验，又有苏区和红军中政治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在这方面，可说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汉年同志又公开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位促成者。虽然他没有文艺创作，但他的短篇政论文章在当时是起了指导作用的。

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方面丰硕的成果，是应该加以重视并应载入新文化运动史册的。同时，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中丰富的经验，也是应该向他学习的。我认为，他在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1、立场鲜明。在20年代，汉年同志已经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从这个立场出发，完成党所交给他的任务，出色地领导上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不同时期，毫不动摇地把矛头针对主要敌人，敌友分明，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队伍。

2、他善于团结、争取朋友和同路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实力。

3、他有组织才能，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的组织，特别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以领导运动，推动运动二如从组织“左联”、“社联”、“剧联”、“美联’等“八大联”，直到组织文化总同盟。他善于以左翼文化团体为核心，来争取公开的文化活动。他从上海建立文化团体，到推动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团体。

4、他始终掌握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又注意发扬文化艺术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贯彻到文化工作中去。这样，在苏区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武装“围剿”的同时，在白区以鲁迅为首的普罗文化战线，也粉碎了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二

汉年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贡献。

1934年前后，他两次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分别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我党与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不久，他被党中央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据理力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代表党，在上海与积极支持革命的宋庆龄同志建立联系，取得了宋庆龄同志对我党工作的配合和协助。

抗日战争初期，汉年同志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党给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他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展开了极为广泛、极为困难而又极为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把主要的争取对象放在上层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进步的民主党派，还有许多实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争他们坚决站到抗日战线方面来。如著名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汉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对象。当时，上海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救亡组织迅猛发展，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运动推动了广大群众投入到抗日的前后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内内战、对日投降的反动气焰。

这些贡献，都是与汉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他那时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绪和问题，都及时报告延安党中央，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决定，用公开的、秘密的、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广泛展开宣传，逐步推动工作的开展。当时，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常嚣张和阴险毒辣，而汉年同志却毫不畏惧，充分利用各种条件，灵活地、不倦地进行工作，推动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他有一套对付敌人的高明的办法，既使敌人无法迫害他，又使敌人无法破坏革命组织。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汉年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海地下党广大党员，广大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界人士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上下配合，团结一致，冲破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汉年同志又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们党所决定召开的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妄图破坏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会。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他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保证了全体人员的安全到达。

从汉年同志进行的统战工作中，我觉得应该着童学习：

1、他坚定地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目的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出色地作出工作成绩。

2、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具体对象，采取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

3、他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在险恶困难的环境中，在喘不过气来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英勇地奋战。他敌、我、友分明，凡是与他接触、交往过的进步人士，不仅对他信任、推心置腹，而且尊敬他。

4、他严守党的纪律，虚心接受批评。在待人接物上，对党外人士，对党员干部都是关心备至；在工作上，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具体的指导。

三

汉年同志对抗战时期的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也很有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汉年同志在负责上层统战及二＆工作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还参与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成立后，他与冯雪峰一起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各系统遗留下来的党组织进行了整理，并与一些被捕出狱及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取得联系，经过审查，对这些同志作出初步结论，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这批同志进行了安排：一部分介绍去延安以及武汉、重庆从事公开工作；一部分分配去搞情报工作；一部分有条件留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便转到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三人小组的领导之下工作。

1937年6月刘晓奉命到上海负责上海党的恢复重建工作后，三人小组下的关系全部交给了刘晓，并明确今后由潘汉年搞公开工作，刘晓负责秘密工作。为此，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我还专门开会研究了工作交接问题。这以后，上海党与潘汉年的联系由刘晓直接负责。潘、刘两人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内部政治交通。当时刘晓方面主要派张毅去接送情报，潘汉年方面也有交通。有时，潘汉年和刘晓也利用各种场合碰头。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为防止被破坏，没有设置电台，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主要依靠政治交通，有时遇到急件就通过潘汉年的电台转发。同样，中央给上海的指示有时也是通过潘汉年转过来的。抗战时期潘汉年与刘晓联系后，刘晓传达给我们的各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给上海的指示；2、上海与上海周围的敌情；3、通过特科搞到的敌、我、友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指示。

四

汉年同志在开展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中，也有过很多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汉年同志大部分时间是领导华中地区以及上海的保卫工作和对敌隐蔽斗争。他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与魔鬼打交道。他是置生死于度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同敌人开展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特别是能避免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做法，使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直到全国的解放。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汉年同志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特别应学习汉年同志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使敌暗我明，敌乱我稳。汉年同志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对党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方面战胜敌人，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功绩应有充分的评价。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带12架飞机起义等，是汉年同志直接筹划成功的，就是一例。

上海解放以后，汉年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中共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市政工作。他积极协助陈毅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上海人民战胜了美蒋封锁，沉重打击了敌特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破坏捣乱，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汉年同志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党叫他做啥，他全无二话，立刻接受任务，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务。我们应该学习’上“出污泥而不染”的“慎独”品质。汉年同志在解放前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充满白色恐怖和“花花世界”的环境中独立工作，但是他在生活方式上除由于工作的需要是“上等人”的打扮外，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质。我们应该学习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工作中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的。我们还应该学习他为人正直，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团结和尊重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优良品格和作风。

汉年同志曾是陈毅同志的助手和战友，我就以陈毅同志的遗诗来悼念他，歌颂他：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党人魂——记潘汉年

——陈修良

①本文原载1988年第12期、1989年第1期《上海滩》。收入本书时已经作者删改。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记得夏衍同志说过，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甚至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还把他说成“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彩，转眼忽然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的罪名。

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这篇社论的惊人之笔是：“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更令人费解的是，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党中央宣布给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居功，极为谦虚，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宰华，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自然成为破落户。但潘莘华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汉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时在陆平为首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宰华都积极支持。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团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华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小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凌霞学堂。1919年夏，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堂。病愈之后，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使观众为之动容。

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不良行为，被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恢复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底，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文。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创造社的“小伙计”

19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19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议并主编的《A11》周刊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原来，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就设在三德里A11号。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既当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作。武汉“分共”①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

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

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折冲樽俎有我潘郎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夏。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达成了十一项初步协定。协定签订后，潘汉年、黄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领又联合陈济棠、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潘汉年还与粤军反蒋将领陈济棠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广泛的商谈。后来因王明路线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条封锁线，与潘汉年和广东实力派的谈判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有很大关系。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除把电报密码送到陕北外，另一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设法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汉年见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由张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同中共接触。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派曾养甫与潘洽商，曾要求潘与陕北党中央联系，再进行两党谈判。随后，潘汉年去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在瓦窑堡，潘的汇报深得中央赞许，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电码也在此时报告了党中央。

潘汉年还持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汉年作为谈判圣手，在谈判桌上机智勇敢、战果煊赫。这年11月中旬，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对谈——

陈立夫：“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或出洋，半年后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可考虑了。”

潘汉年针锋相对：“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又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潘汉年严辞以对：“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他，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要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激烈交战之际，暂对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也无法出来的。”

这以后双方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

接着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潘汉年来在于西安、延安间，做了很多工作。事变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后与张冲、陈立夫谈判。1937年3月，又随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杭州会谈后，潘汉年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作艰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潘汉年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南北奔走，折冲樽俎，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为团结御侮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隐蔽斗争

早在1937年6月间，党中央就派刘晓到上海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的工作。刘晓一到上海，就与当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联络上了。7月间，在庐山结束与蒋介石会谈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约潘汉年、刘晓谈话，布置具体的抗日行动。潘汉年又安排周恩来在黄金大戏院的后台与上海救国会和文化界人士会晤（刘晓虽也参加，并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党的活动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仍由潘汉年负责。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对外以“八办”名义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帮助地方党的重建。在输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线支援抗战，发动上海附近的农村游击战，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作了许多隐蔽的工作。如设立秘密电台、交通联络站、派遣一部分党员在敌特机关工作，广泛搜集敌特的情报等。还接待和审查了许多长期失去党的组织领导的同志，包括出狱的、长期隐蔽在地下的，并将其中适宜在上海工作的转给以刘晓为首的地方党领导。

潘汉年利用“八办”半公开的合法身份，负责领导上层的统战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各界救亡协会、国难教育社、难民救济协会等。当时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光与党有关系的妇女团体就有22个。“八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成绩很大。此外，潘汉年还通过郭沫若、邹韬奋、夏衍等团结了一批记者、作家，办了《救亡日报》、《抗战》等报刊。

在抗战初期，上海的斗争纷繁复杂，潘汉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隐蔽在群众中，只在一定场合露面，所以敌人也摸不着他的行动规律。“八办”建立的电台，是同党中央取得紧密联络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这对上海及整个沦陷区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汉年善于组织情报网，虽身处四面被围的“孤岛”上，也能够知道各方面的动态，采取灵活的对付方法四面出击。如国民党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敌当了汉奸，混在人民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都能及时发现，保卫了我们的组织，防止汉奸的破坏。

1937年12月间，潘汉年同夏衍一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从事文化与情报活动，同时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到香港或大后方去（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又是潘汉年派干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亚子、邹韬奋、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离）。在武汉沦陷之前，他又赶到那里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敌占区的工作问题，还常到中央党校和社会部情报训练部讲课。

在延安期间，潘汉年与董慧相识。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来延安进抗大，是位热血青年。潘汉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护理，终于相爱。1939年，两人结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亲办的道亨银行当职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成为潘汉年最贴身的助手之一。她传递情报，筹措、保存活动经费，工作极为出色。由于她的社会地位，为其来往港沪之间从容工作提供了便利。于伶同志的下述回忆可以使我们想见当年他俩的工作配合是多么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指潘汉年）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潘汉年的情报据点主要放在香港与上海。他则仆仆风尘不时来往于港沪之间。1939年秋，汪伪粉墨登场，敌我友三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仍能从敌人内部及时地搞到精确的情报，迅速通知江苏省委，斗争艺术令人叹服。关于潘汉年与江苏省委的联系方式，于伶同志向我们提供了他自己的经历：“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璇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咖啡馆见面。他（潘）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潘汉年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善于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分领导人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辗转来沪，之后，由潘汉年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把他们安全送回根据地。

1943年，潘汉年参加淮南根据地的整风，竭尽所能保护了受到冤屈的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即殷扬）。后来扬帆写诗赠潘汉年，对潘“殷勤慰我铁窗前”极为感激。在新四军机关所在地黄花塘，饶漱石诬陷陈毅和潘汉年，甚至把陈毅挤走，对此，潘汉年是作过斗争的。1944年底潘汉年赴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不少干部联名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表示对饶漱石不满，请陈毅回华中，托潘汉年将这一报告送到中央。启程之前，潘汉年给上海情报部门负责人张唯一写了长信，传达了组织决定：上海的情报工作暂由刘长胜领导，重申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主要干部作了安排。

作为“七大”代表，潘汉年在大会期间对白区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迅速赶到香港，在港、澳、沪之间展开情报与统一战线工作。

天亮前后履险如夷

1946年初，正是和战未决之时，潘汉年又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护下不时到“周公馆”传递情报，请示工作。当年在“周公馆”工作的同志如许涤新等人后来回忆与潘汉年的接触，还大为赞叹：“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潘汉年也去了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报机构，则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潘汉年叱咤风云，大展宏图，在解放战争后期贡献更为突出。这个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沙文汉、张执一等同志则轮流去香港开会或办训练班，同潘汉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潘汉年在香港没有固定的公开机关，他的“轮流办公室”设在香港各种酒家和咖啡馆内，与各方人士谈话、接头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7年，李济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香港进行组织活动。潘汉年在各民主党派中间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肝胆相照”的风采，深得爱国民主人士的赞赏。194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他不顾改方特务的破坏与港英当局的森严戒备，排除万难，精心组织，分批将350余名民主人士从海路安全送抵东北解放区。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局外人很难想象，而潘汉年组织工作的周密稳妥，在当时就获得高度赞誉。

其时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都能从容应付。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络，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国、中央民航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率领了二十架飞机起义，也是潘汉年组织策动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动的俞勃驾机起义，也是由潘汉年通知他领导的上海秘密电台负责人刘人寿，请他与中央联系，确定降落地点与信号。最后，这架B24大型轰炸机安全降落在石家庄，对涣散国民党的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剧演员。如为东江游击队添置冬衣，他通过关系请马连良、张君秋义演，又发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筹到了一笔款项。他支持夏衍同志领导香港文化工作、办《华商报》，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电召潘汉年北上，他和夏衍、许涤新等在参加庆祝南京解放酒会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东方号”轮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由于他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时，得以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并立刻投入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的战斗。

那时，潘汉年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毅很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复上海的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须取得工商业者的合作，按《共同纲领》办事。潘汉年在陈市长的领导之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做得特别出色，致使不少挟资跑到香港的资本家回上海开办企业为恢复国民经济效力，如刘鸿生先生就是这样重返上海的。刘靖基先生的回忆可以让我们看到潘汉年工作作风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刘靖基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在座的工商业者有荣毅仁、盛丕华等人，当时刘靖基有些紧张，但潘汉年“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可见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时，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捣乱金融的现象十分严重，潘汉年力主坚决取缔，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在他推动下，把上海原有的16.3万家商号按行业整理，改组为200多个同业公会，并安排上海工商界中爱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各种职务，使之各得其所，领导各行各业恢复生产、繁荣商业。此外，在解决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和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潘汉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断又严密，充分证明他既是破坏旧世界的斗士，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行家。

建国之初，上海百废待举，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尤为剧烈，要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指挥若定，履险如夷，需要过人的精力，杰出的才华，更需要忠贞的党人胆魄。作为当时上海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斗争艺术极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里，在镇压反革命，取缔流氓、妓女，解决政府机关不纯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团结广大群众建设新上海，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瑶瑟的绝千古奇冤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突遭逮捕，没有经过公开审问，更没有律师可以代为辩护，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难辩。总之，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从中国政坛上神秘地“失踪”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潘扬案”居然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挂了钩，原因是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分工领导公安局，而饶漱石作为原华东局书记又是分管华东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实，1943年华中局整风时，饶漱石曾把扬帆打成“内奸”，当年潘汉年曾进行抵制，后来还向中央反映过饶的问题，而如今，潘、扬和饶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关系！

潘汉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与扬帆一起包庇敌特三千三百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扬帆在取得上级同意后，决定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流氓头子乃至小偷惯窃，利用他们深谙内情这一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这批人也确实有所贡献，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到了“潘扬案”发，却成了他们两人的弥天大罪。那么，“三千三”这样的大数目又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原来远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长的扬帆开了个玩笑，说扬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扬帆手下超过三千，这个干部当时随口诌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在当时，这首诗不过引起一阵哄笑，但因其妙趣横生，竟在新四军干部中流传开了。到了1955年，这首诗被人利用，“三千三”变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和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屡受中央嘉奖。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祸！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在外”，个别情况无法及时向中央请示也是有的。这又何罪之有！

至于“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只要想一想，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的发电厂在何处而需要“供给情报”的道理，就可看出这条“罪状”的不实了。

对于这一些“罪行”，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怎样接受得了！

经过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团河农场。其间他曾进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对这位老朋友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在狱中，潘汉年曾写过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结句“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实在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从团河又经秦城监狱，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劳改农场。

于伶同志写了一组诗《怀潘汉年同志》，最后一首是《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潘汉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们生者却难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他的形象，作为一代风华的党人魂，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后半生的坎坷，他的冤狱，则值得我们这一代进行深刻的反思。

潘汉年传略

——陶柏康

一

1906年1月12日（农历乙巳年12月18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潘汉年，乳名厂（ān）儿，参加革命后，使用过许多笔名与比名，诸如：厂人、水番三郎、亚灵、天长、泼皮、泼皮男士、迪可、汗牛、汗、爱仙、鲍刚、严陵、彭一清、杨涛、潘健行、小开、K、小K、胡星、萧叔安、萧恺、凯、开、严、潘继仁、严如云、严开、许琳、潘湘、韩企文、张颂南、胡越明、秦汉楚、萧肖、萧相臣，等等。

潘汉年生长在一个书香门庭。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为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莘华是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以塾师为业。

潘莘华思想比较开明，辛亥革命后，曾任乡董，后又代替其兄任区董。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县议会制度，他又被推举为宜兴县县议员，但仍在乡间任教。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有四男四女，潘汉年在男孩中排行第三，为后母巫氏所生。由于小汉年天资聪颖，机灵活泼，深得长辈和兄弟姐妹的喜爱。

1912年，年满6岁的潘汉年进入陆平村初等小学读书。有关孩提时代的生活情形，潘汉年作过片断回忆：“记得那年我还在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安联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萤火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进大姐身旁，要求他打扇……”

寥寥数笔，一个天真活泼且又顽皮好动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又描绘出一幅举家融和欢乐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潘莘华为接济难民，变卖了田产；又因病染上鸦片，家道开始中落，经济十分拮据。

1916年，潘汉年初小毕业，因无钱升学，进入潘海良的私塾学堂，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第三高小坐落在宜兴县西乡都山，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学校，创办于清朝末年，原名陵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发展成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当时担任该校校长的是清末秀才储涵奇，他治学严谨，潘汉年在这所学校里，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1919年，潘汉年从第三高小毕业。在外婆吴氏的资助下，考入和桥彭城中学。1920年，他因下肢患疾，中途辍学。暑假期间，在北京念大学的堂兄潘梓年和潘寂回乡度假，向潘汉年等少年伙伴介绍了不久前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情况，这是潘汉年最早接受的政治启蒙教育。

潘汉年病愈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便在本村和邻村的小学替人代课教书。

1922年，16岁的潘汉年经人介绍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任教。潘汉年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不但使学生获得牢固的知识，而且注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教学中，潘汉年还撰写了一些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言而能行”的教育工作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言行一致，为人师表。他还积极主张在假期里，让学生们多到农村去，充分须略农村“那冲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养出幽美情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探讨教育问题，他还特地写信给《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希望该报“出一张专事研究教学的副刊”。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参加了“宜兴评论社”。该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自发地酝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团体，成员大多是爱好文学艺术、热情而刚直的青年。加入评论社后，潘汉年还参加编辑评论社出版的小型报纸《宜兴评论》。《宜兴评论》的内容有社论、述评、简明新闻，有时也登一些杂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随笔、散文、漫画等。其主旨是反对旧道德、旧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对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封建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和李肠谷、鲍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恶劣行径，并与他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不久，潘汉年离开家乡，走向新的广阔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为了到上海继续求学，然而，时代的召唤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汉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任校对员。在此期间，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儿歌与童话故事。这些作品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写得颇有新意。1925年5月，他还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童话故事：《苦哇鸟的故事》。并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进一步开拓童话故事的题材，得到周作人的赞许。

1925年五卅运动后，潘汉年积极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加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潘汉年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开始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

创造社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不畏艰难的热血青年，他们既做出版部的具体事务，如包装、跑邮局等，又都是能编会写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极其紧张，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时甚至窘困到饥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们“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杀开一条血路”，为“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从1926年到1929年，潘汉年先后编辑和主编了《洪水》周刊、《A·11》周刊、《幻圳》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和《现代小说》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撰写了许多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的杂文、政论文章，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战。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小说，讴歌进步青年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反映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这些进步杂志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许涤新曾经回忆说，1928年，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其他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幻洲》，并受到鼓舞和启迪。

192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设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

由于当时潘汉年等人还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初次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它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第一任书记。此后，他不辞辛苦，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组织领导了文学艺术界的各个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找了钱杏邨商量筹建新的文化革命团体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于5月和7月对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两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钱杏邨在内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筹备工作一度停顿下来。直到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陆续释放，组织筹备工作才重新开始。

潘汉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他通过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广泛征求党外进步作家的意见，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据夏衍、阿英、吴黎平、冯乃超、冯雪峰回忆，在“左联”筹备小组成立以前，潘汉年分别找他们商量。此外，他还找过朱镜我、洪灵菲交换意见，并要阿英会做田汉和洪深的工作，争取他们将来也能参加“左联”。

根据当时文化界的现状，潘汉年还接受阿英的建议，特意请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的夏衍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分头联络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潘汉年主持召开了文化界党员作家为主的座谈会，推定由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几个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起草“左联”纲领，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会议还决定，“这两个文件一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筹备小组成立后，一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都由潘汉年主持。

1930年2月26日，潘汉年主持召开了“左联”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到会者有沈端先（夏衍）、鲁迅等12人”。这次会议着重“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认真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发生以后文化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对小团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敌人。

在此期间，筹备小组还商定了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组成以及分工等具体方案，这些工作都由潘汉年请示党中央后最后决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潘汉年代表党在会上讲了话，并担任了第一任党团书记。3月18日，他撰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任务》一文，用以指导“左联”的初期工作。

“左联”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还成立了另一个文化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也参与发起和筹备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鲁迅、潘汉年、冯雪峰、田汉、郑伯奇等50余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等在会上发表即席讲演，表示“愿意站在民众的最前线，为广大群众的自由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不久，选举产生了“同盟”的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先后两次陪同鲁迅到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宣传演讲，扩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响。

1929年，郑伯奇、陶晶苏、冯乃超等人在上海筹建“艺术剧社”。潘汉年得知后，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从多方面给以关心和帮助，他还特地派夏衍参加艺术剧社的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到1929年10月下旬，艺术剧社正式成立。艺术剧社成立后，排练公演了几出进步戏剧节目，扩大了在上海戏剧舞台上的影响。艺术剧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艺术剧社，并逮捕了一些社员。5月24日，又查封了与艺术剧社有关系的中华艺术大学。针对国民党反动高压手段，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了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和余怀等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发展进步话剧运动的办法，决定进一步扩大革命戏剧团体的组织。到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后经潘汉年与中央文委讨论决定，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

在领导“左联”、“剧联”工作的同时，潘汉年还领导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3、4月间，潘汉年等十余位文化界的党员在邓初民家里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于5月20日召开了“社联”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社联”的纲领，指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等等。

在“社联”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中广泛深入传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团结在“社联”周围。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在“社联”党团的帮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会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潘汉年、刘锡五、彭康和王学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此后，潘汉年对“社研”的工作也时常予以关心指导。

潘汉年作为中央文委书记，还关心指导了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随着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了加强对这些革命团体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潘汉年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文总”于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汉年担任“文总”的党团书记，并主编“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斗争》。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建立了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及其各个方面的垂直的组织系统，大大加强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三

潘汉年是最早与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当天下午，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汉年和鲍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访鲁迅并共进晚餐。此后，潘汉年便成了鲁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潘汉年的名字。

20年代末，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进步文化团体的团结，发展进步文化运动，要求文化界的党组织做好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进步文化团体之间的隔阂，争取鲁迅出掌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为此，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委派潘汉年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与鲁迅促膝长谈，并就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过去同鲁迅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争论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得到鲁迅先生的谅解。同时，潘汉年召集党员文化工作者开会，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党员作家和党外进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鲁迅的论战。他还多次陪同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去拜访鲁迅，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请出鲁迅担任“左联”盟主的任务，这对于发展左翼文化运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具有重大意义。

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潘汉年非常注意倾听鲁迅先生的意见。他曾经派冯雪峰去拜访鲁迅，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问题，征询鲁迅的意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潘汉年对冯雪峰说，“左翼”二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在为“左联”成立做准备工作时，潘汉年为保证鲁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联”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潘汉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华艺术大学，检查了会场的保卫工作，潘汉年特别关照夏衍，请他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陪着鲁迅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他也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保护鲁迅。

“左联”成立以后，为了表达革命文化工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商定，组织一次庆祝鲁迅50寿辰的纪念会。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帮助下，纪念会于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兰餐厅举行。各革命文化团体的代表50余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欣然出席。纪念会上，各文化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衷心祝愿鲁迅先生为进步文化运动多作贡献。鲁迅也作了即席演讲。通过这次活动，使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更趋亲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但他还和鲁迅保持着联系。据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回忆：1932年夏，他从宜兴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馆看到鲁迅与潘梓年、潘汉年在吃冰激凌，热烈交谈。

1936年4月，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时，受代表团的委派，赴沪相机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回沪后，潘汉年和胡愈之为鲁迅赴苏疗养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鲁迅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当时，鲁迅先生病情日渐严重，潘汉年对鲁迅的病情十分关心，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当晚，他和冯雪峰商量了挽救鲁迅生命的具体办法，决定要求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为鲁迅作进一步的治疗。不料19日凌晨，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潘汉年得到冯雪峰的报告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鲁迅先生逝世后，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冯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了鲁迅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化运动中的影响。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会上，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发表即席讲演，高度评价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鲁迅杂文的战斗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潘汉年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帮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时间，《鲁迅全集》就得以出版发行。当时，这套书籍发行1000套。此外，还印刷了200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给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从此，潘汉年一直把这套《鲁迅全集》珍藏在身边，并伴随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27个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后，才被上海档案馆收藏。

四

潘汉年倾注精力，积极组织推动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时，更加艰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31年4月，党中央调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担任特科二科科长，随后又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潘汉年协同陈赓、李克农，在周恩来、陈云的指挥下果断地清除了顾顺章叛变后遗留的隐患，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参与组织、护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员转移到苏区的工作；参与粉碎敌人伪造“伍豪事件”的阴谋；配合宋庆龄，联络国际国内知名人士，积极营救牛兰夫妇，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此外，潘汉年凭借智慧和人生经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地下情报工作网，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杨度、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和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始终深深怀念这位中国战友。他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潘汉年对党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从1931年到1933年，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风险，度过了几百个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汉年营救未成，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汕头去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协助张闻天编辑党刊《真理》。8月，中华苏维埃大学成立，潘汉年被任命为校务委员。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谈判。10月26日，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0月底，他又和黄火青等到福建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就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消除了工农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对峙状态；双方开展了经济贸易；对方还释放了政治犯60余人，并默认进步团体的存在，从而为恢复中共地下党在福建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潘汉年与何长工到江西寻乌地区和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就联合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结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完成谈判任务后，潘汉年加入了长征队伍。在征途中他被编入中央直属团，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这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潘汉年谈话，决定派他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并要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在中共贵州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的协助下，历经艰辛，经香港回到上海，与陈云于同年8月先后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转赴莫斯科。

五

潘汉年到苏联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地区，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官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同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初步接触，邓文仪还向潘汉年交待了回国后找陈果夫联系的具体办法。临行前，潘汉年又听取了共产国际的苏共代表团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等人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意见。

1936年4月，潘汉年和胡愈之离开莫斯科，于5月初到达香港。随后，潘汉年立即派胡愈之到上海去找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的情况。同时，他又按照邓文仪说的联络方法写信给陈果夫，要他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后，通过沈钧儒和茅盾等，找到了党中央先期派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和胡愈之着手宣传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他们帮助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报纸的宣传应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后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贯彻了这一精神。这是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回国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他们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救国会起草了一份在全国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文件。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潘汉年特地找到在香港的救国会领导成员邹韬奋、陶行知，在胡愈之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修改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以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4人联合署名，于1936年7月15日发表。8月10日，毛泽东给沈钧儒等4人写信，表示“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且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此外，潘汉年在香港还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会见了原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和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等。他还会见了过去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同志和旧友，如梅龚彬、柯麟、叶挺等，并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精神。

同时，潘汉年会见了从南京赶到香港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旋即赶赴南京，与陈果失、曾养甫等会面接洽。

8月初，潘汉年通过刘鼎安排，经党内秘密交通线去陕北。8月8日，到达陕北。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和自己回国的任务，以及他在莫斯科、香港和南京同国民党方面协商的情况，为党中央进一步制订逼蒋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随后，他立即赶赴安塞地区，与叶剑英见面，帮助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潘汉年又同张学良会晤，并向党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

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并委派潘汉年担任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联络代表。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与叶剑英一起离开陕北到西安。

在西安，叶剑英、潘汉年向张学良通报了中国共产党同南京谈判的方针，并同张商讨了逼蒋抗日等问题。随后，潘赶到上海。经张冲安排，于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苛刻要求，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与宋庆龄一起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并把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告知陈立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潘汉年又按照党中央指示，就撤兵释张、实现西安协议、争取红军给养、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同陈立夫、宋子文多次洽谈。1937年3月，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等去杭州，参与周恩来同蒋介石的谈判。

1937年春，王稼祥由贺诚陪同，从陕北到上海乘船去苏联治伤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况。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潘汉年和冯雪峰做了认真的接待准备，尤其是保密、保卫工作，并和他们讨论了如何妥善处理从狱中传出的方志敏《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手稿问题，潘汉年还亲自将这两份手稿一页一页拍摄下来，使这些珍贵的作品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并公开出版。

同年7月上旬，周恩来等去江西庐山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途经上海时，两次接见潘汉年与刘晓，就上海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潘汉年、刘晓还陪同周恩来会见了夏衍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党内外人士。

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改称八路军），原红军驻上海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公开对外开展活动。李克农为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继任。

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潘汉年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马相伯、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经常交换意见，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他们建立起心心相印的关系。

同时，潘汉年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宋庆龄的引荐，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进行了广泛接触。

此外，潘汉年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全面掌握了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名单，奉命同国民党当局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进行交涉。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使许多长期被关押而幸存下来的党员干部获释，重新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同国民党上海地方当局公开打交道，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迫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潘公展同意建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并创办了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潘汉年站在抗日救亡宣传的第一线，写了许多政论文章，着重宣传共产党发动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批判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片面抗战路线；阐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路线，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的对外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英美和依赖国际调停的外交政策；广泛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努力争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八一三”抗战期间，应国民党将领陈诚、张发奎和罗卓英的要求，在潘汉年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团派进国民党的一些军队，担任宣传、组织和救护工作。以后，他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同志到国民党的其他军队中去开展工作，扩大了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沦陷前夕，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潘汉年和刘晓，对上海沦陷后党的工作作了布置。12月25日，潘汉年在安排布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后，与夏衍一起，乘船撤离上海去香港。

六

从上海到香港后，在长达七年时间里，潘汉年在香港、广州、武汉、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沦陷区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当时，党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的代表，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汉年的领导下，继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共同努力，团结大批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战，把他们捐献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各抗日根据地；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大力支援坚持在敌后艰苦抗战的琼崖游击队、东江游击队；他们在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上层爱国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还结交了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他们利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利形势，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使香港成为党的对国内外宣传和联络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间，廖承志、潘汉年还经常一起去广州从事党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汉年曾在广州会见各抗日青年团体、进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团体的负责人，热情坦诚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救亡日报》从上海迁到广州出版后，受到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关心。他们每次从香港到广州，都要到救亡日报社去，给报社的同志谈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了解报社的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潘汉年到香港后不久，曾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过两个月。1938年1月7日，他从广州起程去武汉。行前，会见了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阐述了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1月9日，潘汉年曾出席正在筹办中的《新华日报》在汉口江春餐馆举行的招待会。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陈立夫、张冲、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被推举为分会理事，潘汉年也是其中之一。

约在1938年3月间，潘汉年返回香港。8月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香港赴延安，出席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潘汉年留在延安参加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并参加过延安新闻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活动。1938年11月10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成立，潘汉年出席大会并讲话，要求青年记者们认真宣传抗日将士英勇战斗的事迹，“系统地、具体地把它的事实内容，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1939年2月5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同志参加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80余人，潘汉年也出席会议并发了言。2月10日，中华戏剧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潘汉年出席并当选为分会理事长。3月22日，潘汉年主持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举行的纪念“三一八”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

1939年4月，潘汉年奉党中央命令离开延安，4月底途经重庆返回香港。在香港，他经常和廖承志在一起，交流彼此听到的消息，分析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然后由潘汉年写成电报稿交张唯一译发，向党中央汇报。9月，他又从香港到上海，对上海的隐蔽斗争作了部署。同行的有刘人寿。1940年秋，他领导建成了同延安通报联系的秘密电台。在此期间，他曾为党搜集了许多重要战略情报。例如，1941年6月，潘汉年曾向党中央提供过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以后，又向党中央报告了日军准备南进等重要情报。当时，潘汉年还在上海先后设立了“集成皮毛公司”和“裕通运输公司”等商行，作为联络同志的见面地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李一氓在战斗突围后辗转到达香港，向廖承志和潘汉年讲了事变的经过，潘则把事变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在香港，潘汉年陪李一氓到澳门去看望了叶挺夫人。随后，又亲自护送李一氓到上海，并通过党组织设法安排他去苏北根据地。在上海，他还和刘晓约见于伶，商议应付事变的对策和措施。

1941年7月3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央派人加强香港的领导力量，以开展与英美人士、华侨、各党派、文化界的统战工作。9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加强香港工作，但中央一时派不出人来，仍由廖承志、潘汉年继续负责。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形势十分严峻。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同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具体布置在香港的各方面人士撤退、疏散工作。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经过各方面紧密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其中大多数顺利安全地撤往东江，再转往韶关、桂林和重庆等地。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内地和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曾一再指示党在敌占区的对敌隐蔽斗争系统，派人打入敌伪组织，相机开展工作。潘汉年执行上述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效。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掩护一批同志潜伏在敌人内部工作，并掩护了一些同他有联系的领导同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派在香港几位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同志和秘密电台处境危险，潘汉年主动报请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从上海派人去香港，掩护他们全部安全撤到上海和内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上海从孤岛变成了沦陷区。党中央指示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撤退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去。这时，潘汉年也奉命撤退。1942年11月初，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刘晓、王尧山等，都在潘汉年所发展的特殊关系掩护下，同潘一起，从上海到淮南顾家圩子。到达华中抗日根据地后，潘汉年担任了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整风学习期间，潘汉年参加了审查扬帆的工作。在审查过程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认真调查了解，确认对扬帆的审查是错误的。后来扬帆被平反。这个时期，潘汉年还为根据地干部作过一些报告。他还在新四军出版的《拂晓报》上发表了《梦游玄武湖》、《探海东同志病》等诗词，表达忧国愤敌的心声、抒发对战友的感情。

1943年，潘汉年领导建立起两条通向解放区的交通线：一条通淮南华中局，一条通皖北新四军七师。这两条交通线的建立，保证了上海和抗日根据地之间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输送。同年夏秋之交，党中央电告潘汉年，需要保存在上海中央文库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潘汉年指示张唯一取出密藏在上海中央文库中的有关文件，拍成35毫米胶片，送往华中根据地报党中央。

1944年6月，潘汉年离开淮南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大会期间，潘汉年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共同举杯，庆贺胜利。

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开始积极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7月8日。新四军军长陈毅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表示选派潘汉年等六位同志，代表新四军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举行集会，会上宣告正式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周恩来、林伯渠等25人当选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潘汉年也是常委之一。8月10日，纲领起草委员会举行会议，组成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组织法五个专题起草小组，潘汉年出席会议，并参加政治专题小组工作，还担任组织法专题小组组长。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原定10月举行，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会议没有召开。

1945年11月，潘汉年奉命从延安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参与领导该地区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党的隐蔽战线工作。1946年2月，董慧也到达沈阳。是年4月底，因东北地区党的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潘汉年又被调到北平。同年夏天，他回延安汇报工作，不久，奉命到南京，接受新的任务。

七

1946年夏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回到上海继续领导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与刘晓、刘长胜、夏衍、华岗和冯雪峰见面，还会见了情报系统的一些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的“七大”基本情况，阐述了国内外形势。随后，他又指示一部分同志去香港。一部分同志继续留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

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经常参加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的会议，参与一部分领导工作。同时，他和周恩来保持着经常联系，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段时间，他继续同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接触往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关心照顾他们。1946年7月，陶行知逝世后，他根据周恩来关于“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应该负责保护。……在经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的指示，加强了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同志落实具体措施。

在上海，他还应上海地下党同志之邀，忙里偷闲，重操笔墨，用“荆溪”笔名在《联合日报》发表了40余篇杂文。这些杂文抓住人民最关心的民主与和平问题，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内战，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强烈愿望。

1946年10月30日，潘汉年奉命离开上海，和夏衍一起乘飞机去香港。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香港分局，由刘长胜、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天、夏衍、连贯组成。从这时开始，到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在参与香港分局的领导工作中，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联系接触。

从1947年开始，各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人及文化界人士陆续从内地、上海和海外来到香港，到1948年，总数已达千人以上。因此，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成为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当时，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商讨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方略。但同时也有极少数上层人士对形势认识不清，主张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还有一些亲国民党的党派如国社党、青年党还在香港活动，破坏统一战线。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潘汉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提出凡是愿意与我党合作，反对蒋介石卖国政府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争取，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做到多争取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潘汉年身体力行，利用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建立起来的友谊，经常同他们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积极主动地听取意见，耐心诚恳地做解释说服工作。由于潘汉年政治水平高，统战工作经验丰富，加之博学多才，分析问题中肯实在，又平易近人，善于结交党内外各种朋友，因此，在香港的上层人士都愿意找他谈心。夏衍说过：“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彻底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由此可见，潘汉年当时在香港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从1947年起，中共香港分局开始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每周开一次，边聚餐边座谈，由香港分局的领导同志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每次座谈会都有中心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融洽无间。潘汉年是座谈会的主讲人之一，由于他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很受欢迎。

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非常紧张。夏衍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4年或者5年的工作。”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潘汉年还时刻关心着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教育工作。为了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从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他在香港先后向党员干部作了8次报告，内容涵盖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和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

潘汉年对在香港工作的党内同志和党外进步人士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惦记着党内外同志和朋友的家庭生活，每逢他们遇到困难，总会及时得到潘汉年的关心和帮助。对此，许多老同志至今记忆犹新。潘汉年就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充分发挥党内外同志的作用，为党的事业服务。正如他自己所说，别人说我有鬼斧神功，其实做统战工作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京、沪一带控制极严，在这些地区无法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更无法办干部训练班，中共上海局就只好设法在香港建立机关，开办京沪高级干部训练班，总结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工作经验，培训党的干部。训练班先后开办了12期。潘汉年给予很多帮助。此外，上海党组织很多不易办的事，也多半转移到香港，由潘汉年协助办理。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不断加快，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许多人越来越看清了蒋家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逃脱不了最终覆灭的历史命运。因此，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出路。这种情况给党的各条战线包括隐蔽战线提出了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抓住时机，抓紧做好国民党营垒人员的策反工作，努力争取团结更多的人摆脱反动统治的羁绊，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例如：1948年冬，潘汉年对卢汉、龙云做了大量工作，结果使卢汉弃暗投明，宣布起义。又如积极参与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举行起义，使该委员会系统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资财、档案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物资。潘汉年还成功地参与领导了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香港员工起义的初期准备工作，配合上海地下党组织争取到海关的一些高级人员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服务。

新中国成立前夕，潘汉年和中共华南分局的同志根据党中央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和指示，承担了为新政协的召开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重要任务。他们及时向当时转移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通报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并广泛深入地和他们交换意见，讨论研究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通过他们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密切联系和磋商，及时沟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召开新政协问题上的意见，为党中央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8年7、8月间，潘汉年等开始组织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阻挠民主人士北上。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指挥若定，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地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从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先后送走了20余批民主人士，总数达350人以上，没有一次失误，为人民政协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4月28日，遵照党中央电令，潘汉年和夏衍、许涤新离开香港，赶到北平，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他们在北平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亲切接见。

5月16日，潘汉年一行乘火车南下，5月23日傍晚到达丹阳，先后向陈毅、饶漱石、曾山等汇报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作的指示。随后，他们便随解放军向上海进发，迎接上海的解放。

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5月28日下午，潘汉年作为新上海的市政府副市长，陪同陈毅市长，接受原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交出的旧市政府印信。从此，领导新上海的紧张繁重的工作开始了。

从上海解放那天起，潘汉年就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等重要职务，主持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成为陈毅市长的得力助手。

潘汉年协助陈毅领导上海工作是多方面的，搞好城市接管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陈毅是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粟裕是副主任。潘汉年兼秘书长，领导军管会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军管会下面，设立了军事、政务、财经和文教4个接管委员会，具体负责各系统各部门的接管工作。潘汉年主要是抓面上的工作，如综合情况，处理问题，协调步骤等，工作千头万绪，任务极其繁重。在两个月的接管工作时间里，潘汉年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经常主持或参加军管工作会议，听取汇报、作出决定。会议每次都开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由于潘汉年长期战斗在上海，对上海各行各业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思想敏锐，作风踏实细致，因而对接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能提出中肯的意见和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接管任务。

对潘汉年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当时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周林作过这样的评价。“他长期在上海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熟悉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在接管上海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了别人起不了的作用。”

接管工作完成以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个系统重新建立了政权机关。潘汉年领导主持了这项工作，并亲自参加各局和公司的成立大会，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作报告、分析上海的形势，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为建设新上海而努力。各系统、各部门政权建设工作的完成，有力地保证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解放初期，提上市政府议事日程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打击金融投机，稳定货币和市场，保障人民生活。国民党统治后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物价指数如天文数字，国民党通用货币金圆券毫无信用可言。一解放，市军管会于1949年5月28日立即颁布金字第一号布告，规定即日起使用人民币，并限期于6月5日禁止使用金圆券，并宣布以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的比价。人民币开始进入市场。但一些投机奸商却肆无忌惮地进行银元投机，哄抬银元价格，随后黄金、外币价格也跟着而起，造成金融市场一股投机浪潮，带动商品市场物价上涨，有的商店甚至拒收人民币。

面对上述情况，市军管会除了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以外，于1949年6月10日，经请示中央同意采取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经过周密的研究部署，在陈毅、潘汉年、宋时轮等的亲自指挥下，组织了金融、公安、警备区等有关部门的人员，分成5个小组，于6月10民在非法交易最集中的上午10点钟，突然封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当场逮捕了犯有严重罪行的投机商238人，移交法院审理，并缴获一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

通过这次斗争，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同时彻底消灭了以银元金钞计价的现象，人民币占领了市场，政府完全掌握了金融领导权，对稳定上海的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金融投机市场被击溃后，投机势力又把投机资金转向了商品市场，从1949年7月到1950年春，连续三次掀起“涨价”风潮。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担任上海市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潘汉年，在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领导下，领导经济战线的党员干部，研究各种对策，努力抑制物价上涨风潮。当时，他几乎天天晚上参加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汇报，讨论解决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投机势力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市场物价。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派飞机来上海轰炸。1949年6月23日，美国指使国民党蒋介石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切断上海的海上交通运输线，破坏上海的经济建设。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等实施狂轰滥炸，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事件发生后，潘汉年立即陪同陈毅亲赴被炸现场视察，慰问工人和灾民，并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全力抢救，恢复生产。

潘汉年在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期间，非常重视抓好上海的经济建设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要使上海从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方针，花大气力抓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工作。1952年3月，潘汉年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造旧上海为新上海，必须思想上明确以生产为中心，一切为生产服务”。

潘汉年还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他常对市政府工作的同志说，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多办几件好事。1950年初，就决定建造工人新村，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潘汉年领导督促主管部门，组织力量对工人的居住情况进行调查，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工人新村的修建规模、标准等问题，抓紧落实，使解放后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很快建造完工，一大批工人劳模搬进了新房。曹杨新村的建立，开了上海建造新村工房的先例。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除了协助陈毅同志主持市政府工作之外，还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团结争取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共同建设新上海是一项极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潘汉年曾经向统战部的同志指出，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人士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和市场搞好的，一定要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但是，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解放前夕，纷纷把资金抽调到国外和香港，有的人虽然留在上海，但也是随时准备席卷而走。针对这种情况，陈毅和潘汉年等曾多次召集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开会，反复向他们阐述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在民主革命时期结识的工商界朋友，广泛深入地开展说服劝导工作，努力争取许多移居海外和港澳的工商界人士重返上海，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并且动员留在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从国外和香港调回资金和设备，重新开工生产。

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和党外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当时受到过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是右倾。但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符合党的政策原则和利益的。因而毫不动摇，始终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和党外人士交朋友，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开展工作。

潘汉年还注意抓市政府机关内部的统战工作。1952年间，他根据1951年政务院秘书长会议精神，主持召开市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组成立大会。潘汉年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又对机关统战工作作了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综合本单位统战工作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认识，向党外干部作报告”。他还主张把统战工作贯彻到各个部门，从政权部门到生产部门，都要做好这一工作。他说：凡是统战政策思想贯彻好的部门，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会搞好。

上海解放初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潘汉年对党的统战工作始终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精力。正如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潘汉年同志在解放前地下斗争时期和掌握政权后，长期和民主人士相处。几十年来，这些民主人士虽历经风浪，但仍然坚持跟党走，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还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是同潘汉年同志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上海历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解放以后，在上海潜伏下来的特务有6000余人。此外，台湾国民党还不断派遣特务潜来上海，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潘汉年对上海的反特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听取公安部门的汇报，并及时给予具体指示，有时还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

为了保证上海的公安保卫工作顺利开展，潘汉年很重视公安干警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素质训练，他一再向公安战线的同志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熟悉敌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会敌人的长处。他还反复强调，做好公安保卫工作，一定要坚持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要把专业工作和发动群众有机地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保卫方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潘汉年不仅为保卫上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而且在改造上海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统治上海，培植了一批为它服务的上海流氓势力。他们长期横行上海，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潘汉年长期考虑的问题。他凭借着长期在上海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顺利清除了上海流氓势力。当时，上海人民对共产党能不能清除这势力心存疑虑，他们说，“共产党要是能把上海的流氓势力打倒了，才真正称得上翻身”。当他们看到这一要求变为现实时，无不拍手称快。

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上海终于初步改变了面貌，以崭新的姿态显现在世人面前。这巨大的变化，凝聚着潘汉年同志的一份辛苦。

九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在上海新建成的中苏友好大厦落成仪式。这是他有生之年为上海人民所做的最后一件实事。当天晚上，便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谁也不曾料到，一场灾难向他袭来。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在讨论中，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和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同时，会议印发的材料中，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触发了长期埋藏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他奉命去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到上海后，潘汉年了解到，此时李士群正在南京，于是，又马上赶到南京与李士群会面。见到李士群后，没想到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要见见潘汉年。对于李士群的要求，潘汉年反复权衡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机立断，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

潘汉年与汪精卫这次会见，是在李士群的挟持下进行的，会见中潘汉年坚持了党的原则。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时，正值整风运动进入干部审查阶段，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楚情况，便没有向华中局领导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时，他在见到毛泽东时，曾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此事，又因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与赞扬，咽下了已到嘴边的话语。他不曾料到，这会成为他个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大挫折，造成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4月2日，潘汉年向参加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并说明了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他所写的一份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请他转报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觉得事关重大，当天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迅速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4月3日，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

4月17日，上海报纸公布了潘汉年以“内奸”罪而被捕的消息，在上海市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一时掀起轩然大波，一段时间内揭发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接着，这股批判浪潮同潘汉年一起，消失在中国大地上，人们渐渐把他遗忘，只有他的一些战友满腹疑惑，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心头蒙上了层层阴影。同时，有一大批人因为过去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同样遭受了厄运。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不久即被假释，与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潘汉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又经受了长达5年的“审查”。到1972年，以原来的罪名，报经当时党中央批准，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未办改判的法律手续）。

潘汉年虽身陷逆境，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为其他同志写证明材料时，他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1970年，他为战友刘鼎写了翔实的证明材料，使刘鼎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免受冤屈。

1975年5月，潘汉年和董慧被安置到湖南省公安厅洣江茶场。这时潘汉年已年近七旬，身心交瘁，步履艰难。

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病情加重，卧床不起。3月24日，董慧用“萧淑安”的化名把潘汉年送到湖南长沙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4月14日晚上19时54分，潘汉年因病去世，终年71岁。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

对潘汉年的问题，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党中央写信表示怀疑。但是，由于过去党内存在“左”的思想影响，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他的问题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当年同潘汉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纷纷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潘汉年案件。1978年，董慧也曾向有关部门写信，提出申诉。1980年11月3日，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廖承志在发言中提出：我和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因此，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

与此同时，潘汉年的亲属也多次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希望能对潘汉年一案作重新调查、处理。

廖承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及潘汉年亲属的要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他对潘汉年有着很好的印象，认为他是白区工作的好代表。解放以后潘汉年在上海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潘汉年在担任上海财经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处理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中的谨慎和稳妥的表现，曾受到在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的高度重视。他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个水落石出。为此，他亲自调阅了潘汉年案件的有关材料。

此外，陈云又要求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1年3月，中纪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全面的复查。中纪委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有关的历史档案，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作了调查。特别是李克农1955年向中央报告中列举有关潘案的五大反证，对这次复查有很大帮助。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时间的努力复查，终于有了结果。

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根据潘汉年案件复查结果，党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文件，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为此，中央决定：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二、凡因“潘案”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被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党中央还对潘汉年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邀请潘汉年部分生前的战友和部分受株连的同志参加座谈会，以表达对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深切怀念。许多老同志在座谈发言中，追忆了潘汉年的历史功绩。

同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特派市纪委筹备组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市文联党组成员于伶和潘汉年的亲友专门赴湖南省洣江茶场，把潘汉年夫妇的骨灰送往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5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廖承志、陈丕显、王鹤寿等以及潘汉年生前的战友李一氓、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到车站迎接潘汉年的骨灰，并在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党旗的仪式。

潘汉年平反昭雪以后，根据党中央文件的精神，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又专门成立了潘汉年案件复查办公室，对受“潘案”株连的千余名同志的错案进行了全面复查，并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第二章：从“小伙计”到文委书记

从三德里开始的友谊

——楼适夷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上海闸北宝山路，有一条弄堂叫三德里，不知现在还在不在，那是在青年时代很值得纪念的地方。是五卅运动大浪潮过后不久吧，我们几个年轻的朋友自己业余经营的一个小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办得越来越兴旺，借的一家小烟纸店楼上的房子，再不够我们回旋了，于是找到了这三德里的房子。”整幢我们租不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是一个穷团体）合伙，租了那儿A16号的小楼。过了不久，“创造社”依靠读者5块钱一股的资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有个门市兼编辑处，住进A11号，成了邻居。郭沫若去广东前经常来，记得郁达夫在上海独身时，还在楼上住过。相去不远是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化气氛很浓。不过现在记忆的是那儿的一群“小伙计”。别说小字辈，倒是当时和后来成为文艺界名人的。周全平算个小头目，数得起名字的，有柯仲平、叶灵凤和潘汉年等等。

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于义务劳动。而对出版部又都是5元钱的股东身份，就因常常到A11号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都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二真不愧为“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汉年和叶灵凤合伙，两个人办了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叫《幻洲》。那是取的沙漠中一块小小绿洲的意思。这《幻洲》作为文学刊物有个特点，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叫《象牙之塔》，是由叶灵凤负责的。叶灵凤既写小说，又画琵亚词勒式的画，有时穿着三友实业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蓝雪花纹的大褂，外加上红雪花纹的马甲，真像冒充的王尔德，见了叫人吓一跳。

潘汉年担任的是刊物的下部，叫做《十字街头》，专登杂文，有时半本刊物几乎是他一个人包办，化了许多名，什么亚灵，泼皮，水番三郎等等，擅长嬉笑怒骂，什么胡适，吴稚晖，狮子狗曾左李之流，没少挨他的骂。他的“新流氓主义”就是在那儿提出来的。有时骂得走火，胡说八道，说什么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骂出来了。但大家还是爱看。因为他的有些文章，都是我们大家聊天聊出来的。言以见志，比方参加聊天的小头目周全平，就说过：“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有时，大家听了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过了几年，果然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他所经手的革命经费，逃之夭夭了。至于这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小潘，可想不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党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小伙计”们有几位坐过一回牢。孙传芳封了门市部，把他们带走，幸而当淞沪督办的是学者丁文江，有谁走他后门，放出来了。等到来了蒋介石，出了“四一二”事变，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为江南书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图书馆则依然存在，关了一阵门，又开张了，直到1929年给封门，捕人，没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的党，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还在公开活动，依然和叶灵凤一起，办了一个文艺刊物《现代小说》，写他的小说，住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所谓“听车楼”上，一方面却成了地下工作者。鲁迅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互济会由王弼出面请先生吃饭，小潘也在场。这一次鲁迅与他谈得很亲切。1929年酝酿成立“左联”，就是他和冯雪峰、冯乃超去请先生出来挂帅的。1930年“左联”成立，有先生的讲话，也有潘汉年代表党的讲话。前者有冯雪峰的记录，可惜后者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离开上海两年多之后回来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仍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这么个小潘，有时见到，知道还在上海，有时许久见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派一个姓潘的叫潘什么同志作代表去谈判。我才知道这潘什么原来就是小潘。

后来，我在南京，和汉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几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见客了，回来偷偷告诉我：“你猜来的是谁？是汉年，他是从延安来的，来谈判。”过不几天，梓年背着行李走了，给我和一起的几位同志来一封信说：“形势很好，你们大家也快出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个来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党，告诉我办事处的地址说：“你自己去好了，那儿有熟人。”我就去了，见我的是小潘。他问了我还留在那隔离世界的人们，—一把名字记下。我提出要知道些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他给我看一个文件，红油墨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芦沟桥事变告民众书》。我一看就发愣，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一时不了解，慢慢看一阵，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干啥。周而复同志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应问，也不敢问。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小潘，小潘，干么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

潘汉年在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中

——吴黎平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30年代初，我曾和潘汉年同志一起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当时，他在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7月，我遵照党的指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宣传部长是李立三同志。我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主编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刊物《环球》；一方面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代表参加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工作同志聚集在上海。在革命文化界，一度存在着不同团体和派别，未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核心。当时，在这些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派别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有某种原则意义，但其中也确实包含一些狭隘的情绪和偏见。这不利于革命文化工作者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当时，潘汉年同志是文委书记，负责组织领导。

我在潘汉年同志家里同他接上了头。那时，潘汉年同志夫妇俩住在上海新闸路的一间厢房里。我们的初次谈话很自然，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他向我介绍了革命文化界的状况，分析了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形势。我觉得他的谈话是客观的，深刻的，抱有革命信心的。

当时，文委每周或隔周开会，会议地点不定，经常是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店里，大家装作喝咖啡闲聊天的样子，作为掩护。遇到有重要的事情时，则到潘汉年同志家里开会。通常参加会议的有文委成员朱镜我、杨贤江、李一氓、王学文、李初梨、彭康、冯乃超、彭芮生、林伯修等人。文委讨论文学问题时，也请夏衍同志参加。

潘汉年同志在领导文委工作中，是公正的。当时革命文化界里面各种意见很多，特别是“创造社”的某些同志和鲁迅先生不和谐，有些成见。潘汉年同志能够超脱门户之见，和鲁迅先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对原“创造社”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潘汉年同志善于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他机智灵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来往自如，从容不迫，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建立了各种联系，为进行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他对党的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天总是在东跑西忙。潘汉年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工作，很少考虑个人安危，总是那么乐观。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起上海的街道上帝国主义巡捕、国民党特务到处游窜，潘汉年同志轻蔑地说：那群家伙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不怕他们，总是有办法的。

大约是在1929年11月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向潘汉年同志谈了对于革命文化运动的三点意见：一是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革命文化工作者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要闹这个派那个派，争个不休；二是我们要尊重鲁迅先生，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社团，统一和加强党对革命文化运动各个方面的领导。潘汉年同志很同意这些意见，表示自己也有这些想法。我们交换了对于工作的一些具体设想。随后，文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潘汉年同志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意见，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给大家作了很好的榜样。会后，我和潘汉年同志约定一起去拜访鲁迅先生。

当时，鲁迅先生家住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个弄堂里，常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看书和约人谈话。我们和鲁迅先生约好在内山书店见面。不久，我们按约定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先生。在一间僻静的房间里，我们和鲁迅先生谈起了对于文学界现状的估计和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见，希望文化界同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请鲁迅先生在组织进步文化界同志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先生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谅解，认为他们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并同意用“左翼作家联盟”作为组织的名称。我们提议开一个会，专门把成立“左联”的事情讲一讲，邀请鲁迅先生出席讲话。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大约是1930年1月底，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靠近外滩路口的一座红房子的二楼，文委召开了“左联”的一次筹备会，大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是一个茶话会的形式，由潘汉年同志主持。鲁迅先生到会讲了话，大意是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艺而努力奋斗。会上我也作了发言，一是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进步文化工作者、左翼文艺团体应当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当时苏区红军武装斗争的发展形势很好，我们革命文艺界也应当放弃过去的论争，广泛地团结起来，创造中国革命文化斗争的新形势。二是说在这个斗争中，大家要拥护鲁迅先生，把鲁迅先生作为我们革命文化运动的旗帜，向敌人进行斗争。这次会议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大量的组织工作是潘汉年同志承担的。他对上海文艺界情况熟悉，交游广泛，活动能力又强，联络了许多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朱镜我、杨贤江、彭康、李一氓、冯乃超等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

这次筹备会开过不久，我由于受到王明的诬陷打击，被撤了职，离开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没有能够参加“左联”成立大会。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和左权、陈启科等同志就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行为十分反感，曾不断有过斗争。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书，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罗织罪名，把我撤职。并布置在文委系统内对我进行批判。汉年同志对于王明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并不赞同，更反对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批判会”上，他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

我被撤职离开文委后，在地下支部“锻炼”期间，尽管经常要在晚间外出贴标语、撒传单，但我总是关心着汉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汉年同志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潘汉年同志等战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时，也经常撰写一些文章，在文委和“左联”的刊物和书店发表、出版，作为对革命文化运动，对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种支持和拥护。以后，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狱，和汉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1932年，我被党营救出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汉年同志也从上海调来苏区中央局工作，我们又见了面，久别重逢，十分亲切，不禁回忆起在文委期间一起工作战斗的情形。同年11月间，国民党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人来苏区和我党联络共同反蒋抗日。潘汉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军来人接洽，随后又作为我党的代表到福州进行谈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阻碍，红军未能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配合十九路军，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败了。我们红军的情况，也就更为危险了。

1934年10月，我们一起随中央红军长征，潘汉年同志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我任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在工作上来往就不很多了。遵义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出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从这时起到解放战争，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全国解放初，我们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时，他是上海市副市长，我是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当时，我党刚进入大城市，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坐下来闲谈叙旧的时间。我总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去登门找他，往往又顾不得多谈，潘汉年同志每次都是积极帮助设法解决。我们虽然分别多年，但仍保持着以往的友好关系。

我和潘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1955年。这时我在北京工作，他从上海来，在中南海遇到了，没有来得及多谈。没想到不久就传来了潘汉年是“反革命”，被逮捕了的说法，使我大吃一惊。我讲不出更多的根据，但总感觉这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想象，难以理解。大约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缘故吧。确实的，多少年来，我心目中的潘汉年，还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战斗时的那个生气勃勃的“小开”，总是蒙不上一丝一毫“内奸”的影子。不论经过了多少岁月的磨洗，不论在何种场合，每当回忆到30年代的斗争，回忆到文委、“左联”，我总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汉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庄严的工作。

而现在，20多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我心中激动不已，不可想象的，终于可以想象了，难以理解的，终于能够理解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给人民留下的真相，是不会被几句诬陷不实之词所掩盖和湮没的呵！

1982年12月27日

“左联”的成立与潘汉年的作用

——冯雪峰

①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原题为《回忆中的潘汉年同志》。本书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潘汉年初次相识，是1928年12月在上海。

在鲁迅1927年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的日记中，也记有潘汉年同别人一起去见鲁迅的事，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潘汉年显然不可能是代表党去谈问题的。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酝酿是从1929年10月后就开始的。潘汉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1929年10月、11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我去同鲁迅商谈，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这时候，据我了解，“创造社”方面，潘汉年主要是找冯乃超；“太阳社”方面，则找阿英（蒋光慈好像还在日本）；同时潘汉年也找夏衍、洪灵菲等人谈。

大概在1929年底，产生了所谓基本构成成员12人，我记得是鲁迅、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彭康、夏衍（沈端先）、阿英（钱杏邨）、柔石、沈起予、洪灵菲、阳翰笙（华汉）、冯雪峰。这也就是发起人和筹备人的意思。这名单是由潘汉年提出和各方面商量决定的。

在“左联”成立时通过了由冯乃超起草的纲领草稿，当时作为中宣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肯定看过。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是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开的。到会的我记得有30多人。潘汉年代表党先讲话，而后是鲁迅等讲话。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和成立，是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30年2月间，也是潘汉年发动和主持的。鲁迅是发起人之一。

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潘汉年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担任了另外的工作。

潘汉年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大概是在1933年9、10月间。12月底我从上海到瑞金的时候，他正在福建人民政府做我们党的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他回瑞金。

1934年10月潘汉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和第三共产国际联系。

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大概是1936年4、5月间。6月间，我从上海到香港同他取得了联系。我随即返回上海。6月20日左右，我派周文送密件到西安转中央，向中央请示埃德加·斯诺要进陕北的问题和报告，潘汉年已同我取得联系。

这一年7月上旬，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约四五天，随即到陕北中央去。

潘汉年回上海后，即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潘汉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间，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两广反蒋事件失败的时候，潘汉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区的一个很僻静的X园里（可惜地名已忘记，只记得里面有冷饮处和高尔夫球场）去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借用飞机。见了张学良，但是飞机没借成。到现在连当时要借飞机做什么用也给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点多钟，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30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他报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间，即在抗战开始之后，叶挺同志来到上海。当时叶挺同志住的旅馆在沪西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潘汉年带我去看望叶挺同志。在那里我还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汉年告诉我，李一氓从西安调来，将在叶挺同志领导下工作。

1948年2月间，左恭从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党的关系，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过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过邵荃麟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同左恭谈了话。我自己还到潘汉年家去做过客。这是我们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理者冯夏熊注：这是根据我父亲冯雪峰同志的遗稿整理的）

潘汉年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曹力奋

在潘汉年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早期曾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经历，人们知之甚微。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移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就不难发现，潘汉年受命转入党的隐蔽战线之前，已在左翼文坛驰骋了5年。他编辑出版新文学刊物，发表大量别具风采的杂文、小说和新诗，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由一个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成长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他组织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筹备与成立，推动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阵营的形成，并扩展至平、京、津、汉、广等各大城市，为开创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一、崭露头角的创造社“小伙计”

1923年10月12日，17岁的小学教员潘汉年以刊登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首新诗《不敢》叩开了文坛之门。望着报上印成铅字的一行行小诗，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令他兴奋不已。两年后，潘汉年只身离别故乡宜兴，踏进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潘汉年迫切希望能在这片洋溢着五四新文化清新气息的土地上尽情汲取更多更新的知识。他先是考取了文艺界知名人士黎锦熙、黎锦晖兄弟开办的中华国语专科学校。不久，学校因故停办，潘汉年经朋友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编辑部。五卅惨案的发生，把不甘于终日埋首书案的潘汉年卷入中华书局职工反帝爱国游行示威的行列，其间结识了中华书局印刷厂的中共党员。随后，潘汉年还积极参与发动中华书局职工向资方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校对工作之余，潘汉年笔耕不辍，创作的新诗、童话、杂文、短论陆续见诸报端，逐渐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1925年9月，潘汉年应同乡周全平之邀去《洪水》编辑部帮忙。该刊是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自五卅运动后一改浪漫主义创作倾向而创办的，它注重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讨论，抨击现实生活的黑暗与不公，很受青年读者青睐。编辑部因人手紧，没有明确分工，编辑、校对、发行，大家样样都干。这给了潘汉年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次年春，创造社出版部成立，租了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11号作门市部，潘汉年正式加盟其间、和周全平、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等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出版部主要出版、发行创造社成员的作品和《洪水》半月刊，工作紧张忙碌。

潘汉年所分管的是刊物订户工作，他善于同各种不同阶层的人员交往，与许多读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精力充沛的“小伙计”们不满足于出版部的繁杂工作，余暇闲聊中，潘汉年提议办一份“小伙计”们自己的刊物，大家一致响应。说干就干，一张由潘汉年全权负责编辑的八开四面小报《A11》诞生了。从取自出版部门牌号的刊名，足以看出潘汉年等年轻人不拘泥于传统，富有创新意味的鲜明个性。潘汉年在《A11》创刊号上写道：出版部被“四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周围的碳酸气。”①《A11》为“小伙计”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愤世嫉俗提供了宣泄之处。十余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其中《原来如此“内除国贼”》一文，就进步报人邵飘萍因“有宣传赤化嫌疑”惨遭杀害发出悲愤的感叹：“中国的国贼，原来不是军阀，不是资本家，不是串通外人的卖国者，是‘有宣传赤化嫌疑’的不爱国者！谁说的打倒军阀呢，‘内除国贼’的‘国贼’还要请军阀去除的。”②

①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88页。

《A11》仅出至第5期便夭折了。十余天后，潘汉年又主编出版了内容比《A11》更丰富充实的32开《幻洲》周刊。不幸的是该刊也只发行了两期即被查禁。紧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宣传共产，发行过激刊物，肆意毁谤政府”的罪名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没收了全部《洪水》半月刊，并抓走了叶灵凤、柯仲平等4人。潘汉年、周全平因不在场而幸免。事情发生后，潘汉年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首先想到同在三德里的中国济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救济革命被难者为主要职责的革命群众团体。

潘汉年向济难会负责人、中共党员阮仲一、王弼说明原委，他们答应聘请律师为叶灵凤等出庭辩护，又陪同潘汉年他们带了衣物食品去警备司令部探听消息，安慰被捕人员。在友人的指点下，潘汉年上门拜访商务印务馆老板高梦旦，恳请他出面向淞沪督办疏通。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圆满解决。创造社出版部复业，叶灵凤等人获释归来，只是《洪水》未能复刊。

在参与编辑《洪水》半月刊的同时，潘汉年面临着人生旅途的重要转折点，他作出了神圣而庄重的选择。1925年秋，潘汉年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他已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员文化战士。

二、《十字街头》的文坛骁将

短短数月中，创造社一系列刊物《A11》、《幻洲》、《洪水》遭禁，这非但没有使潘汉年心灰意冷，相反激起他向封建军阀政府奋起抗击的勇气和信心。在冷静总结前一阶段办刊经验的基础上，1926年10月，潘汉年与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问世了。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成为一无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分上下两部，叶灵凤主编上部《象牙之塔》，专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下部《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主要刊载杂文、述评、随笔。上下两部风格迥异，给人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但也可能是潘汉年为避免重蹈《幻洲》周刊覆辙而巧妙运用的一种策略。

潘汉年坚守的一条办刊原则是：“不计毁誉，凭着要出版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干下去。”“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要说的话。”①他认为每个刊物必须有独立个性，“只凭读者的喜欢与否来绳准内容，就要商业化了。”因此，在主编《十字街头》时，他提倡一种“街头哲学”，即采用街头搜集来的材料，通过自己的道德准则—一作出评判。潘汉年把自己标榜为“新流氓主义”，并解释道：“新流氓”应有的精神是“好管闲事”。“只要是社会上的一切变化，与我们都有影响，我们都应当问信。”②从这里，我们能够领略到潘汉年身上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①《潘汉年杂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97页。

《幻洲》半月刊从创刊至1927年2月，每期《十字街头》总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潘汉年用不同化名写就的，共发表近40篇杂文小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就连远在厦门大学执教的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及《幻洲》是当时最风行的刊物。本着“好管闲事”的精神，潘汉年写下了《山东大学行跪拜礼》、《又是投壶》、《仍恐有伤风化》、《电话局长的礼教》、《极刑问题》等文。在《爱国的先生们到哪里去了》一文中，潘汉年谴责那些口口声声高喊外抗强权、爱国保家的国家主义者，面对租界当局在租华交界处设置电网、不准华人通行所表现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讽与断言：“拥护国旗红黄蓝白黑，正是保家又爱国！青天白日满地红，亡国又灭种！①这些文章大都切中时弊，锋芒直指军阀政府、国家主义派、维护封建文化的复古派。

①《潘汉年杂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转眼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取得了节节胜利，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扩展到长江流域。潘汉年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伐前线南昌的信函。原来，是创造社前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书长李一氓邀请潘汉年前去南昌政治部主编《革命军日报》。征得党组织同意后，是年2月，潘汉年走出“十字街头”（《幻洲》因之而停刊），赶赴南昌，换上戎装，英气勃勃地投入工作。为适应军队宣传鼓动的需要，潘汉年努力将报纸办得严肃而不失生气，以通俗朴实的文字鼓励军营官兵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

4月中旬，潘汉年奉命回到上海。在三德里，分别两个月的“小伙计”们沉浸于重逢的喜悦中。岂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勾结上海帮会流氓，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策动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无数工人、学生和市民惨死在枪弹下，宝山路三德里一带血流成河。潘汉年亲眼目睹大屠杀的惨状，悲愤交集。鉴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大规模“清党”，潘汉年遵照上级党的指示，辗转于武汉、九江等地，于7月底重返上海。

国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潘汉年的心情是复杂而痛楚的。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患，很快化为拿起笔杆作刀枪，不屈不挠继续战斗的精神力量。潘汉年找到老搭档叶灵凤，决定重振旗鼓，恢复出版《幻洲》半月刊。他们把编辑部从笼罩着“四一二”大屠杀阴影的三德里迁到霞飞路一家皮鞋店楼上。临街的屋子，终日充斥着马路上有轨电车、汽车等嘈杂声，潘汉年给书斋取了个雅号名曰“听车楼”，并以“听车楼随笔”为题，在《十字街头》上撰写了多篇笔锋犀利、矛头对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杂文：《汪先生悔不当初》、《禁止白话文与切切毋违此令》、《普天共庆》、《释国家主义者的新口号》、《血淋淋的头》、《又多了一种党间》、《南京事件》。《爱国先生的真革命》等。

在国民党右派一片“清党”声中，潘汉年的讽刺诗《元旦书红》刊登在《幻洲》上：“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刀下头落，革命成功。升官发财，有吃有用。委员老爷，革命光荣。汽车马车，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实同志，纳贿从容。上拍下吹，官运走红。赤化暴徒，决不留种。杀尽青年，清党反共……”①诗刺痛了国民党政府，《幻洲》被政府以“宣传反动”的罪名查禁。《幻洲》刚被查封，潘汉年即以专为青年说话的周刊《战线》取而代之。这充分展示了潘汉年机智顽强、灵活善变的战斗个性。他在《战线》的开场白中写下了一段肺腑之言：“我们甘愿顶着反动的罪名跑上战线去冲锋，不能日视敌人猖狂而退缩，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的枪炮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顺的奴才。”②

①《牺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页。

②《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8期，第24页。

这一时期，潘汉年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后发表有十余篇短篇小说及一部长篇《牺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离婚》，后期部分作品刊登于他和叶灵凤1928年初共同创办主编的《现代小说》月刊上。该刊创刊时偏重于反映爱情生活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在革命文学口号的影响下，办刊方针转变为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上，倡导“普罗文学”，增辟了文艺思想理论批评的栏目。潘汉年的代表作《浑沌中》、《白皮鞋》、《法律与面包》、《浮尸》等，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时代气息，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打上革命文学的烙印。在小说《例外》中，潘汉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没有我们革命者现实的幸福，我们的生活只是热烈的斗争，我们的命运只是流血的牺牲，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创造未来的光明自由社会的实现。”①

①《牺牲者》，第112页，花城出版社。

三、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

——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组织者

从1928年起，潘汉年以其出众的才华在后期创造社中脱颖而出，但潘汉年办事的机敏、干练，特别是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更引起党组织的重视和赞赏。还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间，性情温厚、开朗、善于交际的潘汉年结识了一批文化、新闻、出版界的进步朋友，他们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加强对文化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开辟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传部长李富春找潘汉年谈话，布置了任务。同年夏，潘汉年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团体及有关单位的中共党员集结起来，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苏省委指定潘汉年为书记。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任书记。1929年6月至7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年仅23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转向领导文化界党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项艰巨工作，就是解决了持续一年有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身为创造社成员的潘汉年也盲目地参与了对鲁迅的批判。1929年秋，论争才引起党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确认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

潘汉年考虑到论争给双方在感情上造成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必须从扭转创造社、太阳社党员的思想入手。潘汉年在与创造社党小组成员阳翰笙商量后，主持召开了由冯雪峰、夏衍、柔石、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参加的党员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基本取得了共识：文化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行动。

作为文委书记的潘汉年，此时一面对太阳社、创造社党员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一面在《现代小说》上发表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一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就论争的焦点问题重新进行辩证的、客观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潘汉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罗文学限制于仅仅描写普罗生活，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无产阶级以其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产生了本阶级的艺术。区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否从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出发，而不是用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无产阶级生活为标准。

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①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无论工人题材，还是地主、资产阶级、小市民、农民的生活都能写。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写无产阶级本身生活，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当然，潘汉年也承认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是普罗文学的极好题材，但这决非坐在家里凭空想象可以写成的，唯有亲身观察体验普罗生活，奋勇地参加普罗斗争实践，方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普罗文学作品。潘汉年对上海左翼作家所处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环境十分熟悉，他进一步提出：“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无产阶级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至于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②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阐明了普罗文学的划分标准、题材范围，这是他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作的初步探索。

①《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

②《现代小说》第38第1期。

不久，潘汉年又撰写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一文，要求从事左翼革命文学的同志通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以利于左翼文学运动健康发展。文章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不允许从个人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态度去攻击别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够的。“为了要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普遍化，为了要确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理论，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与生活的错误，为了要指导一般青年读者怎样去理解作品，我们应当马上开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自我批判。”②这样才能纠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自负的态度和不正确的倾向。

①《拓荒者》第1卷第2期。

②《拓荒者》第1卷第2期。

潘汉年的两篇文章对历时年余且近白热化的论争得以逐步平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论争双方开始正视、认识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分清了文化战线上真正的敌友，在携手并进中加深了理解与沟通。最终使这场“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①

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平息论争的基础上，潘汉年又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连续开会，讨论以何种形式把一切进步作家组织起来。几经商议，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建立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文学团体。潘汉年让冯雪峰去鲁迅家中拜访，就成立左联的有关事宜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听了冯雪峰的汇报，高兴地表示赞成。此后，潘汉年又同包括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及党外人士郑伯奇在内一起座谈，再次重申了党中央结束论争的意见，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已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经潘汉年提名，由各方商量后推定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夏衍等12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1929年10月，潘汉年在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上，要求尽快拟订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分头征集会员。他还叮嘱夏衍、冯雪峰等人及时向鲁迅通报每次筹备会议的情况。左联发起人名单和纲领形成后最先征得鲁迅的同意，再由潘汉年过目后转送党中央审阅，于1930年1月定稿。

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对鲁迅的争取、团结工作。尽管潘汉年曾参与了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当党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论争和对鲁迅的批判后，潘汉年勇于率先作出自我批评，并专程赴内山书店与鲁迅交谈，虚心倾听鲁迅对左联筹备工作的意见。潘汉年的真诚坦荡和高度的党性觉悟，令人肃然起敬。

经过近半年的筹组，左联成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潘汉年与筹备小组最后确定于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左联成立大会。前一天，潘汉年由夏衍等陪同实地察看了中华艺大四周环境。他们沿北四川路、窦乐安路至中华艺大二楼会场，连学校的每个房间都仔细检查，学校共有几个出口，分别可从哪条路出去，都—一问明，心中有数。由于会议筹备时间较长，与会人数又多，为防范国民党当局破坏，潘汉年在会场内外布置了数十名纠察队员，确保会议安全。此外他还派了4名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暗中保护鲁迅先生，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便可安全护送鲁迅从后门撤离。

左联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冯乃超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简要说明，鲁迅先生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出席会议并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左联的当务之急是团结全体左翼作家行动，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潘汉年针对文艺界存在的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缺乏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文艺批评、单纯地为文学而文学、不以文学推进政治运动等错误倾向和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报告阐明了左联成立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潘汉年的讲话全文刊登于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左联刊物《拓荒者》一卷三期上，它无疑是党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对30年代左联的发展壮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继左联成立后，社联、剧联、美联等左翼团体纷纷建立，这一切也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在社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文委作了筹备经过和社联今后工作计划的报告。要求社联通过出版刊物、书籍、组织研讨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系统地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扩大、深入与发展。

对左翼戏剧运动，潘汉年同样予以热情关注。早在筹备左联期间，潘汉年看到上海话剧舞台上活跃着不少业余剧团，吸引了一批学生、青年工人、店职员，就派夏衍加入正在组建的上海艺术剧社，加强党对剧团的引导。当他得知艺术剧社首次公演需自筹经费时，立即慷慨解囊。在艺术剧社的倡）k下，上海9个话剧团体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后因艺术剧社、南国社被政府当局查封禁演，戏剧运动联合会内部产生动摇，潘汉年会同郑伯奇、田汉、夏衍等专门作了研究，解散了联合会，另组“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0年8月，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这是我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次大团结，也是左联、社联、剧联等文化团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潘汉年为“文总”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执委、“中国反帝大同盟”党组书记、左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职，直至1931年调往中央特科。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潘汉年虽然离开文坛，但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他的短论杂文仍不时出现在《救亡日报》、《联合晚报》、《文革》等报刊上。

潘汉年自担任中央文委书记以来，团结和率领文化界党员、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扩大党对左翼文化界的影响，培育了一支浩浩荡荡、坚不可摧的文化生力军，不愧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奠基人。

文艺通信

——普罗文学题材问题

①本文原载1929年10月15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十月扩充纪念特号”。

潘汉年××：

将近两年了，我蛰居上海，没有离开一步，这次为着要见你，居然使我与上海有三天的小别。在这短短的三天中，我们什么都谈到了，可是什么都没有谈得详尽。此刻我又离你归来，孤孤的一人坐在沪宁车中，我遥望着郊外的野景，自然的美好，并不引我入胜，——或者说它不会令我神往，盘旋于我心头的，只是那别后的惆怅！

我的邻座是两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他俩有时候低首看书，有时候便谈论所看到书里内容的感想。车过了苏州，他俩大概是感到疲倦，各自抛弃了书本，只是闲谈，最初是谈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由这哲学问题，忽然又扯到文学上来了，一个是说明文学的必然有阶级性，他痛低新月派梁实秋否认文学有阶级性错误，及金屋派否认文学没有时代性的谬论；一个是怀疑现在的中国，是否能够产生Proletarian文学？

他说：“我是承认普罗（无产阶级）文学的，但是中国的Proletarian文化程度是如此落后，很少有几个认识一个大字，现在他们怎么会有文学产生呢？”

另一个青年说：“我想普罗文学并不一定是只有Proletarian自身会产生，你我假如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了实际的认识与同情，根据他们日常所感受被压迫与惨痛的生活经验来创作，这就是普罗文学了！”

“那末只有描写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生活与反抗就算普罗文学了？”

“对啦，普罗文学是普罗自己的呼声。”

“这一年来，高谈普罗文学理论的人很多，拥护普罗文学的人也很多，以普罗文学自命的创作家也很多，为甚始终不见普罗文学的成绩呢？就是在报章杂志上偶尔见着一二篇，大都还是以小布尔乔亚同情于普罗的描写而已。”

“什么都要慢慢的来，一种新的运动发展是很不容易的，譬如现在我们认定唯物史观的哲学是正确的，可是还有不少唯心论的教授们在那里正努力开倒车工作！”

我很仔细的听他们谈，很有兴趣的注意他们所谈的一切，不幸谈到这里，他们的话头不晓得怎样渐渐转变到恋爱问题上去了，他们聚精会神的畅谈三角恋爱了！——一定的，青年闲谈的方法，开始不管你提出什么问题来谈，结尾必然以谈恋爱来下场。

我听了他们关于普罗文学一段的谈话，我便想起普罗文学这一口号是深深的被多少人误解了！尤其是“什么题材是普罗文学”的理解，在我们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中间是有一种一致错误的倾向，譬如上述那两个青年，他们是把普罗文学限制于普罗生活的描写，这是怎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

关于这一点，我们面谈的时候，我也没有详详细细的告诉你，现在我受了他俩谈论的启示，顺便再和你谈谈，反正孤寂地坐在车中正感着无聊，我乐得借笔与纸来排遣我心头的怅惘。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到今日正遇着Proletarian的抬头，由这一个矛盾，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有它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因此亦就有他本阶级的艺术，所以要分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就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不是以普罗自身阶级的观念形态而出发，而不是离开了这一基点，只是拿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普罗生活为标准。在过去，资产阶级与封建思想的文学史，并不缺少描写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生活的文艺，我们为甚不承认它是普罗文学呢？就是因为它并不是把握得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来出发，只是怀抱一点慈悲心肠而哼出那同情的呼声，换句话说，站在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上，看不惯有这样可悲可悯的人类生活罢了！

在普罗文学的范围中，不是仅仅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根据普罗自身的阶级意识，还要去理解去批判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切现存的社会生活，它应当反抗压迫阶级的凶残，暴露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侵略……总之，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正是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及其任务是一致的。我借樊仲云先生的话总结一句：“凡能以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n）的观点，观察事物，笔之于书的，亦尽可说是普罗文学。”（见《小说月报））20卷1号《通过了十字街头》①）

①原编者按：此刊1929年回月10日出版。副题是《今后文艺思想的进路》，署名仲云。

同时我应当说明，谁能够以被压迫的劳苦工农生活做题材当然是很好的普罗文学，可是这不是勉强妄想可以达到目的，所谓去观察、体验普罗生活，这是一种非实践的概念论，得不到什么结果，只有严肃的去受普罗的革命集团生活训练，只有奋勇的去参加普罗的实践斗争，在这种实地的生活中，你才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生活正确的经验，等于许许多多革命前卫的斗争生活，不是你坐在家里空想可以得来的。

我们看了俄国现在的文坛，就可以明白，以工农生活做主要题材的作家，大半是工农出身的。因为在那里的社会组织变革之后，有了普罗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中国一般社会的文化程度，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程度特别落后，像上海这样广大产业工人区，有几个工人能够用笔来写字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目前的普罗文学，并不要因为拿工农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太少而就失望，甚至怀疑普罗文学的提倡尚非其时，如抱这样的见解，实在是没有理解什么是普罗文学的使命及其任务的范围。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车已经过了真如，大家都在收拾行李，在这纷乱骚扰的状态中，我也不能再静心的往下写了。

现在我再借我的朋友的文章做我对于普罗文学题材范围意见的结论。

“普罗列塔利亚，是现社会唯一的批判者，而他们的阶级的观点，亦是现在唯一的客观的观点。所以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的批判的阻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凡是对于普罗列塔利亚底解放有关系的一切。”（见《创造月刊））2卷6期，初梨的《普罗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①

①原编者按：该刊1929年1月10日出版，全题为《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署名李初梨。

汉年1929.7.17沪宁车中

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

——潘汉年

①本文原载《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0日出版。

中国普罗文学运动发展到现在，其形态根据着理论的展开而逐渐被大众所认识。过去多少沉迷在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人们，曾经狂吠热嘲，把普罗文学当做洪水猛兽一般的攻击，而现在呢，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因为客观的必然性不可避免与阻难很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冲破旧文坛的巨浪，那些曾经诅咒与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人们，也不得不背转身子掉过头追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巨浪而前进。

因此，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自我批判的工作是急不可缓！为了要巩固我们的阵线，为了要整齐我们的步伐，为了要克服旧意识的抬头，为了要纠正不正确的倾向，……总之：要使这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在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过程的现阶段中完成其宣传与鼓动（广义的）的任务，自我批判的工作应当跟着运动理论的展开而当加紧执行。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对不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相同，他绝对不容许从个人的利害关系或者私人的情感而出发，不料最近，我过去的朋友周毓英，袭用四年以前，我与他办小报攻击军阀孙传芳及其走狗名流学者那种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态度，来攻击个人，而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他所说的清除内奸）

他批判叶灵凤最近一篇创作《神迹》，而不从他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的非无产阶级而立论。他批判我的断篇《例外》的失败，不从文学理论上及作品表现的思想正确与否着眼，而在论前加了一段观念论推测的莫须有的事实，藉以反证我作品失败的原因。批判白薇女士的作品而在她的作品中用了英文名字，便论断作品的好坏。批判钱杏邨的论文，不从论文的内容来考察他的错误与否，而主观地骂人捧与不捧。

叶灵凤的《穷愁自传》是一个长篇小说，不看他的内容而诡言是和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一般的自序传，看见了题目上有“自传”二字，连内容都不翻一翻，强说是作者的“自传”！并且发了一堆自传作品好与歹的理论，顶可笑的是要批判郭沫若的自序传作品的失败与否，而把看见人家批评的题目便认定是“攻击”郭沫若自序传的失败！批判杨邨人的小说不是普罗作品，不加以一点理由的说明，等于他说全平那篇《荣归》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一般可笑！——什么叫“为艺术而艺术”，不知我的朋友周毓英懂了没有？我想他假如去翻翻他背后老板所编译的那《欧洲文艺史纲》便不会有这样浅薄无聊的笑话，……通篇是在题外发了许多没有事实根据的牢骚，似乎很左倾的牢骚，这样便算“忠诚的批判”吗？那真是毓英对自己的批评道：“坐在马桶上放臭屁！”

我们一点也不害怕人家的批评，郭沫若也好，周全平，叶灵凤，钱杏邨，……不管是谁，作品与理论毫无疑义的有被批评的必要，但是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种批评的目的与态度，和资产阶级文学家梁实秋，安那其主义的昆水氏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什么分别呢？

话又说回头，这也难怪我的朋友周毓英，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很是不够，因此无理解的周毓英，凭着他一点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劣根性的爆发，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批评文字，堂而皇之刊在“有点小资产阶级意味”（《乐群》月刊2卷12期174页）的张资平小说之后而出现了！

我们为了要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普遍化，为了要确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理论，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与生活的错误，为了要指导一般青年读者怎样去理解作品，我们应当马上开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自我批判。——同时，也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克服以普罗文学运动自负，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种错误的思想与荒谬的态度！关于周毓英在《乐群》月刊第二卷12号上发表那篇《忠诚的批判》的无理解，我另在《现代小说》三卷四期写了一篇公开信给他，题目叫《内奸与周毓英》。

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

——潘汉年

①本文原载《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出版。

一个社会旧有的经济基础到了不可避免的动摇崩溃，而形成急剧的变革时期，其社会上层的政治文化、艺术等，一定也随之而变动。中国的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形态，自然是根据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序而产生。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的程序到什么阶段呢？广大的工农大众，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剥削二重压迫之下，城市的民族工业非特没有发展的可能，且日见衰落倒闭，咱然，帝国主义的工业是相反正在发达。）而工人所遭受资本的进攻，愈见残酷，随之发生目前继续不断的罢工斗争，在全国各大重要商埠随时可以看到；农村经济的破坏，更为显著，一般农民的贫穷化，失掉土地的贫农日渐增加，因此贫农的与地主的斗争更为深入，农民武装的游击战争，弥满了全国。全国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已经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奋斗着，亟亟的争取他们自己的出路，——中国革命复兴的浪潮，正在高涨发展，这一显著的事实，只有无产阶级的叛徒取消派闭着自己的眼睛否认这一现象，跟在统治阶级的背后，掩耳盗铃的高嚷着“中国革命死灭了”。

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的文学运动——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无疑义的它应当加紧完成革命斗争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之任务！

有人批评过去的运动说：“中国新兴阶级文艺运动，在过去都是由小集团或个人的散漫活动，因此无大进展，且犯各种错误。”（见《萌芽》一卷三期第274页）对的！但是我想与其这样批评，毋宁这样说：过去运动的现象，充分表现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的浓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尚未深入。

现在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推动了一般文化运动者思想的左倾化，对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是进一步的认识与运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味逐渐被批判而克服，所以文学运动也跟着走到第二个新的阶段。——上海左翼作家五十余人所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这五十余发起人，过去分为好几个文学集团。而且彼此意见分歧，闹着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自我斗争，现在他们能够消灭彼此小集团互相对立的意识的，在没有形成联盟以前，他们曾齐集一堂，“开一讨论会，以‘清算过去’和‘确立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为讨论题目，……对于过去的运动，讨论结果，认为有重要的四点应当指摘：（一）、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而文学的运动。其次对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者有三点：（一）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底严厉的破坏，（二）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新文艺理论的建立。……还有更重要的一事，即全场认为有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据一卷三期萌芽月刊的记载）不久，果然形成了一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根据上述这一作家联盟成立的历史背景看来，当今革命巨浪到来，这一集团组织的意义是：

1．这联盟的结合，显示它将（有）目的意识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2．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的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

这是说明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意义，现在我再说到这一联盟应有的任务：

1．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没有普遍化的深入，所以当初这一运动的开始，便没有正确的形态，如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虚无主义的革命思想，充满了所有的文艺理论与作品中，一直到现在，含有毒质的革命文学作品尚在发展。我们要克服这一倾向及其危机，只有加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介绍外国已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可是一方面一定要加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在这两重工作中，才能够产生与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配合一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

同时只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宣传，才能更快的摧毁一切反动文学理论的存在，减少其麻醉与缓和革命斗争的作用。现在资产阶级的御用走狗、学者及小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诡辩家，不是正在积极的向我们做各种方式上的进攻吗？我们丝毫不能忽略这一理论的斗争！

2．确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我们单是发展文学本身的理论还不够，一定要注意到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理论的指导，就是说文学运动与政治斗争任务的联系的实际要怎样？举例说，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过去我们的运动与这配合是非常不够；其他如：我们要怎样去发掘反动者的思想根源？要怎样去突破反动阶级防御的战线？要注意怎样去指导与批判新进作家的理论与实际？怎样去帮助或发动青年文学团体的活动？……总言之，要确立斗争的策略与路线。在过去因为没有统一运动理论的指导，其发展非常迟缓与散漫，便不能在中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过程中，显示出文学运动的力量。

3．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作品大众化应该成为目前运动的中心口号，但困于文学理论的没有健全发展以及中国一般文化现状的特殊情形，这个问题，许多人以为无产阶级艺术与作品大众化是两个东西，换句话讲：大众化的作品好像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仍旧被艺术至上主义所蒙蔽，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二元论！目前中国工农斗争的勃发，正需要我们创制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作品，就是说，经过文学艺术的煽动与教育，加紧的鼓励他们斗争的勇气和情绪，当然，同时我们并不取消争取与鼓动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但是在目前工农大众斗争长足发展的时候，用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文化艺术去鼓励与煽动，是迫切主要的工作。假如我们的文学家，编撰一支民谣村歌曲形式（文字显浅明白，音调和谐顺口）似的鼓动斗争或暴露压迫阶级的作品，其艺术价值绝对不在皮面洋装、道林纸精印、专供大学生们所阅读的作品之下。

可是我们这些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要取得大众化作品的艺术形式与内容，不是凭空可以创造，一定要有大众化的生活的实际，才能做到，所以这里就马上关联着一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者生活大众化的一个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先要指出生活大众化，不简单是为了文学而生活，是为了无产阶级文学家应该有决心成为工农大众斗争队伍中的战士，遂能产生大众化的作品，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为了观察大众化的生活，创造大众化的作品，而是为了参加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才能创造大众化的作品。

一切从事文学运动的同志们！全中国城市工人的斗争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发，全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风起云涌而转变为游击战争的红军发展，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客观的环境告诉我们文学运动者目前的中心任务：加紧大众化作品的创作，是如何的迫切！

4．自我批判的必要：自己阵营内工作的检讨与批判，将加强我们运动的成果。要防止整个阵营中发生那些不正确的错误倾向的发展，只有坚决实行自我批判，才能够不歪曲我们前进的大道。自我批判不是闹着个人的意气，而是巩固与加强我们斗争的阵线；不论在理论上，作品上，运动的行为上，都需要大家站在整个运动的立场上，经常不断的执行自我批判，谁要反对或惧怕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他便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忠实勇敢的战士！也只有实行自我批判与理论斗争，才能克服与结算每个人一切旧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想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任务，绝对不限于我上面所举的4点。我不过根据目前革命的阶段，择其要者而言，因时间及篇幅所限，容有忽略与错误之处，希望大家予以补充与纠正。

第三章：在隐蔽战线上

为周恩来辟谣

——李一氓

①本文原载《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

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原文照抄）

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100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1932年2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1967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1968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无标点，上面启事的标点是我加的。作为法律文件，应该如此标点，其他标点都是不准确的。

忆潘汉年二三事

——徐雪寒

①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改、补充。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那时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他通过王昆仑同志，要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我曾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汉年同志约我在钱俊瑞同志家里谈话，关照我在工作上应注意哪些问题。我问到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时，他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对冯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他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暧昧态度。汉年估计很难达到目的，难安于位，所以他决定我的关系还是保存在俊瑞那里。并说，只要冯能站住脚跟，组织上一定派人来同我联系。这次谈话就这样简短明确地解决了。后来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我只去了两个月就回来了。

在这以后，我和汉年同志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1943年我到位于苏皖边区盯胎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时，才重新遇见他。原来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们撤退到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军部、华中局迁来后，刘晓、刘长胜和潘汉年同志分别担任过城市工作部部长、联络部部长。一天，汉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已有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华中局已决定把我分配到联络部工作。当时，党内的风气，对党的工作分配是不讲什么价钱的，我也就同意了。

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得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那时（约1944年夏），汉年同志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欺骗，要求汉年同志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同志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动员这位同志去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够说服这位同志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答应了。

到了上海处理完组织内部的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位同志。当时，我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诉他，汉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到根据地去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给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同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同志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潘部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同志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同志进根据地，她仍在潘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的有关组织。为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汉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经历告诉了我，并告诉我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派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帐，愿意出面营救。

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这就使我放心了。然后由我的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汉年同志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他便肃然起敬。等到我根据汉年同志的教导，晓以民族大义，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个汉奸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其后这个案子就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由此可见汉年同志的确是料事如神，而这是建立在他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之上的。

在党内斗争中，汉年讲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淮南根据地时，饶漱石利用整风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汉年对此表示了不满，也受到打击，饶漱石还告到中央。这些事，我听到一些，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审干整风中，扬帆受到延安“抢救运动”波及，被加上“特务”的罪名而被捕，从盐阜区押送到军部来，还给他加了脚镣。汉年是饶漱石指定的审查小组成员，他曾与我谈过此事。我说我在救国会时就认识扬帆，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特务。给他带上脚镣就更不应该，革命队伍内部这样搞法是不对的。汉年同意我的看法。他与扬帆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审查工作中实事求是，公正处理，不作任何违心之事。最后扬帆冤案得以正式纠正，汉年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电令汉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诉我，由刘长胜同志临时兼代联络部部长，要我多出点力，帮助管好部里工作。因为我本来早已在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里兼任研究根据地财经工作，组长是冯定同志，这部分工作归曾山同志领导。接着，汉年同志跟着华中局交通员往西北方向出发，准备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车，直奔北平，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去延安。20来天过去了，我们都以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华中局领导人突然找我去，说中央来电，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到北平的旅馆找不到潘，已经离开了。想来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点跟新派的交通员走，直接到晋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恋上海。

我到上海，在一个豪华的公寓住宅里，找到了汉年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并说：“你好大胆，不怕怪你自由行动？”汉年同志微微笑着说：“讲定10天内晋察冀派交通员来接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北平举目无亲，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党帮助，也没有社会关系掩护，老住在旅馆里，岂不暴露在敌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这里，我是如鱼得水，最安全不过了。”最后，他根据新交通员约定的地点，和新交通员见了面，并顺利地到达延安，参加了党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经济工作，与汉年不是一个系统，但也有一些联系，有时谈谈话，交换意见。我知道他工作范围比较广泛，情报、统战、经济等方面工作都有联系。他还曾要求我捐一笔钱给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先生，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也乐于照办了。

我在情报部门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汉年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无论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等，都有突出贡献。

汉年同志在对敌隐蔽斗争这一特殊领域里，机智勇敢，才华横溢，善于掌握出奇制胜的斗争艺术；他对干部了解、信任，并善于发挥干部积极性、主动性的领导方法；以及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这些美德永远值得我学习。

风雨话当年

——华克之

汉年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参加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直接领导人。解放前，我们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一道战斗了十几年；解放后，他蒙冤遭难，我也同案罹狱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组织上也为我重做审查结论，恢复名誉。记得1979年春天，我为申诉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时，憋在心里二十几年，不敢启齿的问题终于冒了出来。我问廖公：“您看潘汉年怎么样？”他马上爽朗地回答：“潘汉年是个好同志。”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交集，欲哭无泪。但这时潘汉年已离世两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听到这句话了。往事历历在目。我仅撷取片断，作此短文，权当心香数瓣，以告慰汉年和在他领导下的蒙冤逝去的战友们。

一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我曾经走过一段艰辛崎岖的反蒋救国的道路。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已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并曾作为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经过五卅斗争的锻炼，我成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部长。这个市党部有7名委员，其中共产党员4人，国民党左派3人。在几年的并肩战斗中，我同江苏、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佩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遗训，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也在升级。

1927年4月9日前后，蒋介石指使流氓捣毁了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人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险遭毒手。接踵而来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用鲜血教育了我这个国民党员，誓与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当然，蒋介石决不会容忍我这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鼻尖底下与他作对，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我三次。第三次竟将手枪和《组织农民暴动计划》等宣传品塞在我住处，栽赃诬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迁居上海。

在上海，我和小学同窗陈处泰（即陈惘子，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讨马列主义著作和反蒋救国之道。我的周围，还有几个原来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见，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蒋抗日的道路。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识：“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是我们的消灭目标，刺杀对象。陈处泰对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为党组织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对我们爱护备至，肝胆相照。为我们的“五步流血”的计划和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并且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说服我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不进这些意见。陈处泰将我们的态度再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既说服不了我们，只能预祝成功。我们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们成立了掩护这一计划的行动机构——“晨光通讯社”，正式在南京开张。由我担任社长，化名胡云卿，是一个“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即张保京），采访主任贺坡光（即贺少茹），记者孙凤鸣（即孙凤海，原是国民党军队一名排长，枪法高超，胆识过人）。我们4人组成了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而蒋介石在签订媚日投降的《塘沽协定》后，全力以赴指挥内战，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国内形势的恶化，更加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早日诛灭元凶。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预定在此次会上动手。那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会议开幕式时，孙凤鸣混在60多个记者中进入会场。谁知蒋介石多疑诡诈，他看到秩序不好，决定不参加开幕式后的摄影仪式。孙凤鸣根据集体的决定，只好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他自己也中弹被捕，翌日就在医院牺牲。这一政治巨案带来的当然是多方株连，残杀无辜。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连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

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讯社成员的陈处泰，在探望刚从香港回来搭救战友的崔正瑶（孙凤鸣夫人）时一起被捕。敌人虽查清陈并未参加晨光社活动，但认为他是共产党要犯，将他秘密处死，遗尸也被投入镪水池中。陈处泰、崔正瑶等牺牲时都是30岁不到的有为之士。而我这条漏网之鱼从此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须另谋反蒋救国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经过血泪反思，我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于是积极筹备亲赴延安，向党交心。行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撰写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从香港散发至全国各地，并直接寄给蒋介石。这是讨蒋的檄文，也是宣传烈士的政治主张与揭露被害真相的公开宣言。二是写了一份思想总结，将自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以偿，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己。他们表示对于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潘汉年小我4岁。这次见面，经廖承志介绍，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敌区加强隐蔽战线工作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经过交谈，我为他的渊博知识、潇洒风度所折服。在他领导下十几年，我们不仅是上下级，还成了知交知遇。我认为他才智过人，胆识超群，确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不可多得的将才。

潘汉年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完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时，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找我商议要起用我的一个知交任庵去充当周佛海同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之间的中介人，以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的历史和现状。周佛海虽然在中共建党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国后即已叛党。在黄埔军校教学时，和蒋介石结缘。1927年，他发表《逃出赤都武汉》，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张目，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以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等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骨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时，他反对武装抗日，公开鼓吹汉奸理论。

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在汪伪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实力人物。潘汉年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5年，但蒋介石从未放弃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必然要和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既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就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周佛海的出走投敌，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驻在周的南京寓所，看来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至于那位司令长官，对和日本人做买卖的关心超过对日作战的热情。他早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召见”，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托。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精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交。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

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当他决定将任务交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干涉。

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采访”。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采访新闻”，因为他们自称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我在潘汉年领导下10多年，在完成许多机密的、危险的、艰难的任务过程中，潘汉年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工作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是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一致公认的。同时，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当，给下级以充分的信任和发挥才能的余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于众。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卞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日本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但我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是组织对还是潘汉年对？”

被捕期间，我的心境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并且不得不思索潘汉年布置工作中的细微末节，违心地责备潘汉年当“内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人。思前想后，无以解悟。直到党中央给潘汉年平反昭雪后，公安部又对我的冤案作了复查，并重新作了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时，我才从思想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潘汉年同志负责的结论。

三

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经10多年了。我们怀念潘汉年，同时也怀念那些受“潘案”株连，历尽坎坷，而又过早离世的同志们。其中不仅有党员干部，也有一批对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外人士，他们多是当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他们不为名，不图利，甘愿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斗争，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信任和使用他们，是依靠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和政策，依靠共产党员的品格和牺牲精神，依靠共产党员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连的，无论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现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和负责精神。潘汉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给董慧的一首诗中，喊出了和着血泪的心声：“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这一天毕竟是盼到了。抚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汉年等一批党的志士的功绩将载入青史，令人永远垂念；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正在欣慰地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一如既往地略尽微薄之力。

（沈忆琴整理）

潘汉年在上海“八办”

——朱志良

我于1931年在家乡（江西省于都县）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从事机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战时期，我主要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机关当译电员。

潘汉年当时是上海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调去南京后，他担任了“八办”主任。“八办”机关在多福里时期，他每个星期都要来二三次，有紧急情报时，随时都来处理。处理完电报后，便和李（李克农）、刘（刘少文）共同商讨工作。在他们共商工作时，一般是潘汉年先听听李和刘谈谈情况。“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挂块牌子，是他们研究后设计制作的，后来因为上海形势严重恶化未能挂出去。当时，中央电示小开（潘汉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敌占区、国统区的新情况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报，在潘汉年的主持下，潘、李、刘共同研究后便分头具体负责落实搜集工作，并由刘少文分别整理。对时间性强的重要情报’就用电报摘报中央；一般情报则由陆路转送延安。潘汉年在多福里没有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所有给中央的电报都是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出的，很少用李克农的名义发，更不用上海“八办”名义发电报。

据我回忆，上海勺协”配合地下党开展蒋管区和敌占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恢复和建立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各个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爱国社会团体以及一些领袖人物和我党合作抗战；全面地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种书报、刊物，深入地宣传我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果，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和投降派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扩大了党的影响，坚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强了党在沦陷区人民中的凝聚力；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也输送了不少爱国进步人士、知识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搜集了敌我友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据。记得刘少文于1940年秋，在去延安汇报工作后返回上海时说，周副主席、党中央对上海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是对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无论是在抗战前夕、初期甚至是沦为“孤岛”后，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人员无不经常地聚集在上海进行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活动，因而也一直是我党我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基地。现经回忆，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特别是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时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有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等等。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徐强协同地下党组织力量，互相配合，积极认真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在抗战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情况以及上海广大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和要求释放“七君子”的情况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向中央反映了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先后派到中国的兵力及其番号、长官姓名、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登陆地点和时间以及军队的部署等；国民党调往淞沪前线和其他抗日前线的部队情况；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进行秘密和谈的情况，包括和谈内容、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参加和谈的名单等等；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抗日战争所持态度，特别对美帝一面说支持中国抗日，一面又把旧钢、铁、铜等金属资源运往日本，以及他们企图和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压服中国对日妥协媾和的情报；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纱、股票等市场变化情况；上海各界、各阶层著名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等的思想动态、重要言行，特别是对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反应；上海广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情况等等。这些，都为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记得曾经有这样一回事：我们将蒋、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结，秘密和谈的阴谋活动报中央后，中央就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当时潘汉年笑谓刘少文：这则电讯很重要，使蒋、美、英、法、日都十分吃惊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恼火，抱怨这样的秘密勾当怎么会这样快地泄露出去！敌人的一次重大的诱降和谈阴谋活动就此宣告破产。

上海沦陷后，党中央对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心。至少来了两三次电报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应转移去香港、内地或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潘汉年接到电报，以“八办”负责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转达党中央的关怀，并作精心安排，圆满地完成了对上述人士安全转移的任务。而后复电中央说自己还没有完全暴露，还可以留下来做一些工作；宋庆龄自己也表示还可以留下来做一点工作。后来，在党中央再三催促下，宋庆龄先去香港，潘后走。

我还记得，在抗战爆发后，我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条件，在很短时间内，发动组织了各种救亡活动，成立了不少救亡团体，动员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人员去皖南地区参加抗日工作。

一个机要译电员心目中的潘汉年

——梅黎

1939年夏，我在龚饮冰机关做掩护工作。半年后，龚打算送我去延安学习。路经香港，适遇潘汉年需要机要译电员，我遂被留下来。从此在潘汉年那里做内部机要工作达10年之久。所以我认识潘汉年比较早。

潘汉年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党和人民是有很大功劳的。1955年4月3日，他却被扣以国民党，日本“双料特务”的帽子，在北京遭到拘捕、审查、冤狱达22年之久，1977年4月14日病逝在湖南洣江劳改农场。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的重大冤案。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才使这位我党情报战线上有很大功劳的精英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为了纪念潘汉年的90诞辰，谈点潘汉年在隐蔽斗争中的思想和言行。

一、充分利用社会关系

潘汉年经常对手下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并不很玄妙，但一旦条件成熟，就能轻易地完成任务。”当我们的同志设法顺利完成搞到敌方军用地图时，他就说：“这种事全靠平时团结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当需要时就能很顺利地达到目的。如不通过一定关系，即使东西在那里你也拿不到。”他本人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来开展工作的典范。例如“四一二”蒋介石大屠杀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利用敌人营垒的人作为耳目，从而了解到叛变投敌分子的名单和照片，对我们党及时处理和惩处叛徒，保卫党中央组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利用一些革命同情份子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各种掩护；利用社会上有较高身份和地位的人的亲属或子女为我们传递情报材料；太平洋战争时，利用日本人关系及时派人去香港，把生活陷于困境的干部妥善安排撤离香港，等等。

二、重视环境与身份一致

他对在白区搞隐蔽斗争的同志要求其语言、举止、衣着尽量与当时所处环境相一致。如我刚到香港，只穿件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他即命人陪我去置服装，并要我学说广东话。他本人的衣着是十分讲究的，当时党内有人对此曾有不少微词，他委屈地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俗称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因他经常要与社会上各种达官贵人打交道，包括国民党的要员大官们，为了工作和应付环境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当他要与普通老百姓相处时，他的穿着就很一般了。

三、工作讲求效率，讲求质量

他曾对下面干部说：大政方针是中央综合归纳下面提供的情况反映后作出的，因此我们提供的情况要准确。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在日本投降前，潘汉年派人硬是搞到了蒋、汪、日来往的一些信函。潘汉年本人文化水平高，又有敏锐的政治战略思想，所以他本人活动所得的情报质量是很高的，如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谈判日军将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情报，这些高质量的战略情报，多次受到党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四、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有应变能力

如有一次，我们的机要交通员对藏在相册里的材料担心长途旅行不安全，要求改装在西服垫肩里。事后潘汉年和张唯一曾对下面干部说，对事情的考虑不能绝对化，要有充分准备，更重要是临阵应付得宜，他们曾形象地说安全不安全关键在自己，哪里有真正绝对的安全。别人要是怀疑你，把你剥光，也能找得出来。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的交通员要胆大心细，遇到复杂情况时能镇定自若，机智勇敢，有应变能力。潘汉年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奉命离开遵义到白区，后来去了苏联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络。当时他在组织安排下混在一大群烟贩子里，从容避过沿途敌人重重关卡到贵阳，然后在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帮助下，从柳州、梧州到达广州，再转赴香港。又如1947年后潘汉年在香港办《国讯》半月刊，作为统战工作的宣传阵地。一次在该刊搞总务的同志受到港英当局传讯。事后潘汉年有意乘坐出租汽车从该同志家门口走过，他见该同志之妻怀抱小孩在门口玩耍，就知道该同志已没事了。一次在香港大街上遇见迎面过来他不愿与之打招呼的人，即弯腰佯作结鞋带。以上两例都可看出他的机智和细心。

五、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和体贴关心同志

潘汉年曾多次对香港某同志联系的外国同情分子作形势报告。由于他对形势的深刻理解，不用讲稿即滔滔不绝地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认识和革命信心。

他对内部工作干部也是很关心体贴的。如平时常交待做内部工作的同志不要老关在屋子里，有时也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夏季在香港可去海滨浴场游泳等，让做内部工作的同志搞些文体活动以调节生活。

1947年9月，张唯一由香港去上海解决上海单位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联络方式问题及筹建预备电台，当时我一人留港在家，潘汉年在张去沪相当时日后，主动到我的住处问有没有张的来信。当我告知刚收到张的信，信上写着：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潘听后，即关切地嘱我写信要张即速回港。

以上点滴回忆，不能概括他全部光辉业迹。谨以此文聊表我对潘汉年同志的哀思之情。

潘汉年带我们过封锁线

——吴小佩、范小凤、陈永箴

1942年11月，日军已经占领租界，上海全部沦陷，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大部分领导同志和100多名区级和机要工作干部，陆续来到新四军军部附近的顾家圩子，办起了整风学习班。穿军装，学军事（包括射击、拆洗枪枝、掷手榴弹、值夜班警戒、夜行军等），学文件，谈收获，总结工作……军事化的生活，紧张、热烈的气氛，带来了整天的欢声笑语。从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来到这天地广阔的苏北解放区，不仅青年同志们像飞出笼子的鸟儿，就连年长的同志也焕发了青春。

有一天，从军部来了一位服装特殊的男同志，头上戴的是一顶法国式的便帽。他的个头不高，步履轻捷，面容白皙，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睛有些眯起，似乎在观察着什么，嘴角含着带有幽默意味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此人给大家作关于保密工作的报告。换了军装，戴起军帽，严肃，整洁。站在讲桌后面，没有大声疾呼，没有夸张的手势，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报告者说话语句不重复，语言朴素，条理清楚，内容详实，要点明确。只见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香烟，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忘了时间，他讲的内容太重要了。

会后，大家议论起来，才知他就是在白区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我们对他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风采。

晚饭后，若是没有布置集体活动，同志们通常是在打谷场上自由活动。有一天，青年同志们缠着省委同志们，要听革命故事。刘宁一没有讲故事，只是唱了一支歌：《少年先锋队》。沙文汉讲了一个故事，不长，同志们听得不过瘾。这时，恰巧潘汉年走了过来，大家又缠着他，要求讲个长些的惊险的故事。他就站在那里讲了起来。故事果然好听。但是后来慢慢觉得怎么这故事有些不合理了，越听越觉得不对头。恰在此时，故事里的主人公在用一把折叠式的老式的剃刀刮胡子，一不小心在自己喉咙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到此一命呜呼，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他临时编出来哄小孩子的。亏他编得那么活灵活现。我们想，这人如果去写小说，销路一定错不了。

学习班在1943年春节后结束，学员们就要天各一方了。有些人留在苏北工作，有些人去延安，有些人回白区工作。几个需回上海的女同志由于已剪去了烫发而受到批评。头发短了，脸晒黑了，人吃胖了，这副样子若仍由交通员秘密带到上海去，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只有淑英，小徐和我们三人一共5个女同志被分配跟随潘汉年同志回上海。我们利用伪方关系过封锁线，又搞到居民证后回到上海。

出发时，潘汉年从军部带来了一名兼管照顾马匹的警卫员，顾家圩子也派出机要员小朱同志随行照顾。我们5个女同志背起背包，怀着兴奋的心情跟着出发。大家都仍穿着军装，一路上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潘也是打着绑腿和大家一同步行，丝毫没有首长架子，还教同志们把帽沿翻上去，免得额上晒出一道印来。后来又叫同志们把背包放在马背上，空着手走路更轻松些。

走了两天，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仪征县月塘集。那是淮南根据地最前沿的一个小集镇，为了安全，一行人先不到集上去。晚饭后，地方工作同志来说，伪方人员并未按时前来迎接，当晚不能过封锁线。于是，我们就被安排到一个小山脚下的老乡家中去过夜。

这天晚饭后，伪方带路人仍未到达。于是，我们都聚集在潘所住的老乡家里，听他讲故事。他先讲了《三国演义》里的赤壁大战；又讲了顾顺章叛变后，特科“打狗队”的行动。后来话题一转，讲起他自己从前做文化工作的事。他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青年时代写的文章，真觉得脸红。他还充满深情地说：“我是很喜欢小孩的。想到我自己活到这个年纪还没有一个儿女，真是遗憾。”

第三天晚饭后，带路人终于到达了。我们一行人换了便装，与警卫员及小朱同志道别后就跟随地方工作同志到集上去。那已是掌灯时候，也看不清来人的面孔。一路上，大家加快步伐，默不作声。女同志们拎着随身用的包裹，小徐同志还替潘拎着一个皮包，跟在穿长衫的“潘大老板”后面。走了不知多久，即将到仪征县城，看见城前烧着一堆火，就停下来，由带枪护送的两名伪方人员过去打了招呼，开了城门。一行人进城后，左拐右转地来到一家旅店，住了进去。

第二天早饭后，潘汉年到我们女同志住的房间来，说是他的头痛病又犯了。他说，1936年曾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后来又参加国际会议，由于太紧张，连续7天没能睡着，头痛得不得了。”后来经过苏联医生治疗，还每天吃生鸡蛋黄，才慢慢好了。现在几天没睡好觉，头又痛了。于是，淑英赶快向旅馆要来生鸡蛋，用汤匙舀出生蛋黄，给他吃。

这时，前一天晚上带路的伪方“头儿”来说，他已为我们准备了午餐，说潘务必带我们到他家吃午饭。潘说，还是早些过长江为好。可是那人说，上午没有班船，极力巴结，非请我们去吃午餐不可。结果我们都去了。那人很客气，菜很丰盛，还说这是他老婆亲自下厨做的。

饭后，就到江边去等船。约在下午2时，上了班船。到长江南岸，下船处是镇江。我们被招待到金山饭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潘汉年又吃了生鸡蛋黄，后来的两天也是如此。我们没有随身带着派司照片的女同志被领去拍照片，等待领居民证。

午后，潘汉年来到女同志住的房间，说是伪站长夫妇要请吃晚饭，大家都去吧。女同志们表示不想去，不想出头露面。潘却淡淡一笑说：“乘船过江时，早就被人家看清楚了，隔壁就住着‘保镖’呢。”他又看看我们的服装，说要给我们换成好些的。我们穿的衣、鞋是离开顾家圩子时拼凑来的，几个人在一起很不协调。可是，大家觉得既然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们就犯不着再为他们而打扮一番。后来，就以这副模样，跟随潘去赴宴。

吃饭的地方在金山饭店的单间雅座里。见面时一看，那位伪站长的妻子打扮得珠光宝气，有事吩咐时，就到楼梯口喊一声：“来人哪！”下面好几个人轰然答应。我们心里暗笑，你越有势力，我们就越安全，在你的势力范围内出了事，你就是冤之头、债之主。

饭后拿到居民证，再等对方给我们买到上海的火车票。既然有“保镖”，我们就索性到街上去看看市容，买了些镇江酱菜。第三天，拿到火车票就离开镇江。上车前，淑英告诉我们，上车后分开坐，不要互相招呼和讲话。小凤在半途下车回故乡去看看家人再回上海。火车抵达上海北站，我们各自平安地回到家里。这一次分手之后，虽然都未遭到敌伪迫害，但再见面时已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了、更令人惋惜的是，我们三人再也见不到可亲可敬的潘汉年同志了。

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片断

刘人寿　何荦

一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得到讯息，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敌人妄图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大搜捕扑了空。

党中央派陈云、康生、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即保卫部），将一批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对象的干部调离上海。6月，改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特委委员兼二科（情报）科长，接替陈赓。“一二八”后，特科工作由潘汉年实际负责。在周恩来、陈云领导下，潘汉年积极参与清除、惩处敌特和叛徒的工作；在英法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等处重建网点，开辟情报来源；并争取一批各阶层同情革命者配合党的斗争，了解高层次的军政动向。潘汉年的工作成效显著，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任务。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1．确证向忠发叛变。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曾一度隐蔽在周恩来寓所。1931年6月21日，向擅自外出过夜，6月22日被捕。潘汉年领导的黄慕兰（定慧）从法捕房翻译与人谈话时听到，一个有金牙、断指、50多岁的中共头头被捕。黄根据其形象，疑是向忠发，立即上报了。周恩来得讯，迅速组织营救，打算重金收买法捕房人员阻止引渡。因阻止引渡无效，向忠发被押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不久，又获悉向忠发已于24日被枪决。于是准备动员党组织举行追悼会纪念和飞行集会示威。但据来自法捕房的消息，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陈淙英（任粥时夫人）所住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以致陈琼英、张纪恩、张越霞先后被捕；还供出周恩来、翟秋白、博古等人住处。当时，周已转移，看房子的杨振德和夏娘娘两位老太太被捕遭拷打。潘为确证向忠发是否已真的叛变，从警备司令部内线取得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供周恩来亲自审阅，发现许多除向忠发外，别人无从知晓的内容；周又亲自到寓所附近观察暗号，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才取消预定的悼念活动。

向忠发何以叛变后又被处死？经了解，原来警备司令熊式辉，不满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专权，向蒋介石密电邀功，但未报向忠发叛变供词。蒋接电，喜出望外，又恐发生不测，复电就地秘密枪决，熊就一杀了事。

2．反驳《伍豪启事》的斗争。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名，党内许多同志知道。这个启事，显然是敌特蓄意蛊惑人心、造谣污蔑的阴谋，但他们不知道周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秘密离沪，12月底已到达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但《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布告发行的范围有限，为维护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向公众、向国际进一步澄清。

中共临时中央通过陶行知做《申报》负责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报》刊出一则事实上辟谣的小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后感到这个广告还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由潘汉年通过黄慕兰找法捕房律师，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认启事。这位律师说，他虽任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找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来曾用名）刊登启事。经陈云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师，在3月4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敌特的造谣污蔑！

据当年参与制造所谓《伍豪启事》的中统特务黄凯谈，起草《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派人把《启事》分送各报者是黄凯。但几年之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张冲逐步感到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必要，也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之诚意，转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抗战时期亦坚持团结抗日。1941年8月11日张冲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

“文革”期间，江青等人利用这则伪造的启事诬陷周恩来。周多次向组织说明历史真相。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送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明确指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等人陷害周恩来的企图未能得逞。

3、团结杨度。杨早年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死后，杨被通缉。1918年秋，杨度在沪，正值孙中山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压抑，被迫离穗来沪。杨会见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杨受李大钊影响，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杨思想有很大转变。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曾极力营救。李牺牲后，他多方帮助，周济被难者家属，毁家经难帮助党筹集经费，并参加革命济难组织互济会和其他进步团体活动。晚年，秘密在上海找共产党。、开始时，他的要求未被党重视。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做他的工作，鼓励杨与政学系、改组派联络，从而能经常了解汪精卫、胡汉民、政学系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杨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情况。这些情报，不仅有助于中共的保卫工作，而且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有参考价值。杨度转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杨度的生平，他对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难以置信，乃派文委书记潘汉年见杨。潘与杨见面后，议论风生，十分投合。杨擅长书法，潘请杨为党中央所办《红旗日报》（一说《周报》）题写报头，杨毫不犹豫，一挥而就。潘将杨的题字向李立三复命，李才信服。

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组，陈赓将杨度的组织关系转给潘汉年。后来，潘又奉周恩来命交给夏衍。杨当时作为秘密党员起了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1931年9月14日，杨度逝世，周恩来、潘汉年等曾秘密地亲去吊唁致哀。

4、保护张浩（林育英）。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吴开先手下当文书的沈寿亚，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叫他“老枪”。潘同他建立了联系，要他隐蔽下来，长期埋伏，争取吴开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间，沈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门某科的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的共产党叛徒的登记表。潘授意沈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国民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采纳，并决定由沈专管自首登记表。沈向中共党组织反映，上海某区一中共党员，秘密自首，并向敌提供了全国总工会常委、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浩（林育英）的职务和住处。敌特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来往，了解张浩上下左右关系。特科要沈取出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张浩后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对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恢复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作出重大贡献。并按党中央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同张国森分裂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以上仅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片断。对他这个时期工作的评价，1981年冬，在关于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当然，特科局部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不能改变当时由于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和被动局面。

二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到达江西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

在此期间，潘汉年两次被委派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先后同福建国民党十九路军、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这两次谈判都是成功的。前一次谈判，促成了福建事变。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丧失了利用福建事变打破围剿这一良好机会。后一次谈判则为红军长征突破南线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两次谈判都为潘汉年广泛联系反蒋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积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验打下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于1935年3月代表党中央通知陈云和潘汉年，要他们去上海，准备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先行。抵沪后，中央军委和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告诉他，一时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他在沪不安全，于是，潘就到香港等候。8月，陈云到沪，潘汉年返沪与陈会晤。9月，陈云、潘汉年先后从上海赴苏。他们抵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开过，他们一起参加了少共国际的“六大”。

此前不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方针任务的新转变。12月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作了更切实、更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响应，党同地方实力派开始了广泛的联系。

1935年5月，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1935年下半年英美对日态度转硬。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1936年1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表示，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将由苏返国的潘汉年同国民党联系。1936年7月，国民党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张冲在香港找到潘汉年，陪他从香港到南京。主持谈判的陈立夫，指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见潘，表示要潘先去陕北，取得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同陈立夫正式会谈。

两党谈判的目的不同，共产党是为民族最高利益，国民党是为了融共，所以谈判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但这个时期，面对日本的高压，国民党的态度还比较缓和。5月中旬，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四条，由湛小岑记录。（1）K方（国民党）欢迎C方（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4）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潘汉年于1936年7月24日到达西安，8月8日到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中央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布了《关于遏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8、9月间，潘汉年曾两次奉命到西安，遵照中央指示，把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和张所关心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态度告诉了张学良。

10月，潘汉年到上海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他在赴沪途中把有关致国民党的信在浦口交张冲转交，到上海后，他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身份开展统战活动。首先会见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致她的信，取得了宋庆龄对中共工作配合和协助的允诺。接着，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等人的信交给了他们，并与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强、李云等取得联系。在此时期，潘汉年以谈判为主，也领导支持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为中共谈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协定草案》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八项条件，并希以此为谈判基础。陈立夫代表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他还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严肃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以为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把蒋的条件向中共中央报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要我骗他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对于这次会谈，潘汉年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正式复电：（1）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将领生疑。（2）提了在曾养甫家陈立夫口授的四条（见前文）。11月19日，陈立夫在南京约见潘汉年说，他已携中共中央复电去过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见复电后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当谈到曾养甫提出合作四条件时，陈竟抵赖说：“纯属子虚！”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同日，蒋召开嫡系的军事会议，确定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蒋离西安时公布，并撤换张学良。中共中央也于是日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要我方让步。我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于是，张、杨“兵谏”即西安事变不可避免发生了。

在西安事变中，潘根据中央方针，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潘又按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同志坚定地执行了中央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利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重要贡献。

三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建立，潘汉年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全力以赴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后改《抵抗》）三日刊发表署名文章10余篇，宣传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促成《救亡日报》出版；帮助成立好几个战地服务团，使救亡运动扩展到各地；用各种方式开展国际宣传；掩护王稼祥出国；筹募了我军经费、医疗器材等。同时，和“八办”秘书长刘少文等一起，按中央要求，报告了上海各界对抗战、对国、共的态度；救亡运动旧寇侵华计划、策略旧军装备、番号；美英法对中日态度旧使领馆、海军武官府派遣军、日特务机关、满铁等机构的情况。上海沦陷，他参与安排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和救国会、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安全离开上海后，12月离沪赴港。1938年春经武汉去延安。列席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任社会部副部长。

1939年春，潘汉年受命到香港、上海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同年秋，中央批准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负责，助手有张唯一、李默农等，领导机构设香港，在沪、港、南洋展开工作。为了协助潘的隐蔽活动和开展情报工作，中央社会部派内勤干部十余名到上海，1942年江苏省委也调史永等10多个同志给潘汉年系统，其中有打入汪伪重要机关的同志。1941年初皖南事变，中央电廖承志、刘晓、潘汉年接待从新四军转移到沪、港的同志，帮助他们回新四军；接待从重庆、桂林等地到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这样，香港一度成为进步文化活动、民主活动、开展国际宣传和开辟南洋工作的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央指示廖承志、刘晓、潘汉年帮助在港民主人士安全离港。潘汉年单位，经中央同意，由潘亲自部署，通过特殊掩护将内勤部分转移到上海，外勤部分转移到内地。1942年11月，经中央同意，利用李士群掩护江苏省委领导人刘晓、王尧山等与潘一起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翌年成立以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为委员的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以潘为书记（主任）。同时成立以潘为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以徐雪寒为主要助手。潘部上海单位1940至1941年由乔犁青负责，1942至1947年由张唯一负责。南京有徐楚光、马蕴平、白莎、吕一峰等同志，由华中局情报部直接联系。

抗战时期，党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潘部工作主要是以了解日本动向、国际关系变化来为这个方针服务。工作需要重新布置。1940年建立了与延安通报的电台，到1942年夏因日本宪兵搜查，被迫停止工作。1943年建立与华中局（1945年4月改华中分局）联络的交通线，直到1946年全面内战才停止。抗战时期，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海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等。潘还化名伪装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从事谋略活动的人物直接接触。如他利用特殊关系，化名“肖叔安”，租用了上海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经常出入这家饭店，而他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坚持斗争。正如他常说的，只要掌握敌人的规律，巧于应付，有时依傍虎穴反而比较安全。

这个时期，潘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电。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等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4）李士群提供了日军要“扫荡”苏北盐阜区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的信息。（5）周佛海设电台与重庆通报。（6）重庆对日谋略活动者与日海军和近卫的接触等。（7）某战区关于敌情和“匪情”的通报，等。

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讲到敌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赞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55年潘被逮捕审查，李克农同志根据周总理要求，组织了专人查阅了有关文电档案，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个时期潘情报的评价：“太平洋战争前，潘汉年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本特务、伪军、及日美谈判和德苏战争等情报是有价值的。”1982年中央关于潘汉年的平反通知中说他“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这个时期，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1942年夏，潘部在上海的电台处被搜查，因收藏良好，敌人未查到机器。当时有人主张撤退干部。潘认为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住房的保人等。坚持不动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全撤退。（2）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转移到香港，潘电告了中央，并陪他到澳门看望叶挺夫人，然后送他回沪，经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送回新四军。（3）为了配合整风学习，淮南根据地和上海情报单位之间曾经通过秘密交通，传递党的整风文件。潘汉年为此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将党的文件密封后伪装成汪伪镇江特工站致江伪上海特务头目的亲启公文，由交通何荦安全通过几个关卡，胜利完成任务。同时，刘人寿也从党中央留存在上海的秘密文库中取出的重要历史文件拍成照相底片，塞在干电池中，由何荦带到根据地。并由华中局情报部用放大镜阅看底片，逐字抄录后电报中央。

四

潘于1944年底离淮南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组织决定，潘部在上海的单位由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代管。日本投降，潘单位首先得知蒋介石要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受降的命令。可惜当时没有电台向解放区通报，只能待刘长胜到沪时再汇报。在此时期，潘系统在上海的同志利用日伪惶惶无主，重庆接收人员尚未到沪的机会开展隐蔽工作。如华克之通过社会关系，设法弄到5卡车TNT炸药和194挺机枪送到解放区，此事受到上级领导机关表扬。又如，当时打入伪方任警察局司法处长的李时雨，陪同兄弟单位的范济美到监狱营救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之弟杨树田，等。

1946年夏，潘汉年返沪。潘部在上海的单位仍归潘领导。有些不适宜留沪工作的同志调离上海。刘晓、潘汉年、王绍鏊又介绍了些关系。张唯一转移到香港，管机要又分管上海工作。上海日常联络由刘人寿负责。在军事部门、军统、中统、警察局、海运方面有一些或深或浅的关系。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45年秋在美帝支持下大量蒋军从大后方空运到沿海城市和东北；（2）华中剿总战报，东北战役中海上军运；（3）国民党关于徐蚌会战的部署；（4）江防计划，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5）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组织系统、补给表、战斗序列、蒋军运输；（6）几个潜伏台，反映的解放区大华贸易公司金柯秘密叛变的情报；军统、中统上海机构人事以及他们搜集的有关基层革命组织的情报；他们收集的有关苏联在沪机构活动的情报；（7）1948年12月获悉蒋将下台，李宗仁将上台，等等。此外还转报了史永交来的南京市委请示敌空军起义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电，后来中央复示俞渤驾机起义成功。由季崇威策反资源委员会起义，使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22万技术工人，3万2千科技和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钱昌照亦从香港来沪宁策反该会）。由陈天骏参与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

为了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在香港，同方方等一起经常出席民主人士座谈会，在《群众》杂志用笔名肖凯发表了多篇统一战线论文，批评对美蒋幻想，宣传革命到底。在国民党特务和港英严密监视下，安排了李济深等350名民主人士安全到解放区，为人民政协胜利召开作出贡献。还对两航起义作开端，他离港后由别人完成。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作，李克农同志1955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从1946年到1949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情报组织的来往电报及从1949年缴获的蒋特档案看，这一时期潘汉年所属上海、香港两地报告了有关蒋匪的军事调动、建军、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测情况，蒋美关系……等情报，现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潘汉年长期搞隐蔽斗争方面工作，曾作出过杰出贡献。但由于敌区条件，保密严格，潘又严守纪律，从不谈自己的功绩。

第四章：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我所知的潘汉年

刘晓

我最初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会后改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时候。

1931年2月，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潘汉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时的省委秘书长，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发行、交通等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秘书处机关设在老靶子路10号。后来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楼上。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苏北人，和派往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寿仁（湖南人）。负责财务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经费，先后和省委书记李维汉、王明直接联系。我只管秘书处油印文件、交通、密写等所需经费，每月造预算，经省委书记批准，向彭休士领取。我除了秘书处工作外，还要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特科工作是直属中央领导的。派来联系江苏省委的是刘鼎和胡先青。潘汉年虽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但也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参加了江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他把花了半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1932年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抄发给他的宗派集团传阅，以新的左倾纲领来攻击三中全会的决议，同时大规模地改组了上海各个区委，分派他的亲信控制了各个区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错误还要“左”的观点。他们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王明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当时，党内矛盾很尖锐、很复杂。一方面，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同时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霍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另一方面，罗章龙等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江苏省委改组后，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里来，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会议记录和经费。当时，彭休士和我部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不肯罢休，大吵大嚷。后来，潘汉年赶来了，对王克全说：这样吵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发生危险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连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和第二次扩大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何孟雄等。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王明悍然宣称何孟雄等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活动并作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内区级干部就有20多人。王明还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江苏省委通知上海各级党组织和赤色群众团体都要与何孟雄等“割断一切关系”，同时停止发给何孟雄等的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潘汉年也在这个时候来苏区，我在福建蒲田遇见他，他对我谈了上海情况非常严重，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并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和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个地区2932个乡中，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在革命根据地中有许多报纸和杂志，1934年初，中央区有报纸杂志34种，其中《红色中华》每期发行四、五万份。

1933年8月，我从福建省委调到粤赣省委担任书记，潘汉年兼任中华苏维埃大学的委员，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沙可夫。1934年三月2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潘汉年和我都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期间，他正忙着奔走于瑞金和福州之间，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开展抗日反蒋运动。1933年9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福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派陈公培（吴明）携带蒋光鼐写的《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书》到达五台。彭德怀和袁国平遵照周恩来的电示与陈公培会谈。彭德怀和袁国平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行动，又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将会谈情况电告了中央，并且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10月下旬，蒋光鼐、蔡廷锴派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同陈公培来到瑞金，送来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派潘汉年（潘健行）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具体商谈。双方在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曾多次会见徐名鸿、陈公培、潘汉年等，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标志着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的关系初步形成。随后，我方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黄一青）为秘书前往福州。黄火青团正患疟疾，一时不能同行，中央让潘汉年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并由李克农指派吴振英等两人为警卫员随行。临行的那天早晨，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前来送行，邓发为他们开了通行证，还派人护送他们经河州，由新泉出境。一星期后，黄火青病稍愈，独往福州，与潘汉年同住在十九路军总部里。

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关系形成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的条文，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反日的力量，于11月15日在福州开会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对于十九路军方面的行动，蒋介石已获情报，企图加以阻止。蒋曾邀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请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遂于17日派专机携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廷锴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

在福建事变爆发的过程中，潘汉年、黄火青给中央发回了两份电报，电报稿是潘汉年起草的，由黄火青翻译成密码后，交十九路军的电台发回的。党中央复电要他们两人中一人回瑞金汇报情况，潘汉年因忙于同“福建人民政府”商谈各项工作，选由黄火青回瑞金。黄火青在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被派往漳州，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漳州领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的条文，派张云逸为代表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到汀州，与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谈判。双方于11月27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在福州与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所缺乏的物资，特别是运输食盐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洽谈。当时，不仅双方的贸易往来频繁，农民群众和商人也可以进出苏区做买卖。闽西善后处还在蛟洋组织一个民间的贸易合作社，提供了一笔资金，用以购买食盐等物品运进苏区进行交换。潘汉年还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陈友仁等人，就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进行广泛的商谈。他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实施《初步协定》中“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的规定。12月1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了“大赦令”，宣告：“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12月4日、5日、7日，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先后释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60多人。其中马立峰、范式人等同志被福州中心市委派往福安，加强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同时，福建人民政府对我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的公开活动也予以默认。福州、厦门等地“反帝大同盟”等组织都采取了公开的形式，壮大了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蒋介石大为惊恐，认为如不迅速扑灭，影响所及，起而效法，就将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立即从“围剿”前线抽调嫡系部队，集中陆、海、空20—30万兵力，自任“讨逆军”司令，向福建十九路军阵地进攻。由于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内部派别繁杂，蒋介石又以硬攻与分化兼施，十九路军节节败退。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来推进反蒋抗日运动，坐失良机。1934年1月，蒋介石刚攻取福州，就将大部分军队调回，继续投入第五次“围剿”。当十九路军撤离福州时，潘汉年与梅龚彬等从马尾乘日本商船去香港。在香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继续进行反蒋抗日运动，潘汉年交待梅龚彬要大力策动。随后潘汉年回转瑞金。张云逸和黄火青等在十九路军的协助下，也先后回到了中央苏区。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是，蔡廷锴等当时反蒋反日，同蒋介石公开决裂，这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党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多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我被编入中央直属干部团，领队的是李维汉。潘汉年被编入中央机关直属团，和我不在一起。过湘江后，向贵州进军的途中，我曾碰见过他，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他。1935年10月，过腊子口向陕北进军的途中，我才知道潘汉年和陈云在遵义会议后被派往莫斯科去了。

1936年4月，潘汉年与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国共两党之间打通联系的工作已从1935年11月开始了。当时，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用谈判的方法来“收编”红军，然后“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蒋介石在国内派曾养甫与我党进行接触；在国外派驻苏联大使馆的邓文仪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潘汉年与邓文仪联系后，在4月份同正在莫斯科的胡愈之一起经法国回国。他们在5月份到达香港，胡愈之先到上海，通过救国会沈钧儒和其他关系找到冯雪峰，他告诉冯雪峰，潘汉年已到了香港，冯雪峰得讯就到香港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接触，一同去南京与陈果夫的代表曾养甫接触。曾养甫提出：因为潘汉年是从国外回来的，要求他同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负责人联系后再与陈果夫接触。潘汉年从南京回到上海，找到冯雪峰和刘鼎，通过刘鼎的联系，他在8月份经过西安到达保安。这些接触为国共两党代表后来的正式会谈作了初步的准备。

1936年5月，我党从2月间开始的在反蒋抗日口号下进行的东征取得一定胜利后，主动撤回陕北。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这个文件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把蒋介石集团也包括在促其“觉悟”的范围内。这是我党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促进了两党之间的谈判。潘汉年到了保安，向党中央汇报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派遣他与国民党方面接触的经过。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9月，他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回到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劝说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后，潘汉年同宋庆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他还把毛泽东的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副本交给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后，潘汉年同他们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潘汉年与张冲接触，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身份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了他。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这个文件里，对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内战局面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仍在继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对国民党较之过去有若干进步的地方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了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个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我党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尽管我党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行动，力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现，然而，蒋介石毫无诚意。他震惊于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不顾日本侵略军已在绥远东部燃起战火和全国人民要求援救绥远的强烈呼声，不顾中共的一再呼吁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苦苦劝谏，决心继续“剿共”，妄图一举将红军消灭。10月31日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接着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上海救国会领袖（即所谓七君子案）。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激成了12月12日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极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使“一二九”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其中亲日派在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挑动更大的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间的矛盾。英美派为维护其本身利益，救出蒋介石，因而他们感到有转变政策的必要。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方面对蒋介石的安危一无所知。张冲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杨对事变的态度。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一向他们传达。后来，南京国民党方面派端纳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了西安。经过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从而大大加快了两党合作的进程。

1937年1月，潘汉年到南京与张冲谈判，这是西安事变谈判的继续。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国民党军队从西北撤退。2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第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国内的政治问题。我党为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以如下之保证：1．在全国范围闪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接着我党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3月下旬，潘汉年从上海陪同周恩来等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回到上海后，潘汉年与宋子文继续谈判红军的改编经费问题，又同张冲两次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治合作问题。由于蒋介石这时在对日问题上仍旧存在幻想，徘徊不前，因此尽管我党进行了艰巨的努力，谈判还是没有能达成协议。

193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上海工作，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又与潘汉年有了工作联系。他负责党的上海办事处工作，归党中央领导。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粉碎了国民党“求和”的迷梦。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陈立夫、康泽谈判后到了上海，在中国饭店与潘汉年和我会面，张毅在外面放哨，她买了一份报道“七七”事变的晚报回来。周恩来对我和潘汉年的工作关系作了具体交待。第二天，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后台公开与救国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会面，我也去参加了。

“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蒋介石被迫进行应战。并于7月30日释放了“七君子”。8月22日发布八路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在7月15日就交给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发表了蒋介石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这次合作的推动，才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抗日统一战线的功臣

胡愈之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臣①

①本文原载1983年7月14、15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伟大的不平凡的斗争的一生——忆潘汉年同志》，收入本书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党中央对潘汉年同志的估价是很高的。诚如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里说：“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于他的革命斗争是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环境，他在不平凡的对敌隐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而他又是从来很少表扬自己的，所以他的伟大的战斗的一生，很少为党内党外所知道。

我和潘汉年同志相识是在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南昌、武汉回到上海，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创办了“创造社出版部”和《幻洲》杂志等。我对出版工作有兴趣，所以和他有往来。到了1939年1月，我离开上海去法国，以后就没有和他见面。现在才知道，在30年代初，他是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代表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建立联系，同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和随后以文化界为主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这一系列活动，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

在1930年到1933年前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上海党中央受到了破坏。潘汉年同志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目，写了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1933年夏间。他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苏联船，到达莫斯科。这时候他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1935年7月召开的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①

①潘汉年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结束。他列席了正在举行的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这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巨大的影响。由于纳粹夺去了德国政权和德意日形成了法西斯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受法西斯威胁的资产阶级国家应该和苏联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来说，共产党要联合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工农红军还在雪山草地长征途中，和外边的通讯联络被切断了。所以出席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创办了公开的中文刊物——《救国时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救国的纲领，就是在《救国时报》首次登载的。

1935年底，我通过在狱中的杜重远，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取得了成果。但那时上海党中央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和我唯一联系的宣侠父同志也流亡到香港。在香港是可以和巴黎《救国时报》通消息的。为了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我到香港找到了宣侠父同志。这时候，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正准备反蒋抗日，国内的形势有很大发展。宣侠父同志要我去法国，转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取得联系。1936年1月，我假充华侨商人，搭了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他替我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我把国内情况，特别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潘汉年同志也向我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1936年4月间，我在莫斯科的任务已经完成，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要我陪同潘汉年同志从法国搭船回香港，以后我的工作由潘领导。

在我离开香港以后，邹韬奋因为在上海受国民党的压迫，也到了香港筹办《生活日报》。当时两广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抗日运动，想拿《生活日报》作为宣传机关。我回到巴黎时接到韬奋的电报，要我赶快回香港，帮助筹办报纸。潘汉年就要我去一复电，说是等我回到香港“择吉开张”。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生活日报》才正式出版。以后报上没有提两广的反蒋运动，而宣侠父同志也被调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期的中共党员，抗战中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成为烈士）。

回到香港以后，潘汉年同志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经在上海开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参加的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例如两广、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张抗日的爱国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头名。这个修改后的文件虽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对群众的影响不大，在国民党地区没有一个报纸刊出，后来只是在《生活日报》上刊登。中共华北局大概是根据《生活日报》所载，转送党中央的。1936年8月间。以毛泽东同志名义，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复。这个复文我在以前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在苏州法院审问时，法官拿出一封毛泽东给章乃器等4人的复信，作为救国会“勾结”共产党的证据。直到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出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来问我，我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纲领来答复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汉年同志见面的时间不多，一般是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入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有时邀我一起参加。故意对国民党说我是救国会的，对中共有意见。他接触比较多的是国民党的张冲，此人懂俄文，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副部长。潘汉年同志常和我说：“国民党内部有问题。有些叛党出去的特务分子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愿意找到我，想和共产党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机会，做策反工作。”张冲后来担任国民党的秘密和谈代表。潘汉年同志是受共产国际委托到国内和陈果夫、陈立夫谈判停战抗日。他给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个任务，虽然这些任务是党中央知道的。

潘汉年同志这种对敌的隐蔽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见了当时已经和我党有联系的张学良，后又去了陕北，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战线逐步联系起来，由反蒋抗日走向逼蒋抗日，直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但和潘汉年同志的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代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表，与南京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是秘密举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宋是亲美派，是倾向抗日的。潘汉年同志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七七”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上海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进行隐蔽的对敌斗争和情报工作。已经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写了回忆文章。我从1938年起离开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领导。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编日报，以后经过太平洋战争，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先后经过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兹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进入解放区的。我们假充华侨商人，搭了英国船，开往南朝鲜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和山东的小口岸，才进入解放区的。这一隐蔽的路线也是由潘汉年同志亲自布置的。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任副市长和市委统一战线部部长。1955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盟主席沈钧儒很久未见到他了，知道他来北京很高兴。所以由我去约请他到沈老家午餐。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两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主席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时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后来终于这样判决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为假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监。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并未发现新问题，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并被遣送到湖南省劳动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这是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讽刺王明之流的关门主义的话。潘汉年同志不是关门主义者而是统一战线的坚决支持者。他采取了不平凡的方式，为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为党、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大错案纠正了。潘汉年同志虽然已无法知道，但他的名誉恢复了，他将在革命历史中永远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的。我们要统一战线，不要关门主义！

与邓文仪谈判概要

杨奎松

谈判之简要经过

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于1935年12月21日从上海动身，乘俄轮抵海参崴，再坐火车于1936年1月3日抵达莫斯科。邓文仪到莫斯科后，立即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商量好的办法，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但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邓随后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专门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了是否同邓文仪见面的问题。会上多数人对国民党派代表来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表示怀疑，但仍旧同意与邓见面以了解其真正动机。只是会议明确决定此事应由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潘汉年出面，王明应视潘接触结果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同他进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触与谈判。双方这次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初步约定了3天后再谈。根据潘汉年的记录和汇报，王明分别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负责情报及联络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皮亚尼茨基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再度召开代表团会议进行讨论。在中共代表团的会议上，与会者就王明是否应该亲自与邓文仪接触意见分歧，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亲自与邓文仪接触则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王明与邓文仪之间的正式谈判因此而成为事实。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谈判。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明确提出了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双方并就中共代表团派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当局就此进行具体谈判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多数与会者明确反对在南京政府所提条件下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所宣布的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因此，在1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谈判的过程中，王明对南京政府的所谓合作诚意明确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只是，考虑到邓文仪宣称蒋介石已经来电表示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旧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谈判。双方确定，中共代表将和邓文仪二起，于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邓文仪找到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前往南京的计划将要告吹。以后的谈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举行，因为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首先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然后再拿到国内去具体实行。因此，他估计李融清将参加在莫斯科的两党谈判。26日，邓文仪写信给王明，说明他将于次日出发前往柏林，并再次保证他将同李融清一起回来与王明进行具体谈判。但邓文仪一会即再未露面。

事实上，邓文仪并不了解，蒋介石这时已经改变了想法。早先，蒋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谈判，是因为他于1935年12月19日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嘴里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与南京政府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同时他又了解到中共代表团在苏联放弃了笼统地反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提出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蒋估计苏联政府已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他统一中国的努力，并正在迫使中共改变政策。据此，他立即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谈判，同时秘密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于邓走后第三天，坐船去欧洲赶往柏林，准备在那里直接与苏联交涉军事合作问题。但邓、陈二人走后约一个月，蒋介石方才得知苏联政府并无支持他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蒋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在国共两党的冲突问题上表明立场，劝告苏联务必通过向中共施加压力，支持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鲍格莫洛夫明确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说，苏联与中共毫无关系，解决两党冲突是中国内政，苏联政府绝不会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蒋介石反复劝说长达80分钟，全无结果。至此，蒋不仅失去了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而且对与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心灰意冷。这是因为，如果苏联继续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军队依照条约进入中国，受其益者必是中共无疑。因此，蒋介石在1月23日突然致电邓文仪，通知他立即停止谈判。而后，蒋又致电正在柏林准备开始军事谈判的陈立夫，立即改变与苏联政府秘密谈判的计划，转道欧洲回国。至此，不仅莫斯科国共两党谈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苏两国缔结秘密军事条约的谈判也胎死腹中。蒋改变计划，再度决定不依靠苏联，首先在国内解决共产党问题之后，再来与苏联谈判条约问题。在莫斯科的国内两党初步接触与秘密谈判，即因此而中断，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此转到国内去进行了。

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①

①潘汉年与邓文仪谈话记录要点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第3—44页。

潘；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你找他谈话，是以私人资格，还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们早在上海战争（原文如此，应为1933年）时，就公开宣布愿在三条件下与一切军队谈判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可惜除十九路军曾与我们初步谈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将领，都没有作出积极反应。红军西征到云南时朱、毛两同志已经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明显企图。虽然南京军还在不断进攻红军，朱、毛两位领导人始终相信，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主张，一定会得到全国同胞的拥护。所以朱、毛临时派我离开部队，向各方表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可借我到上海时，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占领平津了。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响应，而且国民党还不断地逮捕和枪杀抗日救国的同胞，更加残酷地进攻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没有可能向各方具体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就连人身安全都毫无保证，不得不离开祖国。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会见邓先生，很想知道国民党与南京政府在全国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么表示没有？

邓：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

潘：我们在你们五次大会之前，曾有过一个通电，蒋先生看了为什么没有提出讨论？

邓：在那种会议上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讨论这种问题。因为几百人的会议，没有人知道里面会有多少汉奸。现在我们只是在内部有联俄联共共同抗日的讨论，即使这样日本人已经到处宣传并向南京进行威胁了。因此，我们将来如果合作，具体实现合作的方式，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蒋先生主张，现在要抗日，首先是要集中八十个师的人马，否则必然受日本所制。可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全都被红军牵制住了，因此我们两党需要合作。不过即使我们谈判成功，国民党的军队也不能一下子就撤离，非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不可。我们得到情报，知道日本今年一定要进攻外蒙，它对华弱自然也会有新的动作。日本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了，可惜我们两个主要的力量至今还没有找到联合的道路。

潘：有人诬蔑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玩弄手腕，毫无诚意。我想你一定注意到巴黎《救国时报》转载的王明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明。在这里我想强调说，全国民众都知道，两党继续内战必将便利日本由北向南地并吞整个中国。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抗日救国是它一贯的主张，虽然我们过去政见不同，但遭受亡国之耻辱，我们大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内政问题上的歧见，彼此可以暂时放在一边，首先来救国。假如你们诚心诚意地想与我们共同抗日，我们不会玩什么手腕。只有那些不想抗日，企图利用抗日口号欺骗民众的人才会这样做。

邓：国内只有我们与你们两种力量，假如能够联合起来，就像一九二五年的合作那样，一定可以有办法。过去是因为鲍罗廷的错误使得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不得不分裂。我们的领导人常说，朱、毛那时对于分裂是没有责任的。

潘：过去的不要说了。究竟谁对谁错，历史会回答的。现在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反帝主张，来制定政策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阴谋得逞。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

邓：我们最近召开的六中全会和五次大会，已经表达了团结对外的一致愿望，这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团结现象。现在政权也开放了，比如银行界张公权、教育界蒋廷黻等，都不是国民党，现在也吸收到政府里来了。言论自由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今年五月要召集国民大会，说明我们准备把政权交给人民。近来对你们的进攻也消极了。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愿意与你们合作，而是许多问题阻碍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作出这样的表示。今天我们能够会面是很好的开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彼此意见接近的办法。

潘：朱、毛的通电你们为什么没有讨论呢？同时，上海、武汉等地也没有停止逮捕抗日分子与共产党员，你想朱、毛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你们想抗日呢？

邓：这也难怪红军。就是为着粮食，他们不打也不行。我们曾两次找过鲍格莫洛夫，向他说明我们要找你们谈判，但他表示不愿意过问我们国内的问题。因此不待过阴历年我就匆匆来此，预备从《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转信给王明，又怕没有结果，又担心日本特务会知道，所以我直接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秘书处转王明。他不知收到没有？

潘：没有。可能还没有寄到吧。

邓：我在上海时从上海领事馆里找到最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把王明那篇文章连夜找人泽出来，连同王明在七次大会上的发言一起交给了蒋先生。因此他要我来和王明谈谈。

潘：我们今天能见面，这很好。希望你能够具体说明一下你们对于与我们合作的意见。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邓；要合作这一点是确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一是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统一指挥不可；二是我们现在子弹和粮饷都只够三个月的，如果要打持久战，就非另想办法不可；三是外交方面我们对英美是有些办法的，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与我们那样方便。最近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今年肯定要打外蒙，因此我们应当与苏联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和粮饷。这一点很重要。

潘：如果真心抗日，这三个问题应该都不难解决。统一指挥将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抗日应当利用英美的帮助，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并且我们近来一直有人研究英美日之间的冲突，将来也许在这方面可以贡献一些具体的意见。关于找苏联帮助，这确很重要，根据他们一贯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则，只要南京政府坚决站在团结全体民众反对日本的立场上，我个人相信苏联对中国的P族运动是会同情的。你们从外交方面去努力不会没有结果的。至于说日本最近关于进攻外蒙和内蒙的宣传，它很大程度也是故意吸引南京政府的视线到蒙古问题上去。因为苏联国防力量雄厚，全国团结一致，日本没有欧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实际上是不敢冒险进攻苏联的。最近外蒙古政府派人到苏联来，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都亲自接见，这说明外蒙在外交上是很有办法的，日本进攻外蒙恐怕不比进攻南京政府更容易。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日本究竟是先进攻外蒙，还是先进攻中国。我们现在应当努力团结一致对付日本，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问题是朱、毛和王明同志8月1日即发出宣言，最近红军又发通电，南京政府除因汪精卫被刺组织上略有变动以外，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抗日的准备。

邓：要抗日其实政府早有准备，不然的话日本为什么总是要威胁蒋先生呢？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问题，将来会有文件来证明的。现在情况非常迫切，日本可能只留给我们三个月时间，而我们之间尚未停战。即使停战后，八十个师的部队也不可能马上集中起来，何况为了避免日本人知道国共妥协，先发制人，各个击破，与红军接触的部队还不能立即撤退。但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就是与日本宣战之时。因此我希望能够与你们早日谈判成功。

潘：希望今天我们初次交换意见之后，下次你能够具体地代表南京政府提出你们的想法。

邓：当然。不过，虽然我们谈话也是一样，我还是希望见一见王明，因为来莫时蒋先生特别叮嘱要我会见王明的。

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谢黎萍

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位不辱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情况的冯雪峰。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此番重新聚首，虽不是组织的安排，却是意味深长。潘汉年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而陕北中央此时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因此，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潘汉年在听取了冯雪峰有关陕北中央及上海的情况介绍后，并没有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团派遣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不久，冯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冯雪峰，潘汉年于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见黄毅。”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酒店与张冲见了面。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

约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扬子饭店。由于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CC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曾养甫在重申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潘汉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且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离开上海。8月8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汉年被安排住进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张闻天的窑洞。张闻天和潘汉年促膝长谈。随即潘汉年又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接着，潘汉年又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将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密码，交给了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至此，潘汉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的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实行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并于9月1日向全党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通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潘汉年在参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张学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关于“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他“取道肤施”（即延安）回陕北的电报。①9月上旬，潘汉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准备不日启程，经西安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①《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在西安作短暂停留后，于10月中旬到达上海。就在潘汉年到达上海前后，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必须说明的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因而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并于5月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湛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解决西北问题。因此，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带上这一烙印。陈立夫的所谓个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这里，对等的谈判已不复存在，而是居高临下的收编。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其谈话只是个人意见，因此潘汉年对此没有作更多的辩析。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11月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是日晚，张冲告诉潘汉年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潘汉年随张冲即刻赶回上海。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与陈立夫开始了首轮正式会谈。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并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陈立夫以冷淡的态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中共合作谈判条款作答的，并就此作了具体陈述。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面对蒋介石在合作谈判上的倒退，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潘汉年坚定的立场，迫使陈立夫转换话题，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的设想，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由于双方各守其则，谈判难以进展。张冲提议潘汉年能否先打一个要求周恩来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于蒋提到的其他各点，看有没有复电再说。潘汉年没有继续张冲的话题，而是另辟蹊径，对陈立夫提议，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陈立夫拒绝了潘汉年的提议，并且再次要求潘汉年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最后，潘汉年为使谈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陈立夫的提议。国共双方沧州饭店的会谈就此结束。①

①《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其间潘汉年旗帜鲜明，坚持中共的先暂时停战，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继续推出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红军的人数从3000增加到3万，并且把前次谈判中潘汉年提到的曾养甫派代表送往苏区的国共合作谈判条件说成是子虚乌有之事。潘汉年再次拒绝了陈立夫收编红军的方案，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说：“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有关两次谈判的汇报后，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①

①《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顽固强硬态度，并且在军事上继续向红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以潘汉年、陈立夫出面主持的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①

①《周恩来传》第318—3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这正是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最高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在谈判桌上所展现的风采。

但是，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闭谈判大门。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11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倒退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混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变发生不久，张冲受宋子文、宋美龄之托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过后，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对此，潘汉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张学良、杨虎城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见一一向他们作了传达。接着，潘汉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从上海抵达南京，与宋氏兄妹进一步落实赴西安谈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是达成了，但要蒋介石履行以人格担保的协议却非轻而易举。当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达南京后，他“履行”协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张学良扣压起来，接着又派重兵进逼西安，摆出讨伐之势。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间即被浓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为缓解西安事变后出现的紧张局势，维护和平，1937年1月亚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的进军，仅有利于政学系及日本，对民族国家及国民党则是“极大损害”了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并嘱潘汉年“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泽东又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②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蒋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问题。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共谈判电报摘录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给毛泽东)国共谈判报告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给共产国际)国共谈判报告

潘汉年

以上①是我16晚车去京（二次）前，要李②将第一次与陈立夫会谈经过及他去）11等报告转给你们一看，我今晨回来，尚未交去，因此我又续写这第二次报告。因时间关系，只能将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①指潘汉年1936年11月12日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②李，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

一、自从他们要我去电里面、要求恩来同志出外与蒋面谈以后，不久已得里面的复电，电文如下：

“汉年同志：甲、真电悉，张子华亦到；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丙、据张子华谓曾养市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曾谈原则协定；丁、你在南京谈判地点？（署名）十三日”

同时这个电报以前另有一长电，他们译不出来，疑心是给我个人的私电，所以电邀我两次去京，在未正式谈以前，张冲来表示，第一次陈立夫所谈保留军队3000，意思是保留红军番号的3000人，余则照南京军队编制。我表示诧异，并问为什么保留红军番号的只要3000？张说：这是蒋的意思，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此刻我们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我要求立即会见陈立夫继续商谈，他说陈今去洛，并将我方复电带去请示蒋矣。他要我候他回来面谈，并表示：陈此去或许可使蒋条件降低。他把另一个译不出的电交我，我研究了一回，也不是家中给我私人的密电，我将原稿退回去了。第二天晚，张来说陈明天即口，要我等他，这一天他陪我去逛中山陵，看看城内新建筑的各衙门的外表，第三天便正式谈了阵，他们态度大变，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浅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事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责职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可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能在这草案中所提原则精神下来商讨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终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傅作义仅表示要坚决抗战，全国一致起而慰劳并愿为后援；如蒋先生坚持继续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蒋先生之称谓如何，实堪杞忧。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考虑。

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

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在晚十时左右，张冲来，婉言叙述陈立夫本人左右为难，事当双方继续努力，并述陈意：希望我还是把蒋的意见电告里面。我说：这样岂不是恩来更不能出来？他说，陈先生亦如此对蒋说过，但蒋说：不妨，周还是会出来的。陈先生以为周如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这一套显然与第一次没有改变，相反因为这几天，德俄外交恶化，德日反共协定宣布，加以国内各界纷纷慰劳傅作义，在南京认为在外交上正是可以要挟苏联的时候，在对内上讲，自命傅作义抗战是南京领导，民族英雄天生是他们，用不着顾忌与共党合作。然主要还是蒋利用日本目前并未全力对绥，故意制造前线剧烈抗战消息，挽回他个人的信用，且企图在这把戏中，打击阎锡山与张学良，利用韩复榘排挤宋哲元，依然进行消灭异己的工作，对红军自然不能马上化敌为友。据此，我认为立刻与他中止谈判是不对，还是继续与他扭，而且暗中设法把谈判内容传到各方面去，说蒋目前尚无决心抗日，所以我仍表示留沪愿与他们继续谈，同时，依照他们所讲，又发了一电：

“毛朱张周同志：元电已悉。（一）我二次来京，据陈先生转告蒋先生意见：1、红军可缩编至3000人，其余由宁方编遣；2、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不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二）据陈先生告，如恩来同志能出外与蒋先生面谈，或双方意见更能接近。（三）我已将我方所拟草案交陈先生参考，同时向陈先生提议如能暂时停战，周同志尽可与蒋先生面谈一切，但彼方仍主先谈军队条件，其他方能解决。我夜车返沪矣。（十九日）”

现在我又回来了。

二、太太已借我5万元，正在设法送里面，但前几天我们派去西安送第一次去京谈判报告的交通，昨日来信说找不到王之人，似乎交通处能否继续工作，他还在打听。另一方面，我们在沪得消息：杜重远去西安，蒋给邵力子密电，要暗中监视杜的行动，并须逮捕张左右诸积极分子，并附一名单，邵将蒋电及名单交张，要他自动设法，据说一批干部都已离西安。这样，是不是我们交通线确也有问题呢？我现在如坐地狱里，要想从“刘秘书”手上得一点真相，真是好比上青天，我希望代表团方面接到这报告时设法告诉一些办法，及解决我与里面的交通关系。

三、如再过一些时，交通方面尚无确息来，我拟自己去西安一趟，因为里面急需款项，已经借到又送不进真是命苦吗。

应（因）急于将此信送出，不能详谈一切了，待下次当设法做一些国内一般救国状况报告。

小K　11月21日　上海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

潘汉年

民众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一般的说，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倚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至于怎样来发挥它的政治力量呢？那就是政治动员。

在今天，我们已看到中华民族的神圣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已逐渐在开始了。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集中人才的口号虽然久已提出，许多愿意为国牺牲的爱国志士，竟至没有做事的机会。战区几十万的失业工人不能参加生产工作。无组织的群众遍地都是，他们不但不能去帮助军队，担任救护运输工作，以及补充战斗员，而且也不能维持后方治安，肃清汉奸，力求自卫，一旦敌人的武装侵入，纷乱无秩序的避难者，自相践踏，以致常有伤亡丧失，遇着敌人无理的屠杀时，只有伸着脖子等死，不能抗拒或者还（回）击。敌人看到这个弱点，因此就尽量收买汉奸，扰乱后方，而一部分缺乏训练脱离生产的民众都会受骗而替敌人效劳。这是多么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现在无论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总该已明白了解民众运动的重要了吧。然而民众运动要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为他们所注意，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他的关键来。

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的一部份优秀分子，这些分子因为社会地位的殊异，各有其思想的立场，在这抗敌救亡的大时代中，他们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然而才能领导民众的大团结。领导者如果不能实行全民联合的政治决心，要想民众运动的统一和顺利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们统一抗敌的局面虽然相当形成，然而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这种包办思想，对于全民统一阵线的完成，很有妨害。从今以后，希望从事群众运动的领导者，都应当抛弃包办民众运动的企图，大家必须任劳任怨，把领导的责任共同负担起来。如果大家能推诚相与，共赴国难，那么，彼此间的互相倾轧、排挤，应当不财存在。已经取得领导地位的集团，也不必再借口什么，来范围与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了！

民众运动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统一领导，就是整个抗敌救亡的事业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统一的的领导，方能完成伟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没有这个全民族全面抗战领导的政治基点，我们无从汇集与发挥其民族战争优越的政治力量。因为，我们优越的特点，就是全国一致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内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为全民族利益而战的共同决心。在敌人方面，是为少数军阀财团利益的扩张而战，其内部矛盾不但是无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世界经济集团的冲突，更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军事冒险又加重劳苦大众物质上的负担，及无辜生命的牺牲，这一切，难道还不够造成敌方民众怨声沸腾的局面吗？现在他们的军阀法西斯主义者正在拿侵略可能胜利的话来夸耀，藉此麻醉群众，可是群众决不会长此永远忍受着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们全民族的坚强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众预约的胜利时，那些怒气填胸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军阀财阀。这就是敌人的政治的弱点。

全民统一的领导的建立，首先就是各党各派的领袖要能够彻底取消过去成见，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军政领导机关，以保障统一领导的具体实施，来完成抗敌救亡之大业。其次，目前需要一个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就是抗敌救亡的政纲。全国民众在这个共同纲领的领导下面，将闻风兴起，欢声载道，必然人人抱着坚决奋斗，为国牺牲的决心，惟民族国家利益是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

1937年8月30日

全面抗战释

潘汉年

“全面抗战”，“八一三”以来这四个字是在普遍的被大家嘴里叫着，笔下写着，可谓已成流行的口头语，手头字，为什么我还要加以解释呢？因为现在全国军事动员的范围日益扩大，从察绥到华北，山东沿海到上海，大半个中国的地域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这种全国性的战局，是被一般人误会着这就是“全面抗战”。

目前战争的性质是不同于“九一八”东北军的抗战，也不同于“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因为这些战争，都是局部的抵抗，就了结当时的战局，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完成抗战的任务，即在军事上也没有结束战略上的任务。“九一八”抗战的结束是丢了东三省，“一二八”抗战是签订了《淞沪协定》。目前战局的形势，最后胜负，固难一言预计，即以失败前途而言，决不是丢了几省土地，或者仅仅是签订一个不利于中国的什么协定就可了事，即是中国今后能否保存半殖民地独立国家的名义，正因这个战争是有关于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独立生存的意义，所以被侵略的我们，在芦沟桥事变后，虽说“应战”，而我们一开始的军事动员，就超过了局部抗战的范围。“八一三”以后，抗战的范围就表现了全国的性质。在部队的调动上，不论那一个偏僻省区，一律在实行动员，战争本身的影响，动摇了全国范围以内的正常状态，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战争的影响，起了极大的变动，这是“九一八”、“一二八”抗战所没有的现象，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全面抗战呢？不，带有全国性质的军事行动还不能称为“全面抗战”。

我在另外一个报纸上说过：“所谓全面抗战，应该是指抗战的政治决心”，如加以更具体的解释，全面抗战应该是在政治方面有切实的办法，必须动员全国人力（军队，人民），财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娱乐，出版，及其他宣传机关），全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全民抗战。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在单纯的军事条件上，应当不讳言的承认敌人比我们优越得多，然而我们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全国人民敌汽同仇为政府与军事后援的全民力量，这种力量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没有的。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本身与侵略者统治下人民的矛盾，他们不能实现政府与人民一致，军事与人民一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如延长下去，他们的广大人民必然会起来反对侵略者的统治。可是我们的抗战，是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全国人民必然一致起来拥护这个战争，这就是我们可以战胜敌人优越军事条件的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抗战只限于单纯的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不能彻底实现全面抗战的政治决心，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是没有保障！不久以前的阿比西尼亚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抗战，正因为仅仅实现全国性的单纯军事动员，没有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最后依然遭受了惨败。试问我们现在除掉有了全国范围以内的军事动员外，是不是在实行全国抗战呢？这个答复，可以从政治方面动员的实际状况中得出结论的。

全国的人力，军队是一部分，而且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如何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拥护政府与军队呢？这就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的利益，此其一。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此其二。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禁绝私人外汇，反对市场投机操纵，统制与军事有关之重要工业，交通，贸易等，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此其三。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此其四。立即撤回驻日大使，对日绝交，确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此其五。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此其六。只有实现上述各项，加以目前已在实行有全国性的军事动员，方能称为“全面抗战”。

在军事上我们已与日帝国主义顽强抗战相当一个时期了，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赞许我们政府在军事领导上英勇不屈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阿比西尼亚单纯依靠军事动员的失败的教训，我们要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必须立即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有个刊物在征求“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的论文，我想我可以做一个答复：假如政府立即实行“全面抗战”，这就是必然胜利的原因！假如政府始终只有单纯的军事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我就答复不出。

前线的将士不断的在经验上发出军队必须与民众合作的议论，而且有些地区如晋绥线，相当的在执行军民合作的初步工作。我们相信：一切救亡阵线上的爱国分子，无不迫切热望政府当局立即实行全面抗战，以保中华民族这次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希望政府当局能当机立断，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一切必要步骤。

10月13日

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

潘汉年

自从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因此全国父老兄弟妹妹，无不以惊奇眼光注视着八路军。报纸流传，街谈巷说，八路军几乎神秘化了，朱彭英名固蜚声全国，即八路军运用自如的游击战术，也变成高深莫测，好像八路军独得锦囊秘诀似的。这是一种错觉，我们愿意全国同胞对于八路军有平常正确的了解。他们不过是全国抗战范围以内英勇善战的一小部分，他们参谋处并无诸葛孔明传授的锦囊，他们的士兵并没有吞下了符咒，或者身藏“千人针”，更不是铜皮铁骨，三头六臂，他们不过是一群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然而，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是的，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这原因也不是八路军独得之妙，而是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普遍强化实现起来，方能最后战胜日本军阀。我可以简略的介绍八路军所以成为抗战中一支精锐部队的原因给全国同胞为参考。

提高部队的民族意识，坚定将士民族战争胜利的信心，发扬每一个战斗员抗战中的政治自觉的积极性，这是八路军年来准备抗战一刻不敢疏忽与懈怠的基本任务。中央社记者王少桐君，最近从晋北发出关于八路军的通讯，有这样一段：

“他们的部队，此次参加抗日，他们每一个士兵，平时早已都明白日本军阀的罪恶，和侵略中国种种的野心，他们每一个兵士的脑中，早已存着对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观念，无疑的他们在抗日战线上步调一致，精神一定团结，而且一定能产生伟大的力量。”

他们依靠什么办法，完成这个工作呢？是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政治部的任务。当年蒋委员长训练党军，以迄北伐，早就实行过的政治部的训练教育制度。八路军从民国十六年，南昌八一事变起，与中央军分离以后，经过10年，重归蒋委员长指挥，参加全国抗战，黄埔时代的政治部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比较民国十六年前更强调了政治部在军队中的领导与作用。

“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领导部队和训练部队。这种政治领导和政治训练的目的，首先在于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是朱德、毛泽东几年前给各军政治部主任的训口令。

“中华民族处在生存死亡的决定关头，迫切需要抗战军队牺牲奋斗到底的战斗力，迫切需要军队与人民团结共赴国难，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要消灭一切畏缩不前，借故推诿，当友军险危而不援，望风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耻现象，只有发扬大革命时代（指北伐时期）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国军队成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奋斗到底的革命军队！”这是前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于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恢复北伐时代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建议。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重视政治教育训练的工作，所以普遍的提高了士兵的政治认识，“随便问他们一个十四五岁的勤务兵，他能告诉你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和他们这次来前线的任务的。”（中央社王少桐的话）八路军部队既有这样普遍深入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坚决反抗日本的战斗力量，当然要大大的发扬起来了！

八路军的组织是肃清了封建军阀制度，官长与士兵之间没有丝毫隔膜，长官欺压士兵，或者克扣薪晌……等等军阀残余习气，在八路军里面已经找不到影迹。我再抄一段新闻记者对八路军官长与士兵生活打成一片的描写：

“总司令也罢，伙夫也罢，除了职务的区别外。平时是一块娱乐，一块谈天。一个士兵去见总司令，是很平常，没有看见太拘束的窘状，也没有看见长官无谓的威武。一个士兵作错了事，没有以打骂来责罚，只以和善的指示，纠正他们的错误。……再说到物质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一定也吃菜。总司令服装和士兵没有分别，简直没有例外。”（大公报通信）

不仅如此，八路军还有一个特点，像朱德、彭德怀一类的高级官长，没有一个人有私人财产在后方，因为他们不特不许克扣士兵薪饷，谁要利用军队搜刮民间财物，或者仗势欺压人民与绅商，借口敲诈谋财，这是滔天大罪，决于枪毙，毫无宽假。就是一般士兵，都知道尊重人民利益，“不扰民，不害民”是他们对待地方居民的纪律，私取民间财物，或者向人民勒索强欠，不论官者士兵有此行动，都要军法从事。这些纪律的执行，是依靠平素的政治工作，他们有这么一个口号：“纪律要建筑在士兵政治自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强迫命令是不能有如此效果。

八路军对于抗日的民族战争，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战略战术上有这样的认识：“中日战争虽胜虽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我国这次为自卫而战，所以战略上是防御战雌因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如（必）然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这种攻势防御，就是要乘敌人于运动中，或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集中我们优势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歼灭敌人”。（彭德怀的意见）他们对于抗战的战略战术，是坚决认为必须采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或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生（主）力军作战，是战胜敌人依靠优势的现代兵器压迫我们的最好办法。朱德曾经这样说过：“为了使抗战能够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千百万群众上前线去，武装群众，编成无数的游击队，在日军的左右侧翼，或者日军已占领的区域，进行广泛的游击战，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主力军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他们开入晋北，在平型关及其他地区的胜利，就是执行了这个办法。

所以八路军并无神秘之处，不过他们是这样三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就是他们是坚决执行胜利的战术。他们形成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每个战斗员的政治认识，由于他们运用完善的系统的深入的政治工作制度，方能在今天抗战中，表现了他们的英勇。确无任何神秘，如要全国抗战胜利，全国部队，都有根据他们的经验，加以改造的必要。

因为八路军不过是全国200万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整个抗战的胜利，单纯希望他们是不能的，毛泽东很坦白的指出：“第八路军在今天对整个抗日战线，还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还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他们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之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的情形，曾经经过许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肃清之（了）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与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10月30日，上海

第五章：统战能手

解放前夕的两件秘闻

夏衍

关于潘汉年的事，真有点一言难尽。1982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潘汉年同志》，那是陈云同志指定要我写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平反，而不是给他评功，所以写得很简略。潘汉年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上海，的确是立了大功的，由于他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所以有许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随便举一个例，比如陈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滩》上刊出的《党人魂——记潘汉年》）中有一段话：“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系，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这两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说我是参与了的。

这些事，1949年我和汉年从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来同志报告过，但是汉年一直不让我们讲，他不止一次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所以这些事就成了秘闻。

1948年八、九月间，有一次张骏祥同志（当时他也在香港）告诉我，说资委会的负责人钱昌照正在香港，准备到英国去讲学，他对当前的局势很悲观。钱昌照在重庆时期我就认识，他对文艺、话剧有兴趣，和张骏祥、张瑞芳等都很熟，为人正直，事业心很强，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潘汉年——他当时代表华南分局领导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汉夫调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后，我是工委书记。汉年听了之后立刻对我说，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资源委员会不仅在国内拥有大批美援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下面还有许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可遇难求的机会，你赶快去办。这样，我就通过张骏祥约钱一起在九龙山林道的“雄鸡酒家”吃饭。寒暄了几句之后，很自然地谈起了时局。我记得话是从金圆券谈起的，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颇有生不逢时之感。于是我们就对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劝他不要悲观，新中国的建设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于我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当然不能谈具体问题，于是就由汉年把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报告和请示（当时我们有两个地下电台，一在九龙，一在东江游击区）。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来同志回电，要我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地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于是我就约了钱昌照在浅水湾第二次单独见面，这次我就开门见山地直说了，我说我们已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希望钱先生能为祖国的复兴效力。他开始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于是我就讲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后，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后正式摊牌。我说：“周副主席希望钱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内地的资源委员会的朋友们联系，只要能把美援物资和档案保护好，解放后不仅可以在原岗位工作，有些人还要特别借重，因为我们正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我讲得很坦率，并把我住址的电话告诉了他，随时可以联系。他很谦虚，说了些个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对周恩来同志要仰仗他的话似乎很感动，这是从语气中就可以察觉的。最后他说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强。我说，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了让他放心，我郑重地告诉他，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不论在内地或者香港，我们一定绝对保密。这之后，他只和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不去英国了，暂时留在香港，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大家心中有数，他不到英国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以后的方向了。

1948年冬到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南京政府派张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谈，接着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就在1949年4月底离开香港，回到北平。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冠华（我走后，乔接替我当了香港工委书记），要他负责和钱先生单线联系。大概是在5月中旬，当我们南下前夕，恩来同志忽然对我说：邵力子先生向党中央建议，认为钱昌照是个人才，一定要争取，所以恩来同志要我拟一份电报，要乔冠华立即安排，请钱先生早日回国。他大约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这之前，他是不是到过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对上海资委会的人已经作了交代，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有一位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负责人（这位先生姓沈，名字记不起了）来和我联系，说资委会的全部物资和档案已经按照钱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来了，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走，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愿地到台湾去了。从1949年到1955年，汉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钱先生没有联系，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后，才有见面的机会。“文革”之后，他同情我的遭遇，来往就更多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他一直很乐观，他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国家统一，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为在台湾他还有许多资源委员会的同僚朋友。他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和调查，去世前还去过海南岛，并把自己的感受和设想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前面说过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头之后，我就介绍他去见潘汉年，因为潘是常务副市长。至于物资、档案、干部由谁接管，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为主任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吧。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我后来知道，除钱昌照外，在北方，资委会另一位负责人孙越崎先生也和我们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起义，说来似乎有一点偶然性，话得从抗战初期说起。“八一三”之后，上海海关的一批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海关长征团”，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战，性质相当于一个文工团，一共有二十几个人。这个团的负责人是叶厥苏，团员有邓爱珠、蔡鸿斡、陈琼瓒等，后来在上海牺牲的茅丽瑛，也参加过这个团。1938年夏，该团到广州演出，叶厥荪到《救亡日报》来找我，要我给他们作一次时事报告，这样我就和这个团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同年10月广州沦陷，长征团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陈琼瓒曾到桂林找过我，我给他介绍了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深交，当时大家都很忙，我对这件事也就渐渐从记忆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后，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了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从你认识的“海关长征团”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恩来同志的很明确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3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了头。遗憾的是上海解放后陈一直没有找我，失去了联系，去年我问过现在成都的叶厥苏同志，他也说广州分手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来往了。

凝聚在党的周围

荣毅仁

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陈毅市长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会议室召开的有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会议开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领我到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跟前，介绍我认识他们。只见陈毅同志气宇轩昂，豪爽幽默；而汉年同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会议间，陈市长和潘副市长都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阐说了解放、建设大上海的伟大意义，宣传、解释了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经济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来，和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发展生产，恢复市场。初次见面时虽未深谈，但两位领导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盛康年对我说，潘副市长希望约个机会同我碰碰面，一起谈谈，彼此熟悉一下。我心里思忖：虽然听过陈市长和潘副市长的讲话，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能有机会当面谈谈再好不过。特别是得知汉年同志把约见的地点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里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适宜的。那天见面之后，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既谈正事，也说闲话。汉年同志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引人入胜。我拘谨的感觉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轻松自如起来，大家的话也就越来越多。不觉已时近黄昏，盛康年就顺便请吃晚饭。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以后，汉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工商业者一起开会或座谈，循循善诱地宣传解释党的工商经济政策，指出这个方针是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执行这个政策，既是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新上海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要求大家团结在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围，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而共同努力。同时，他认真倾听大家意见，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汉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他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在具体解决问题时又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所以结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在他的带头示范下，许多搞经济统战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种方式宣传政策，听取意见，沟通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组织筹备慰劳解放军的工作，工商界也于7月15日组织了上海工商界慰劳总会，此事市里是由汉年同志负责的，我和盛丕华等其他几位同志也参与其事，这样，我和汉年同志接触机会就多了，相处也更随便。“八一”犒军以后，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请陈毅市长到我家吃顿便饭。盛讲此事先要问潘。我就向汉年同志提出，他说，要请示陈老总自己，并答应由他自己去和陈老总说。两天后，传来回音，陈市长同意来，但叮嘱人不要多，可以随便一点。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同志，汉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临我家，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还约了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装而来，在我家中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聊着。陈市长间或问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见，我坦诚相告，聚晤气氛始终十分亲切融洽。以后，陈市长和汉年同志又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会座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诚恳耐心地听取意见，有时还共同商量、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自陈毅市长来我家中聚会以后，汉年同志有时就到我家来聊聊天，有时沟通一些情况，有时通过我了解一些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有时还约了一些负责同志一起来。他当时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有时就步行过来。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银行老板的女儿，早年就参加革命，人也很随和。有时他们夫妇同来，董慧就和我夫人杨鉴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谈得来。有一天，汉年来我家，谈话中他说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愿意靠拢党，跟党走，情况是好的。工商界在旧中国有商会和工业会，现在是否也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以便组织工商界人士贯彻国家政策，也可以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他征询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认为解放前旧商会和旧工业会几乎沦为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不是为工商界服务的。现在人民政府这样为工商界人士着想，内心很是振奋。汉年同志还征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经过多次酝酿，大家做了许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我完全同意。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二六”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二六”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当时正临阴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二六”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交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七一”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交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在日常的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思想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帮助作用，使我从接近党、靠拢党、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过程中也不改初衷。

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于北京

潘汉年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的贡献

——蔡北华、杨延修

潘汉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诞辰。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我们更怀念解放初期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潘汉年同志。

解放前，由于三大敌人的长期掠夺，上海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商凋零，市场混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上海刚解放时，物资匾乏，库存空虚，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储备也不敷市民一个月的消费。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处停业或歇业，工人和店员失业人数达16万之多，有些资本家悲观失望，弃厂弃店出走，劳资纠纷急剧上升。

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东局、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稳定上海市场和恢复生产，坚决果断地取缔和打击了银元投机，封闭证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价涨风，迅速而又稳、准、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使上海金融财政和市场物价很快地纳入了稳定的轨道。当时，潘汉年协助陈毅和曾山、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陈毅市长就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举行座谈会，会上，陈市长表示希望工商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潘汉年及时指导我们在工商界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他要我们不仅在面上做工作，还要走出办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当时，我们在潘汉年的指导下，曾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团结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战胜封锁轰炸，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共同努力。潘汉年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并深入细致地做工作，使他们及时解除了种种疑虑，同时还使留居海外的刘鸿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后纷纷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出场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在领导带头示范下，我们也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的方式，反复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以进一步消除他们的疑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从此，我们结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过他们起桥梁作用，广为宣传，扩大了影响。那时工商界朋友把马当路的市工商局，视为他们的“娘舅”，遇到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问题大都找上门来，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因此，我们对工商界情况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较快，解决问题也比较好，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汉年副市长接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工商界组织的提案，指示我们，要以工商局名义出面筹备与组织上海市工商联，把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抓起来。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来有旧市商会和旧市工业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商登记，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业和同业公会的底细，为筹建工商联组织打下了基础。解放后三个月，我们就在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小组。继而对16.3万家工商户（其中私营工业1.3万户左右，私营商业15万户左右），按行业整理，改组为二百多个同业公会。不到半年时间，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在这项工作中，难度较大的是人事问题，就是说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响和有实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进去，使之发挥带头和桥梁作用。那时，我们把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人事安排，及时向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请示汇报。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工商人士的情况很熟悉，对工商联正、副主任和重要同业公会主任等职务安排亲自审批，因而迅速获得了领导部门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联组织成立起来，协助我们对工商界开展团结、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务院第39次会议上，潘汉年谈到工商界组织的作用时，曾给予一定的评价，他说：在工商联筹备会领导之下，这些同业公会对推销公债、参加工商业税的民主评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在加强同业对公营和私营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将会起更多的作用。

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这个烂摊子得到初步整顿，稍见起色，工业生产、市场物价、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上海人民正在欢度新年、春节之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1950年2月6日，大肆轰炸上海。“二六”轰炸后，潘汉年副市长立即陪同陈毅市长到被炸现场视察慰问。据当时同去的随从人员回忆，当他在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沉重，充满了对受害人民的同情和对美蒋反动派暴行的无比愤恨。

当时正值旧历年关前后，“二六轰炸”造成的新的困难，使原来潜在的上海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那时，上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为了克服“二六轰炸”引起的工商界困难，刘长胜和潘汉年亲自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他俩以极大的毅力，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争取保本自给。当时，对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还亲自处理。最近，一位著名的老工业家回忆那时的情景说，解放初期，我同潘副市长常常见面，有时他还到我家来。在“二六轰炸”后，有一天晚上，因劳资争议较为紧张，劳动部门打电话来家中找我，恰巧潘副市长刚到我家谈话，他接过话筒在说明自己身份后说：你们怎么在夜里还打电话找人，明天再说吧！把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又有一天晚上，某纱厂一些工人因劳资争议问题，上门找一位著名的工业家。那位工业家打电话给潘汉年反映情况，他立即打电话转告陈毅市长，并果断地排解了一场严重的纠纷。这位工业家说：潘副市长精明干练，处事有魄力，至今印象还很深。

在调整劳资关系的同时，政府通过贷款、代纺、代织、代染和订货等措施，调整公私关系，许多厂商纷纷复业开工。当时有一家由金城银行投资的纱厂，发生资金困难。潘汉年获悉后，指示金融业要同生产事业相结合，并责成有关部门主动找他们商谈，在公平合理原则下，使该厂问题及时获得了解决。还有一位棉纺业大户，解放初期从国外带进一笔资金，恰巧遇到“二六”轰炸，这笔钱全部用罄，生产发生困难，结果也是在潘汉年亲自关心下，通过贷款帮助他度过了困难。事后，这位工商业者说：“共产党办事干脆，有肩胛。”

还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轰炸后，引起上海市场物价很大的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政府千方百计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来沪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挤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在私商粮食代销店门前排成长龙。那时，有位外国专家向我们工商局建议说，光靠私商代销，还不能把大米直接接国营零售牌价分配到市民手里，米价也很难稳定，必须立即开设国营零售粮食商店。我们就把这建议向刘晓和潘汉年作了汇报，很快得到了批准。我们马上行动起来，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食店，敞开供应大米，紧张的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稳定下来。我们还在主要地区开设合作社门市部，供应日用工业品。从此，上海人民那种长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严重威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年潘汉年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坚决果断决策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潘汉年十分重视民主协商工作。早在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就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协商委员会，由陈毅任主席、潘汉年等任副主席，下面分工商、劳资、税务、文教、一般等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经常集会讨论，研究各项工作。潘汉年常常参加小组讨论，直接听取意见，并即席发言，对提出的问题分别作出解答或解释，使到会同志都感到满意。潘汉年一再说：“对政府提供建议和帮助，经常反映各界人士意见，对各种重要工作及时协商，各部门负责人到会报告各项重要措施，并答复所提问题，这样使政府与人民之间、各界人士之间，经常气息相通，交换意见。”1952年间，潘汉年根据1951年政务院秘书长会议精神，召开了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市府委员，各委、局、处、院、署、区政府负责人和在市府内工作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专家、技术人员、人事部门干部等二千余人，交流机关内部统战工作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和意见。潘汉年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对机关统战工作还作了重要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应综合本单位统战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认识，向党外干部作报告”。与此同时，潘汉年还切实妥善执行安排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并为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配备秘书。他还嘱咐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使这些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做到有职有权，尽职守责，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体现了在政权内部党与非党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

潘汉年主张把统战工作贯彻到各个部门，从政权部门到生产部门，都要做好这一工作。他说：凡是统战政策思想贯彻好的部门，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会搞好。1951年6月举办了上海市土产交流展览大会，潘汉年是大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展览会亲笔题词，在预展时检查了工作，并对我们说，如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一切都很好，不过有一点，就是哪个馆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放手让大家来搞的就更好，哪个馆专门由我们自己干部搞的，就比较差。这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坏的问题。

潘汉年对我们的教育是比较深刻的。记得解放初期，他针对我们做工商统战工作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大胆开展工作的思想，经常教育我们说，对于工商界同我们讲的话，不能都听，也不能不听，而是听了以后要分析，还要敢于向上反映，有的还要帮助他们解决。事实上，潘汉年在这方面是处处以身作则的。他耐心听取意见，善于分析问题，敢于反映问题，也敢于帮助解决所反映的困难。“二六”轰炸以后，敌人继续封锁我们，致使上海在内外交流、城乡互助两方面都不能打开局面，上海财政经济中潜伏的困难越来越暴露。工商界中有的人因而丧失信心，索性停工关厂，一走了之；有的认为工商业困难是因为公债税收任务重而造成的；也有些人认为困难是国家要扩大公营，缩小甚至淘汰私营，提早实现共产主义而造成的。当时，潘汉年在个别交谈时或在公开会议的场合，都—一进行批评和说服教育，他还从上海的历史，分析了当时困难的根源、性质，并指出了方向。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上海工商业，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盲目性、投机性，表现在那些推销高等洋货的商店，疯狂投机的金钞证券市场，穷奢极欲的餐厅酒店、舞场妓馆，钻头觅缝的经济捐客、行商坐贾。上海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表现在商业多于工业，投机商多于正常商业，加工工业多于制造工业，等等。”在谈到物价问题时说：解放前上海市场投机盛行。物价飞涨，是因为有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军政、特务、四大家族操纵市场，支持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现在这一因素不复存在，但是敌人封锁尚在，全国范围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投机商人还在兴风作浪，稳定市场工作还是相当艰巨的。他认为当时上海正处于新旧经济交替过程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不是跌下去爬不起来的困难。只要根据十六字方针和毛主席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指示，是完全能够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潘汉年的讲话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人们认清了困难的性质，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潘汉年也鼓励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情况，不要怕别人讲我们右倾。他说：“这是我们从事工商统战工作人员的职责。”记得解放初期，在税收工作中曾出现虚盈实税、畸轻畸重等问题，工商界意见比较多。我们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潘汉年反映后，他就和许涤新两人亲自写信向陈云汇报。后来根据陈云的指示，经过调查研究，同工商界协商了办税原则，决定分别大中小户不同情况，把上海工商业户分为几种纳税方式，对于具有现代化会计制度、帐册齐全的，自报查帐，依率计征；对于中小户，一般能记帐的，进行民主评议；凡营业额较小、又无帐册的，大体按自报平均营业额，定期纳税，从而保证了税源、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公私两利的目的。

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和非党友好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当时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右了。但他毫不动摇，始终坚持贯彻统战政策，并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会理解的。”

潘汉年在解放前地下斗争时期和在掌握政权后，长期和党外民主人士相处。几十年来，这些民主人士虽历经风浪，但仍能坚持跟党走，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还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是同潘汉年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这一事实既说明了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也记载了潘汉年同志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

1995年5月

潘汉年为我们设计走向进步的“高架桥”

经叔平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了，工商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少部分有资力的工商业者逃向国外，大部分工商业者，表面上欢迎解放，但内心里疑虑猜测，静观其变。

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我继承父业办了一家卷烟厂，跻身于上海工商界，在同业中也算是一位高层中坚分子。我思想比较开放，有能力判断事物的是非与黑白，进步与落后。在当时，我跑到国外去不是没有机会，但要继续去受帝国主义压迫，太没有意思了，而且也是没有前途的。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商业者有没有前途呢？我一时也吃不准，只有等着看，厂能办就继续办，不能办就关门歇业，靠双手过生活有什么不好。

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他相当关心上海工商界，认为统战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层份子搞稳定工作。今天回忆往事，虽事隔四十余年，但还历历在目。潘汉年同志确实是一位高明领导者。他深切了解上海工商界情况，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不是教条式的板起面孔空谈马列主义理论，而是对我们反映的问题仔细分析，很讲原则性，有褒有贬。而且与人为善，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令人悦服，这样做效果很好。他还想出一套独特方法，即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员来做思想教育，而是通过工商界中自己人来现身说法，潜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轻松愉快地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这项工作当时由盛丕华同志的儿子盛康年来担任。他原本是上海开美科药厂经理，生活作风与工商界人士很容易接近。其实他早在1947年随黄炎培、盛丕华等赴香港，与中共地下党领导潘汉年等接触，接受了新思想。所以，解放初对上海上层工商界的联络工作，就由他来担任。工商界中的高层分子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胡子婴、严愕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等当时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要求学习，要求进步。就在潘汉年领导支持下，于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成立了工商界“七一”学习会。取名“七一”主要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的愿望。“七一”学习会成立后，始终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亲切关怀，潘汉年、许涤新、吴雪之等党政领导都先后应邀来学习会做报告，讲解党的工商政策，起了指导方向的作用。对工商界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学习组织。它帮助我们工商业者走上康庄大道。从此以后，工商业者参加了一系列爱国活动，如拥护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全行业公私大合营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能经受严竣考验，对党坚信不疑。“七一”学习会，帮助工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七一”学习会，会员入会限制很严，有不成文的入学标准，如：政治上要求进步，经济实力雄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能广泛联系群众等。申请入会者，先由已入会的会员介绍，经干事会讨论一致同意后（注：干事会由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严谔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组成。盛康年是召集人，负责干事会的具体工作），向全体会员会议提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接纳新会员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只要有一票否决即不予批准。由于把关极严，直到1952年2月仅有会员49人。

学习会的会员虽少，能量却很大。会员中大工商业家最多，占65％，工商界代表人物占25％，其他知名人士占10％。就政治地位而言，会员中有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民建、市工商联主委盛丕华；上海市财委副秘书长严愕声；市协商会副秘书长盛康年；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另有市政府委员；市协商会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委、常委、执委；主要行业同业公会主任或负责人。学习会中有民建会员33人，占会员总人数约三分之一。虽然民建会员一般不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活动，但是民建会员对“七一”学习会潜在的影响是显著的。就社会关系而言，成员分别代表棉纺织、毛纺织、麻织、染织、橡胶、火柴、水泥、化工、造纸、制药、卷烟、机器及公用事业等14个大工业。纸品、百货、金融、棉布、地产、国际贸易等六大商业。以上情况表明，“七一”学习会汇集了上海工商界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是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工商业者众目所瞩的塔尖，对工商界颇具吸引力和影响力，它的一举一动都起着表率与示范作用。

今天我缅怀这段往事，饮水思源，不能忘怀我们的启蒙导师、解放上海后与工商界接触的潘汉年副市长。他以多年的革命工作经验，深远眼光、特殊的方式，把工商界中的上层中坚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分子。目前，我们工商界中荣毅仁同志光荣担任了国家副主席要职，刘靖基同志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负责全国工商联工作。其他我们工商界不少同志都在各省市的人大、政协中担任重要职务，还有不少人在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我们有今天，不能不想念“七一”学习会，想念掘井人潘汉年。

1995年7月1日于北京

对潘汉年夫妇的一段回忆

陈铭珊

说起潘汉年同志在上海的事迹，我接触不多，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盛康年同志发起组织“七一”学习会，参加的人都是些工商界代表性人士，聚会在一起，学习《平凡的真理》，地址是在永福路52号一个工商业者纺织界董旋生先生的花园别墅里。每人交一定费用，边吃晚饭边聊天，有时吃后再谈，谈谈自己的思想和学习体会，也谈谈税收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工商界最关心的是上缴的税收，民主评议，幅度很大，有点吃不消。有一次，潘汉年同志应盛康年之请来和我们见面，谈谈当时的形势和税收政策。潘汉年同志谈话很平和，一点没有火气，他说：“国家要建设，工商界赚了钱向国家缴税，也是应该的，至于说缴的数字多少，可以根据利润多少，多赚多交，少赚少交，不赚不交，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康年同志反映。”因为康年同志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潘汉年同志坐在我们中间一张椅子上和我们说话，好像他没有吃饭，是在我们吃饭后才来的。穿的是藏青列宁装，没有穿军装，和大家比较容易接近。他的讲话对我很有帮助，至今不忘。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位着灰布列宁装的女同志。在“五反”运动中碰到我，走到我身边来，问我对“五反”的感受怎样，当时我流露出有点恐惧的情绪，她鼓励我要鼓起勇气，继续办好企业，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我觉得她和蔼可亲，语重心长，句句人耳。当时我只知道她是统战部的一位工作同志，我很敬重她，我觉得党的关怀，又从她的口中听到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潘汉年同志的夫人董慧同志。她在潘汉年同志身居副市长高职之时，却毫无架子地做我们的工作，与潘汉年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他们夫妇两人那平易近人的印象，永远牢记在我心中。值此纪念潘汉年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缅怀之意，萦绕心头，深感党的英明伟大，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

1995年5月1日于上海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代表

谢黎萍

在潘汉年的革命生涯中，统一战线工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会名流中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思想，争取各界上层人士理解、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并且配合与协助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于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两办事处有关统战、情报、组织整理、救亡宣传、武装斗争等各项工作中，潘汉年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他们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且向纵深发展；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通过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阵地。

宋庆龄自1931年8月奔母丧从德国柏林回国，宣布“留沪休息”后，就一直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与宋庆龄保持长期的联系。他这次从陕北出来时，身上带有毛泽东9月18日所写的致宋庆龄信。信中毛泽东除了对宋庆龄的革命救国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宋庆龄“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前公开活动之办法。”“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①潘汉年一到上海，就与宋庆龄取得联系，并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给她的信件。为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保持经常化，潘汉年与宋庆龄约定由地下党员、特科工作人员李云（即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之后，无论是在鲁迅病重期间讨论为鲁迅治病之事，还是开展“救国无罪”斗争；无论是购置电台，还是为中共中央筹借款项；无论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广泛接触，还是西安事变中向南京方面力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论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是组织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潘汉年都及时与宋庆龄交换意见，并且取得了宋庆龄对我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仅以宋庆龄对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文协”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国共合作形式诞生的最早的群众性救亡团体，宋庆龄不仅出任“文协”理事，而且还积极参加“文协”的募捐及宣传工作。在“文协”机关刊物《救亡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她写的文章。正是由于得到像宋庆龄这样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协”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蓬勃开展，并且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也是上海众多救亡团体中吸纳会员最多的一个。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对救国会领袖陶行知、邹韬奋，潘汉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途经香港时，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还就国内的政治形势、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我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与他们交换了意见。在潘汉年的影响下，陶、邹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请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以表示他们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韬奋还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请救国会另两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签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邹四位救国会领袖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公开信在《生活知识》上公开发表。在这一公开信中，四位领袖表示坚决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一公开信后，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四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①这样，使潘汉年和救国会领袖们的联系，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委托。潘汉年不断地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后，潘汉年非常关心七君子被捕后的情况，还亲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当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获释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又代表党去探望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见面，以促进救国会与国民党之伺的联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曾在上海主持过销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办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具有深远的影响。1937年7月31日韬奋出狱后，依然决定以他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9日，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由韬奋主编的《抗战》3日刊（后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关于以文化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的指示，非常支持韬奋的工作。他经常为《抗战》）3日刊撰写文章，他所写的《全面抗战释》、《动员群众的基本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以简练的语言，精辟的论述，向人们传达了全面抗战的精神实质，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的具有政治导向性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战》3日刊在群众中的声誉。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1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文协”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文协”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中；无论是在“文协”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上海救亡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与以宋庆龄为首的各界上层人士、社会活动家的冲锋陷阵是分不开的。上层人士的出面，对基层群众性救亡运动的开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但是，宋庆龄等在上海救亡运动中的公开露面，必将引起日伪的极端仇视。上海华界沦陷前后，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1937年10月便开始考虑如何安排上层人士的撤退问题。10月下旬，当他接到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为了宋庆龄的安危，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马上亲自把电报送给宋庆龄。由于宋庆龄尚有工作需要处理，一时无法离开。上海华界沦陷后，潘汉年再次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指示后，立即通过地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到达码头，乘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去香港。

在救亡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著名政治活动家郭沫若等，均在上海华界沦陷后，由潘汉年安排撤离上海。当时，上海的形势已急剧恶化，中共中央曾于上海华界沦陷的当天致电潘汉年让他转入地下，“完全秘密”起来。①但考虑到这些上层人士的安危，考虑到他们随时可能遭受日伪的暗害，潘汉年仍忘我地工作着。为向各界人士阐明撤退的意义，潘汉年以宴请的形式，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新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必须撤离上海。之后，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潘汉年均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安排，这些上层人士均安全地撤离了已被日军包围的上海。

①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潘汉年、刘晓等《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7年1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潘汉年在广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根据周恩来关于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的指示①，十分注重以上层的统战工作推动基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他充分利用“八办”公开合法的地位，通过新闻界的杨枣，职业界的王纪华，文化界的王任叔，妇女界的沈兹九，与各界救亡团体保持密切联系。随着各界救亡协会的相继建立，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澎湃之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①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就以争取《救亡日报》的出版为例，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八一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分别到国民党军队陈诚总部及张发奎、罗卓英部进行抗战宣传服务活动，是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又一成功例子。组织战地服务团至国民党军队服务的想法最初是陈诚向郭沫若提出的。之后，郭沫若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庐山谈判中涉及的有关向国民党军队派服务团的精神，认为可以同意陈诚的要求。并且提出我们可以组织一批爱国的革命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去工作，不仅可以在战地群众中做宣传、组织、服务工作，而且可以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交些朋友，进行团结救亡的教育。但潘汉年强调一点，即根据国共双方的约定，一方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因此这次上海组织的三支战地服务团切不能破坏这一约定。服务团成立后，潘汉年又专门找负责人开会，重申这一纪律。由于双方信守诺言，战地服务团工作进展顺利，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潘汉年在任“八办”主任时，还把统战工作做到上海青帮头目、抗战后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身上。针对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汉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送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第二天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价值约1.6万元）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的决议。①

①《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抗日战争（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如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在上海将近一年的统战工作，不仅赢得了各界上层人士的信任与支持，而且将上层统战工作与基层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将对国民党的团结争取工作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从而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的阵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进程。潘汉年作为一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潘汉年与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

黄金平　吴祥华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对他来说是“老行当”，得心应手。在新的条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帮助民主党派整顿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为新中国诞生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城之初，潘汉年就陪同陈毅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张元济、颜惠庆等著名爱国人士，广泛听取他们对接管、改造和建设新上海的意见。在短短的一二个月内，接连召开各种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知识界代表人士会晤，宣传政策，稳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粟裕、刘晓、曾山、潘汉年等。陈毅在会上致词说：中国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当与各阶层爱国同胞共同努力，来打文化仗和经济建设的大仗。6月3日，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会议的有：张澜、罗隆基、史良、郭钊沉、陈铭枢、郭春涛、胡厥文、谢仁冰等。席间，宾主交谈极为欢愉。

为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作为华东局统战部正副部长的陈毅、潘汉年，调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现状、组织、领导成员、政治倾向、活动状况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及时处理出现的一些问题。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党派为了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内部开展了整顿工作。有的整顿方针比较明确，整顿工作很顺利；有的工作迟缓，成效不大。对此，陈毅、潘汉年都作了了解、帮助。有的党派领导人没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顿工作中建立权威，潘汉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经陈毅、潘汉年说服后，北上了。陈毅、潘汉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并向中央建议亦工亦商的盛丕华等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安排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组织发展，有的党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以开明人士为主，有的主张以上层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为对象。对这些分歧，陈毅、潘汉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并积极做工作。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汉年主持下，统战部连续召开数次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一方面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征求大家意见。同时，也就各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交换意见。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谈会上，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与各党派中央协商规定的各党派分工原则，提出上海各民主党派组织内部整顿完毕的可以发展组织；同时建议注意质量，不要单纯追求数量，要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来发展组织。

当时，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现象，对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1950年上海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认为：他们总共没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个组织，是否有必要。对于这一情况，潘汉年在党内做工作，强调说，党不是孤立的，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一同前进，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

1951年3月16日，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并要组织部挑选一批较好的党团员进民主党派帮助工作。他并且亲自做到民主党派内部帮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学成去民建帮助工作，潘汉年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主党派工作也要做，白天没时间，晚上也可以去”。金接受了工作，和许涤新、蔡北华、杨延修等一些人去了民主党派，帮助他们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到1956年，上海各民主党派总人数从1951年的1300余人发展到11000人，为上海地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

积极开展工商统战工作

上海是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初期约有10多万户私营工商业，中国规模较大的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如申新纺织公司、福新面粉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大隆机器厂、大中华橡胶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等都开设在上海。如何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企业，团结和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是个重要问题。上海刚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陈毅、潘汉年都在会上讲了话，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大家，使工商界听了之后认为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些在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的人士陆续回沪。刘鸿生一回到上海，潘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当时，几位有代表性的人士邀请陈毅、潘汉年等市政府领导去吃饭。有人怕吃资本家的饭犯政治错误。陈毅笑着说：“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了，真是怪事！”潘汉年支持陈毅的意见，应邀作客。实际上边吃饭边做思想工作。潘汉年曾说：“要同资本家搞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要同他们交朋友，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如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潘汉年十分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投入恢复生产的工作。他对市军管会工商处的几位干部说：上海这个工商业大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的。他要求工商干部接近工商界人士，不要摆官架子。当潘汉年得知上海纺织工业的资本家为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苦恼时，立即向陈毅汇报，亲自走访荣毅仁、刘靖基等人，指示银行低息贷款，并通过市总工会做工作，说服工人大力支持。潘汉年想方设法帮助郭氏的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价值250万美元的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回到上海，潘汉年设宴为他洗尘，金融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邀作陪。周经营的金城银行由于受国民党金圆券风潮后遗症的影响，赤字无法弥补，不得不将投资的一个厂售给政府，以抵偿赤字。潘汉年认为，周作民在香港时，对转移民主党派负责人秘密离开香港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曾作出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人家的功劳，就派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帮助周解决困难，同时表示愿意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厂。周作民对此十分感激。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加深了他们对党的信任。上海工商界中的盛康年，经潘汉年同意组织了一个工商俱乐部，定名为“七一学习会”，潘汉年第一个应邀前往作报告，使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士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并且沟通了和党的联系。

解放初期，由于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积极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经济逐步好转，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欢呼“难忘的1951年”。但是，随即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毒”罪行。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开展了“五反”运动，成立了领导运动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经中央批准，上海对303户上层工商业者在市政协集中学习，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帮助他们自学和自查，推动他们自己交代问题，接受教育。这项工作由薄一波、陈毅和潘汉年领导，许涤新具体负责。潘汉年天天询问情况，强调“把斗争和团结结合起来”。当获悉有两个资本家神色不对，就关照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潘汉年夫人董慧这时也参加做303户的工作。她动员汤蒂固带头交代。汤看到别人交代问题像挤牙膏，她想出倒轧帐的办法，一口气坦白了5亿元（旧币，1亿元相当于改为新币后的1万元，下同），成了积极分子。潘汉年知道后找她谈话，询问汤坦白的数字是否真实。当了解到汤由于坦白多了，正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时，潘笑着说：“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潘汉年领导“五反”定案评议委员会，认真复查、评议、核实。汤后来定案核实为2亿元。也有人自报240亿元，结果核实定为3亿元的。“五反”期间，潘汉年还关心支持市妇联大胆做好303户家属工作。变阻力为动力，减轻资方的紧张情绪。由于中央和市委的正确领导，参加学习的303个资本家个个过关，定为完全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上海“五反”运动既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又严格执行政策，让资产阶级重新靠拢我们。

重视政治协商工作

潘汉年十分重视政治协商工作。1949年12月，上海市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协商委员会，陈毅任主席，潘汉年任副主席。下设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5个小组，隶属市协商委员会常委会领导。潘汉年经常参加各个小组的讨论，听取意见，解答问题。市协商委员会每月开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和潘汉年经常出席会议，和委员们一起协商许多重大问题。参加市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很高兴，认为每次听陈、潘两人讲话，都很“解渴”，能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潘汉年注意发挥市协商委员会的民主协商作用。解放初，上海面临各种困难：私营商业缺乏资金，原材料不足，生产停滞，公私和劳资关系紧张等。潘汉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协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1950年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成立市推销委员会，潘汉年担任主任委员。动员全市人民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解决资金短缺和财政经济困难，是市协商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陈毅曾邀请了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当场认购了很多，但到付款时却交不出来。这时，他说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多购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潘汉年派人进行调查，得知情况属实，于是就如实向陈毅和来上海调查的陈云汇报上海认购公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中央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削减了部分认购数目。

进城之初，收税困难，逃税漏税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市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吸收专家和工商界人士参加，对税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协助政府顺利完成收税任务，同时也提高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认识。同时，陈毅、潘汉年根据工商界人士的反映，也调整减免了一部分不合理的税收。当时，潘汉年和许涤新还联名写信给陈云，提出了经过调查研究，和工商界协商后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定税原则，既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又达到了公私两利的目的。

上海解放初期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市协商委员会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三大政治运动，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50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潘汉年被市协商会、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推选为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当时，上海举行了反帝爱国讲座达41次。上海抗美援朝分会发动上海各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1951年9月12日，潘汉年出席市协商会召开的劳资双方座谈会，会上，他强调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上海原计划捐献334架飞机，计人民币508亿元（旧币）。由于上海抗美援朝分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工人，各界踊跃捐献达8491万（新币），约合飞机566架。1952年，潘汉年等接见来上海参观访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华东分团的全体代表，向他们讲述了上海人民的这一无私的奉献。

为了推动市郊土地改革，市协商会组织了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市郊土改。通过实践，使各界人士对党的土改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促进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1951年上海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潘汉年向市协商委员会提出建议，成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审理。对某些案件在量刑上有重大分歧时，或对某一案件认为材料不足等，通过市审查委员会调查核实，作出正确结论。例如申新纺织厂恶霸黄龙华一案，主审人员量刑意见不一。潘汉年得知后，一方面及时做工作，另一方面要市协商委员会组织调查团，由各陪审员、机关、团体代表与报社记者20余人组成，到工厂访问被害者，提讯与黄有关的在押犯，进行深入调查，查明黄犯重大罪行，在量刑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巩固发展统一战线

解放初期，上海市协商委员会根据全国政协关于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组织上海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等二千多人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针对党内外存在解放后统一战线工作还需要不需要的思想，潘汉年向各界人士作了《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的学习辅导。他着重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需要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统一战线还要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一定要让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民族工商业在五种经济并存中有一定发展前途，但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潘汉年还谈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问题，他指出：各个阶级的代表都有依据共同纲领平等发言，共商国家大事的权利。各个阶级阶层在共同纲领的大前题下，都代表着各自的合法利益。在统一战线内部有团结有斗争。

上海解放之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妥善安置了13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和9000多名失业知识分子。著名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还被提名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体现了党最广泛的团结各阶层人士的统战政策。1951年和1953年，上海先后设立了市府参事室和文史馆，安排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流。“味精大王”吴蕴初、“煤炭大王”刘鸿生从香港回沪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韦悫、盛丕华、金仲华、荣毅仁、赵祖康、胡厥文等党外人士先后就任副市长。陈毅和潘汉年都很重视党外副市长，要求办公厅为他们配好秘书，及时送阅文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让党外副市长做到有职有权，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还十分重视市、区两级政权机关中的统战工作。1952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召开机关内部统战工作组成立大会，市委、市府有关负责人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专家等二千余人参加了会议。潘汉年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后来，他还对机关统战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应结合本单位统战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工作，向党外干部作报告”。由于民主人士拥有共商国家和上海大事的权利，调动了各界人士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放初期，上海呈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广泛结交新老朋友

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朋友，与我们一道工作。对于各界上层人士，争取、团结了一个，往往就能争取、团结一大片。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过去对党不了解的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往往首先是从对共产党干部认识和了解开始的。而这些人最先接触到的，就是共产党做统战工作的干部。潘汉年在担任统战部领导以后，他向华东和上海统战部门的干部反复做动员和教育工作，要求统战部干部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善于广泛结交朋友。

潘汉年自己作出了表率。他过去长期在上海工作，有很多老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是文化界和军政界爱国人士。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工作的面更广、更复杂。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除了老朋友外，还需要结交许多新朋友。作为负责华东、上海市统战工作领导的潘汉年深知必须团结和结交更多的朋友，才能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从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起，潘汉年就开始结交赵祖康这位朋友。他关心赵祖康的工作，尊重并倾听这位党外朋友的建议。上海解放后不久，赵向潘建议，原上海市公安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在解放前夕曾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希望考虑给陆大公安排工作。潘汉年接受了赵的建议。这令陆大公十分感动。他感到潘汉年所代表的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并不是因为陆大公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公安局代理局长而予以排斥。赵祖康也感到潘汉年是真诚信任党外的朋友。

潘汉年对一些老朋友不仅在生活上关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关心。王昆仑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经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从30年代起，他就和中共联系，并在1933年秘密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但是，他还是忠诚地为共产党工作，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潘汉年也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解放后，王昆仑对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十分关心。为此，王请求潘帮助。潘不仅负责地向中央组织部证明了他所了解的有关王昆仑的历史情况，而且很快给王昆仑复信，潘的关心与负责态度，使王昆仑深感欣慰。

潘汉年对于一些老朋友，对于一些统战工作的对象，既有必要的关心与照顾，同时又坚持一定的原则。有些问题可以灵活处理，有一些问题必须坚持原则。新闻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解放初，他提出拟编译10种新书，向主管出版的单位借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但长期未还。此事在新闻出版界闹得沸沸扬扬。出版部门和统战部门都向上级打报告，拟让有关部门出面向人民法院控告。潘汉年知道后，慎重指出：此事应“提出清查积欠之办法。现在即向法院提出控诉，尚嫌过早”。后来，出版部门按照潘汉年的意见妥善处理了这件事，从而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样，潘汉年在处理一位耆宿在沪住房租金的问题也是非常认真细致的。上海解放后，这位老人对居住的住房租金调整提高有些意见，潘汉年知道这情况后、认为对这样一位老先生必须充分照顾，不能为一点很小的事情而伤害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朋友的感情。因此他指示：“租金照常，不宜提高。”像这样一类不因小事而伤害朋友感情的事例还有不不少。

解放初期，潘汉年担任常务副市长工作，兼职很多，每天要处理成堆的文件，听许多汇报，在百忙之中，对于统战工作中的一些小事，他都是亲自出面处理。一位爱国人士牺牲后，他的遗孀一直住在上海，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其日常开销。上海解放后，这位女士的开销日渐增大，以至中央统战部按月给的费用不敷开销，拖欠了很多债务。久而久之，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某女士的生活费用由中央统战部管的，上海不便直接处理。于是，潘汉年写信给中央统战部领导。后来，在潘的亲自协调下，此事才得以妥善解决。这事情很小，但很重要，很棘手。这不仅是一点钱的问题，其中还有政治影响、党的统战政策、人的感情等问题。因此，即使是对于这样一类琐碎事情，潘汉年也从不马虎从事，而是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

争取新的和平展开新的斗争

黄金平　吴祥华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对他来说是“老行当”，得心应手。在新的条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帮助民主党派整顿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为新中国诞生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城之初，潘汉年就陪同陈毅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张元济、颜惠庆等著名爱国人士，广泛听取他们对接管、改造和建设新上海的意见。在短短的一二个月内，接连召开各种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知识界代表人士会晤，宣传政策，稳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粟裕、刘晓、曾山、潘汉年等。陈毅在会上致词说：中国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当与各阶层爱国同胞共同努力，来打文化仗和经济建设的大仗。6月3日，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会议的有：张澜、罗隆基、史良、郭钊沉、陈铭枢、郭春涛、胡厥文、谢仁冰等。席间，宾主交谈极为欢愉。

为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作为华东局统战部正副部长的陈毅、潘汉年，调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现状、组织、领导成员、政治倾向、活动状况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及时处理出现的一些问题。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党派为了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内部开展了整顿工作。有的整顿方针比较明确，整顿工作很顺利；有的工作迟缓，成效不大。对此，陈毅、潘汉年都作了了解、帮助。有的党派领导人没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顿工作中建立权威，潘汉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经陈毅、潘汉年说服后，北上了。陈毅、潘汉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并向中央建议亦工亦商的盛丕华等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安排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组织发展，有的党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以开明人士为主，有的主张以上层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为对象。对这些分歧，陈毅、潘汉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并积极做工作。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汉年主持下，统战部连续召开数次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一方面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征求大家意见。同时，也就各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交换意见。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谈会上，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与各党派中央协商规定的各党派分工原则，提出上海各民主党派组织内部整顿完毕的可以发展组织；同时建议注意质量，不要单纯追求数量，要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来发展组织。

当时，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现象，对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1950年上海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认为：他们总共没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个组织，是否有必要。对于这一情况，潘汉年在党内做工作，强调说，党不是孤立的，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一同前进，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

1951年3月16日，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并要组织部挑选一批较好的党团员进民主党派帮助工作。他并且亲自做到民主党派内部帮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学成去民建帮助工作，潘汉年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主党派工作也要做，白天没时间，晚上也可以去”。金接受了工作，和许涤新、蔡北华、杨延修等一些人去了民主党派，帮助他们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到1956年，上海各民主党派总人数从1951年的1300余人发展到11000人，为上海地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

积极开展工商统战工作

上海是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初期约有10多万户私营工商业，中国规模较大的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如申新纺织公司、福新面粉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大隆机器厂、大中华橡胶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等都开设在上海。如何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企业，团结和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是个重要问题。上海刚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陈毅、潘汉年都在会上讲了话，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大家，使工商界听了之后认为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些在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的人士陆续回沪。刘鸿生一回到上海，潘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当时，几位有代表性的人士邀请陈毅、潘汉年等市政府领导去吃饭。有人怕吃资本家的饭犯政治错误。陈毅笑着说：“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了，真是怪事！”潘汉年支持陈毅的意见，应邀作客。实际上边吃饭边做思想工作。潘汉年曾说：“要同资本家搞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要同他们交朋友，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如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潘汉年十分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投入恢复生产的工作。他对市军管会工商处的几位干部说：上海这个工商业大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的。他要求工商干部接近工商界人士，不要摆官架子。当潘汉年得知上海纺织工业的资本家为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苦恼时，立即向陈毅汇报，亲自走访荣毅仁、刘靖基等人，指示银行低息贷款，并通过市总工会做工作，说服工人大力支持。潘汉年想方设法帮助郭氏的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价值250万美元的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回到上海，潘汉年设宴为他洗尘，金融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邀作陪。周经营的金城银行由于受国民党金圆券风潮后遗症的影响，赤字无法弥补，不得不将投资的一个厂售给政府，以抵偿赤字。潘汉年认为，周作民在香港时，对转移民主党派负责人秘密离开香港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曾作出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人家的功劳，就派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帮助周解决困难，同时表示愿意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厂。周作民对此十分感激。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加深了他们对党的信任。上海工商界中的盛康年，经潘汉年同意组织了一个工商俱乐部，定名为“七一学习会”，潘汉年第一个应邀前往作报告，使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士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并且沟通了和党的联系。

解放初期，由于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积极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经济逐步好转，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欢呼“难忘的1951年”。但是，随即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毒”罪行。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开展了“五反”运动，成立了领导运动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经中央批准，上海对303户上层工商业者在市政协集中学习，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帮助他们自学和自查，推动他们自己交代问题，接受教育。这项工作由薄一波、陈毅和潘汉年领导，许涤新具体负责。潘汉年天天询问情况，强调“把斗争和团结结合起来”。当获悉有两个资本家神色不对，就关照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潘汉年夫人董慧这时也参加做303户的工作。她动员汤蒂固带头交代。汤看到别人交代问题像挤牙膏，她想出倒轧帐的办法，一口气坦白了5亿元（旧币，1亿元相当于改为新币后的1万元，下同），成了积极分子。潘汉年知道后找她谈话，询问汤坦白的数字是否真实。当了解到汤由于坦白多了，正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时，潘笑着说：“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潘汉年领导“五反”定案评议委员会，认真复查、评议、核实。汤后来定案核实为2亿元。也有人自报240亿元，结果核实定为3亿元的。“五反”期间，潘汉年还关心支持市妇联大胆做好303户家属工作。变阻力为动力，减轻资方的紧张情绪。由于中央和市委的正确领导，参加学习的303个资本家个个过关，定为完全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上海“五反”运动既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又严格执行政策，让资产阶级重新靠拢我们。

重视政治协商工作

潘汉年十分重视政治协商工作。1949年12月，上海市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协商委员会，陈毅任主席，潘汉年任副主席。下设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5个小组，隶属市协商委员会常委会领导。潘汉年经常参加各个小组的讨论，听取意见，解答问题。市协商委员会每月开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和潘汉年经常出席会议，和委员们一起协商许多重大问题。参加市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很高兴，认为每次听陈、潘两人讲话，都很“解渴”，能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潘汉年注意发挥市协商委员会的民主协商作用。解放初，上海面临各种困难：私营商业缺乏资金，原材料不足，生产停滞，公私和劳资关系紧张等。潘汉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协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1950年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成立市推销委员会，潘汉年担任主任委员。动员全市人民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解决资金短缺和财政经济困难，是市协商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陈毅曾邀请了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当场认购了很多，但到付款时却交不出来。这时，他说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多购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潘汉年派人进行调查，得知情况属实，于是就如实向陈毅和来上海调查的陈云汇报上海认购公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中央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削减了部分认购数目。

进城之初，收税困难，逃税漏税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市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吸收专家和工商界人士参加，对税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协助政府顺利完成收税任务，同时也提高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认识。同时，陈毅、潘汉年根据工商界人士的反映，也调整减免了一部分不合理的税收。当时，潘汉年和许涤新还联名写信给陈云，提出了经过调查研究，和工商界协商后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定税原则，既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又达到了公私两利的目的。

上海解放初期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市协商委员会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三大政治运动，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50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潘汉年被市协商会、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推选为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当时，上海举行了反帝爱国讲座达41次。上海抗美援朝分会发动上海各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1951年9月12日，潘汉年出席市协商会召开的劳资双方座谈会，会上，他强调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上海原计划捐献334架飞机，计人民币508亿元（旧币）。由于上海抗美援朝分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工人，各界踊跃捐献达8491万（新币），约合飞机566架。1952年，潘汉年等接见来上海参观访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华东分团的全体代表，向他们讲述了上海人民的这一无私的奉献。

为了推动市郊土地改革，市协商会组织了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市郊土改。通过实践，使各界人士对党的土改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促进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1951年上海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潘汉年向市协商委员会提出建议，成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审理。对某些案件在量刑上有重大分歧时，或对某一案件认为材料不足等，通过市审查委员会调查核实，作出正确结论。例如申新纺织厂恶霸黄龙华一案，主审人员量刑意见不一。潘汉年得知后，一方面及时做工作，另一方面要市协商委员会组织调查团，由各陪审员、机关、团体代表与报社记者20余人组成，到工厂访问被害者，提讯与黄有关的在押犯，进行深入调查，查明黄犯重大罪行，在量刑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巩固发展统一战线

解放初期，上海市协商委员会根据全国政协关于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组织上海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等二千多人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针对党内外存在解放后统一战线工作还需要不需要的思想，潘汉年向各界人士作了《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的学习辅导。他着重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需要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统一战线还要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一定要让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民族工商业在五种经济并存中有一定发展前途，但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潘汉年还谈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问题，他指出：各个阶级的代表都有依据共同纲领平等发言，共商国家大事的权利。各个阶级阶层在共同纲领的大前题下，都代表着各自的合法利益。在统一战线内部有团结有斗争。

上海解放之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妥善安置了13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和9000多名失业知识分子。著名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还被提名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体现了党最广泛的团结各阶层人士的统战政策。1951年和1953年，上海先后设立了市府参事室和文史馆，安排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流。“味精大王”吴蕴初、“煤炭大王”刘鸿生从香港回沪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韦悫、盛丕华、金仲华、荣毅仁、赵祖康、胡厥文等党外人士先后就任副市长。陈毅和潘汉年都很重视党外副市长，要求办公厅为他们配好秘书，及时送阅文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让党外副市长做到有职有权，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还十分重视市、区两级政权机关中的统战工作。1952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召开机关内部统战工作组成立大会，市委、市府有关负责人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专家等二千余人参加了会议。潘汉年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后来，他还对机关统战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应结合本单位统战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工作，向党外干部作报告”。由于民主人士拥有共商国家和上海大事的权利，调动了各界人士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放初期，上海呈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广泛结交新老朋友

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朋友，与我们一道工作。对于各界上层人士，争取、团结了一个，往往就能争取、团结一大片。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过去对党不了解的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往往首先是从对共产党干部认识和了解开始的。而这些人最先接触到的，就是共产党做统战工作的干部。潘汉年在担任统战部领导以后，他向华东和上海统战部门的干部反复做动员和教育工作，要求统战部干部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善于广泛结交朋友。

潘汉年自己作出了表率。他过去长期在上海工作，有很多老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是文化界和军政界爱国人士。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工作的面更广、更复杂。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除了老朋友外，还需要结交许多新朋友。作为负责华东、上海市统战工作领导的潘汉年深知必须团结和结交更多的朋友，才能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从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起，潘汉年就开始结交赵祖康这位朋友。他关心赵祖康的工作，尊重并倾听这位党外朋友的建议。上海解放后不久，赵向潘建议，原上海市公安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在解放前夕曾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希望考虑给陆大公安排工作。潘汉年接受了赵的建议。这令陆大公十分感动。他感到潘汉年所代表的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并不是因为陆大公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公安局代理局长而予以排斥。赵祖康也感到潘汉年是真诚信任党外的朋友。

潘汉年对一些老朋友不仅在生活上关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关心。王昆仑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经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从30年代起，他就和中共联系，并在1933年秘密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但是，他还是忠诚地为共产党工作，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潘汉年也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解放后，王昆仑对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十分关心。为此，王请求潘帮助。潘不仅负责地向中央组织部证明了他所了解的有关王昆仑的历史情况，而且很快给王昆仑复信，潘的关心与负责态度，使王昆仑深感欣慰。

潘汉年对于一些老朋友，对于一些统战工作的对象，既有必要的关心与照顾，同时又坚持一定的原则。有些问题可以灵活处理，有一些问题必须坚持原则。新闻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解放初，他提出拟编译10种新书，向主管出版的单位借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但长期未还。此事在新闻出版界闹得沸沸扬扬。出版部门和统战部门都向上级打报告，拟让有关部门出面向人民法院控告。潘汉年知道后，慎重指出：此事应“提出清查积欠之办法。现在即向法院提出控诉，尚嫌过早”。后来，出版部门按照潘汉年的意见妥善处理了这件事，从而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样，潘汉年在处理一位耆宿在沪住房租金的问题也是非常认真细致的。上海解放后，这位老人对居住的住房租金调整提高有些意见，潘汉年知道这情况后、认为对这样一位老先生必须充分照顾，不能为一点很小的事情而伤害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朋友的感情。因此他指示：“租金照常，不宜提高。”像这样一类不因小事而伤害朋友感情的事例还有不不少。

解放初期，潘汉年担任常务副市长工作，兼职很多，每天要处理成堆的文件，听许多汇报，在百忙之中，对于统战工作中的一些小事，他都是亲自出面处理。一位爱国人士牺牲后，他的遗孀一直住在上海，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其日常开销。上海解放后，这位女士的开销日渐增大，以至中央统战部按月给的费用不敷开销，拖欠了很多债务。久而久之，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某女士的生活费用由中央统战部管的，上海不便直接处理。于是，潘汉年写信给中央统战部领导。后来，在潘的亲自协调下，此事才得以妥善解决。这事情很小，但很重要，很棘手。这不仅是一点钱的问题，其中还有政治影响、党的统战政策、人的感情等问题。因此，即使是对于这样一类琐碎事情，潘汉年也从不马虎从事，而是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

加强团结、扩大统一战线

萧恺①

①萧恺，即潘汉年。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进入第三年，“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已变得更加没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们的统治，已经走到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不但日益丧失人心，日益威信扫地，日益分崩离析，而且连（略三字）①本人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与此相反的人民大众方面呢，歼灭了蒋军264万余人，解放了的地区已占全国面积24．5％，解放的人口已占全国总数37％；在解放区的农村，已正确的执行了消灭封建势力的土改工作，“这不但为解放区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因为它符合于全国农民及其他广大人民的要求，又为整个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对于城市，对于工商业，也完全规定了正确的政策”，（严格执行安定社会秩序，维持治安，认真保护公私财产，及“一切守法的民间工商业者，守法的文化宗教团体，和守法的外侨不受侵害”……）这一切不仅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同时是“实现全国胜利所不可少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请参看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有利于人民大众走向胜利最显著的另一个标志是：

①此处略去的三字是：蒋介石。下同。

“广大的中间阶层迅速地失去了对于和平改良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并且敢于把这希望公开表示出来。”

“特别是今年5月1日所提出的召开没有帝国主义走狗及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但获得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拥护。”

当前政治上的新形势，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去年年底的预见：“只是在（略三字）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略三字）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但是回顾1年来的形势发展，检讨一下我们在蒋管区及海外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否完全符合客观形势的发展呢？我想除了已得的成绩之外，还有些值得我党及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纠正的。

首先关于执行加强团结及努力扩大统战的基本方针上，还存在着若干偏向。

一、共产党如何执行坚强领导

谁也不否认当前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共的坚强领导，是不能胜利的，实现领导，决不是形式的，概念的可以解决任务，必须通过党正确的方针，具体的政策，用耐心的，诚恳的解释，说服，教育态度，才能够团结一切民主党派及一切反美反蒋的民主人士，过去不可否认我们是有以一般的口号代替了具体的领导的情况存在，如反对第三条道路的或中间路线的幻想，我们有些同志强调民主与反民主之间“路只有一条”——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是对的，但缺乏分析这一条彻底民主大道，是反美反蒋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片面的强调了工农民主利益，误解“人民利益”或“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好像是排除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在外，好比农村土改中的强调贫雇农利益，而忽视联合中农同样的偏向。特别缺乏仔细分析中间路线者所幻想的反动统治和平改良的不可能，同时又把提倡中间路线的美蒋阴谋者与徘徊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的中间路线者混为一谈，对前者我们过去着重打击与揭露是正确的，而对后者忽视对他们争取与说服是错误的。正因为在蒋管区及海外中间人士为数不少，正确的揭露与打击中间路线的阴谋幻想，应当是有利于我们争取广泛的中间人士，而过去我们从“左”的概念出发，对若干中间人士口头上、文字上所表现的幻想改良和平，不加分析的把他们看成制造阴谋幻想的代表来打击，没有从争取的原则出发，给以适当的说情说理的批评（斗争），这个过程虽然很短，遗下的影响是相当的大，是妨害了统战的团结与发展。

共产党应该坚强领导统一战线，不要满足于形式上的一呼百应，我们必须是依靠正确具体的领导，使人心说诚服。同时不要把党的一般纲领与统战范围内具体的共同斗争的统一纲领混为一谈，因此要承认联合过程中各阶级各党派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区别，应当照顾到他们与我们不相同之处，同时又坚决忠实执行共同目标，并经常促进大家的进步。反对把统一战线代替了党，取消了党的独立性，同样反对把党代替了统一战线脱离群众的“左”的关门主义。由于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胜利的不拔的基础，由于中共的政治主张为全国范围内广大人民所拥护，目前在统战工作中较容易犯“左”的偏向，不尊重同盟者的意见，不考虑其他民主党派的建议，遇事不善诚恳合作，为了巩固团结或必须争取的同盟者，对他们应有的友谊批评与善意说服，却误用了对反动阴谋者而采取的打击……这些自高自大，敌友不分的作风，都是由“左”倾偏向而来。

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对坚强领导统一战线就提出明确的方针：

“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方面走去，谁要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面，谁就要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和友党同志谦和商量的态度，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巩固统一团结。”“双方（我党与友党）同志接触，应采谦和、尊敬、商量态度、不采傲慢、轻视、独断态度，以改善双方之关系，这也是必要的。”（毛泽东：论新阶段）

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坚强的领导，不是别的，是基于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有利于人民的正确政治方针，通过实际具体的政策，加强统一战线的团结与发展。

二、放手发展反美反蒋统一战线

蒋管区广大群众对美帝的阴谋侵略的“援华”罪行，及反动统治卖国灭族的“勘乱”政策，已普遍纷起反抗，即广大的中间阶层也迅速地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转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及人民解放军的彻底胜利，国民党内部反独裁，反专政，也达到空前的程度，但是统一战线的发展，是落在客观形势之后，其原因不是别的，在于我们停留在反美反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一般的号召，而缺乏针对着美帝及其走狗反动集团每一罪行，提出具体的鼓动口号，组织各个社会阶层迫切的当前的个别利益的斗争，关于这方面，全国学生的斗争是有它光荣的成绩，但学生运动还相当孤立，不能发动广大的公教人员，工商业界，及其他一切社会各阶层，作有机的配合。

我们当不能否认反动统治愈接近崩溃，其残酷的白色恐怖压迫愈严重，如宣布抗暴学生和求生工人的死刑，是套上民主外衣的欧美帝国主义所未曾见的暴行，而美帝豢养的大走狗竟敢为此，其狠毒卑劣，袁世凯也只能叹为观止，但是人民觉醒的程度也随之提高了，斗争的勇气也随之坚决了，我们放手发展广泛的蒋管区的统一战线，是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主张的号召，与蒋管区人民各种具体斗争结合，特别是目前中共号召的召开新政协，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入各社会阶层去宣传解释，联系到反美反蒋各别具体的斗争。如蒋政权在美帝指使之下，公然提倡“中日合作”，派张群赴日具体面商“共存共荣”的汪精卫的汉奸政策，首蒙其害的当然是工商业界，我们应当去对工商业家进行宣传鼓动，展开反亲日的统战运动。又如蒋政权的财政经济崩溃到不可收拾的状态，物价狂跳不止，而一般公教人员收入普遍地到了饥不足食，寒不足衣的境遇，组织他们起来反饥饿，要求改善待遇。总之，谈政治路线，原则，方针，而不去联系具体实际的各别斗争，是取消斗争的空谈。同样，专注意上层党派关系的团结，不去具体进行群众间实际斗争的组织领导，统一战线既不能巩固团结，也不能广泛的发展。

三、利用合法，矛盾，有利于斗争的展开

美蒋为了欺骗蒙蔽群众，伪装民主，甚至谣言和平，制造“反蒋独立”，我们应当揭露其阴谋，使广大人民不致上当，但是在蒋管区我们不要满足于单纯的揭露，同时要善于利用合法的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以便掩护斗争的展开，使之有利于人民的斗争。问题是必须清楚明白敌人的阴谋诡计，不能怀有丝毫幻想，才能说得上利用，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敌人的阴谋欺骗是必要的，但不注意利用敌人的合法，利用敌人的矛盾，进行有利于我们的斗争，也是消极的。问题是利用，而不是信任，同时利用必须有利于人民，而使敌人欺骗阴谋更无作用；相反的，凡是一切足以增加敌人阴谋欺骗的利用都应该坚决反对，如信任李宗仁之流的口头反蒋，他并无具体反蒋行动，误认有利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愿在政治上揭露他的阴谋作用，相反的引以为同道，这是被李宗仁利用，扩大其阴谋欺骗，妨碍了人民的彻底反蒋，这是原则上的错误，谈不上利用矛盾，可被利用的敌人内部矛盾，必须演变到互相利害冲突。

第六章：新上海的副市长

印象深刻的领导人

屠基远

在我参加革命工作中，潘汉年是我接触的领导人中印象深刻的一个。

1949年上海解放以前，我并不认识潘汉年。青少年时期，爱好文学，因而知道在中国左翼文坛中，潘汉年是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中年轻的一员。在后来懂一些党的历史之后，知道他不仅是党的文化战线的领导人，同时又是做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打交道的重要人物。当时，我虽有敬佩之心，却从来没有和他接触过。解放以后，他在陈毅市长领导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我才认识他。他是市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市府党组书记，是领导我们市府各局的主要负责人。我开始是市民政局的秘书主任，同他接触不多。到1951年我任民政局副局长时，才多次同他接触，对他才有所了解。一直到1955年他离开市府被审查为止，前后有6年时间。　　　　　　　　　　　　 一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我党在进上海以前，就在江苏丹阳做接管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准备工作，按系统成立军事、政务、财经、文教等接管委员会，搜集资料、档案，安排好每个单位的负责人。汉年同志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人一起从丹阳进入上海。5月25口，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他们迅速同上海地下党会合。我当时参加国民党市政府的接管准备工作，奉命到总部设在交通大学的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去报到。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政务接管委员会到塘沽路原国民党市参议会、市民政局地址办公。主要接管司法（法院系统）、参议会（接管后撤销）、民政（民政局和社会局救济、社团方面工作）以及一些不属于各局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驻上海的机构。上海当时有30个区。市区20个区由政务接管委员会接管，郊区10个区由郊区工委接管。

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在当时成立。汉年同志除任副市长外还兼任秘书长，管理市政府内部事务，同市政府各局的接触较多。市民政局成立后，仍管各区的工作。各区的许多工作要请示汉年同志。市政府任命的第一任民政局局长为曹漫之，副局长黄序周，我为秘书主任。当时，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采取彻底摧毁的方针。各区成立区接管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区以下的保甲制度全部取消。我们接管了30个区，1193个保，28552个甲，1033206户，5406644人口的户籍册。一大批保甲人员，听候审查。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记得当时汉年同志对地区工作有几点原则指示：一、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万，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40万（如蓬莱、嵩山区）。要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二、地区工作要依靠群众，依靠工人家属，依靠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三、要解决在里弄中出现的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例如当时上海居民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棚户区）没有家用自来水，而是由给水站供应的。这些给水站往往由当地的地痞、恶棍所控制，他们敲诈欺压居民。根据汉年同志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普陀区在梅芳里、江宁区在金家巷，发动群众建立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自来水站管理委员会，深受群众欢迎。此事很快在各区推广。全市成立了104个自来水站管理委员会。

根据市委、市府的要求，我们逐步组织里弄居民，在1949年夏天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市区各区组织了居民卫生小组16650个。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各区开展反轰炸斗争，组织人民防护大队108个，中队413个，小队15875个。冬天，抗美援朝开始，破坏分子蠢蠢欲动，市军管会决定各区成立冬防办事处，组织人民冬防服务队2020个，开展防特、防匪、防空、防火和解决居民生活上共同关心的问题。1951年，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里弄居民委员会。

当时，全国还没有居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它是一种新生事物。我们是根据上海人口多的实际情况和居民需要，由市委、市府决定组织的。成立起来后，出现的具体问题很多。我当时正担任市民政局副局长，主管政建工作，同潘汉年接触较多。他对于居民委员会由谁来组织的问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工人在工厂里工作，解放初没有退休工人。潘汉年指出：首先要依靠在里弄里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属。其次是党员家属和过去同我们一起参加过革命和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曾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这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我们同妇联联系后，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居民委员会和在区以下建立街道办事处，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是根据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实际情况摸索着建立起来的，奠定了今天城市管理的基础。

解放初期，市、区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通过有关人民团体和代表性人士协商产生。潘汉年指示我们：“过去国民党时期是有钱人当代表，我们特别要注意，让各方面的人士当代表，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1950年12月27日，提篮桥区第一个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潘汉年代表市人民政府前去参加。各界人民，特别是里弄居民、人民警察、烈军属、少数民族以及工商业者、中小学教员等各界热烈欢迎潘副市长的到来。潘汉年在会议上讲了话。从此，各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市普遍召开，揭开了上海人民民主政治新的一页。

二

解放前的上海，在很大程度上由流氓集团控制，上海人民深受敲诈、盘剥和欺凌。解放初期，老百姓盼望着共产党消灭流氓，做到真正翻身解放。

潘汉年长期在上海工作，做过党的传科工作、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对于上海的流氓集团有深刻的了解。上海解放以后，党为了恢复生产，同投机倒把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在他的参加领导下，取缔了证券交易所和银元贩子，其中不少人是流氓集团分子；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盗匪活动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镇压了一批流氓集团的骨干分子；在禁毒，取缔赌场，以及工厂肃清工特，整顿市政基层组织中，挖出了一批流氓霸头。解放前夕，青帮头子杜月笙及其手下避往香港。据说潘汉年在港期间曾同他们有过接触，告诫他们转告在上海的徒子徒孙，要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劝告杜等可以回上海改恶从善，将功赎罪。

在上海没有出走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成为群众议论的对象。当时党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让这个作恶几十年的大流氓头子安安稳稳地住在上海，他的徒子徒孙们觉得有个老头子作靠山，会继续胡作非为，必须对他作出处理；另一种看法相反，认为不要动他，潘汉年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黄金荣不走，说明他受到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对党至少不抱敌意。再说，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也消灭了，难道他斗得过共产党吗？我们要掌握他的情况，并要他有所表示。后来，黄金荣在报上登了悔过书，表示自己已经年迈（时已80多岁），不问外事，所有徒子徒孙，都要安分守己，服从政府；否则，谁在社会上干了不利于国家的事，由谁自己负责。黄金荣于1953年在上海去世。

在改造旧上海的斗争中，民政局除了收容游民、惯窃，实行劳动改造外，还配合市公安局进行取缔妓院、消灭娼妓的斗争。1951年，在市公安局材料中，上海还有400多名妓院妓女。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把“大世界”附近和福州路一带的妓院予以查封，收容工作由民政局和妇联负责。对改造妓女的方针，潘汉年作了具体指示，他认为妓院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汗为生，必须坚决关押、判刑和强制劳动改造。对于妓女，首先应当肯定她们是劳动人民，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旧社会的受难者。但是，她们进入旧社会的黑暗圈子之后，受到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气。因而既要用对劳动人民态度来对待她们，又要用劳动来改造她们。

民政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妇女教养所，在封闭妓院那晚把她们接来。不出潘汉年所料，有些人感到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了火坑。但也有不少人进来后大哭大闹，有的还设法逃跑。她们要抽烟，要喝酒，有的还有毒瘾；她们把晚上当白天，把白天当晚上，互相吵架厮打，甚至我们女干部在劝架中也被她们打伤。我们用潘汉年的指示教育干部，做耐心的工作。给这些妇女讲党的政策，讲革命故事，安定她们的情绪，帮助她们改变生活习惯，医治性病，并组织她们学文化和参加生产劳动。

潘汉年很关心这项收容工作。几天后，我们去市政府向他汇报，他说：“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教育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一旦觉悟，就会懂得人民政府为了挽救她们的好意。”又鼓励我们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事实正是这样。她们学文化、学生产技术，两年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不少人建立了家庭。当时，娼妓在上海不复存在了。通过多方面的改造，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大大提高。潘汉年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　　　　　　　　　　　 三

1955年初，有一次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礼堂开会，宋日昌副市长告诉我：潘汉年向市委推荐，调我去市政协当副秘书长。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调任我国驻苏联大使，原市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梅达君到大使馆做参赞。协商委员会机关没有党员负责人，潘汉年那时是市委第三书记，主管政协工作。1954年，党中央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发交各省、市讨论，上海组织几千人讨论，提修改意见，主要由协商委员会负责。我曾参加了组织工作，对协商委员会和各方面人士比较熟悉。”我想调我去，可能与这方面有关。

1955年3月下旬，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的委员、常委的名单，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想不到这次会议竟是我和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约十多天后，潘汉年在北京被逮捕。市委在4月召开的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

这个大冤案，不仅迫害了潘汉年和董慧，还牵连了许多同潘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他们都遭逮捕，有的坐了20多年的牢，有的受到长期审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党不仅为潘汉年伸张了正义，也为许多无辜受牵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使许多干部感到党的伟大和温暖。

潘汉年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能够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人民群众具有深厚感情，全心全意为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辛劳地工作，人民永远怀念他、崇敬他，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潘汉年是上海工人的贴心人

陆象贤

“二六”轰炸前后

上海解放初期，由于美蒋封锁，面临着严重的形势。1949年9月7日，刘晓在华东青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华东的斗争是尖锐、紧张、曲折、复杂的，华东的斗争位于全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上海的斗争最尖锐。同一天，潘汉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上海遭受经济困难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海口，使过去畸形发展的上海经济与依赖于帝国主义原料的若干生产事业发生困难；二、目前我们尚处于军事状态，我军在华中、西北、华南正全面开展攻势，因此，使全国商品运输受到阻滞，物资不能顺利交流；三、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主要依靠广大解放区农村的支援。农民负担很重，购买力相当萎缩。基于这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一个原因，使目前上海经济情况受到很大影响。潘汉年告诉大家：这是解放后暂时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不但可以克服，而且激励了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打下今后改造上海、发展经济的基础。

正当上海广大职工和工商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积极沟通与各新解放区的关系，节约器材，节衣缩食，度过最困难阶段的时候，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的美制飞机17架（其中B24型12架，P51型和P28型5架）分4批在午间12时25分至13时53分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法电、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处，造成人员、财产、设备的巨大损失。当时，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刘长胜当即宣布休会。陈毅指示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立即赶回去组织紧急抢修，恢复生产。陈毅赶回市政府。当时，潘汉年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参加一个约会，他得到市长办公室秘书的电话，听到杨浦发电厂被炸，锅炉被炸坏的消息，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辞，赶回市政府，同陈毅一起召集各局汇集情况，同时部署公安局维持社会治安；卫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医院准备汽油灯，全夜值班，抢救伤员；公用局调度电力，尽量使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处的供电迅速恢复；民政局通知各区对被轰炸地区，迅速妥善进行安置工作，严防宵小之徒乘机捣乱；市军管会紧急通知各机关及全体人员动员起来布置防空，组建消防小组。

2月7日，陈毅和潘汉年、刘长胜等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冒着刺骨寒风前往被炸得最厉害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并慰问电厂工人。潘汉年遵照陈毅同志的嘱咐，连日来，到嵩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的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慰问伤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市人民政府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抢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供应。在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往往出现排队长龙。工商局向潘汉年建议不能光靠私商代销大米，需要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把大米直接按规定牌价出售到市民手里。市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安定下来。

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上海解放后，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经济、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处理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劳资关系。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时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只有150多家，而私营工业有1300家左右，私营商业有15万家左右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减产、停工、倒闭，失业人员增加。由于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一些私营工商业缩小经营，甚至停工；少数业主甚至抽出资金，企图逃跑。而少数职工又一时分不清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变化，提出过高要求，有过火行为，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劳资纠纷。1949年8月3日，陈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现在不少企业，资方有困难，工人也有困难。这个困难只有根据党中央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通过劳资协商解决。”上海广大职工群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动精神去做好团结、教育资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难严重的私营工厂中，工人们还自愿减薪，甚至轮流回乡，团结资本家维持生产。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货公司店员帮助资方改变经营方针，将经营高档商品改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货。与此同时，潘汉年对劳资双方做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阐明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和劳资协商的原则。他对工人说：发展生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要鼓励资本家来参加发展生产的事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应当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应当照顾到整个发展生产的利益，不应当只想眼前，而应当注意谋取长远的利益。他还向工人说明：“劳资两利”与国民党政府宣扬的“劳资合作”有根本的区别。国民党宣扬“劳资合作”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共产党的“劳资两利”政策，是为了使民族资本家一道来参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稳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他对民族资本家再三说明，“劳资协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下进行的，这同国民党宣扬的“劳资协调”有着根本的区别。国民党的“劳资协调”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下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共产党的“劳资协商”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权下照顾民族资本家的目前利益，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因此，民族资本家在“劳资协商”中要端正对工人群众的态度。潘汉年以高度的政治修养，诚恳的态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认识，在妥善解决劳资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潘汉年细致坦诚的工作，使当时上海广大工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切的具体的了解，影响很大，郭棣活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在国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当时运回来的有瑞士制造的7000瓦汽轮发电机、1万锭纺纱机器整套设备和6000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250万美元。有一批民族资本家从海外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工作。他还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方式，反复宣传政策，进一步消除他们顾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

兴建曹杨新村

上海在解放前是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天堂，他们住的是花园洋房、公寓，而劳苦工人住的是棚屋。解放初，聚居1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全市有320多个，大多集中在杨浦、普陀、闸北等老工业区。他们主要是交通运输、码头、纺织和市政等各业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较多。上海解放初期，市人民政府尽管财政很困难，但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还是决定在改造部分简易住房、棚户的同时，兴建一批工人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督促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他自己到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所进行调查。他在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例会上同赵祖康、徐以枋等反复讨论修哪条马路，在哪里建设水电设施，从哪里开始改造旧房，在哪些地区建筑工人新村。经过调查和讨论，决定从沪东小木桥、沪西药水弄等工人棚户区开始改造。1951年开始在市区西北部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他对这第一个土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会上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由于潘汉年抓得特别紧，曹杨新村在195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竣工，1002户工人搬进了新居。潘汉年对应当让哪些工人住进这第一个工人新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新问题。他在陈毅、刘晓、刘长胜等的同意下，确定分配给从事创造发明和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有显著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以及生产上一贯表现积极、工龄较长的老工人。1952年6月下旬，陆阿狗、戴可都、杨富珍等114位劳动模范和一大批先进生产者、老工人，手捧鲜花和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居住证，穿过插满彩旗的高大牌楼，住进了工人新村。从1953年起，又先后在沪东的控江、凤城、鞍山；沪南的日晖、龙山；沪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沪西的天山地区等建成9个建筑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杨新村为以后兴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创造了经验。在这一宝贵的经验里，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他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上海人民的“好当家”

武汉

1995年，是潘汉年诞辰90周年。一提起这个一直使我梦牵魂萦并为之神往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但因事隔40个春秋，且遭遇过无尽的折磨，对于他的雄伟业绩和出色的工作，犹如一缕轻烟已被荡拂得依稀飘渺。现在，只能将记忆中犹存的点点滴滴的追忆，寄托对他的沉痛怀念和无限的哀思。

上海解放后，我分工负责接管伪市府秘书室和文史委员会，并担任军管会秘书，负责处理军管会办公厅政法公文的审批会稿，以及担任来信、来访的接待和处理；也曾以英文秘书身份处理过几件涉外商务。随后，因外事处成立，我就不再参与外事业务，专职从事办公厅的日常政法事务以及陈毅市长交办的有关任务。陈毅办公室的秘书，由朱青担任。我和陈毅保持着直接的工作联系。潘汉年是军管会秘书长、市政府副市长，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每当我所处理的公文和业务涉及他的分工范围时，都直接到市长室向他汇报和请示。从接触中，我发现他水平很高，才华出众，考虑问题周密，遇事果断，从不含糊拖延。遇到有些问题还需周密考虑时，他要我向原单位领导询问细节，再向他汇报后，由他批示。从此，我接受他的教益，凡要向他汇报审批的事项，都事先与原报单位联系，了解细节和前因后果之后，再向他详细汇报，使他能顺利决策。

1950年初，朱青秘书因病住院开刀，经组织决定和潘汉午认可，由我到市长室接替朱青的工作，负责市长室和市府党组的秘书工作，并兼任潘汉年的秘书。为了照顾潘汉年的工作、生活，更好地履行我的保卫任务，经组织决定和潘汉年同意，我搬进华山路潘汉年住所居住。他家只有夫人董慧，没有儿女。我搬进他家后，他没有把我当外人，我成为潘家的一个成员。每天和他们一起吃早餐，餐后一起乘汽车上班，中午都在单位吃饭，晚上一起回家吃晚饭。饭后一起工作或闲谈。我和他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前后近两年，直到1951年底，我调到市公安局后，才从他家搬出，从而结束我的市府秘书生涯。两年的秘书工作，使我对潘汉年的生活细节和工作态度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切身体会和了解。

潘汉年名义上虽是副市长，但因陈毅市长军务在身，他的工作头绪繁多，除了要处理上海市政管理和建设工作之外，还担任华东局委员、市委统战部部长、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并主管政法工作。这在当时上海市领导人中是兼职最多、负担最重的一位。但他对市府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效率极高。潘汉年之所以每天能以较少时间完成如此巨大繁重任务并取得极大成效，是由于他的优秀素质、超人水平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他信任干部，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的功能作用，让他们有责有权，各尽所能，各求其效，从不在具体工作上指手画脚，而是放手让局、处长全权操办，从而增强了局、处长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增强他们的工作信心。每当局、处长遇到一些紧急而难于处理的问题，他都能积极果断地帮助解决。他工作抓得很紧，华东局的工作，在华东局办公时解决；市委的工作，在市委办公时解决；统战工作在统战部办公时解决，所有各部门的工作，从未“跨门办公”。而市府的送批公文都每天批完。遇到他在外办公，不能来市府时，则由我将待批卷宗带回家里，晚饭后由他连夜审批，严格履行“公文不过夜”的原则。上述工作作风就是潘汉年能够带领各级领导，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整个市府的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良好效应的关键所在，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和备受下属干部爱戴的根本所在。

潘汉年对于华东局、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非常重视，每次必到。会前有所准备，会上静心倾听，发言简要而言之有物。会期都只有半天，每次都收到预期效果。至于他召开的市府局、处长会议、党组会议，都有明确的讨论内容和预期目标，只用半天时间5便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会议呈现出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局、处长的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都集中到会议中。但他对当时上海各单位的庆典活动都不参加，只要求我把收到的请柬单位和内容向他汇报。有时，他认为有必要，就派专人代他出席，但禁止代表他发言或致贺词。有一次，市总工会发来庆祝大会的请柬，他不出席。朱青秘书向他提出意见，说：“工商界，民主人士的会议你都出席；工人阶级的工会开大会，你为什么不出席？”潘汉年直截了当回答：“市委分工，市总工会由刘长胜领导，他已代表市委主持会议，市府就不必干预群众团体的活动。像这样的会议多得很，每次都参加，我哪有时间工作？！”

对于各种宴请的严肃态度，也是潘汉年一个突出优良表现。对于外事活动中的外方邀请，他顾及外交礼节，如约前往，但寒暄几句就先行告退。他也设宴款待过几个重要的、有政治意义的外国代表团、演出团以及出国演出的中国艺术团体。但对本市各机关团体以各种名义对他的宴请，他不但不参加而且有反感。市府各种会议只开半天，不搞宴请。开人代会、协商会，他也只吃一份工作午餐；对外地或中央来沪干部，他从不设宴迎送，必要时由有关单位代表他设宴招待。当时的南京市市长柯庆施负有“特别任务”专访潘汉年时，他只在家中由保姆操厨宴请他一次。这是他在家宴请的唯一的一次。至于统战界知名人士，如荣毅仁、郭棣活、盛丕华父子等人对他的宴请，如果有事商谈，他会把我带去，表示是为公事而来。他以身作则、艰苦勤俭，从未收过礼品，也没人敢向他送礼。我在他身边工作，只看到他收过有限的几次礼品：一是董慧的弟弟从香港给他带来的一些衣物用品；二是夏衍同志出国回来送他一件小礼品（我也收到一把小洋刀）；三是我从老家托人绣了有他名字的半打手帕。所以，他家逢年过节没有人送礼，家里除了一架沪产的收音机外，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正因为他能以身作则，当时吃、喝、请客、送礼之风不敢抬头；也无人敢去吃、喝、玩、乐。

潘汉年对待生活的态度，更令人钦佩。他所住的“市长官邸”外表宏伟，内部却都是最简单的旧家具，而且是已离沪的老房主所遗弃的旧东西，未添置像样的新家具。至于吃饭更是简单。我们3人，早餐是稀饭和酱菜，外加每人一根油条和一个鸡蛋，有时是一碗豆腐浆。中午在单位按等级吃份饭。晚餐三人共吃一小盘荤菜，一小盘半荤菜，一小盘青菜和一小碗汤。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心安理得，过着满足的生活。他每天回家时，因劳累了一天而精疲力竭，但还要审批公文，接待有关业务单位负责人的请示汇报，简直累得不成样子，但还是那么拼命工作。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从未出去游山玩水，过一天清闲的日子。我觉得很不忍心，便背着他给买了一只大鱼缸，放养了几十条漂亮的金鱼，他见此十分高兴，每天早晚和休息日，总在鱼缸前观赏，从中获得休闲和享受。后来，为了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和身体的适当运动，我从公安局弄来一张桌球台，一套球具。他高兴极了，一有空就和我打桌球散心。他对鱼缸和桌球那样欢喜，可见他并不是什么“怪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也需要娱乐的普通人。还有一次，我建议他周日到“百家俱乐部”去游玩一次。那里湖光山色，绿草如茵，清静安谧。他听后非常高兴地说：“通知那些有空的局、处长，大家一起去。”我照办了。那天，二十来个终日辛苦不堪的局、处长和他一起，在那美丽景色和闲静的环境中，在翠绿的草坪上谈心、散步，观赏花木，谈笑风生，还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

潘汉年在与沪上知名人士交往中，是严格按党的统战政策办事的。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中求得更好的团结。他懂得如何做好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他们一起贯彻落实党的各种政策法令，并通过他们在同行、朋友中扩大影响。他平日从不指责他们，而是用极平静的态度和言语陈述利害，启发他们自觉地纠正失误，从而使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取得极大的成绩。至今，这些人除了已经逝世者外，都坚定地跟着党走了几十年，成为各界的带头人或政府的高级官员。当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他“右”、“跟资本家走”。这完全是错误的。举例来说，当时由于统战需要，经常召开人代会、协商会，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共商市府大事，又吸收其中著名人士担任市府委员会的委员。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吸收一些知名人士与党的干部组成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共同对案件进行最后审决。每一案件都事先经过“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共同审批量刑，并送军管会秘书处政法科会审，再经三级分审定案。无期徒刑以上的都由潘汉年最后审批。虽然要经过这许多程序，但由于都能实行“公文不过夜”而能及时送到反革命案审查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凡讨论中有少数案件被一致认为“过轻”或“过重”的，潘汉年在最后定夺时，对提得合理合法并不违反原则的，一般都接受他们的建议改判，以资更好地鼓励、团结他们，使他们感到不存在“空职”而是“实务”。其中也有斗争。本市某著名纺织集团的人事科长黄龙华，因长期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并奸淫不少求职女工而被判死刑。案件在审查委员会讨论时，该纺织集团资方也是审查委员，建议从宽处理，引起争论。会后，我们向潘汉年汇报，他指示组织一个黄龙华罪行调查委员会，让事实说话。当委员们到厂里调查时，工人们群情激昂，许多女工们悲愤哭诉，委员们都深受教育，该资方也深受教育，不断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民愤大，该杀！该杀！”会后意见完全一致，执行枪决。事后，潘汉年和这位委员就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似的照样和他友好往来，合作共事。

潘汉年平易近人，从未当面指责或背后议论过任何人。各级干部和各界人士都乐意和他接触。每当潘汉年发现某一领导人或身边工作的人员出现失误时，他从不直接指责，而是从另一侧面提出问题，启发他们在思考中发现自己的失误而加以改正，所以备受各级领导干部的敬佩和爱戴。对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有一次，市府设宴招待朝鲜歌舞团。宴会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艺界人士作东，并在座位上挂有姓名的牌子。当客人们都入座时，交际处长对潘汉年说：有一位作东的没有到会，现在又无法找人代替。潘汉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东人名义作东。我到那个桌上入座时，贵宾们都十分惊奇，说没想到中国这样著名的作家竟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因为在座的都是年轻的艺人，我和年轻人在一起时，心情特别高兴。由于过份的激动，我多喝了点酒，本来每逢宴会时，我都身藏手枪紧随潘汉年入场或离场，但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会昏昏然呆坐在门外的沙发上。后来突然听到交际处长大声对我说：“喝醉了吗？潘副市长要离场了。”我睁开双眼，看到潘汉年仍是那样安详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车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总要受一次严厉的批评。可是事实却相反。他在车上不发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后，才对我说：“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点睡觉吧！”当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时，我怀着沉重心情对他说：“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写一个检讨给你。”他笑了一下说：“检讨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后要注意影响。”从此，我再也没有在宴会上喝过一口酒。

潘汉年在各种场合和集会上所作报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对于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和某一特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领导进行教育、宣讲。对于为了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他是有请必到，并发表讲话。他的报告，从不需要秘书代笔起稿。他从主办单位的领导处得知会议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后，晚上作一些思考，并记下几行要讲的提纲，第二天就上台开讲。他的报告，从不讲空话、套话。一开始就进入问题关键，从理论、政策、方针以及具体问题作精辟的讲解。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地从各个方面论证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表达清楚，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听者都为之倾倒、动容，常常博得听众的掌声。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调动与潘汉年分别时，我征求他对我的意见。他考虑了一下，说：“你热情有余而考虑不足。”我和他相处两年，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好东西和当一名干部应有的品德。但当时我对这一评断不能很好地理解和体会，因而未能引起重视。直至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为此而受到挫折，才对这一临别赠言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公理自在人心，冤案已经昭雪。汉年同志，安息吧！

潘副市长对新闻工作的关心

徐大刚

在潘汉年同志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期间，我是在新闻处担任重大活动新闻照片统发工作的记者。所以，经常能在活动现场见到他。我那时才20岁出头，是刚从文字记者转搞摄影。一方面由于我对摄影还不精通，又加上以往也未见到过那么多高级领导人，有时还有外国元首，所以，在摄影现场很拘谨，不敢随意抢镜头，显得有些笨手笨脚。潘汉年同志觉察到了我这种心理状态，就几次在现场和悦地对我说：“不要紧张，有困难我们帮助你。”头几次所发的照片在各报刊登后，潘汉年又鼓励我：“不是拍得很好吗。”这番鼓励，增添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也就显得活跃了些。有些同志说我与初期相比，几乎是判若两人。说心里话，我这种转变，是和潘汉年同志对我平易近人的教导、鼓励分不开的。

在50年代，摄影记者使用的闪光灯是一次性的镁光泡。这种闪光泡在生产时如抽氧不纯，在点燃时会炸，不仅声响吓人，碎片还会伤人。为预防万一，我们都用薄绸套住灯泡，拍一次套一次，既影响亮度也影响连续拍摄。潘汉年见了，就召我到他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情况。当他了解到国外已有不会炸的万次闪光灯，虽价格昂贵，还是立即表示应该添置。当他了解到在重要场合，只有我一个记者，而我就只有一个相机时，他立即决定，应再配备一架高级相机，以备现场发生相机故障时用。在潘汉年亲自过问下，财政局很快拨下了专款，使我幸运地成为当时拥有最精良、最齐全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从而保证了我顺利完成各项统发稿任务。

潘汉年不仅对干部在工作上给予教导和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如他发现我经常是一个人在新闻处大楼晚上放照片发稿，就及时嘱咐市府保卫科长李克同志，要他给我一件利器防身。不久李克同志给了我一把缴获的倭刀。以后，我就经常用爽身粉扑擦刀刃。令人痛惜的是这把倭刀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仍无下落。

“文革”前，我一直完整地保存着潘汉年同志所有活动的资料照片，十分痛心的是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封后焚毁，现尚保存的仅是我在被抄家前，匆忙转移出来的极少部分。

1955年后，我虽未再能见到潘汉年同志，但我对他在我刚踏上新闻摄影岗位所给予我的教导和支持，一直铭记在心。

潘汉年同志蒙冤后，我也听到了关于他的“问题”的传达和一些传说，心中虽有些疑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组织纪律和观念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想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看到了一些文章，方知潘汉年同志是一个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更加激起我对潘汉年同志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潘汉年同志永远是我心目中崇敬的首长和良师。

潘汉年与上海镇反

钱丽君

1950年10月，上海与全国步调一致，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彻底地肃清了上海地区的特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各项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镇反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抚今追昔，许多老同志对当年的镇反运动记忆犹新。人们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潘汉年同志。当年，潘汉年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直接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镇反运动。他协助陈毅市长，出色地治理了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把一个被喻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潘汉年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左”的影响，历史被颠倒了，是非被混淆了，所有的功绩被一笔抹煞，一夜之间，潘汉年成了“内奸”、“反革命”。其中，有一条罪名是解放以后他和扬帆曾掩护、包庇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是坚决贯彻执行了“双十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

上海解放后，人民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面临的敌情还是十分复杂的。大批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流氓、恶霸等各种敌对势力，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机，勾结作乱。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派遣特务来沪，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作为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担子重、责任大。在解放不久的日子里，他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稳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等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决策，落实措施，并亲临基层具体指导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在打击残敌过程中，潘汉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瞭。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后清理历史反革命。事实证明，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落实，贯彻执行“双十指示”的精神。他在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上海前一阶段的镇反工作存在着右的思想错误，只注意对特务的斗争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的斗争。他特别指出在对待沪西恶霸柏文龙的处理上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倾向。柏文龙，人称“沪西半爿天”，他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解放后，还强奸并逼死邻女及其母。像柏这样民愤极大的恶霸，只被判3年徒刑便作了事，沪西群众对此反响很大，联名上书，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龙。潘汉年强调，对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要坚决镇压。他要求公安机关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镇反运动。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镇压反革命的法律武器。为了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调整后的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副书记潘汉年（陈毅为书记），组织公、检、法三家成立了案件处理委员会，以加快积案的处理，并召开了专门会议。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讨论部署镇反工作。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纠正宽大无边、不及时、不严厉、不依靠群众等缺点。”他建议在最近期内，举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建议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协助审判机构提供有关重大反革命案件处理意见。他强调要“完成中央及华东局有关惩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潘汉隼在这次会上进一步提出本市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并决定在4月底进行一次大逮捕。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会后，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热潮。在潘副市长直接领导下，公检法机关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成立了“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4月23日，召开了市人代会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动总指挥部分别发出了《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及《对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的补充指示》，下达了上海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命令。4月27日，全市组织出动由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6万余人，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统一行动，依法逮捕了历史上罪恶重大、解放后抗拒登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从外地逃来上海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余人。4月28日，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市、区两级协商委员会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和在工厂、企业、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对9名血债累累、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如曾经杀害500余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国民党“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刺探机密、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徐松坚；横行江南十余年“四霸天”之一、杀害老百姓千余人，甚至将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惯匪陆杏生；强奸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丰绒线厂恶霸、流氓、特务陈小毛；勾结土匪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顺政国皇帝”张顺宝；制造劝工大楼血案主凶之一、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横行真如一带的恶霸、特务周彼炳；杀害《文革》三烈士的刽子手任宗炳等。身受其害者纷纷登台控诉揭发。女工刘秀英，在控诉陈小毛强奸她及百余女工罪行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控诉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惩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检察署副署长方行当即宣布：将9名凶犯提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全场群众欢声雷动。广播电台转播了会议实况，280万上海人民和80万苏南地区群众收听了大会实况。大会期间，1700多个单位63万余人来信来电要求枪决9名罪犯，收到5400余封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来信。30日，市军管会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枪决。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后，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热烈赞扬共产党“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个身，这回完全翻身了”。北站一老翁，当该区8个恶霸被处决后，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泪交加，感激政府替他报了仇。东新村恶霸肖慕陶伏法后，普陀区千余群众自动集结到被内杀害的烈士墓前献花，告慰英灵。

二、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在各种会上经常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多次反复指出，要使镇反运动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他批评一些政法干部只会埋头苦干，不善于运用现实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众、宣传群众，不善于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说，要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他认为，过去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解放了，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在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要发动他们起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在镇反高潮中，全市召开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会议3200余次，收到群众检举信4万余封。政法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取证后，又逮捕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公安机关在争取教育反革命家属工作中，成绩也非常显著，绝大多数反革命家属站到了人民群众这一边，起来揭发自己反革命亲属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属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属将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财物缴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枪枝弹药，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三、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潘汉年经常告诫政法系统的干部：肃清残余反革命，维护社会治安，不仅要靠政法保卫机关的强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我党政策与策略的作用，这是我们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力量所在。在镇反运动中，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直贯彻于始终。潘汉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过，对于有现行活动的特务，不管其有无反革命历史都应根据罪证，依法从严惩办，不能以为其没有历史反革命身份就宽纵，这是错误的。对于主犯、罪恶重大的、搞行动破坏的要从严惩办，其中罪恶重大的应判处死刑。对于真诚悔改、自首立功的，应从宽处理。对于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严重残疾，失去活动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关押。潘汉年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他经常对公安机关一些领导同志说，不管任务如何繁重，时间如何紧迫，一定要弄清情况，不能急躁。在杀人问题上，他同样主张谨慎从事，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的严格审批。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稳、准基础上的狠，对不同对象要讲究区别对待的原则。有次镇反工作会议上，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潘汉年经过了解，听取意见，发现案情基本失实，他与有关同志研究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无越轨行为。事实证明，给予一批“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机会以后，在当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企图潜入大陆暗杀陈毅等党政领导人的军统特务刘全德，从台湾专程经舟山来沪，沿途活动情况悉数为我掌握，刘全德进入上海还未来得及活动，就落进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再如，曾是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解放前夕，国民党内调局对他布置潜伏任务，要他留下来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寻找中共关系，投奔解放区，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以求立功赎罪。起用这个人物，有关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并经上级同意。胡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八十余部。应该说，潘汉年主张利用国民党投诚人员，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正确的，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除了对付特务等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外，对付流氓及其帮会势力的任务也相当艰巨。为了减少其对社会危害，主要抓住、稳住大流氓帮会头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准确而有力地执行了有关的政策与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汉年就已经通过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了信息，为此，黄金荣没有逃到台湾去，他为了表示悔过自新，将一些财产叫人列了一份清单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又将自己手下的400余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单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前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听说潘副市长在一个会议上说过：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的帽子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黄金荣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镇反期间，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悔过书，除简述自己的经历与罪过外，保证遵守一切法令，并且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份悔过书对当时的镇反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对于杜月笙这个著名的帮会头子，潘汉年也费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争取工作，以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社会治安的滋扰。解放前，潘汉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过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关照手下门徒遵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法令。

潘汉年在镇反运动中不仅仅有依靠、争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时还有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一面。潘汉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对于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例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被处以极刑；那些残害爱国人士、革命先烈的刽子手，被坚决镇压。镇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使上海治安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普遍地掀起了劳动生产热潮。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忆当年，感慨万分地说，上海镇反运动的胜利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潘汉年殚精竭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千头万绪，运动的各个环节、步骤、计划，他都要操心，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事实证明，在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人。这批人被镇压后，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别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宽猛相济、彪炳盖世”。

镇反运动已经历了40余年岁月，时间和历史进一步证实上海当时这场大张旗鼓的群众性镇反运动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汉年对于上海镇反功不可没。

潘汉年与上海的社会改造

黄金平

194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电召在香港的潘汉年返回北平。刚刚完成护送大批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去东北、华北解放区任务的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便匆匆离开香港，风尘仆仆来到北平。他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5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见了潘汉年，对潘汉年参与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具体安排，指出：中共中央已决定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等工作。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着重谈了接管上海中的政法方面的问题，要潘汉年注意防止上海青洪帮出来捣乱等。

肩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潘汉年在解放了的上海开展了艰巨的社会改造工作。

肃特反盗，稳定社会秩序

旧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基地。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大小特务组织有84个，特务分子6000余人，其中组长以上的骨干分子1600余人。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都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应变”措施，大批特务潜伏隐藏下来。此外，在国民党溃退前，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等地潜逃来沪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等地派遣特务进入刚刚解放的上海，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和暗杀等活动。总之，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上海面临的这种情况，决定采取先打击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陈毅市长向政法保卫机关提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庄严任务。潘汉年根据市委、市府以及陈毅市长的指示精神，多次召集公安保卫机关负责人会议，组织落实全市的治安防范措施，具体指导多项公安政法工作的开展，并且会同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负责人共同制定了公安政法方面的政策性措施。潘汉年认为，肃清上海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维持社会治安，保持上海的稳定，不仅要靠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威慑力量，还要依靠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政策威力。

潘汉年是一个有着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领导。他深知在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时，充分掌握敌情和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成为执政党，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拟定的镇反工作方案，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设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公安机关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1949年6月中旬开始，集中破获了一批特务潜伏电台。如国民党保密局核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电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织，以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织等。6月29日凌晨，潘汉年指挥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联合行动，又集中搜捕了特务匪徒317名，“青年救国军上海服务团”以及假冒“中共地下军第7支队”等特务组织首犯当场落网。潘汉年很重视“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要把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运用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还曾直接掌握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敌情。利用这些“逆用台”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像台湾敌特机关派遣刘德全来上海搞暗杀陈毅等军政首长活动的重要情报。利用这些“逆甩台”，对上海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潘汉年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内外侦察，严密防范，查明情况，坚决打击。从1949年5月底至1949年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敌人电台109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解放初期，盗匪活动非常猖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据统计，在上海解放后的头7个月中，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仅1949年6月，全市就发生抢劫案190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竟发生14起，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打击盗匪的措施，协调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紧密合作，广泛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同时，还制订并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坚决镇压盗匪头子，并采取了“以盗反盗”、“以案破案”的斗争策略，一批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到1949年12月，盗匪抢劫案降到56起，比6月份减少240％，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分化瓦解流氓帮会势力

旧上海的流氓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控制着整个上海社会。

对于如何处理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党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切。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就问起过这件事：“上海解放，青洪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见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要安分守己。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洪帮上层分子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刘少奇听后，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等同志，先不要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上海解放前夕，潘汉年就通过关系向黄金荣等传递信息，要黄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解放时，黄金荣听从了潘的劝告，留在上海，并表示不问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仍然不断地干坏事。改造旧上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黄金荣这类人。这时，党内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黄金荣等旧上海流氓势力，同时更好地体现党的政策，潘汉年会同市军管会领导经过多次专门研究，考虑到上海青洪帮势力和黄金荣等人的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决定采取对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以达到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的目的。

当时，上海有些市民对人民政府不杀黄金荣，想不通，致书有关部门，要求从严惩办。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宣传工作。1950年6月的一天，潘汉年为了了解黄金荣的动态，把杜宣同志找去，让他去黄金荣家宣布党的政策，并对黄及其手下的头目训示，要黄金荣及其手下老老实实，不准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1950年底镇反，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黄金荣谈话，向他宣布政策不变，但要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黄金荣让人代笔，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潘汉年切实执行了党的政策，把流氓头子黄金荣稳住，让黄约束其徒子徒孙，打击了流氓犯罪活动，并且使其破坏性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了上海的稳定。

黄金荣于1953年6月20日去世后，又留下了一些麻烦问题。原来，黄金荣有不少财产，解放后，他的许多金银珠宝被他的一个儿媳席卷一空带到香港，剩下的不动产就非常有限了。黄家的收入日见拮据，以至于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后来，求助于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在1955年1月写信给陈毅市长，陈述黄家的困难；2月，章又给潘汉年写信，吁请政府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问题。潘汉年接到信后，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难题。

对于杜月笙，潘汉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许多心力，努力争取，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上海社会治安的滋扰。在解放前夕，潘汉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并且得到过杜的保证。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又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个儿子杜维翰找来谈话，告诉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们是欢迎的。杜维翰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告诉潘汉年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活，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他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们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以上这些，后来都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杜家要求在上海的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为此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门徒为此深为感动。

把妓女改造成为新人

旧上海的捐妓，据国民党市警察局统计，全市登记注册的妓院有800多家、妓女5000余人。另外，未登记注册的妓院还有1200多家，被称为“野鸡”的私娼有2万多人。这些娼妓绝大多数因农村贫困、逃荒流入上海，为生活所迫，步入风尘。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现象，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市政府工作会议，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他指出：娟妓是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留下来的产物。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残酷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予以制裁。而妓女大都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但她们进入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因此，必须用强制劳动和耐心的教育来改造她们。

1949年6月，潘汉年主持市府会议研究决定：在实施对妓院、妓女登记的同时，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谋出路。7月，又发布了《管理妓院暂行规则》，限制妓院和妓女的发展，废除一切非法契约，禁止妓院老板对妓女的压迫和虐待。不少妓女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开始走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

1951年下半年，全市残存下来的妓女有四五百人。潘汉年在市府党组会议上指出，采取全市突击收容的办法，消灭一切娼妓。同年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取缔残存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决议。11月25日晚上，潘汉年指挥全市公安、民政、妇女等部11采取联合行动，突击封闭残存妓院72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334名。收容妓女501名。但是，取缔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尚有一批没有登记的妓院和妓女继续进行卖淫活动，不少私娼还在游乐场、舞厅、旅馆、酒店出卖色相招揽押客。因此，后来又进行了几次收容。直到1957年底，全市共封闭妓院627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920名，收容妓女7513名，基本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丑恶现象，解救了一大批沦落苦海的妇女。

潘汉年在领导取缔妓院，消灭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对于脱离妓院的妓女深表同情，他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一个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并指示市妇联选派一批素质好、责任心强、有阶级感情的妇女干部，同市民政局配合去妇女教养所工作。那些进入妇女教养所的妓女，对收容反应不一。有的深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火坑；有的人则大哭大闹。潘汉年指示市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对妓女的教育改造，首先要从政治思想教育着手，安定她们的情绪，说明党和国家是关心她们、爱护她们的，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同时，为了帮助她们提高思想认识，要在妓女中开展吐苦水、挖苦根的诉苦活动。开始她们对诉苦不理解，有的则担心共产党不长久，不敢诉苦；有的认为身世下贱，不愿诉苦；有的人则思想已麻木。后来，通过打击和斗争妓院老板、老鸨，管教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终于使她们逐渐醒悟过来，纷纷起来控诉妓院的老板、老鸨对她们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当时，妓女的性病率很高，在第一批收容的500多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88.3％。要使性病在中国绝迹，必须首先消灭她们身上的毒菌。而治疗她们的性病需要大量的青霉素。由于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进口很困难，库存又有限，主要是供朝鲜战场使用。但是，为了给她们治病，陈毅、潘汉年果断地作出决定，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给妇女教养所使用，朝鲜战场需要另想别法，使患有性病的妇女都及时得到了治疗。此外，还教育引导她们改变好逸恶劳的习惯，要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会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并且动员社会各方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成家立业，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社会的新人。

潘汉年非常关心改造妓女的工作，多次询问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当得知有些妓女在妇女教养所里大哭大闹，甚至把女工作人员打伤时，潘汉年嘱咐民政局的负责同志：“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一旦觉醒，就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又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一定要坚持用挽救受害者的赤子之心来对待她们。我相信，我们的改造工作会得到成功的。”

事情正如潘汉年所预料的，在妇女教养所经过两年改造，500多名妇女，学习文化、学习生产技术，以后陆续走上了各个工作岗位。她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有的人还当上了生产能手。劳动积极分子。并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组织了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上海领导肃清敌特分子、清除和瓦解流氓帮派势力、改造妓女的斗争中，潘汉年以及他所主管的公安、政法以及民政等部门，始终坚持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克服重重困难，保持了上海的稳定，净化了上海的环境，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五反”运动情况

潘汉年

各位委员、各位先生：

上海的“五反”运动目前已到了第四期，也就是说上海的“五反”运动已到了快结束的阶段了，今天我就把上海的“五反”运动，由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工作情况简单报告一下：

一、我们上海的“五反”运动是在3月25日正式由陈市长向全上海市民广播后开始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准备早在3月25日以前，近两个月的酝酿，如工商业方面等都展开了文件的学习，以做思想上的准备。然后，如何在职工中号召动员、组织检举运动，同时由我们增产节约委员会来组织干部，训练干部，搜集材料，研究材料。这个准备工作时间较长，而后按我们的预定方针进行，我们在3月17日召开了一个“五反”工作干部大会，会上宣布方针、政策。3月21日就进行了74户典型试验，这个试验，我们采取检查队入厂、入店检查，因此在3月25日正式宣布“五反”运动开始时，74户重点户，已在进行检查工作了，3月底前这74户重点户检查结束，3月31日，上层工商界389户展开互助互评动员，这389户中有86户，态度比较不好，就参加一般的斗争，保存其余的303户在市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的互评互助下交代问题。这是第一期的工作，主要的典型搞303户的交代工作。

二、从4月1日到4月11日，这是第二期。第二期的工作，由于以前有了典型试验，特别在303户典型试验后，我们已有了经验，我们号召全上海主要用互助互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在第二期工作中就解决了2000大户，1万中小户，我们首先把1万中小户弄好，由他们交代问题、定案，同时解决2000大户，这2000大户中间，用检查队解决问题的数目不多，约三分之一，很多检查队一到厂，解说后，就交代问题的也有。

第二期以后，从303户上层交代问题后，得到了比较明确的经验。由于工商界采取互助互评，效果较大，工人可以放手提出他们的意见，不使资方。工人面对面的斗争，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样建立了第三期普遍采用互助互评的方法，作为上海市“五反”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第二战役中，特别在74重点户坦白交代后，就把他们放到各区去，让他们向其他工商户劝说、立功。这个作用很大，因为他们可根据自身的经验，并在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来劝说别人，这对全上海工商户的坦白很有帮助。

三、第三期自4月13日到5月10日，由于采取互助互评的方法，解决了6000大户、8万中小户，其中真正受到检查队检查的很少，只有16户，检查队用到的很少，主要是互助互评。第三期的特点，4月20日开始，到25日左右，开始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坦白后的退款问题，这是有关生产的问题，如果全部退款可能影响生产；同时，坦白的中间也许有不必要退的，坦白的数字怎么样，该不该给他核一下，这是要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城乡交流发生停止，这也影响生产的，全国公营机关，加工定货受了影响，目前我们正在用大力，在华东财委帮助之下恢复城乡交流。

第三期结束得到了初步意见：1、已坦白的数字如何核实？2、如何退款，因退款不妨害生产所以能不能放弃？能不能暂时不退？这个等一下许秘书长会报告的，报告后由政府委员会讨论批准。现在我们以检查来说，上海市“五反”的成果，可以这样说，我们上层交代的，即303户交代的，根据现在初步统计，工商户自己坦白的有11520亿（旧币，下同），这是大户；其他85125户中小户他们所坦白的有52709亿；中等户18325户，坦白的有510亿；小户77616户，坦白的有390亿。就是说，上层工商户包括大、中、小已解决的约11万户，坦白的总的数字是65133亿。现在所知道的，全上海工商户16．3万户，实际上只15万左右，已解决了11万户，剩下的4万多户，其中中、小户占的数字最大，与五毒的关系较少，因公家与他们无加工定货，普遍都以市场经营为主，这样看来，估计上海15万到16万工商户全部坦白后，坦白的数字估计约有8万亿，这个数字假使全部退的话，上海生产能否维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这个时间如何让重要生产继续生产，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市府做了下面这些工作，我们估计上海在二、三月份所得税收过后，马上再来一个退款，要影响生产，在全国加工定货没有恢复以前，如果退款，生产要受影响，我们经过市财委的研究，在收购、加工定货上，使6400户受到了照顾，这6400户中间，包括54个行业，换句话说，靠我们财政当局投放，把生产很快恢复，恢复城乡交流，一切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中央也已知道，关于怎么核实退款，等一下由许秘书长报告。

四、上海的劳资关系，一般来讲，我们因“五反”与生产无矛盾，我们的情况比较好。但是由于间接的关系，有若干厂发生了困难，停工的数字不少。据初步统计，旧的失业工人不计算在内，新的失业的工人有8万人。我们看，上面所说的11万户中，职工有522725人，不过职工失业的问题很多已在第四期内解决了，目前做好退款问题，以及新的劳资关系如何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五反”在第四期结束后，从处理问题上讲，有几个问题要我们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严重违法户，必须依法处理的违法户如何处理。我们增产节约委员会组织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我们现在已提出上海市“五反”人民法庭的组织草案，审判长及委员等的名单，要我们政府委员会来批准。同时，上海工商业户的面很广，要处理的违法户也比较多，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向人民政府建议，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迅速成立人民法庭，同时我们还建议组织评议委员会，做好核审工作，这个评议委员会有总的，也有各区的，在人民法庭下要组织分庭，关于这个问题为了节省时间起见，由方行同志提出，大会讨论一下。

1. 上海的“五反”快结束，新的劳资关系问题也就来了。1、我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取消“五毒”也有了，但如何使其正常化，如何帮助资方不再犯“五毒”，现在政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各地各有不同，有些地方工人监督资方违法，区里要求我们有一个总的方针。2、高级职员、资方代理人的问题。高级职员在“五反”期间，归队与工人站在一边，向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这是对的。“五反”后，应回到自己的原有工作岗位上做好工作，但是有的现在还没有这样做，这个问题，主要的是如何划清界线的问题，有许多大厂的经理、厂长，现在都纷纷要求辞职，这个问题，通过工会，希望工商联，大家在思想上沟通，通过“五反”，很多人都提高了，但是其中还有些人对“五反”意义的前途还是了解不足的，工会应该召开一次高级职员座谈会，要把我们政府在“五反”中的态度向他们作一个说明，叫他们不要消极，这样提法，是否妥当，请大家讨论，再建议。会后，希望工商联照常工作，首先在工商联系统上做好普遍传达，“五反”结束，退款问题，工商界注意，普遍传达，只有这样，“五反”不仅在中间不影响生产，而且“五反”后，可以更好。

上海商业改造问题(节录)

潘汉年

（一）情况：

1．上海是全国的一部份，情况与全国大体相同，而上海：

（1）本来是一个国际性、全国性的大城市，面广、量多、商业基本上过剩（全市商业从业人员57万，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如估计全国须1000万则仅占六十分之一）。

（2）多做远距离生意。

（3）服务性行业多，因此私商困难更加突出。

2．上海商业行业共214个，其中纯商业有110个，春季以来，困难的有46业（批发：五金、钢铁、国际贸易、海北桂、什粮油饼、水果地货、牛、羊、华洋杂货、化工颜料、蔬菜地货、药材、菸叶、小百货、环球百货、仪器文具、南货、盐、橡胶、棉布、绸缎、呢绒、毛绒线、热水瓶、钟表、陶器、砖灰水泥、茶27业；批兼零：新药、糖、炒货、蛋、五金零件、医疗器械、纸、猪、烟丝、木材、竹等11业；专营零售的：估衣、茶食饼干、鞋、帽、酒五业；服务性的：运输报关、转口、客庄三业，这些行业不仅经营比重逐月下降，而且绝对营业额也低于去年同期，以1954年与去年同期比，南货业营业额下降21％，困难户占16％；新药业营业额下降61％，困难户占22％；棉布业营业额下降33％，困难户占28％。

3．急待安排的有18业：批发：菸商业、木材商业、棉布商业、海北桂、华洋杂货、猪商业；批兼零：卷烟皂烛、什粮油饼、茶商业、五金商业、化学原料、颜料、煤、新药、糖、石油、瓷器；零售：文具仪器。

（二）已进行的工作

1．从去年年底开始，财委研究了对私商改造的方针，确定了若干原则，如对私商改造应根据行业性质，大小，对国计民生的关系，批发或零售以及需要与可能等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具体说来，为先搞统购统销的行业，次搞经营主要副食品的行业，第三考虑经营主要工业品的行业。几个月来进行过程，说明这几点原则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是正确的，并且仍可据以进行工作。

2．三月份踏步后进行的工作

（1）研究并控制了营业额，主要是二季度适当降低了国营与合作社的营业额，要求私营不低于一季度，在此要求下，我们对棉布、百货、南货、新药4业进行了重点研究与安排，办法是：（甲）公营控制营业额，合作社并控制供应对象。（乙）对私商多增加热销货。（丙）适当提高国营零售价（娘热水瓶、玻璃器皿、鞋油、牙刷、衣刷、钢精器皿等9种）。（丁）适当降低起批点（南货业如红枣、胡桃、桃仁、桂元、金针菜等38种，以及西药119种，百货9种，共计100余种）。（戊）小量贷款。（巳）暂缓发展劳保站与联合诊所（与新药业有关）。

（2）组织并推动私商下乡采购，药材、海北桂、蔬菜地货、水果等都由工商行政部门及商业局、合作社等单位陆续组织下乡采购’。药材业下乡达90％，参加联购春笋的占依此为生产数的二分之一。海北桂、水果等业也都分别往浙江、广西、山东、山西等地采购。

（3）召开了私商座谈会，工商局分批召开了南货、文教仪器、新药、炒熟货等20个行业，400余代表会议，批判其消极等待思想，指出他们必须自力更生，搞好业务，私商一般表现较好。

（4）进行了思想教育，中央提出踏步后，对干部（包括各局、行、公司经理等科以上党员干部）、店员进行了教育，说明踏步和私商改造的道理。

（5）排队摸底：（甲）对目前急待安排的18业，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整研究酝酿，订出了初步的安排方案，其中除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两批、专业代批、批购、联购）外，批发部分中尚须吸收职工2700余人。（乙）初步提出了归口方案，商业部门有口可归的：百货26业、食品15业、花纱布4业、五金7业、土产10业、交电4业、煤建3业、化工4业、专卖5业、医药2业、市贸信2业、仓储1业、石油1业、油粮1业、木材1业共计有86业。其他如金银、珠宝、典当可归银行，进出口可归外贸。还有一些开会研究。由工商局组织归口。

3．效果估计：经过以上这些措施，一般说来，比较突出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缓和。如闸北区棉布业困难户5月中上旬比上月同期升6．3％，百货业困难户升6．14％，新药困难户升12．69％。又如黄浦区困难户5月中旬比上旬，新药升7％，棉布升14％，南货升6％，一般说4个行业的营业额5月份均比4月份有了好转。同时在这几个五的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对私商改造的经验。

但由于我们对全面情况尚缺乏系统的掌握，加以经验不足，因之工作上还存在着一定缺点。例如在安排4个困难行业中，对5月份营业额高估了些，各种具体措施和对职工、资本家思想教育以及贷款和增配热销货等均未能及时结合进行，而在安排过程中可能引起的大小户间矛盾，事先缺乏周密考虑，因此尚有若干困难户未见起色，尤以处于淡季，天气阴雨，这对若干行业营业有很大影响，像三轮车生意清淡，生活困难，典当发生挤当情况，但是总的说来，实施了各项具体措施，还是有其一定效果的，最大的成效，开始稳下来和不再坏下去，至于措施实行了还有一定过程，上海私商面广户多，困难情况发展很快，我们工作赶不上形势发展，也是必然的现象，当然这也应努力加以改进的。

（三）根据全国财经会议，陈云主任指示的精神，在我们现有的工作基础上，如何来加以贯彻？我们觉得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但措施应根据目前的情况，也要看到旺季到来的情况，今天的改造与明天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必须分别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采取“要快要稳，先粗后细，边计划边提高，统一领导，分头负责”的原则，积极进行。商业改造与工业不同，工业只要求得生产关系开始改变后，即可逐步的引导它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商业则是今天经销，明天又可能是代销，是比较复杂和比较周折，因此是逐步提高。逐步精细。上海市贯彻中财委指示，一方面必须对私商管起来，将必须安排的批发商安排一批，零售商困难面不再让它扩大，能先使它稳下来；另一方面，选择两个主要行业和两个次要行业，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改造，目前安排的大体措施是：

1．批发：

（1）大中批发商、经营主要商品的批发商，辅导转业。

（2）小批发商、经营次要商品的，我无法代替的，如国药、柴草，有的保留下来，有的改为代批，有的转业。

（3）上面办法不能行通的，由国营公司吸收一部分人员二

（4）上海零售商多，批发商一般不转零售。

根据上述办法，最近二、三个月内，重点安排，6个批发行业，10个批发为主的困难严重的行业。

2．对经营土产的运销行业，继续组织他们下乡采购，并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行业，扩大资金，扩大品种，扩大地区（农产品保证先供应大城市，将由合作社负责，但由于主要是南方地区合作社尚未普遍建立，若干小土产运销阻滞，有就地采购就地供应的情况，因此目前加强私商下乡采购也是很必要的）。

3．零售：总的做法是将他们稳下来：

目的：稳下来，便于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私商改造，免得我背包袱。

原则:必须保证国营经济领导力量增长。必须保证物资合理供应（从利用的一方面发挥，我们意思如此）。必须保证物价稳定。

标准：使私商能勉强维持生活，就是陈主任所提出吃稀饭的标准。

具体的办法：

（1）调整起批点：现在的起批点，是商调时为了照顾两批发订的，现批发多被代替，为照顾零售，必须调低，如雨衣10件改为5件，南枣50斤改为20斤。

（2）调整差价：国营公司将需要调整批零差率调整到1952年商调的水平，如棉布商调时决定批零差率为14～18％，实际执行只有12～13％，零售价偏低，考虑先提至14％。合作社零售逐步取消优待价格，第一步适当提高与国营公司牌价接近，其原则：

第一、计划供应商品，高贵消费品，供应不足商品，零售单价2000元以下者，与国营一致。

第二、劳动人民一般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对市场影响较大者。如肉类、花布、橡胶、搪瓷品，低于牌价1～2％。

第三、对市场影响不大的生活必需品，如茶食、肥皂、咸肉等低于牌价2～3％。

第四、生产社手工业品，燃料等低于牌价3～5％。

第五、须推销的商品低5％。

这样调整，一般价格提高1．7％、比市场仍低。1．82％，对合作社影响估计不大，每月并可增加积累、34亿，社员每人每月仍可得优待3000元，由于调整品种多，须分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进行；

（3）对私商多分配一些热销货（但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程度，发展批购，批购的具体化应进一步研究）合作社酌量减少一些花色品种的经营，门市部不再发展，必要时，可撤掉个别的零售点，但这须经过慎重研究，区提出意见后经市批准后才能执行。

（4）对有条件维持下来的私商，给予小量贷款，贷款方式考虑以行业为对象，集体贷，集体还，请银行考虑具体办法。

以上这些办法，必须分别各种情况，分别运用，同时还要责成私商积极改善本身经营（如协大祥平均工资待遇每人每月达190余万元），否则变成消极的照顾，达不到改造的目的。由于各行各业户的基本情况不同，条件不同，所处的地区不同，其结果是不会平衡的，但必须加强掌握，在6、7两个月内将私商的经营情绪安定下来。

4．步骤：

（1）思想动员：要充分进行思想动员，并纠正下列的错误认识。

对干部。（甲）急躁冒进，快一点搞掉私商，不了解改造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零售商（苏联还有缝衣的）。（乙）只管自已经营，不了解领导市场的责任。（丙）能进不能退，认为这样搞是右了。不懂得挤指[批]发是胜利，搞得零售不能生存，结果反而会右。（丁）认为要安排私商便户户俱到。

应纠正这些错误的认识，说明我们掌握货源的重要性和把私商稳下来便于改造的道理，要按业归口，不可推卸责任、要了解不可能在市场中孤立起来搞业务；如果只愿听建设，不愿听改造是不对的，因为改造为衡量建设标准之一。

对职工应说明：（甲）企业困难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长期盘踞，私营商业盲目发展的结果。（乙）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对私商改造。（丙）教育他们应该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督促资本家搞好业务，负起工人阶级应有的责任，做好改造工作，更须说明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重要。

对资本家：（甲）批判消极情绪，认为瘫已经瘫定了，吃光算数；不愿多进货，挑拨职工，夸大困难，要求解雇职工，抽逃资金等，不愿贷款，不愿订定批购计划等。（乙）鼓励他们自己想办法，积极搞好经营，资本家有矛盾，应争取他们。（丙）并以此来衡量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如何。

分三条线进行：（甲）各单位必须先上后下，由内到外进行传达，求得思想一致，逐步将计划部署进行。（乙）召开职工会议，解释对私商改造方针，启发阶级意识，进行政策教育。（丙）工商联、工商局会同召开私商代表会议，我出题目：“本行本业如何改造，克服困难及转业办法”，要他们先做文章，然后再宣布我党对该行业改造办法，以免私商将一切责任推在我们身上。

（2）组织领导：这是一个长期工作，但必须先突击进行。

市：以财委为主，会同工商局、商业局、合作社、银行、税局、工会、劳动局、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黄浦、老闸等商业区委等有关单位组织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统一领导全市工作，各有关单位内部抽出必要力量组织办公室，在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区：区财委、商业部联合成立办公室，抽出主要干部成立区级机构。

各专业公司：抽出主要干部成立办公室。

（3）条块分工：

市：拟订计划、方案；决定政策方针，如撤点问题，区提意见，合作社研究，提交委员会决定，市委对委员会起监督保证作用。

区：（1）保证贯彻市级计划、方案的执行。

（2）参加市级重要问题的讨论；组织宣传教育。

（3）反映情况，提供意见。

（4）时间：本周内成立组织（名单报市委、财委）6月底以前，20日左右做好干部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在7月底能逐步的开始稳下来，以迎接旺季到来。

前述有关目前上海私商改造的做法、进行步骤、组织分工，以及所选择的行业等，还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修改和变动，更具体地则俟委员会成立后，进一步加以研究讨论。

第七章：共和国的大冤案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情报战线曾作过杰出贡献的优秀战士、领导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对此应当历史地分析。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在讨论中，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在这个背景下，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就直接将材料转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另一方面，当时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直接有关，而且同潘汉年有牵连。而此时，我们国家内部肃反工作刚刚开始，由于潘汉年过去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经历复杂，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两件事就成了被怀疑为“内奸”的起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机关审理。

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事情。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后的事。所以发生潘案的直接原因还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其实，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造成了这个冤案。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当时周总理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我们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以后怎么办？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汉年得以平反，陈云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调阅了有关材料。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当时党内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潘汉年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后一代人可能不大体会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其实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潘汉年冤案就是一例。我们都是有亲身体会的。

1995年3月于北京

“潘扬案件”始末

尹骐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海内外

1955年7月中旬，当人们还没有从全民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声中沉寂下来时，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关注。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了已将原人大代表潘汉年逮捕的消息。第二天，这条消息就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全国以及海外。紧接着，便是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表态，拥护对“反革命分子”潘汉年采取“革命”措施。在潘汉年原来任职的上海市更掀起了一场声讨和揭发运动。当地新闻媒介进行了连续的报导，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揭发声讨潘汉年的同时，又将原在上海工作已被逮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扬帆公开揪了出来。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就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简称“潘、扬案件”或“潘扬事件”。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氏、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长、华南局情报负责人等职；解放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前后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长。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要职。

潘扬案件的发生之所以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不仅在于他们两位都是资深的中高级干部，曾经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潘汉年更是一位久负盛名的风云人物；而且在于他们都是长期活跃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换言之，他们都是老党员、老保卫、老公安，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政治上最为可靠和最可信任的革命干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不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一些和潘、扬有过直接交往或是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更是深感困惑、难以理解。

知人善任，政绩斐然

1949年4月28日，正在香港负责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接到从北平打来的一封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签发的电报。电报要求潘汉年和也正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许涤新等三人立即离港赶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给他们的新任务。

潘汉年一行到达北平当天，立即赶到弓弦胡同李克农的住所报到。李克农当即向他们交底：中央要他们参加即将解放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未来的上海市长陈毅将军已来电催促他们走马上任。李克农又对他们说：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都要分别接见，你们的具体工作将由中央领导人亲自向你们交代。

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潘汉年等三人的工作的确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一周之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先后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在香港工作情况的汇报，又对于他们即将去上海的工作任务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潘汉年一行于5月23日赶到当时华东局和三野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江苏省丹阳县城，到车站迎接潘汉年一行的正是当时担任华东局情报部长、又是即将解放的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扬帆。

5月27日，潘汉年、扬帆随华东局和新组建的上海领导机关一起，在炮声中赶到了上海，并开始了接管工作。潘汉年以军管会秘书长和常务副市长的身份，全面挑起了协助陈毅工作的重担。在担负全面接管的艰巨任务中，他又侧重分管了十分棘手而对他来说又是不容推辞的公安政法工作。众所周知，国民党在被迫撤离上海前早就做了所谓“应变”的准备，给这座中国第一大都市留下了种种巨大隐患。中统（当时改“内调局”）、军统（当时改为“保密局”）两大特务系统部署了大量的潜伏势力。后来敌人又陆续从空中、海上和地面派遣特务进入上海从事包括暗杀中共党政领导干部等各种破坏活动。旧上海固有的地痞流氓和帮会恶霸势力当然也不甘心失去他们的昔日天堂，在新政权尚未充分巩固时，他们到处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给新政权不断制造困难和麻烦。再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残留下的一大批散兵游勇到处乱窜，为非作歹，扰民害民，给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上述种种暗藏的和公开的敌对势力，都向新生的革命政权提出了严重挑战，也给人民公安工作提出了巨大而又艰难的课题。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机关根据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种专项的斗争，给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破坏势力的猖极活动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为新政权的巩固、革命秩序的建立、社会治安的稳定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上海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良好局面，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诚如当年章士刘老先生在致陈毅、潘汉年的一封信函中所热情称颂的那样，他们对上海的治理是“宽猛相济，彪光盖世”的。不言而喻，作为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尤其功不可没。

政策和策略的作用

上海解放初期公安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世所公认的成绩，主要是潘汉年、扬帆等几位主管公安工作的领导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他们在贯彻执行上述政策与策略的原则时，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威力，公开地严厉地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民愤极大的流氓恶霸分子，以显示人民政府除恶务尽的决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又积极运用政策与策略的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努力分化和瓦解一部分敌人，争取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一些人转而为我服务，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最顽固的敌人。因此，他们在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自己的公安干警队伍并发挥其绝对主导作用的同时，还组织了一部分被称之为“特情”的人员作为一种辅助力量，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工作。实践证明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指导，解放初期上海公安局在扬帆的主持下，组建了一个名为“情报委员会”的机构。其成员多是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骨干分子，一般具有较高的身份。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发挥提供咨询和参与侦破的重要作用。例如这个委员会的主任一职，就是由胡均鹤担任的。

胡氏经历复杂，他早年曾加入中共，并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回国后一度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1932年他被“中统”逮捕后在酷刑下自首叛党，成了“中统”特务。1939年他在上海被汉奸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后，由于和李士群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便投靠李，并被委以重任，成了李的重要助手。当李士群为了留条路，表示愿意为中共提供一些情报和帮助中共做一些事情时，胡被指派为和中共的联络人员。1942年，李士群答应帮助中共要人刘晓、潘汉年等从上海撤往新四军根据地时，正是由胡负责安排并派专人将刘、潘一行护送越过封锁线的。抗战结束后，胡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决定弃暗投明，派人到香港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并愿意帮助策反一支国民党的军队。潘汉年本着情报工作的一贯策略，又考虑到胡在抗战时和中共的历史关系，便将胡的情况与要求电告华东局情报机关，请他们接洽。华东局情报机关研究后，报请华东局领导和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将胡留在解放区，作为“特情”人员准备让他参加上海的镇反工作。胡又向我呈交了一份“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这对于解放后的上海镇反工作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因此，扬帆在组建“情报委员会”机构时，在报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后就任命胡担任了主任一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类似胡均鹤这样的或起义、或投诚、或自首，争取立功赎罪的敌特人员数量是不少的。上海公安机关根据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适当予以运用，为整个公安镇反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1949年底，公安机关在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刘全德阴谋杀害陈毅一案时，就是起用了一位向我投诚自首后被当作“工作关系”的原国民党特务高激云，利用他过去和刘全德的相识，从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一位叫厉培明的原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解放前夕参与了起义行动，上海解放后被吸收参加了公安镇反工作，先后提供了20多个线索，为侦破工作做出了重要成绩，并受到了公开表扬。

应当承认，在运用上述各类反正人员时公安部门虽然也经过了一定的审慎挑选，尽量避免大的疏漏，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常识告诉我们，不可能完全不出现一点问题的，被运用的反正分子不可能百分之百都会真心实意为我效力。我们有分化、争取和利用敌人的策略，敌人也就一定会利用我们的这一策略反过来利用我们。这就必然会有极少数表面上向我投诚自首而在暗中仍受敌人控制的特务分子钻进来继续与我为敌。无论我们怎样防范，这种现象或称负面效应事实上难以完全避免。但从总体上说，这类人是极少数。他们的存在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分化利用敌人的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更不能因此而怀疑和否认这一策略本身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否认潘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

风起于青苹之末

1950年冬天，南方某省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被控制使用的“特情”人员叛变投敌的事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中央有关部门为此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引以为戒，提高警惕。同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处分。

不久，即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和检查工作时，有人向他反映：上海公安机关在控制使用“特情”人员工作中也存在类似南方某省的隐患。这位负责人据此对上海公安机关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对于建立那个“情报委员会”和任命胡均鹤担任主任一事深表不满。于是下令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门检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检查人员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重用”了一批起义投诚或自首立功的“特情”人员。特别是对于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有过于“放手”、“使用不当”、“内外不分”的现象，任命胡均鹤为主任更是“原则性错误”；二是让一大批投诚自首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继续留在社会上当作“工作关系”加以使用，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又并不很得力，致使其中的一些并未真正洗心革面、改恶从善分子钻了空子，干了一些坏事，造成了不良影响；三是被控制的“敌台”（即所谓“逆用台”）有掌握不力运用不当问题。1950年春天敌机对上海进行大规模空袭时，其中2月6日这一次对上海电力公司等一批工厂企业的轰炸损失最为严重，而恰恰在此前不久，一个被控制的“逆用台”曾向敌方提供过一份有关上海电厂等企业生产状况的情报，因而怀疑这其中有因果关系。

按说，检查者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并提出上述问题，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对于上述问题，上海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人曾经在会上会下作过多次说明，既有诚心诚意的检讨，也有实事求是的辩解。他们承认在利用“特情”人员的工作中确有某些控制不力，乃至麻痹疏忽的缺点和失误，但在原则上，在指导思想上，他们是清醒的。在建立那个“情报委员会”时，曾明确规定过一条原则，即委员会的工作是“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就是说“特情”人员主要是提供情况，提出建议，并不直接参与侦查、捕人、审讯等实际行动。当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确实出现过个别“内外不分”的情况，这是他们掌握不严的失误。关于将一批投诚自首的敌特人员放在社会上当作“工作关系”运用问题，从政策和策略的原则上说是允许的，必要的，并且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具体工作的某些环节上，抓得不严不紧，以致出现了某些失控现象，这是教训。关于对“逆用台”的掌握与使用问题，他们解释说，当时“敌台”情况十分复杂，数量也相当不少。被我们控制的“逆用台”仅占全部“敌台”的一小部分。这些“逆用台”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被我破获后经过迅速争取转变过来为我所用；有的则是早就由我地下人员秘密打入而后被我所掌握利用的。既是“逆用”，为取信于敌方就不能不提供一定数量的具有实际内容的而又无碍大局的“情报”蒙骗敌方。1950年春天敌机空袭上海时，具体空袭目标究竟是由“逆用台”不慎所提供，还是由真正的“敌台”所提供，一时也难以准确判断。至于2月6日这一次轰炸上海杨树浦电厂等目标和那个“逆用”台此前不久所提供的“情报”是否有因果关系，更不能轻易下结论。因为那个“逆用”台正是由我地下党员秘密打入后掌握的。再说，上海解放还不久，杨树浦电厂在上海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地理位置等，敌方是很清楚的。敌人选择电厂作轰炸目标，未必和某个“敌台”临时提供“情报”有必然联系（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二六轰炸”和那个“逆用台”的所谓“情报”井无关系，而是由军统的一个潜伏台直接活动的结果）。

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对于上述问题的检讨和说明，如果主持检查工作的人们能够冷静地实事求是进一步调查分析，是不难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结论的。不幸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倾向当时已经在检查工作中形成了气候，宁“左”勿右已成为人们的思想定势；加上扬帆同志的所谓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等因素，因此，在后来的继续检查过程中，上述几个问题没有及时得到澄清，反而被片面地夸大甚至扭曲。

一般工作失误成了严重政治事件

检查并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失误，从全局和长远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检查者和被检查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都可以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前面所述的几个问题，虽然在事实材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发现，但在思想认识上却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检查工作基本结束后，对于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虽然在具体解释时，也还加上了某些限制性词语，如说“不管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但在客观上实质上是……”等等。这“重用、包庇、掩护”的定性词语，谁都知道是非同小可的。这当然已不是一般的工作缺点错误，而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了。那“包庇和掩护”的概念事实上已经包含了某种可疑的主观动机在内，那是随时可以继续上纲升级的。这也就为后来强加给潘、扬的严重罪名埋下了伏笔。

然而还有一个值得推敲的可疑之点：所谓“重用、包庇、掩护”云云，是可以由人们的主观认识和觉悟水平来定性的。但那“3300多人”的具体数据又是怎样被调查和统计出来的呢？其实这“3300”的数字并非是真实的计算结果，而是想当然的主观推测，或是道听途说的编造。关于这“3300”数据的来源，一直就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人分析说，当初检查时大抵是把上海和华东某些地区所有曾经被运用过的各类起义、投诚、自首等反正分子，都统统计算在内了。虽然这些人的大多数在协助公安机关镇反工作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检查者仍然要认定所有这些人都应包括在被“包庇和掩护”之列。然而即便如此，许多人认为“3300”数目仍是被夸大了的，因而始终怀疑这数字的准确性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事隔30多年，即在“潘扬案件”已被平反之后，才又有人说出了这数据的另一种可能的来源：原来，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一位干部当时同扬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物色了各类人物为我所用，就像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3000一样。而且说他比孟尝君养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于是有人当场附和随口就诌出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结果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大笑。据说就是这两句打油诗的传播而变成为定论。若果如此，岂不荒唐可笑。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上海市公安局竟然犯下了如此严重的“大错”，主管局长扬帆当然逃脱不了直接的领导责任。况且这个“怪癖才子”的认错态度又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扬帆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不久，即1953年初，扬帆不幸患了脑肿瘤，国内医疗条件欠佳，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这一去就是近两年时间。

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当然还有一个过程。上海市公安局和局长扬帆虽然已被认定犯了“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错误，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错误性质仍然被界定在工作问题范畴之内。例如在一次全国性的公安工作会议上，上级领导机关就曾明确指出上海公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属于工作性质的错误。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毅也曾指出，对于公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应根据隐蔽战线的特点和规律实事求是来分析，不能简单地对待”。组织上决定让扬帆去苏联治病和疗养这件事本身也可以说明当时还并没有把他的问题看得过分严重，至少还没有把他推到敌人那边去。

扬帆被打入另册

问题的复杂化和进一步升级，始于1954年的春天。这一年年初，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饶漱石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进行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出来，中央有关部门开始了对饶的全面审查。由于饶是华东局书记，批准胡均鹤为“情报委员会”主任的是饶，而具体负责“情报委员会”的是扬帆，于是扬被与饶联系在一起审查了。1954年的最后一天，当扬帆正在上海家中休息养病时，突然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当晚即被扣押，过了两天，他也被送往北京接受隔离审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涯。3个月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谈到高饶问题时，便直接点了扬帆的名，明确地把他列入了饶漱石反党联盟之内。数天之后，扬帆被正式逮捕。其主要罪名，还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勾300余人”。

潘汉年成了“反革命集团”首犯

饶漱石的反党活动殃及扬帆，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1955年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非例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就对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做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同时提出了相应对策。他说，帝国主义势力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很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要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很猖獗，必须有计划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所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造成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他的这番讲话，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政治信息：在我们所要准备和所要采取的措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揭露和解决高饶问题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已经被作为一起重要政治案件提了出来。前已述及，此案的专案机构早在半年前便已建立并开始工作，主要当事人扬帆、胡均鹤以及“背后”的饶漱石都已先后受到追究和查处。然而就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的4月3日，此案案情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和发展，潘汉年在这一天突然被捕。后来在对外公开宣布时，被正式定名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这一突然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其过程大致是；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作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曾负责分管公安工作。扬帆在公安工作中所作的各项决策和采取的若干措施原则上也部得到过潘汉年的同意与支持。但当公安局被检查出有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时，首先是扬帆被抓住不放，后来又与饶漱石挂上了钩。在长达4年之久的反复检查、审查过程中，潘汉年一直被认为并无直接责任。因此，他除了在某些场合从领导工作角度作过一些自我批评主动承担部分责任外，从未被牵连进去。后来在分管财经建设工作中，工作成绩依然令人瞩目。特别是在协助陈毅主持“三反”、“五反”运动时，他对政策的把握和处理问题的稳妥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好评。1955年3月，他到北京时是以党的代表兼上海党的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会议期间，他参加了会内外的一切正常活动。只是到会议临近结束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会上号召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是有所牵连的干部应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出书面材料作出交代时，潘汉年在思想上方受到很大震动。他感到上海公安工作中的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既已被定性为一宗政治案件，扬帆也已被定性为饶的反党联盟成员，那末，他和扬帆、饶漱石都是有过直接工作联系的，在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上，他自然也有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月B个关键的当事人胡均鹤正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也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和胡均鹤在抗日时期的一段特殊联系，当年他在策反汉奸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上海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将他骗到南京去，并且用挟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此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当初参与其事的胡均鹤既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当时的有关情况向有关部门交待。会见汪精卫一事虽然未损害党的利益，但长期未将此事向组织报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经反复考虑，潘汉年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便鼓足勇气向中央写了一份材料，将他和胡均鹤在抗战时期有过的联系以及被强拉去会见汪精卫的经过一一作了交待，检讨了自己长期未向组织报告的错误。材料写好后，潘汉年就去找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当面向陈作了汇报，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听了潘的汇报又匆匆看了材料后，恳切地安慰了潘汉年几句，立即将材料直送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处。毛泽东就作出了立即将潘汉年逮捕审查的决定。其“罪名”有二：一是潘在抗日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是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潘汉年的突然被捕，不仅潘本人始料未及（他原以为只会受到严厉批评或是纪律处分。在交上材料之后便打点行装准备回上海了），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领导人也是料想不到的。陈在听了潘的汇报后曾恳切安慰潘，要他思想上不要紧张。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定性，正好成了计划在全国开展内部肃反运动的突破口。

骇人听闻的三顶“大帽子”

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自1955年4月定性后，随即在中央高层人士的直接领导（5人小组）和主管部门的具体掌握下开始了进一步的侦查审理工作。但此案的侦查审理工作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和反复的过程。

对潘汉年案的审理工作无疑是难度最大的。这位1925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在长达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既担任过党的中央保卫机关和情报部门的领导工作，在隐蔽战线上长期独挡一面和敌人反复周旋较量，又受党中央的派遣和委托，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公开或秘密地和敌人或朋友打过多年交道，和许许多多的高层统战对象有着密切的交往。他还曾经在左翼文化和宣传战线上担任过党的核心领导职务，和许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亲密的往来。要从各方面全面审查清楚潘汉年的经历，的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潘汉年一案的审理工作难度虽大，但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终于还是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即到1957年的秋后，基本上结束束了，其结果如何，几乎早就可以预知。因为审理调查是根据上面的定性取证的。审理的结果是给潘汉年正式戴上了三顶非常吓人的“大帽子”：除原在逮捕时已定下的“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外，又进一步加上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大罪名。

这真是骇人听闻和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位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战斗了数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在党内外都很有威望的党的高级干部，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可怕可恶的“敌特”人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理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因不外以下三方面：一是个人迷信已经盛行，凡事“唯上”而不“唯实”。潘汉年案是由上面定的，而且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定的性，自然便被视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也不敢有怀疑。倘若真的有人怀疑什么，那也只会是首先怀疑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有问题，岂敢怀疑上面有错！因此，从审理工作一开始，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思维定势，一切审理、调查、取证工作，都是沿着这一思维定势进行的。二是那种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复杂的理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正指引着办案者们的思想与实践行动。三是参与办案的大多数干部来自根据地、来自基层，一般说来，社会生活阅历有所局限，对在白区隐蔽战线上对敌斗争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于从事高层统一战线工作也缺乏理解。比如，潘汉年在敌占区深入日本情报机关获取了许多有战略情报价值的工作成绩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而为了取得敌方的信任不能不适度地向敌方提供某些敌方感兴趣的情报资料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外古今谍报史上比比皆是）则往往被看得极为严重甚至被夸大。潘汉年的“日本特务”帽子就是这么给戴上的。再比如，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1936、1937年间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张冲虽是CC的重要头目，但对国共合作态度却是比较积极真诚的。潘汉年为了争取统战工作的进展，同张冲有更多的交往和交谈，并且适当地向张介绍了陕北的某些并非属于机密的情况，可是办案者们却据此认定潘汉年“秘密投靠了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诸如此类今天看来是很幼稚可笑的问题，当初却是被正式写进了专案报告和判决书一类文件。

1957年底，潘案审理结束后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宣判，而是长期被延搁着。原因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但关键一条是因为此案原是由党的最高决策人决定的。有关材料虽然早就呈报上去了，但没有他的直接发话，谁也不能擅自表态处理。一拖就是好些年。直到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顺便提到了这个案件，这才使潘案的处理有了依据。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段话的语气似乎是宽容的，但却给原本是冤案的潘汉年再一次定了性：“CC派特务”，可杀可不杀的人物。

正是根据这一讲话精神，潘汉年终于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潘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1965年，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是公正的

1963年对潘汉年案的处理，既有领导人讲话在先，又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在后，按说是具有足够权威了。谁知历史风云变幻无常。三年后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很快又将此案原判推翻。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下令重新审查潘扬案件，同时将已经假释出狱数年的潘、扬重新收监关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扬原先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所谓“包庇、掩护”了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而负责主持审理潘扬案件的公安部领导人此时却又被“中央文革”小组指控为“右倾”，包庇了潘扬这样的“特务”、“反革命”。于是他们另组专案机构对潘扬案进行了近三年的虐待性的审查。结果，1970年，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新问题的情况下，硬是将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

1975年，潘汉年、扬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洣江和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

1976年10月，历史经历了又一次的重大转折。当风暴过后，天空逐渐变得较为明朗时，潘汉年、扬帆都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而萌发了新的希望。他们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正的惩罚，过去就没有从思想深处接受，现在是更加不服了。于是他们开始为自己申诉，希望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能够实事求是地复查他们的案件，还历史以公正。

不过历史的转折与发展仍然有一个曲折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凡是派”在一系列问题上还起着主导作用，潘扬案件岂能轻易推倒，潘扬的申诉当然也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不幸的是，经历了多年折磨，已经年逾古稀的潘汉年再也等不到拨乱反正的一天，终于在1977年的4月含冤抱屈离开了人世。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才真正取得历史性的进展，潘扬案件开始引起了高层人士的关注。

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终于开始对潘扬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整整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艰巨工作，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文件对潘汉年一生重新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中央对扬帆也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为他安度晚年创造了有利条件。

曾经轰动一时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成了一页历史，然而这却是一页令人痛心，令人难忘的历史。

潘汉年董慧的最后岁月

邹烈华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最后岁月是在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度过的。

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后，中共上海市委为做好因“潘案”而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复查平反和善后工作，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潘案”清理小组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遵照中共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办理好潘汉年同志的善后事宜——把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湖南移送到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安放。我当时在市委“潘案”清理小组办公室工作，曾于1983年三四月间两次赴洣江茶场和长沙市，找过当年与潘汉年、董慧夫妇有过接触的省劳改局、洣江茶场的干部，曾服侍过董慧同志生活的保姆，为他们看病的医务人员等。现将见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作为资料供更多人了解和参考。

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的日子里

“文化大革命”对潘汉年、董慧夫妇来说，犹如雪上加霜。他们在1955年蒙冤遭到错误处理后，于1963年已被假释，居住在北京团河农场。1967年5月又遭“四人帮”加害，被重新收监关押、审查。潘汉年从原判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未办改判手续），永远开除党籍。董慧在审查期间因左腿骨折致残，关了8年后给了一纸“维持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释放。不久，根据当时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他们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下面是当年移送潘汉年同志的公文：

湖南省公安厅：

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

致

礼

公安部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7日

潘汉年于1975年5月27日在中央公安部十五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人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三天前（5月26日）已到达长沙的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在洣江茶场，我见到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这就是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屋。此屋座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有25平方米大小，内隔两间，其中一间为灶间，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据当时上面的要求，因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所以给他们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又不能和干部职工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对潘汉年、董慧夫妇来说，在他们再次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后能重新相逢，已经是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的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董慧一直住到1979年2月23日送医院，2月24日去世。

潘汉年早在1967年重被收监关押时，已患有肝功能不好的毛病，因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他在洣江茶场的劳动，就是做些家务，去食堂买饭菜。后来，由于董慧腿残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干部征得他们的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每天去料理、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一位叫王芝兰的，一直照顾到董慧病逝。

潘汉年、董慧在洣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着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格给洣江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过去穿过的一些旧服装送给剧团做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子女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请去他们家坐坐的同志尝尝潘汉年亲手炒的花生等。茶场干部、群众也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亲昵地称呼他们为“俩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的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次，当他们经过场部蒋会计的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多样食品招待他们，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董慧对毛主席、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毛主席逝世时，大家要看电视，因场部电视机小，他提出把他一台放在仓库里的电视机拿出来给大家看。董慧对保姆王芝兰等群众回忆当年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时说：“我在延安时学纺纱，有一次毛主席到我纺纱的地方来，看到我会纺纱了，就高兴地说：‘嗨！董慧纱纺出来啦！’”

董慧同志原名董奉然，生于1918年，广东省中山县人。1938年1月在延安入党，长期跟随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做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长、副处长。1955年因潘汉年同志冤案受株连。董慧从小在香港读书长大，其父董仲伟曾任道亨银行经理，早在1937年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董慧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弟妹大多在香港，有的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也很爱国的人。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董慧乘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部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1930—1949时期，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就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该项工作的同志应感谢的。”他们还转达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向潘汉年、董慧夫妇的致候，要他们保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网打尽。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显得非常高兴，董慧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江青这人我了解……”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董慧的弟弟也给他们写信说：“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12月份到洣江探望他们。信上还说：“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9月27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久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斑斑的人了。”

董慧到洣江茶场后曾多次向省劳改局来的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没被开除党籍！”粉碎“四人帮”不久，她又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仍无结果。“四人帮”是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他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在香港的弟弟、弟媳在当年12月到湖南来探望潘汉年夫妇时，被挡在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打算明年（1977年）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事总该结束了。”但一年后，当他们依约再次前来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了董慧。

夫妻双双含冤逝世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同志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墓穴上面平铺着一块约有六块瓷砖见方的墓碑，上面横写着：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1977年2月24日起，潘汉年因肝病恶化卧床不起，3月24日被救护车送到长沙市。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的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救护车到达长沙后，又改乘小汽车由公安厅同志陪同送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14病室110床。14病室是干部病房，在进医院前，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用过的“肖淑安”的名字。

从当时为潘汉年同志治病的医生、护士介绍中，并翻阅了一部分病历卡，我们知道，潘汉年于3月24日住进医院，4月14日病故，先后住院22天。潘汉年进医院时病已很重，不断喊肝痛，经扫描确诊为“多肿肝”。他很少说话（满口假牙也是原因），烦躁不安，没有谈过个人的问题。但不时的要报纸看，还念念不忘他的爱人董慧。据3月29日病志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间婆婆（指董慧）在那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4月6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爱人。4月8日，使用冻干血浆200CC。4月9日输血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情绪很激动，两人均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还对他讲这些话。当天晚上19点45分潘汉年逝世。董慧即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晚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为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征求董慧的意见。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肝像豆腐渣。医生认为这病少见，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据省公安厅同志说，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曾向华国锋写过有关潘汉年和她的问题申诉信，要求平反纠正。这信公安厅同志见到过。潘汉年去世后一段时间内，董慧常常意味深长地对保姆等周围人说：“老潘将来会复活的。”董慧的弟弟来信安慰她说：“最近见香港一份报纸载有姐夫在革命时期是周恩来手下重要的地下干部，他今天虽与世长辞，但他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亦曾尽过一份力，死无憾焉。”并要接她去香港治病。

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孤单一人，悲伤过度，没能等到党中央为他们平反昭雪的一天，于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压脑溢血病抢救无效，含冤病逝于洣江茶场医院里。董慧病故后，她在香港的弟弟曾发来电报，寄钱给茶场委托办理后事，茶场为她开了追悼会，火化后骨灰保存在场部。以后，董慧的弟弟曾来信要求为潘汉年、董慧夫妇办理合葬，但未获同意。

由于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同志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从潘汉年遗物中清理出来的诗词手稿有20余首，成稿年份不详，内容大多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如延安），也有怀念董慧的诗句。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据省公安厅同志说，他从秦城监狱到洣江来时，这箱书是他随身带来的。董慧曾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门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蔡元培写了后刻出来的。

潘汉年、董慧夫妇骨灰移送八宝山公墓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中央组织部电告上海：潘汉年、董慧骨灰在长沙挂一节火车专厢，从长沙起程的日期定为1983年4月14日。这天正好是潘汉年逝世6周年。为了做好移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会同湖南省委的同志，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子启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场董慧的骨灰盒送到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同志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及省委书记、省长孙国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道奇，以及湖南省各部委办的代表、潘汉年同志在湖南的生前友好、省文联主席康濯、副主席蒋燕，湖南大学校长朱凡等同志。

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纪委（筹）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于伶等同志，以及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专程去长沙护送潘汉年、董慧同志的骨灰去北京。

15日上午，在北京火车站迎接潘汉年、董慧骨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以及周扬、夏衍、李一氓、阳翰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白治民等，还有潘汉年夫妇在北京的部分亲属友好。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内举行了为潘汉年、董慧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然后将骨灰盒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号，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158号。

乌云散尽现忠魂

扬帆

潘汉年当年蒙冤后，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作“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由于我是潘案的一个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为幸存者来说，在潘汉年诞辰90周年之际，我对他的怀念，就更甚于一般同志。

我和潘汉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审查的。潘案发生后，我也“升级”。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门向我宣布逮捕审查，押入监狱。经过长达10年的预审期，于1965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上是度过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汉年于1955年4月被捕，预审期长达8年，以“内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我们最后的结局却不一样。潘汉年这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潘汉年在没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潘汉年含冤不白，客死异乡，死后连墓碑上还不能刻上真名。而我于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养病，结束监狱生活后，1980年4月撤销了原判决书，1983年3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和久别了25年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汉年的彻底平反。人间沧桑，令人感叹。

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汉年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了这些常人不能具备的条件，为党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备，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好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和潘汉年相识在1943年，地点是淮南新四军军部黄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盐埠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工作，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我去军部“开会”。我匆匆赶到天长县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当场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时的问题。怕我逃逸，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破旧的砖瓦房监狱。其间，饶漱石亲自审问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责我是“奸细”。我寸步不让，坚决否认。我被说成是C．C．派（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是我曾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职，而这所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C．C．派的健将张道藩。而我在那里介绍了一位同志参加了“救国会”，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

几个月以后，我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长脸，满面笑容，戴着眼镜，比我年龄稍长的中年人。牢房门被打开了，陪同那个中年人进来的负责看押我的保卫部门负责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潘汉年。你向他老老实实交代。”

听说来人是潘汉年，我肃然起敬。尽管我对潘汉年不熟悉，但是我还是听说过他的很多传闻：党龄长，参加过长征，在党中央担任过许多重要负责工作。

在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潘汉年开始对我审讯。潘汉年是一位地下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革命者，对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有相当了解。他显然没有带着“扬帆是奸细’”这个框框来审问我。这使我一开始就感到温暖。潘汉年审问我那天，窗外雪花飞舞，我被上了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我一眼，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潘汉年坚定地说：“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我先简单扼要地讲讲参加革命前的经历，然后着重讯问了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一些历史情况。我对于潘汉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答如流，每到关键，还能提出有力的证明人和旁证人。另外，“救国会”是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于“救国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了如指掌，我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在接受潘汉年的审查以后，心中踏实多了。其间曾发生一件事，组织上暗中派了一名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其中有一首：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塌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潘汉年看了我的诗以后，他也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的是我不慎将它丢失了，但是其中的一句“巨眼谁复识英雄”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头。潘汉年给我的诗暗示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囗囗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在我被关押审讯10个月以后，1944年春，我被释放了。那天，饶漱石来看我，向我伸出了双手，说：“扬帆同志，你受委屈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组织上错了，你没错。”事后我才知道，对我的审查确是中央的指令。原来，延安整风后期，分管保卫部门的康生，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占领区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我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CC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只讲自己在戏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的组织，是学校老师石蕴华（我原名）介绍的。就这样，把我牵连上了，我就成了“特务”。康生立刻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审查我。这就是我这次冤狱的由来。

我出狱以后，很快恢复了原先在新四军军部保卫部门的工作，和潘汉年没有什么接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们才有较多的往来和接触。潘汉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因为潘汉年主管公、检、法，抓解放初期上海的镇反工作，是我的上级，我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解放初期，那时为了根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潘汉年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国民党从上海逃跑时，国民党特务头子、保密局头头毛人凤、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在上海附近潜伏了10部电台，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危害极大。我们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人员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我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使黎明起义。并在他的协助下，于1950年6月中旬一举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隐藏在上海周围的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七个潜伏组电台及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缴获电台十余部以及手枪。密码等物。经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边用”其中的两部，即：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那个军统潜伏电台交给你们公安局‘边用’。”“逆用”国民党电台，后来成了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名，说我与潘汉年在1950年2月初，用敌台送出闸北电厂及上海自来水厂位置的情报，导致了国民党“二六”轰炸，使上海遭到严重损失。但事实上，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都不是上海解放后新造的，是解放前就有的。其准确位置，国民党是最清楚不过的。1950年2月6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杨树浦电厂、上海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无需别人给他们提供什么位置。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至于“二六”轰炸的问题，后来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的潜伏电台提供的有关上海的水电厂恢复生产和天气情况等情报。与潘汉年毫无关系。

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另一个重要罪名。是说我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以后，串通一气，有意包庇、掩护、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这样的；解放初期，在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时，确有个叫胡均鹤的，他在1932年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被国民党逮捕，经不住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严刑拷打，先后充当了国民党和汪伪特务。1941年，胡均鹤同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并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撤退到淮南根据地。上海解放前夕，胡向我解放军请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经过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同意，胡被带到上海，参加镇反工作。在我接收此人之后，记得于1949年5月10日、23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有关领导同志就此事曾两次向中共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说明用此人是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的。潘汉年对此也没有责任。

对这两个重大问题、从我被捕开始，便舌敝唇焦地反复说明了上述经过。其实，用胡均鹤的问题，不仅是经过饶漱石同意，中共中央主管部门来电也明明白白地说：“由扬帆同志带往上海，协助镇反工作。”结果却还是成了潘汉年和我的“罪证”。

事实证明，给予一批投诚过来的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的机会以后，他们在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949年10月底，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派出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潜入大陆，任务是企图暗杀陈毅、罗瑞卿。刘全德既是叛徒，又是特务，此人心狠手辣，在此以前曾奉军统之命执行过多次暗杀任务，是个不能小看的杀手。但当时国家定鼎伊始，各级政权建设刚刚起步，以上海之大，茫茫人海，哪里去抓这个特务？但是，由于我们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刘全德从浙江舟山来上海，他沿途的情况，悉数为我们掌握。11月2日晚上，抵达上海才一个星期的刘全德在潜入他昔日的同事高激云家中时，被高傲云稳住，借故出门报告了我们，这个恶贯满盈的杀手束手就擒。

解放初期，我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为了根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荡涤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潘汉年耗费了巨大的辛劳。在那错综复杂的新旧交替时期，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策，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严格审批。上海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这些都是证据确凿、不镇压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坏人。事实证明，镇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工作接触中，潘汉年布置任务不仅具体，而且有些案件还认真负责地亲临指导。我记得有次重要会议，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案子由我经办。我发现基本情况失实，便立即向潘汉年汇报。经潘汉年亲自研究以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事后，潘汉年告诫我：做公安工作，尤其是涉及到拘留、逮捕，一定要慎而又慎，工作要细致，决不能马虎、草率，否则要犯错误。

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没有越轨行为。当时，我们曾约法三章，在镇反工作中，给那些反正过来的人的任务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就是说，只许他们提供情况，不给他们逮捕权。可是，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是非完全被颠倒，功绩成为罪行。随之而来的，是无法预测的大风暴。潘汉年和我首当其冲，继而是大批的株连，大搞逼、供、信，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不仅是与我们有关的在反特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受到牵连，而且党的许多干部也在一夜之间被打成了“特务”、“反革命分子”。那时，有人居然编出了扬帆包庇坏人“三千三”的神话。株连之广，可以想象！破获特务刘全德案有功的高激云，尽管当时得到有关部门表扬、嘉奖，并号召上海公安战士向他学习，但他却因我被捕而受到株连。经关押审查1年，虽然没有罪证，但是还是被送去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20多年，直至死亡。类似他的情况还有很多。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做了认真的复审，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否定了原来认定的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许多鲜为人知的功绩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不久，我和别的受株连的同志也都陆续得到彻底平反。

乌云早已散尽，潘汉年同志，您安息吧！

1995年5月写于上海

沉冤昭雪英名永存

王征明

高饶事件成了爆发点

1955年4月5目，我由上海市公安局调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刚好一年，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案件的株连，被公安部专案组逮捕。

正是这一天，我从《中国青年报》第一版看到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消息，报道了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永远开除党籍。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要我彻底交代上海市公安局用特务等问题。我天真地以为一定是专案组不了解情况，弄错了。这些事公安部领导同志都知道。1951年春，公安部领导巡视上海工作时，曾对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使用特务有过定评，认为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而且他回北京给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上海表示纠正的态度还好。事实上我们已作了纠正。1952年公安部领导还通过一个案例，当面批评我是否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了。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严厉的审讯之后，另外来了两个40来岁的人，从其讲话口气判断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说：“饶漱石、潘汉年负路线之责，扬帆是主谋，你是执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为对敌隐蔽斗争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经过市委会议认可的。其实，饶漱石这样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据的。

我被关押600天后，审讯员以一种特别的神情告诉我，已查明潘汉年是个“内奸”，扬帆是个“奸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战犯，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务康泽等均被开释，而我仍被久悬不结，气得大口吐血，立时写信给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没有下文。到五一节我又写报告，翌日放我出来。关押了6年零1个月后，我被以执行“内奸”潘汉年、扬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于起诉。

1963年得知潘汉年和夫人董慧亦获释，住在北京团河农场，半自由状态。扬帆则因拒不认罪，仍在狱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监，长期关押达7年半，潘、扬更被“四人帮”重新判处重刑，受尽摧残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和董慧已先后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与世长辞），这件历时长达27年的共和国第一冤案，才算了结。

历史是怎样被颠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在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后，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联系，但他的名字，我则敬仰已久。

记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当时我还是一个参军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志故意问我：“你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谁？”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着我说；“潘汉年同志代表我们党同福建地方实力派陈铭枢和蔡廷锴谈判，实际上他相当于苏维埃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区黄花塘军部参加整风学习，潘汉年给华中局和军部干部作辅导报告。报告中引证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机会主义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有一段时间，在晚饭后，我到黄花塘去，经常看到陈毅军长和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一面在田野散步，一面热烈交谈。这些昔日美好的记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军“挟全国胜利之余威，军临上海”（陈毅同志壮语）。潘汉年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副市长，日常事务千头万绪，可是他才华卓越，日理万机，处理问题干练，遇事沉着不乱，从容不迫，有条不紊，驾驭自如。在上海刚解放的那些日子里，潘汉年同志始终指挥着我们度过一个个战斗的日日夜夜，领导着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敌对势力嘲笑我们“共产党只能管农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这座东方著名的大城市。旧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大本营。光特务组织就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蒋经国、陆京士和毛森等系统28个主要单位，特务分子累万。此外，还有一大批反动党团骨干，盘根错节的蒋帮余孽和黑社会势力。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华东局指示，要我们首先从思想上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向谁斗争这个根本性问题。指出进城以后，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要犯原则错误。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社会改造要逐步进行，一定要分辩是非轻重，稳步前进，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错误。

华东局还指出，我们解放城市是从外部打进去，群众既会热烈拥护我们，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准备又不够，所以进城后对社会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以免使自己陷于孤立。因此，进城后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国民党的机构接收过来并且管理好。（3）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交通运输。

潘汉年同志是坚定地贯彻这些方针的。

当时，我们的处境仍很困难，国民党政权虽土崩瓦解，但仍凭借美国的支持，不甘心失败，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空中轰炸，作垂死的挣扎。800万蒋军大部被消灭，残存的反革命势力发生分化，一部分消声匿迹，另外一部分则继续疯狂破坏，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经济罪犯嚣张放肆，捣乱金融，哄抬物价。反革命特务间谍有的分散潜伏隐蔽活动，有的冒名接管，破坏解放军声誉。美蒋特务机关预伏的特务电台，每天同台湾秘密通电，供给情报，提供气象信息。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甚至进行猖狂的反革命纠合。台湾、舟山敌人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妄图对华东、上海军政首长、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进行暗杀，并在闹市投掷炸弹、制造重大事件。这一切，给我们对上海这个烂摊子进行全面接管、整顿和恢复增加了重重困难。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敌人的任何企图未能得逞。全市没有一个党政军首长、一个知名人士遭到敌人的暗害。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敌人纷纷瓦解向我投降，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人民开始安居乐业，生产逐渐恢复。这一胜利的获得，归功于党中央政策方针的正确，亦与陈毅市长和他的主要得力助手潘汉年同志的卓越领导分不开的。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对汉年同志在这条战线上的业绩是终生难忘的。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他经常听取军警关于治安和保卫工作的汇报，并及时给予正确的指示，而且还常常亲自上阵指导反间谍斗争。例如：在同反革命特务分子作斗争的问题上，根据当时我们处于敌情不甚明了，群众还未发动起来，以及我们力量尚未组织好的情况，汉年同志参与制定的军管会治字第12号布告，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行动，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为了保卫7月6日举行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和群众庆祝游行的安全，市委决定在七一前夕进行一次全市性大搜捕，并在瑞金路的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了专门会议。到会的有市委、市府、军队、公安、法院和工会、青年团等部门负责人，潘汉年同志主持会议。他针对主管部门制定的搜捕计划打击面过大指出：寄希望于通过一次大搜捕来彻底肃清上海特务、反革命破坏分子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如果采取断绝交通，挨户搜查的办法，群众必然反映很大。过去国民党经常采用的扰民办法我们不能采用。他强调这次搜捕目标要明确，行动计划要周密，搜捕面不能过大。

6月间，市公安局社会处对国民党特务布置潜伏在上海各角落极深的秘密电台进行了一次扫荡。同志们彻夜战斗，第二天，汉年同志亲自来到社会处接见胜利完成任务的同志，一面给予鼓励和慰勉，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只知道破案，过于简单化，要提高反间谍斗争的水平。

在汉年同志领导下，市公安局在策动、团结、教育原国民党人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解放前夕去香港，该所重要图书资料均已运往香港。我们利用邓的女友吴嫣（吴丽丽）同邓通信，引桥铺路，果然把邓争取回来，潘汉年、扬帆同志亲自接见了他，经过做工作，邓即把100多箱、约万余册珍贵图书资料交还祖国，这批图书资料不少是善本、孤本，相当珍贵，曾获周恩来总理的嘉许。

解放前，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曾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控制。军统曾有意加害张、罗，因得到稽查大队长阎锦文的保护未逞（阎受与我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有联系的杨伟的影响）。解放后，党中央邀张、罗赴北京共商国是，阎害怕我们因他的历史不放过他，他定要跟去，张、罗也执意要把闽锦文带去。潘副市长出面做了许多工作，认定阎保护他们有功，并特别对阎作了妥善安排后方才了事。

1950年1月25日与2月6日，美制蒋机先后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及江南、英联船厂等滥施轰炸。市公安局全力以赴，1月26日即将由台湾派沪不久，频频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特务电台及时侦破，于“二六”轰炸的第二天，报潘将罗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51年2月4日，将对我危害甚烈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徐松坚一举破获。在市公安局召开的庆功会上，潘副市长到会祝贺。

汉年同志对公安保卫队伍的建设一贯高度重视。1950年7月，社会处第一期干训班开学，陈毅、潘汉年、刘长胜、宋时轮同志都亲临讲话。潘还时常留下与训练班干部一起进餐。技术侦察部门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终年埋头工作。潘亦专门去看望他们。

潘汉年执行的是党的正确路线

我手边尚保存1950年3月22日在华东公安会议上潘汉年讲话的记录，不妨摘要重温一下。

汉年同志详尽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上海度过由于美蒋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恢复生产，安定秩序，为保证500万人民的生活，粮食公司以低于收购价供应市民。他强调顾大局、讲政策的重要性。工人打老板，资本家不会认为是部分工人不谅解，而会对政府政策发生怀疑。他指出中国大陆解放多是军事解放，但内在政治因素起很大作用。《约法八章》的颁布，对解放全国有极大作用。政策照顾起义人员，这样就有很多留下来的旧人员，给他们机会能为人民服务。但这些因素不免也成为特务得以暂时存在的客观条件。他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熟悉敌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习敌人的长处。敌人的方法对我们有利无害的可用，不好的东西不能用。如肉体处罚、严刑拷打，反革命认为是唯一法宝，我们决不能用。

公安部门建立起来的首要任务，是肃清那些公开破坏的特务，对城市中带短枪、炸弹的破坏分子和特务组织，只要发现，力求追踪消灭，不能让其得手，助长敌人气焰。

关于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出，不管任务如何重大，情况如何复杂，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急躁。反革命活动最易激起我们急躁情绪，产生过急做法，这样容易到处去抓，牵连过广。“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乱抓，抓了再清理很不好。这样，真正的敌人抓不到反而溜掉了。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准”、“稳”基础上的“狠”。要打得准，就要看的准，诱敌深入，当敌人暴露要对我破坏时，一定要给予有力的打击。

他举例说，对流氓打架喜欢采取形式上的处罚，不了解只有将其后台弄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他概括地说：上海解放已经9个月，有些成绩，贯彻基本方针，树敌不太多。

他特别指出，由于我们由农村到城市，工作改变，环境改变，和黑暗面接触多，容易产生蜕化堕落。加上我们公安人员有权在手，容易违反政策。他告诫说，不能利用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他最后提醒老同志，要在提高自己方面下狠功夫。

在另外场合，他批评我们只会埋头苦干，而不懂得用现实材料去教育提高群众。批评我们不善于更有效地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曾当着许建国局长的面批评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案犯中有许多未能及时依法处理，他说：“再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公安局长要受处分。”

现在回顾后来在内部肃反中走过的以逮捕代侦察，根本不讲法治，制造大批冤假错案、株连无辜的曲折道路，不正是离开正确方针，走向反面的恶果吗？！当然，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些正确的意见，必然会被一些“左”的人看成右了。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汉年同志的正确意见在上海工作中得到贯彻，从而保证了建国初期在上海公安保卫斗争中取得那么重大的胜利和成就。

上海镇反运动的实际指挥者

1951年1月，上海市办理反动党团特务登记伊始，在市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上，潘汉年讲话指出，对国民党员应区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和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不同时期，提高了干部的历史知识与政策水平。

中央颁布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以后，潘汉年同志代表市委具体主持这一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他在多次会议上，批判右的“宽大无边”的思想错误，正确指出，上海过去注意了对特务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浮在面上有罪恶有民愤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强调要党委领导、第一把手负责，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冬防，充分发动群众。公安机关要走群众路线，和基层工会密切结合，嘉奖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纠察队有功人员。控制杀人权限，组织人民巡回法庭。根据毛主席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既听取了各方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又使大家了解了党的毋枉毋纵的政策，从而使广大民主阶层站在拥护镇反运动的一边。他还亲临普陀区的公审大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和陈小毛，受害者愤怒的控诉，通过电台向全市广播，影响巨大。潘汉年同志是上海镇反运动实际上的指挥者。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汉年同志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工作方面，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陈毅同志曾引用一句名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启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宏伟的气魄，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力量。汉年同志是能从战略高度理解统一战线对于革命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意义的，证明他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的真谛并且善于运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解放前后，有许多民族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专家，经他动员由海外纷纷归来。他善于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汉年同志学识渊博，马列理论水平高，逻辑严谨、分析问题透彻，语言简练，他写文章作报告，从来不要秘书代劳。有一次，华东和上海联合召开清理中内层的干部会，原定饶漱石作报告，届时饶有事不能来了，只有请潘讲。我们事前为潘准备了一份讲稿给他参考，一直到临开会才送到他手里，他只来得及把段落题目看了一下就上台讲话。当时我们深感内疚的是讲稿送迟了，要影响他报告的效果，可是由于他平时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即席发挥，他的报告讲得非常成功。1951年鲁迅忌辰，汉年同志百忙中写出《鲁迅杂文的斗争性》的纪念文章，在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这样的学者市长，令人敬佩。

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很早，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为革命立下不少功勋，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从不摆架子，宽厚和蔼，平易近人，没有见过他对人发脾气、耍态度，受到大家的敬爱。他曾对我们的警卫制度提出意见，他苦笑说：“晚饭后想到公园散散步，干什么要跟着警卫员，既惹人注意，又脱离群众。”

汉年同志一贯关心干部的培养。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对在他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要求严格，不许任何人生活特殊化，但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提高。他在公安局讲话，细致地关照大家要注意仪表整洁，符合文明城市要求。他对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来不放松批评，但始终是抱着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大多采用启发疏导的方式，不伤害同志的自尊心，因而效果良好，也深得干部的爱戴。

党中央为汉年同志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给他应有的正确评价和荣誉，读之不免感慨万分，潸然泪下。20余载的沉冤终于昭雪，长年累月压在我们心头上的巨石终于落地了，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将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潘汉年冤案的前前后后

文光

蒙冤入狱

1955年3月下旬，春寒料峭。北京饭店门前警卫岗哨林立，平添了几许肃穆的气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的代表为陈毅、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许建国、夏衍6人，以陈毅为团长。这次会议有三项议程：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时，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并对自己和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查或交代了一些问题。毛泽东主席在大会讲话中，对此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应主动把问题和过去的错误向中央讲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会议印发了所谓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饶漱石问题发生后，所谓被“包庇”的胡均鹤已于1954年9月间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也已于1954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面对这些情况以及会议的有关提法，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又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自然而然要联系自己的责任。而且1943年他到沦陷区和李士群接触时，意外地被李士群挟持去同汪精卫见面（当时是由胡均鹤带去的）一事，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作过报告，这也是他的一个思想负担。这次会议，潘汉年下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3月31日会议结束。当晚，心事重重的潘汉年到同住北京饭店的夏衍的房间里，向这位知交交心说：“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夏衍感到这一定是件要紧的事，便诚恳地对潘说：“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指陈毅）去说清楚。”是什么事？潘汉年当时没有说，夏衍也不便问。

第二天（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了自己在12年前被一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详细情况，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要求陈毅将他写的有关报告转呈中央。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允亲赴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并转交他写的书面材料。陈毅还安慰了潘汉年几句，要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先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中央公安部立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列举逮捕的”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组织；二是说他在饶漱石、扬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

就在4月3日晚上8时许，潘汉年在北京饭店301房间内接到电话，说楼下客厅里有人等他，请他马上下去一趟。原来是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着几名便衣干警在等着。潘汉年下楼后，罗瑞卿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当即将潘押上小车直送功德林监狱。

对于逮捕潘汉年的事，潘的秘书、警卫员以及同住北京饭店的许多熟人都毫不知情。潘的警卫员相其珍当晚看京戏回来，时已12点多。他发觉潘不在房里，马上到陈丕显、夏衍处打听，都说没见到他。夏衍的秘书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第二天、正当夏衍、相其珍在打听潘的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同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为防止张扬，直接通知夏衍，潘已被捕，并嘱夏一定要保密。

当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了潘已被捕的消息。他诚恳地、留有余地地对上海代表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同他熟识，请不要担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而被捕的，那是发生在1943年。在此之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无叛党嫌疑。4月7日，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追请大会批准将对潘汉年的逮捕列为议程。因为根据宪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须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

潘汉年因“内奸”、“反革命”被捕的消息，除了上述通报的范围之外，被严格地保密着。全国党代表会议结束后，在上海代表团回程的火车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特地布置：潘汉年出了问题，你们回上海有人问起潘，就说他出国去了。不要说别的。相其珍不久就被“隔离”起来，因为向他打听潘情况的人很多。直到报上公开发表潘汉年被捕的消息，相才得以露面。

1955年7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公布了潘汉年被捕的事。报告中提到：“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引起了党内外、国内外的莫大震惊和关注。而这个报告所提到的“证据”还是同年4月3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公安部要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两条。

从1955年4月3日到1960年3月15日，潘汉年在功德林监狱被关了近5年。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成，他被转移到那里。由于他已“定性”，他的一些战友、他领导的一些干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后受到株连，蒙冤入狱。没有被捕而在本地区、原单位受隔离审查或抄家的人就更多了。扬帆即因潘汉年被捕而在1955年4月12日从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以后被称为“潘扬反革命集团”，简称为“潘扬案件”。在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的调子愈唱愈高的形势下，对这样一件中共党史上罕见的高级干部被直接指控为“内奸”、“反革命”的集团性大案、要案，势难进行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审查、处理。就在1955年潘被定为“内奸”、“反革命”后；周恩来总理即布置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李克农组织专门班子查阅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文等全部档案。查档结果由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正式报告。报告对潘汉年案提出了五条反证材料，要求中央郑重考虑潘汉年的问题。先后三次报告都没有回音，被搁置起来。

1957年潘案的审查告一段落，1958年有关办事机构也解散，但案件本身却成了一桩悬案，只审不判，也无法定案、结案。有关部门对潘汉年的处理有一条既定原则：不杀。这是因为毛主席于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毛主席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事情拖到1962年，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番话似乎是从政策宽容的角度讲的，但却又给潘汉年增加了一条罪名：“投降国民党、是CC派人物”。5月30日，中央对公安部关于处理潘案的请示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一个暗藏在党内很久的内奸分子。他的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予宽大处理。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案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精神，认为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一半以上，宣布将潘汉年假释后交公安机关管制。

2月13日潘汉年出狱，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和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他的生活境遇虽然有所改善，每月发生活费200元。能够探亲访友、看书写作；但是，他依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刑释犯，他的“罪名”已经法律认定，能不委屈吗？据他的知友唐瑜回忆，他和唐瑜在这时重逢时，潘自责对人轻信，几乎陷入敌人的圈套，但没有承认自己犯罪和对革命事业有什么损害。潘还说过，几年中他一直在写材料。有一次，潘汉年夫妇去逛颐和园时，巧遇正在陪同外宾的陈毅。陈毅亲切地问了他们的近况，并说要设法催促上面一下。可见，在团河农场时期，有人在关心解决潘汉年的问题，潘汉年自己也在耐心地企盼着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会到来。

“文革”劫难

祸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潘汉年当然也难逃厄运。“中央文革”为了彻底砸烂所谓旧的公、检、法，给中央公安部领导人和办“潘扬案件”的人员强加了“包庇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罪名，将他们都送进了监狱。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一纸命令：“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于是，潘汉年和董慧又被收监受审。1981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时，陈伯达亲笔供认；这个没头没尾的纸条“是我开会时受命写的”，“笔迹是我的”。

潘汉年在这一次坐牢期间受到的“审讯”和生活待遇，和上一次有天壤之别。在无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岁的潘汉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7年10月，监狱当局给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潘汉年已初步诊断为肝癌的病情报告。有关负责人当即请示谢富治，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个报告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人审阅同意，最后经江青批准。从这之后的三个月内，潘汉年竟遭到了47次突击审讯。一个多月以后，为了审讯他解放后的“罪行”，又在38天内对“连续作战”41次。身患重病，倍受虐待的潘汉年的身体进一步垮了下来。

经过近三年的突击审讯，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提出了关于潘汉年的“罪行审查”和“判刑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对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理意见。这一报告经江青送“主席、林副主席、永胜、富治、叶群、作鹏”等圈阅同意。

真正执行这一处理意见却是1975年3月后的事。1975年，在恢复整顿、加强落实政策的形势下，当时的中央加快了各专案工作结案处理的步伐，统一部署将重要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去。潘汉年专案组报经批准，决定对他“维持原判”（即维持1970年7月的判刑处理意见），将他和董慧放到湖南劳改单位，每月各发生活费100元。但是，1970年决定的判处无期徒刑，是在没有办过任何改判的法律手续下否定了1963年的15年有期徒刑；而且是在没有发现任何“新罪行”下的“从严”处理，怎么能说是“落实政策”呢？所以，当专案组向潘汉年宣布安置他到湖南去时，对审查结论和具体处理意见，避而不提。

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在度过了“四人帮”时期的8年冤狱生活之后，被押送到湖南省公安局（“文革”时厅都改为局）所属第三劳改农场——茶陵县洣江茶场安置。他没有公民权，没有通讯自由，不准接近其他犯人，离开场部要经省劳改局批准。尽管是个特殊犯人，但他毕竟可以和同时进秦城监狱而又8年未见的董慧重逢了。夫妇俩相依为命的农场生活，是潘汉年苦难生涯的最后的安慰。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潘汉年夫妇重新鼓起昭雪沉冤的期望，相信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董慧曾经出面向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写过简略的申诉信，陈述她和潘汉年“并无两心”。但是，在同年冬天，潘汉年的健康状况却严重恶化，多病并发。为了要从茶场医院转到省城医院作进一步检查，经过层层审批，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才得以用“肖叔安”的化名住进长沙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病房。尽管医院采取了治疗抢救措施，但毕竟无法挽救潘汉年垂危的生命。4月14日19时54分，71岁的潘汉年终于含冤逝世。一个大革命时期入党，在党内历任重要职务，对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许多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员，经过22年冤狱的灾难，不明不白的死去，能不死而无憾、死而无怨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潘汉年的沉冤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历史真相

历史是公正的，27年后历史终于还了潘汉年以清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正式文件。历史事实证明：潘汉年是一贯忠于革命的好同志，那些所谓“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汪”、“上海解放后掩护包庇反革命，供给敌人情报”以及“内好”、“特务”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潘汉年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的。1940年前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以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供给台湾情报，引起“二六”轰炸（即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炸）。根据这三条“罪名”，潘汉年被定性为“内好”、“特务”、“反革命”。

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第一，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潘汉年并没有“投降国民党”，相反地，他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有功之臣。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后，国民党政府曾派其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会谈，时在莫斯科的潘汉年奉命参加了会谈。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潘回国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陈立夫正式洽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潘汉年于1936年4月离开莫斯科回国，同国民党代表联系后，秘密到达保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意见，以及与国民党当局取得联系的情况。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他为国共谈判的正式代表，带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进行谈判，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此期间，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等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经常联系国共谈判事宜。他根据《八一宣言》、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电的精神，向国民党有关人士提出了中共对时局发展的见解和国共谈判的方针和条件，并介绍了自己的一般经历。这些都是属于执行中央指示的正常的工作往来。他和中共中央关于谈判情况来往的文电档案都可证明，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是坚定地按照中央的谈判方针行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潘汉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也没有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有勾结国民党、危害共产党的行为。因此，所谓潘汉年“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与日、汪特务机关及其头目有过来往，见过汪精卫，决不是“投靠日、汪”，而正是为了了解敌方意图和动向，不计个人安危所表现的深入虎穴的过人胆识。他发扬了党的情报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党的特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曾一再指示敌占区的对敌隐蔽斗争的系统，需要派人打入敌伪组织，相机开展工作，了解日、汪、蒋之间的政治动向。争取重要的情报来源。潘汉年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潘汉年同日、汪特务机关和头面人物之间的活动是工作的需要，其情况均及时向中央作过正式报告。中央主管部门还为此从延安等地选调了一些干部给潘。为了执行这些任务，他决定采取的一些特殊手段，也都是组织上允许的。潘汉年系统在抗战时期的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开展隐蔽斗争，功绩显著。经过他们机智勇敢的工作，成功地派人打入了敌伪重要的特务机关，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供延安决策时作参考，曾经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他们利用各种关系掩护了一批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保证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他们在敌占区建立了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秘密联系的畅通而且在环境恶化时还通过合法掩护，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干部和领导人，安全撤至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派在香港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一批同志和秘密电台处境危险，潘汉年王动地报经中央同意后利用他的特殊关系，派人前往将他们全撤至内地，得以继续工作。这一切都表明，潘汉年和日、汪来往，是利用敌人、争取各种机会完成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而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内奸”。

根据复查材料证明，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问题，是1943年在李士群的挟持下发生的。

潘汉年和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建立情报工作关系，对李做策反工作，是潘汉年1939年离开延安时经中央社会部领导同意的，以利用李士群“留后路”的打算，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由于李士群在敌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慎重起见，潘还特地请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并得到了同意。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就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充当汪的得力助手。他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多一点政治投机资本，1939年李士群设法和中共联系。汪伪政权建立后，李炙手可热，逐步受到重用，历任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省长等要职。对于李士群这一类关系，潘汉年采取的步骤是非常慎重的。1939年潘汉年就派人和李士群接触，经过两年的观察和试探，1941年才亲自和李士群见面。

有一次，李士群向潘引见了胡均鹤（胡当时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人指定胡为潘、李之间的联络。胡均鹤，大革命时期加入过中共，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32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被捕，叛变后投靠中统。但胡又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之一赵尚志的妹夫，胡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并帮助过东北抗日联军在香港的电台。抗战初期，胡被江伪逮捕后就在李士群手下工作。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胡均鹤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

1943年春，潘汉年奉中共中央华中局之命，从淮南根据地去敌占区找李士群了解敌伪“清乡”部署。潘先到上海，要胡均鹤安排同李士群见面。李当时在苏州家中，但当胡陪同潘到苏州，李却又到南京去了。李留话有事可到南京找他。潘觉察到李的态度有异，但还是亲赴南京以摸清李的底细。在胡陪同下，潘汉年到南京的当天仍然没有见到李。第二天，李约见潘时，就急切地提出了汪精卫想和潘见面。这就和盘托出了李士群搞突然袭击，要潘到南京的真实目的。在此情势下，胡均鹤带着潘汉年见了汪精卫。汪精卫为了猎取进一步同日本勾结的政治资本，想仿照重庆国民党召开参政会的办法，在南京另搞一个汪记参政会。汪向潘提出要共产党派人参加，当即被潘汉年拒绝。潘明确表示：延安方面不会同汪精卫合作搞什么联合。对汪的意愿可以转告。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证明：潘汉年这次会见汪精卫没有说过任何不恰当的话，更没有作出任何允诺。这次会见后，潘汉年与汪精卫再未见过面，也没有发现他与汪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触。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当时或以后，中共都没有因为这次潘、汪会见而在政治上、组织上受到任何损害。

潘汉年作为敌占区隐蔽工作的领导人，和大汉奸汪精卫见面一事，在从敌占区回到根据地以后，没有向华中局汇报。当时华中局正在整风，在淮南根据地高级干部的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搞了小动作，排挤打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潘参加了整风运动，不满饶的这种做法，支持了陈毅，饶漱石则挑动一些人攻击陈毅，并指责潘汉年犯了“自由主义”、“小广播”等。陈毅这时曾致电党中央负责人报告事情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力求搞好团结。陈毅当时的电文中提到：“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工作。”据潘汉年的解释：在当时的气氛下，他顾虑说出见江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弄清楚。再加上潘汉年还目睹了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部长扬帆被康生来电诬陷为“特务头子”而被逮捕审查。从扬帆的遭遇联想到自己，潘汉年也不会不考虑如果主动报告见江问题，将会有什么实际后果。

1945年2月，潘汉年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这一次，潘汉年原是下决心当面向毛主席报告的。当去杨家岭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对潘汉年在敌占区的工作表扬有加，并当场举酒祝贺潘汉年工作胜利；还嘱潘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毛主席的亲切热情，充分信任，使潘汉年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据1963年潘假释后见到唐瑜提起这次见面时，他还为自己错过了这样一次袒露心迹的机会而后悔。在“七大”时，还因为饶漱石不守安分的问题和有人说潘汉年“自由主义”，受到了批评，迫使潘汉年主动提出自己不宜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机一失，一拖就是12年。潘汉年的解释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不向组织报告会见汪精卫这样重要的事情，总是个错误。至于所谓潘汉年“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等等则都不是事实。

第三，关于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也是不实之词。

胡均鹤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经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同意后报告了中央有关主管部门。于是胡均鹤等被带到上海参加镇反工作。对此，潘汉年没有责任。上海解放后，经饶漱石批准，’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所属的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主任（1950年2月改为政保处情报室副主任）和专员，利用一批叛徒、特务担任了情报、审讯工作和联络员。还有许多登记自首的原国民党特务，被用作为公安局的工作关系。在开展隐蔽斗争中利用这些人，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对当时开展反特肃反斗争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们在市公安局领导下曾经获得各种敌特线索，破获敌特潜伏电台几十部。尽管在利用这些人的范围、分寸、界限、方式方法上有不当之处；尽管潘汉年分管政法工作，但无论如何不存在所谓潘汉年“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至于说潘汉年“供给情报”引起“二六轰炸”，完全不确。现已查明，1950年“二六”轰炸前，被上海市公安局破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的潜伏电台（罗已被镇压），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情报和轰炸目标，这和潘汉年毫无关系。对我国实施封锁轰炸，是当时美蒋的政策。况且当时国民党从上海败退不久，对上海原来的工业布局，包括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等的所在地一清二楚，不需要提供什么情报。断言“二六”轰炸是由潘汉年“提供情报”所引起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向全党郑重宣布：“原《判决书》认定潘汉年是内好的那些罪名，经过复查都不能成立。”联系潘汉年为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历史上一贯表现来看，“潘汉年是一贯忠于革命的好同志，而决不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把潘汉年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株连种种

潘汉年冤案发生后，在他长期工作过的上海，受到株连的人员面广量大，又形成了一连串的冤假错案。据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1982年的材料：从各单位上报数字来看，全市1955年起因潘案株连而被逮捕的有800多人。受到其他处理的有100多人。这900多人中，在市级党政部门工作的干部有170人，其中中共党员91人。

还有一些名义上未因潘案立案，实际上却因潘汉年被错误定性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并未算入上述900多人内。所以在上海实际受株连的约有1000人以上。

这些株连对象，大致属于几种情况：

一、是解放前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隐蔽斗争的革命干部。解放后，大都是公安、情报、统战等部门的骨干。1955年四五月间在“潘扬案件”立案后，中央公安部直接逮捕的上海的干部除潘汉年、扬帆外，还有刘人寿、董慧、谭崇安、袁锟田、王征明、田云樵、钱明、李涤非、蔡秉贤、汪锦元、孟述先、周之友等19人。他们被关押从2年到20年不等，大多被作为“反革命犯”判处徒刑，主要“罪名”，无非是长期在潘、扬领导下参加隐蔽战线的工作。潘、扬既是“反革命”，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他们中很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连累了第二代也背上黑锅，工作、参军、入党、提拔，处处受限制。例如蔡秉贤同志，是1940年的中共地下党员，1942年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工作很有成绩，曾受到中共中央主管部门的表扬。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破获过几起潜伏敌特的重要案件。潘案发生，蔡锒铛入狱时正年轻力壮，等到80年代平反出狱，已经步入老年。又如周之友（又名幼海），是汉奸周佛海之子，受进步友人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就倾向革命。抗战胜利后，上海地下党的策反组织和他建立了联系，他参加了地下斗争。1946年由扬帆、何荣介绍入党，成为华中分局情报部的特别党员，在上海参加情报策反工作。上海解放后，被分配在市公安局任副科长。潘、扬冤案发生，他被株连入狱。出狱时已是半身不遂的老人。

潘汉年的夫人董慧的遭遇也很悲惨。她出生在香港，父亲是道亨银行的经理，曾任香港商会会长。董慧在北平求学时经受了“一二九”运动的洗礼，1937年18岁时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进了“抗大”。1938年1月在延安加入共产党。丑939年由中央社会部派遣在潘汉年领导下到敌占区工作。她以道事银行的职员身份为掩护，通过她的社会联系，为潘汉年系统掌管经费，做交通、联络的掩护工作。抗战初期，她还曾动员父亲捐了一笔巨款给八路军。上海解放以后，她担任市委统战部的科长、副处长。1955年5月被捕受审，虽然夫妻两人关在同一座秦城监狱，却互不知下落。1962年，公安部给予她所谓“参与内奸活动，盗窃国家资财，但不追究刑事责任，宽大释放”的结论。1963年潘汉年假释出狱，夫妻才得相聚。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两人被再次收监，使董慧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疾病加重，在狱中又遭骨折，一时生活都无法自理。1975年原中央专案三办宣布对董“维持原结论”，让她随潘汉年安置在湖南洣江茶场。她的处境引起在港亲属的忧虑。1976年，董的弟弟曾从香港到长沙要求探望潘、董，未获同意，但转交了他给董慧带来的轮椅。潘汉年逝世后，1978年其弟又来探望，提出要将董慧接去治病，但那时董慧正陷入失去潘汉年的巨大悲痛中，她守着潘汉年洣江茶场的旧居，期待着平反昭雪的一天。后来，董弟又致信国务院负责人，要求让董迁居到广州，以便就近照顾。这封信还未有下文，董慧已含冤离世，终年61岁。董慧蒙冤20多年来，组织上从来没有宣布开除她的党籍，只说“停止”她的党籍。直到她临终，还背着“参与内奸活动”的罪名。1979年初平反决定到达时，她已去世。1980年董弟致信湖南省公安厅，要求将潘、董骨灰合葬一处，经请示未得同意。1982年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忠贞善良的共产党员董慧的骨灰，才和潘汉年的骨灰一起被移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还有一些解放前后在潘汉年、扬帆直接领导下的干部，虽然1955年未被逮捕判刑，但受到隔离审查、调离原来岗位、降级使用等不公正待遇。如赵铮、何荦等在隔离审查后，有的升级逮捕，被清理出公安部门，有的送皖南劳教农场。有些干部在以后的审干、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中又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等，受到错误处理，如王以伟、干戈、唐路等。解放前有过贡献的王大超则被迫自杀。

这样一批经过对敌斗争长期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长期被打入另册，遭到诬陷，不受信用，且不说个人和家庭蒙冤遭难，对解放后的情报、公安、政法、统战等工作，也造成了相当重大的损失。

二、是解放后立功赎罪的来自敌特阵营中的叛徒、特务分子，即所谓潘汉年、扬帆“掩护、包庇”的反革命分子、这类株连对象人数最多，情况也复杂。本来是既往不咎，立功赎罪的投诚对象，现在却成为潘、扬“包庇”的铁证。

三、是潘汉年的亲属，如潘汉年的胞弟潘锡年，侄子潘可西等人。潘汉年是宜兴陆平潘家较早参加革命的。解放前，潘汉年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他的亲属在家乡被另眼看待。解放后，潘汉年成了“反革命”，他们又被无辜株连20多年。如潘可西和潘锡年，都是抗战时期入党、到过延安工作的老干部。由于是潘汉年的亲属，在反右斗争、“文革”中或被下放，或作为“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他们的小辈也受影响，有的连上大学、当干部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除了以上直接受株连的以外，还有一批潘汉年的战友、挚友，如王尧山、于伶等，也曾受到过种种怀疑、诬陷和不公正的对待。潘汉年被捕后，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奉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命立即回上海安排追查潘案的工作。许一到上海先和市委秘书长王尧山研究潘在上海的工作情况以及潘的私人来往关系。柯庆施从北京返沪以后，马上召集小范围的会议研究潘案，并要王尧山谈对潘汉年的看法，提供潘的来往关系中的可疑之处。王尧山谈的主要意见是：潘汉年解放前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的关系比较复杂，因工作关系与敌人内部曾有接触；至于他是否是内奸，王尧山始终不表示态度。后来，就要王停职检查，并追查他与潘的关系。柯庆施还决定把王的宿舍从丁香花园迁出。从此，王尧山被迫写了不少交代，但每次交代都没有说潘汉年是“内奸”、“特务”。以后又召开多次揭发批判王尧山的会议，有时会议有四、五十人参加。1959年，对王尧山宣布了市委《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王尧山党籍的决议》。王尧山拒绝签字，并严正提出：“签字违反我对党忠诚的意志，我不同意市委的决议。”当年，王尧山被降职降级下放到淮海中学。他的夫人赵先写了申诉信给中央。谁知此信转到柯庆施手里，赵先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销上海市妇联主任的职务，下放到长兴岛农场“劳动改造”。

除了上海以外，潘案的株连对象还涉及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甚至香港等地。由于潘汉年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条战线上的干部受株连的情况特别严重。现年93岁的华克之（即张建良）就是其中之一。华克之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左派，“四一二”事件后，他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誓以反蒋救国为己任。1935年曾策划刺蒋未遂，成为国民党悬赏10万元通缉的要犯。1937年他到延安后，面聆毛主席的教导，表示决心听从共产党的调遣，万死不辞。1939年，他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两人介绍，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潘汉年的重要助手，驰骋于敌占区的隐蔽工作战线上，屡建奇功。潘案发生后，1955年5月21日他也被捕。在狱中，他实在不能接受潘是“内奸”、“反革命”的定论，犹如他不相信自己犯“反革命罪”一样。但他又不能不相信中央的决定，加上某些人对他的不实诬陷，使他极度痛苦，竟将筷子捅进自己的眼窝，眼球都掉了出来。经过抢救，眼睛虽被保住，但一目几乎失明，落下终身残疾。他被判刑11年，刑释后被押送徐州监督改造又是10年。他的夫人朱素文也是潘的下属干部，1955年被捕审查，1963年获释后下放到徐州当图书资料管理员，两人依靠她的50多元工资苦度光阴。1979年，华克之到北京找到廖承志，才得以平反。直到潘汉年平反，公安部再次复查，重新作了结论，认定他在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对党的事业是卓有贡献的。

在潘汉年冤案的影响下，如此众多的他的家属、亲友、战友、领导下的干部和所属的工作关系受到株连，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个历史教训十分深刻，永远值得记取。

复查平反

1979年陈云委托刘晓等了解潘汉年解放前在上海隐蔽斗争中的工作情况和问题，为重新审查潘案做准备。后来陈云因病住院开刀，在开刀之前他语重心长地提出：虽然这次是开小刀，但人老了要防万一，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得到解决。他还提出：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去进行国共谈判时，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决定的。现在王、康都已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明了。当姚依林去探望他时，他建议中央复查潘汉年的问题，姚将他的建议立即报告总书记胡耀邦。

刘晓1978年在上海休养时，陈云即想找刘了解潘汉年的历史材料。1979年刘晓回北京住进医院，陈云到医院看望刘晓，并要求他在一二个月内写出报告，用实际材料回答潘汉年究竟是为我党搞情报，还是为国民党或日本人搞情报的问题。刘晓当时虽然半身不遂、记亿衰退、言语困难，而且自己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但仍然在夫人张毅的协助下，与有关同志联系。当时，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复查潘汉年案的阻力还很大，陈云交代的任务只能悄悄地进行。刘晓、张毅找了夏衍和史水等向中央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并以历史材料证明潘汉年确是为党出生人死地搞情报工作的。还找了上海的刘人寿夫妇自费到北京，名义上是探亲访友，实际上是为复查潘汉年问题提供材料。刘晓自己也提供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凡是潘汉年掌握的上海地下党的人和事、联络机关，都没有遭到破坏的有力证明。

1980年廖承志最早公开对潘案表示疑问。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潘汉年的问题是个冤案，潘汉年不是“内奸”、“叛徒”；因为潘汉年解放前对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地下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这些地方的地下党没有一个机关是因潘而遭破坏的，建议中央对潘案要重新审查，廖承志的意见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胡立教于1981年同样对潘汉年“内奸”问题提出反证，他在材料中写道，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系“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我们的这一机密。

潘汉年的亲属20多年来受到株连，但对潘案一无所知，连潘汉年是否还在人间也不敢打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潘的弟弟潘锡年、侄儿潘可西等才积极给中纪委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

1981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潘案正式复查。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中央公安部采取了积极态度，于1月16日向中纪委提出了处理潘案过程的报告。3月，中纪委的复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主管部门的历史档案，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作了调查。20多年前李克农关于潘汉年案件的报告引起人们重视，成为复查、平反的有力线索和重要证据。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特务”、“反革命”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作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发[1982]37号文）。《通知》对潘汉年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宣布中央决定：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判决；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切实处理好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潘汉年无罪，宣布撤销1963年的原判。

上海因“潘案”而遭到株连的人数最多，影响最深，为此受到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胡耀邦曾亲自对潘案复查落实政策和善后工作作了三次批示。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以王尧山为组长的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由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分管。自1982年开始到1985年，清理复查和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深切怀念潘汉年同志，号召全市人民学习他的优良品德。4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派人专程赴长沙将潘汉年和董慧的骨灰移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

至此，沉冤27年的“潘案”终于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颠倒的历史被颠倒了过来。以史为鉴，酿成潘汉年冤案的教训是发人深省的。“潘案”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而“左”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则是导致潘汉年沉冤难伸的主要原因。

第八章：情谊永存

陈云与潘汉年

迟爱萍

从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陈云与潘汉年的直接交往不多，在党的历史上他们仅两度并肩工作过，时间都很短暂。但这两度交往在党的历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发生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关于这两段交往，无论是陈云还是潘汉年都未详细叙述过，后人只能沿着他们生前的足迹和他们点滴的回忆及有限的历史资料，去寻找那不寻常的战斗情谊。

在中央特科

1931年1月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潘汉年一度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值陈云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同年4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的可能。幸而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及时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局势转危为安。此后，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范围被迫大大缩小，连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会议都难以举行，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

为了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逐步稳定下来，中央决定重建特别工作委员会，于是陈云、潘汉年、康生被同期调往中央特科。陈云任特科总负责人，潘汉年是陈云的助手，任特科二科科长，主要负责搜集情报工作。”

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下，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协助下，克服各种困难，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为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期间中央特科主要处理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协助周恩来处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的转移。第二，惩处叛徒王世德。此人绰号“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员，叛变后，泄露了特科工作机密，给党的特科工作造成困难。后受到特科“红队”的惩处。第三，配合营救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牛兰是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当时他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又交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

牛兰被捕后，中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释放他们。1932年3月陈云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曾召集全总党团开会，研究营救牛兰夫妇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于5月7日发表《反对国民党政府危害世界职工运动革命家——牛兰夫妇告全国工友书》；7月9日又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赤色工会领导全中国工人阶级来援助世界职工运动革命领袖牛兰之决议》。与此同时，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各国的著名学者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他们释放牛兰夫妇。

当时的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这件事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四，派遣宗益寿打入敌人内部。宗益寿，江苏宜兴人。1927年曾参与发动宜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到上海参加党的工会工作，改名孟平。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特科的安排，在上海报上刊登脱党启事，打入敌人内部。宗孟平在敌人内部曾成功地保护了中共被捕的同志。

第五，揭穿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协同党的上海地下组织付诸实施。当时，采取的主要反击行动是：

1．在《申报》刊登《伍豪启事》。《申报》在上海影响大，共产党和申报馆又有一定的关系。1932年2月16日《时报》刊出伪造启事后，中共党组织即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上海的临时中央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词。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2月20日，《申报》馆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申报》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两个伍豪，因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已在《申报》登出，而又说伍豪有个启事未能刊出，可见后一个伍豪与前一个伍豪不是一个人；（2）使人得知后一个伍豪的启事是对着《时报》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正如陈云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2．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传单。这一传单于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3．在党内披露事实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了党组织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4．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83年1月23日，陈云在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虽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去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而不了解地下党设法揭露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由此也可以说明潘汉年同志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陈云于1933年7月17日由上海转到中央苏区。不久，康生去了苏联，特科工作实际上是潘汉年具体负责。1981年11月，陈云在回忆特科工作时讲，在特科中，“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他是领导”。

1933年5月，潘汉年亦从上海转至中央苏区，到苏区后立即被任命为中央局的宣传部部长；同年六七月，调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此时，陈云在苏区继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两人工作上没有直接往来。

共同担负特殊使命

1934年10月，陈云与潘汉年都加入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陈云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潘汉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同年二三月间，在红军重人遵义城不久，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随陈云到敌区，主要任务是：在上海附近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以恢复我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张闻天还嘱潘汉年先行一步。当时，潘汉年与陈云约定白区的联络方法，是在与陈云相识的潘汉年的表妹吕鉴莹的住址会合。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即从遵义起程赴贵阳城。途中改名杨涛，化装成商贩，以邓发为他找的一个广东商贩为伴。到了贵阳，找到了贵州工委的秦天真，经秦天真派蓝运城（女）同行掩护，约三四月间抵香港。到香港后，潘汉年即写信给吕鉴莹，得到潘渭年回信知道他们安全，才赴上海。在沪通过潘渭年的上级、临时中央上海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找到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其时，中央上海局已遭到1934年6月、10月，1935年2月三次大破坏。1935年3月至8月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持白区工作及与各方联系的局面。同年5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被捕。潘汉年到上海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浦化人告诉潘汉年：国际负责代表已不在上海，并认为白色恐怖严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张潘暂返香港，等待时机活动，国际方面也待取得联系后再通知。于是潘汉年重返香港。在港潘获悉共产国际预备在当年下半年于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便产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联络国际关系的想法。并经梅龚彬（原名海电龙，自1932年起，与潘有来往）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鼎等人，托他们疏通两广关系以办理出国护照。

再说陈云。自潘汉年接受任务，离开红军队伍之后，陈云继续随军西行，经过两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艰难里程，于5月31日到达西康地区的沪定县。当晚，陈云出席在沪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陈云受命后，约6月中旬离开长征队伍，在四川中共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出发，经荣经、雅安、成都、重庆，乘船前往上海。

约6月底，陈云到达上海，住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馆，化名李介生。由于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二弟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此时，章郁庵改名为章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为安全起见，章秋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组织之命亦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安顿之后，陈云即通过章秋阳，找到厂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通过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在此期间，陈云分析时局，产生了赴苏的想法，并通过章秋阳顺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

约8月，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取得联系。鉴于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他们两人决定先后乘苏联货船赴海参威，然后转赴莫斯科。作出决定后，陈云便通过秘密交通，与陈潭秋、杨之华等先期乘坐苏联货船经海参威，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及陈云、滕代远等人。而后，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化名史平。

约8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托，列席了少共国际代表团大会。随后，潘汉年化名柏林，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学习，并与在苏的陈云、曾三、孔原、饶漱石、杨之华、高自力、梁广、夏采曦等一起参观访问。

陈云与潘汉年的赴苏，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特殊使命，使中共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使共产国际了解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

1936年初，国民党为谋求国共合作的途径，派其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据陈云同志1981年11月8日回忆，当时是他与王明、康生三人共同商议决定。派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接头的。随后，又指派潘汉年为联络代表，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并要求他默记密码，以恢复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年4月间，潘汉年离开莫斯科经法国巴黎回国，为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日夜奔波。

这年10月，陈云亦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他回国迎接西路军的指示。1937年4月，陈云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膝代远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而后在新疆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为战友伸张正义

陈云与潘汉年自莫斯科分手回国后，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为党竭力工作。陈云从1937年11月由新疆赴延安，12月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至1944年3月；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直至解放。潘汉年回国后，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等职，为党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近新中国成立之际，陈云受中央之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出色的领导了建国初期统一财政、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等重大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有过直接的指示。当时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曾为落实中央一系列指示，协助市长陈毅在上海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整顿金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4月，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并定罪判刑。但其问题始终查无实据，政治名誉也未能恢复，直至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逝。

对此，陈云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汉年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内了解他情况的同志并不多，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层中与潘汉年共过事的、还健在的，仅有陈云一位了。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陈云都认为必须彻底搞清潘汉年的问题。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评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三中全会后，陈云便委托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的材料，以查清问题。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大手术。手术前，陈云郑重地给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案子。姚依林来医院探望陈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别的事，潘汉年的问题也给耀邦同志写了条子。在疾病威胁生命的关键时刻，陈云提出潘案复查的问题，充分显示了他对党的历史和事业及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就潘案复查问题致信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信中说：“我认为潘汉年的案子需要复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的组织的完整保存，从反面证明了潘汉年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陈云明确提出：“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科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又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材料的情况，并对在场的原特科工作人员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短短的几句话凝聚着陈云对战友的深重的情意和无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位特科老战士的心。

历史不容歪曲，这是铁的原则！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协同下，根据档案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及错误结论。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通知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历史传扬着许多友谊的颂歌。陈云与潘汉年在白色恐怖及生与死面前所结下的战斗情谊，就是非常动人的一曲。时至今日，两人已相继谢世，但他们共同灌注的战友之情和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万古长存！

潘汉年与宋庆龄

林铭纲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关怀与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八一南昌起义时，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第一位成员；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领衔担任执行委员，和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领导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潘汉年还知道，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请她帮助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张子华一起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就在3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戴上了眼镜，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了起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①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①指蒋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关于这次潘汉年与宋庆龄会见的详细情况，我们迄今尚未见到有关的史料。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中可以判断，宋庆龄对于潘汉年转达的毛泽东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张，是完全赞同与坚决支持的。她与中共驻沪办事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仍由潘汉年任主任。“八办”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并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竭尽全力。她于1936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同时，“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为了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潘汉年日以继夜地从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的谈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在这两个方面，潘汉年都得到了宋庆龄有力的帮助与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11月9日，周恩来又电告潘汉年，要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正式谈判。在谈判中，潘汉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用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给潘汉年打电报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使谈判陷于僵局。同时，他对内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于11月26日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名加以逮捕。在长达8个月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潘汉年同宋庆龄经常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宋庆龄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国民党镇压抗日的救国会领袖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发起了影响巨大的“救国入狱运动”，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义正辞严地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讲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不顾天气炎热，胃病发作，疼痛难忍，坚持与胡子婴等12人亲赴苏州高等法院投狱，使该院院长、首席检察官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宋庆龄返沪后，又于7日致电蒋介石等，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月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营救活动取得了胜利。当“七君子”回到上海时，潘汉年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并转达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他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会见七君子，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宣布了“讨道令”，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谋取妥协，把蒋介石救出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深知，如果蒋氏一死，宋氏利益难保。她不仅请兄长宋子文去见二姐宋庆龄，打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而且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宋庆龄央求她出面斡旋，与中共联系，以求保住蒋的性命。宋庆龄立即将此情况转告潘汉年，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决定派出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潘还建议宋庆龄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及中共代表团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

潘汉年还向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表示陈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汉年从宋庆龄、张冲那里分别获悉了南京方面的种种动向之后，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赶到南京秘密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商定由端纳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参加谈判。另外，又同陈立夫面谈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很快就取得了比较圆满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正确主张的胜利。也少不了潘汉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经过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的多次谈判，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宋庆龄闻讯后“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潘汉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宋庆龄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贡献。

1937年12月23日，距芦沟桥事变仅5个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沦落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她离沪去香港。潘汉年收到电报后，立即派交通联络员李云（祝秀贞）转达给宋庆龄。宋庆龄接到第一次电报，表示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暂缓离开上海。接到第二次电报，她才决定离沪去港。这天早晨，她惜别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达公和祥码头。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国邮船驶往香港，潘汉年派李云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为了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战争，支援正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依靠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于1938年6月组织了有国际友人参加与支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潘汉年也于1937年12月撤离上海到达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并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汉年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捐寒衣，运送给八路军。他还参加了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领导“保盟”向海内外许多友好团体和人士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等，源源不断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立即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离港。9日，宋庆龄从香港启德机场乘飞机飞抵重庆。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将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继续进行情报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1944年11月，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在沈阳、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及情报工作，并为解放区提供紧缺物资。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蒋介石政权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5月初，潘汉年奉调到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分别接见。随即南下经丹阳于26日进入上海。27日，苏州河边的枪声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当天，受命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和陈毅市长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拜会她，向她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征询她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作为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曾多次看望宋庆龄，并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宋庆龄为此曾亲笔写信给潘汉年表示谢意。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从事国务活动的同时，始终特别关怀妇幼保健卫生和儿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认为，这是为祖国缔造未来的重要工作，应当更好地开展起来。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致函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并附去25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以及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计划、预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说：“我建议他（周总理）通知你们关于接受我们的计划和预算一事，以便你们提供必要的经费，为我们开展工作之需。……中国福利基金会一直为上海和全国人民服务，将来，我们将更全心全意地做好这项服务工作。”宋庆龄还亲自提名潘汉年担任中国福利会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潘汉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庆龄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主持召开了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潘汉年出席会议，参与讨论《中国福利会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汉年还和谭震林、陈丕显等一起到少年宫参加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晚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欢乐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从此，宋庆龄就再没有见到过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长了。1981年5月29日，88岁高龄的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临终前并不知道潘汉年已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于长沙。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①

①本文原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略作删改。

尹骐

文坛巨子、革命前辈、与世纪同龄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写着的第二部《回忆录》，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内容的他与潘汉年的交往……未能写出就离我们而去了，这真是一大憾事。

笔者曾经接触到有关夏衍与潘汉年交往的若干资料，并为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深情所感动。我想把它们记述下来，虽然无法和当事人的直接回忆相比，但也可以窥见其中若干精彩的历史风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学战线上共商团结大计

夏衍和潘汉年相识，是在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创造社出版部给《洪水》编辑部送稿，潘汉年当年在《洪水》当编辑。不过，这只是匆匆的一次会晤而已。还算不上真正相识。

夏衍与潘汉年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联开始筹备的前夕。这时，夏衍从日本回国已经两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不久回国，并且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入党后，夏衍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开始了以翻译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经成为上海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员，并当选为执委，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潘汉年入党的时间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点。但他经过北伐战斗的洗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这时已经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成长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战士，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夏衍在会见潘汉年之前，已经听了洪灵菲传达的中央精神，应解决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纷争，停止由创造社、太阳社挑起的和鲁迅、茅盾之间有关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潘汉年作为文委书记，原先也是创造社成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消除隔阂筹组左联的重任。他一面拜访鲁迅，虚心听取鲁迅的意见广面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上著文，带头作自我批评，以消除歧见，促进团结。与此同时，他约见夏衍谈话，要求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党员作家在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隔阂方面多做工作，让这位从未写过文章卷入争论的党员作家充分发挥沟通对立双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潘汉年约见夏衍的这次谈话，成了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成了他们后来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点。当时，29岁的夏衍虽然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胜于23岁的潘汉年，但因潘汉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级领导，夏衍对潘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并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积极推动左联筹备工作的进程。

数月之后，在潘汉年、夏衍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战线终于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组成了以鲁迅为旗帜，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正是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共谋团结大计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中，夏衍和潘汉年之间不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汉年的朝气蓬勃、精明干炼和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潘汉年则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稳、博学多才和献身革命的宝贵品格。这两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战斗情谊便由此而建立、发展，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升华。

30年代初，在隐蔽战线上的心灵沟通

左联成立后不久，夏衍和潘汉年就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夏衍继续在左翼文化阵地上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为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左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内，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左翼戏剧与电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汉年则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岗位，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1930年夏开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艺工作范围代表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团体，包括“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反帝大同盟”等。还参加了以救援受难者及其家属为主旨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领导工作。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层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长职务，并参加特科的领导工作。

当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动，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极为机密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数主要领导人掌握特科的情况。为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挥作用，特科干部都必须减少以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亲属在内。在一般情况下，特科干部不仅要严守机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让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现得灰色一些。潘汉年到特科工作后，就象他的老朋友之一楼适夷后来形容的那样，这位原先十分活跃的文化人，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再也难见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场合碰见他，他也只是稍稍点个头，就算招呼过了，马上就避开去。

潘汉年的这种异常态度及其有时表现出来的灰色面目，曾经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误解。但夏衍在潘汉年销声匿迹之后，不仅没有对他产生误解，而且依然是那样的完全给予信任和真诚地无保留地支持。

潘汉年离开左翼文化战线后，在思想上仍然关注文化战线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关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况。有一天，他忽然约夏衍到爵禄饭店见面。这时，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一开始夏衍便忙着问潘汉年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潘回答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夏衍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就避而不谈。夏衍对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么误解，仍象过去一样向潘谈了许多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潘汉年也仍象过去一样仔细倾听着，随后便告诉夏衍两件事：一是要他转告主编《文艺新闻》的袁殊，对国民党社会局长吴醒亚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测；二是告知中央已决定由翟秋白来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今后这方面的事将会好办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又一次约夏衍见面。见面后，潘汉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夏衍带到薛立华路的一座小洋楼里去见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模样的人物。潘汉年对这位绅士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然后就将夏衍介绍给这位绅士：“今后由他和你单独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我们是老朋友。”潘汉年既不向夏衍说明这位绅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说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联系。离开小洋楼之后，潘汉年也只向夏衍简单交代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但仍未将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诉夏衍。直到后来夏衍和这位绅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当年袁世凯搞复辟运动的大将之一杨度。

原来潘汉年主持特科情报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专职情报干部外，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情报网络。杨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经常从杜月笙那里为特科搜集一些有关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这种特殊情报关系当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干部，潘汉年要他和杨度联系，从杨那里接受情报，只是一种临时调用性质。因此，潘汉年向他交代任务时才显得那么简单、那么神秘。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位战友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心灵沟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释一句，夏也决不多问一句。彼此都确信对方能够理解。这或许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了。

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同开创新局面

潘汉年1933年夏离开特科前往江西苏区。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并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忙于和国民党当权派陈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时又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经过西安事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国共谈判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共合作的局面即将形成。这时，大约在6月的一天，潘汉年设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向他分析形势，传达党在上海即将实行的工作方针的转变，要他并通过他转告一些党内外的朋友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又询问了他个人的许多情况。

这次谈话，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已有的战友情谊，而且事实上决定了夏衍后来数十年的工作与生活道路。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扩大，党需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适宜担负统战工作任务的干部去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过国民党，认识许多国民党要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他的才干，他对党的事业的热诚，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声望，更为潘汉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汉年又约夏衍见面，见面后便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究竟见谁也不明说。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规矩，不多问一句，老老实实跟着潘汉年坐上出租汽车上路。等到走进一座石库门房屋的二楼，才知道是周恩来要见他。周恩来是在前往庐山和蒋介石谈判的途中临时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紧迫。正是潘汉年事先已经向周谈了夏衍的情况，并向周作了推荐，周才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决定亲自向夏衍交待今后的工作任务。夏衍这是第一次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见党内这样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在拘谨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点，但周恩来已作出了决定，一向组织观念很强的夏衍当然只有服从。周恩来又指示夏衍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以后的一切“就由汉年和你联系”。这就意味着，以后夏衍的工作将由潘汉年直接领导。如果说，左联时期和特科时期潘汉年虽在党内职务比夏衍高，但他们之间基本上还是某种横向联系与合作，是战友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现在又加上了一层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丝毫也没有影响或妨碍他们已经固有的友情，而是继续不断地加深和升华这种情谊。

和周恩来见面之后不久，潘汉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统战工作的第一线。先是派他去给刚刚回国的郭沫若当“参谋”和“顾问”，向离国10年对国内情况已经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绍各方面情况，帮助郭沫若处理某些难题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汉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总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询问，也决不轻易透露具体情况，不提前多说一句。这虽然可以说是潘汉年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慎重和机警，但从另一侧面也恰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与理解。

接着，潘汉年又派夏衍参加由郭沫若领衔主持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工作，担任中共方面派出的总编一职。不言而喻，既是统战性质报纸，夏衍就必须和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诚心诚意地和人家“联合办报”，同时也必须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主导与核心作用。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制定者之一，并且是这个领域内的杰出帅才。潘汉年是贯彻执行统战策略的高手，是周恩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进入这一领域后，很快也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把一张四开的《救亡日报》办得十分红火，销路与影响与日俱增。夏衍没有辜负周恩来和潘汉年的重托。这同时也反映了潘汉年对夏衍的真正了解与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后，上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从上海撤退和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政有权的国民党人士尚且争先恐后备找门路，在野无权的共产党及其进步的朋友们自然更是困难重重。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紧张而有秩序地组织指挥了整个撤退和转移工作。首先是将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内地去；又指挥夏衍派先遣队去广州，准备在那里恢复《救亡日报》的出版。到12月中旬，即上海经沦陷一个月之后，潘汉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让人给他送去一张船票。等到夏衍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后，才在船上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又是事先不加说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后一批的撤离。这一对革命战友真正是患难与共，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虽然这是党的工作需要，但确实反映了这两位革命战士的可贵情怀。

抵达香港后，夏衍前往广州主持《救亡日报》，潘汉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被召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后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这两位战友一别竟达9年之久。虽然在1941年间，他们两个都同时在香港活动一段时间，但因夏衍是公开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汉年则是中央社会部（后改情报部）派往敌后主持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行踪飘忽，不时奔走于港沪之间，非常隐蔽，因而再没有机会和夏衍往来叙旧。

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岁月如流，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从大后方重庆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战线上从事艰难曲折的斗争。潘汉年又以中央情报部代表的身份受周恩来的调遣来到上海。他肩负双重任务：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前者隐蔽，后者公开或半公开。在这两条有分有合的战线上，潘汉年轻车熟路，驾驭自如。这时，他和夏衍又恢复了密切联系。

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不得不撤离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机构及其成员也只能分别撤离、转移或转入地下完全隐蔽。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潘汉年和夏衍都属于转移到香港去开展工作的干部。而且潘汉年又负起了组织指挥撤离和转移的重任。这一次潘汉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时撤离。不过这次乘的是飞机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从上海直飞香港。

在香港，潘汉年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情报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员。中共华南分局成立后，组织上则由上海局兼管，潘汉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员的身份参加华南分局的领导工作。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两个方面：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主持情报工作。夏衍是华南分局的成员，并主持分局所属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以文化宣传为其主要职责。从组织关系上，潘汉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间接领导。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范围而需要通力协作。潘汉年的特殊身份，使他实际上成了协作的总调度和总指挥。用夏衍的话来说，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汉年来“牵头”办理。当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各方面的人士都要来找共产党，向共产党询问方针政策，打听人事和各种消息，他们最想见到的也是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得到权威的答复。因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始终保持着和中央的直接联系。于是，潘汉年便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夏衍成了潘汉年的重要帮手之一，又正是在这新的频繁的接触与密切的合作中，他们之间进一步加深了战友情谊，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1948年，为迎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驻香港机构要设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国统区各地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请到解放区去。这些人士又大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旦发现他们将去解放区“投共”，必将加以阻挠甚至谋害。这无疑是一项难度很大并且是充满着危险的任务。潘汉年调集了许多得力干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无一意外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过程中，分管文化宣传的夏衍也被调积极参与其事，全力以赴协助潘汉年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央指名邀请的人士通过海运送往已经解放了的大连、烟台等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要不断搜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时报告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那里已经策反或联系到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于是许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夏衍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和参与潘汉年的工作，潘汉年自然也同样地关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华商报》，1948年冬因亏损而陷入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十，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捐助，从而使《华商报耀脱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兴。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与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为了加强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农亲自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部分别和他们会见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他们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对去上海工作的重视。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衍负责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许涤新负责工商统战工作。

夏衍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赶到江苏丹阳，在丹阳仅仅停留数日，便开赴上海履行新职。

潘汉年作为陈毅的重要助手，为接管和治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陈毅的领导下，他先后主管政法、统战、财经和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绩。他和陈毅还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相识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无论在开始的接管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别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多年养成了自由职业者的诸多习惯。当他进入上海当了执政党的高官后，有一个时期很不适应解放区的某些制度、习惯和作风，包括互相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称谓等等。不过，只要夏衍一踏进潘汉年家的门槛，那一切制度、习惯和作风便不复存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称谓而论，当面或直称“汉年”，或和过去一样戏称“小开”。夏衍有时离开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国访问，在给潘汉年写信时，那称呼就更随便而显得更亲切了：“汉年兄”、“开兄”或“凯兄”等等。有一次从国外访问归来，途经广州时给上海潘汉年夫妇写信，大约是在国外呆久了，思乡心切，信的开头称呼“慧姊转开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跃然纸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接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两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扬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励，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要求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保持始终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贰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象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谓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动。夏衍和潘汉年的命运也在不断地变迁。1975年，潘汉年在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去监督改造。1977年春，当历史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而天空的乌云还远没散尽的时候，潘汉年终因多种疾病缠磨含冤去世、遗恨终身。夏衍则在1977年的同一历史时空获得了“解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1979年后，潘汉年一案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动下得以复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中央下达文件通知到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这和当年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潘汉年的情况相比，一份党内文件显然不足以完全恢复潘汉年的真实面目。于是又在陈云的关注督促下，由夏衍带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从而引发了1982年至1983年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和资料，终于使这位卓越的革命老战士，在革命文化战线、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领域内，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一生光辉业绩为世人所知。

为了进一步颂扬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荧屏上重塑一个潘汉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经92年高龄的夏衍又牵头和阳翰笙、罗青长两位潘汉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建议拍摄一部反映潘汉年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迅即批复同意。虽然这部电视剧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预期在1996年潘汉年的90诞辰前后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阳翰笙这两位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建议完全实现，便也先后与世长辞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可贵的经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友情，却是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1995年3月写于夏衍逝世1个月之后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

林铭纲

潘汉年同志在他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战斗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鉴于他长期在国统区、敌占区和香港从事统一战线与秘密情报工作，并且是一位“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①，从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许多功绩至今仍鲜为人知。他为创建新四军所起过的重要作用，作出的历史贡献，仅仅是其中之一。

①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联络工作，他和精通法语的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经巴黎于5月到达香港。

肩负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汉年一到香港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首先发信给国民党的陈果夫，要他即派员到港面谈，并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情况。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会见各方面人士了解国内情况，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叶挺。

叶挺，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春末夏初出国。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开过饭馆；在维也纳靠卖豆腐维持生计。同年冬，周恩来路过柏林时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与批评。1932年秋，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结束了国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门。在澳门，叶挺没有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以客座参谋身份参加过福建事变，失败后又回到澳门，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叶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①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和党脱离了关系。正当叶挺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了解党对当前时局的政策主张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并通过何麟（中共地下党员，医生）约见了他。

①见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页。

5月的一天，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饭店同叶挺进行了热诚的交谈。比潘汉年年长10岁的叶挺，倾听这位刚到而立之年、风度翩翩的同志和朋友侃侃而谈。潘汉年依据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说，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他诚挚地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同时，还希望叶挺在反蒋的两广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是叶挺自从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干部面谈。这次会面，对叶挺未来10年的人生旅程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①

①见董保存：《叶挺与新四军初创》，载《世纪》1995年5月／6月总12期第22页。

自从潘汉年主动约见叶挺，把党的最新的政策主张告诉他，并且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之后，叶挺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叶挺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访问了在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一带建设防御工程的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还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赴广西苍梧，向李济深等反蒋人士转达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春节后，他带了全家从澳门迁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

这时，潘汉年已从陕北保安返沪，受命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并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代表负责同国民党谈判。卢沟桥事变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周恩来等赴庐山同蒋介石谈判路经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桥堍新亚大酒店。当潘汉年告诉他叶挺现在上海的时候，他请潘汉年安排与叶挺见了面。他们自从1928年柏林分手后，已有近十年没有见面，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在上海相逢，要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够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且示意他同陈诚、张发奎等人接触，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叶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这位当年保定军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并建议这支将要编成的部队的番号叫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示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几经考虑，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他认为叶挺不是共产党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尚不知此事。潘汉年得悉后，即于10月5日发出致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的电报：“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小开五日”“小开”是潘汉年使用最多的一个化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接到潘汉年的电报后，经过研究复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在下列条件下完全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即叶挺和国民党同意：（一）何鸣部人枪全数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其他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毛泽东还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完全受共产党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来延安一次面商等问题。当博古、叶剑英向叶挺转达了毛泽东等人的意思后，叶挺明确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经何应钦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与亲自接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热烈欢迎叶挺愿意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并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会上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艰难交涉，组建新四军有关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叶挺军长更以其特殊身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核定”了下来，批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此后，又委任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办公。2月11日凌晨，叶诞军长一行到达南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浙、粤、赣、湘、鄂、豫、皖八省红军游击队，终于汇成了一支抗日的铁流，在大江南北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潘汉年和刘晓在抗战期间的亲密合作

沈忆琴

“送君西去诉离愁，长渡鄱阳作楚游。大别山中堪暂住，会师江左待经秋。”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晓奉命离开淮南根据地去新四军五师接受新任务前夕，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写的一首送行诗。依依惜别，期盼胜利重逢的战友之情，跃然纸上。潘汉年和刘晓，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区，就曾并肩战斗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在上海地下斗争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报战线的领导人，刘是上海地方党委的领导人。严酷艰辛的地下斗争，铸就了两人之间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他们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机智勇敢地周旋于日、汪、蒋势力之间，为在上海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政治影响，发展党和爱国进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遭到严重破坏，留存下来的党员和党组织同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党中央为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刘晓来上海。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地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支援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顺应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的活动，但又采取种种包办统制的办法控制爱国群众的抗日斗争，并且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预计到上海地下党重建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高瞻远瞩地提出：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这三点，正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上海地下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切实纠正。潘汉年和刘晓从当时的上海实际环境出发，将这三方面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展开了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各项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刘晓、潘汉年等决定先成立党的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王尧山任书记），将各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党员组织起来，作为筹建江苏省委工作的第一步。当时，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正确与否，就是看是否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潘汉年当时以八路军和中共统战代表的公开身份就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公开的国共谈判，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文化界的救亡运动。限于地下斗争的环境，上海地下党和“八办”组织上都是独立系统，一般不公开联系，双方负责人商谈工作要经过充分准备，但在“八办”和“群委”的协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层“、中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迅速地建立和开展起来，使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当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都争取了公开合法化，一切抗日救亡工作都采取合法的工作方法。当时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是联系各群众团体，开展救亡运动的枢纽，也是党的工作的中心，它是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的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会员人数最多、群众工作基础最雄厚的一个救亡团体，参加者不仅有店职员，还有经理、工商业者；领导层中还有各行业的知名人士，真正体现了上、中、下统一战线的结合。文协和职协这两个团体都参加了国民党当局主办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为团体会员，取得合法活动的地位。潘汉年负责同抗敌后援会和文协中的国民党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打交道，同各界上层人士加强联系。他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上层活动中尽量创造条件保证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工作顺利开展。文协、职协等救亡团体则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具体工作，发挥中层、基层统一战线的作用，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大胆放手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去。

当时的群众活动，也打破了陷于小圈子、动不动就大搞示威游行的老办法，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种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故地服务团的工作搞得如人如茶。

二是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建立公开合法的新闻出版阵地，组织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的《救亡日报》，是在中共领导下采用国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报，一开始就是中共宣传抗战的舆论中心。它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针对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群众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宣传、组织，使广大爱国群众逐步认识全面抗战和抗战必胜的意义和途径，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下紧密团结起来，如“八一三”战争期间，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不宣布绝交和宣战的政策，《救亡日报》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那些坚持反对绝交、宣战的人是少数汉奸的观点，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当局的投降妥协倾向。当社会上出现“英美即将调停，日军将不向南京进攻”的谣言时，《救亡日报》将“主和者就是汉奸”、“战则存，和则亡”、“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反对妥协！”作为标题，并发表了潘汉年、胡愈之的评论文章，使人们认清抗战到底的阻力和困难，坚持斗争。上海失守前夕，当蒋介石谋求对日乞和时，《救亡日报？又及时组织文章揭露和反驳匡民党内主和派的阴谋。

在此期间，潘汉年在《救亡日报》等公开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观点鲜明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公开的中共代表的作用。这对党员和积极分子了解党的主张，提高对五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起了指导作用。

三是重新组织党员和干部队伍，为重建上海地下党打好组织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汇集在上海的各个方面的党员和干部人数众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联系的原来留在上海的各系统的党、力员；有出狱后到上海来寻找党的关系的各方面干部；有各系统在救匡会运动后发展的新党员，等等。但是，要建设一个隐蔽精干、长期作战的上海地下党，必须认真审查与物色适宜做地下斗争工作的党员。“八办”和“群委”担当起了当时审查和调配干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在王尧山家中开会。这是“八一三”时期上海地下党两个方面主要负责人仅有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商量了两方面之间的分工和党员干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确定了哪些人坚持在上海搞地下斗争，哪些人要转移到新的岗位去。之后，经过“八办”的调配，大部分干部被动员到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去，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只是少数党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环境，在上海有隐蔽条件，并且经过多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

以上仅是“八办”和“群委”在“八一三”时期千头万绪工作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汉年和刘晓的密切合作，“八办”和“群委”的默契配合，为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良好基础，使得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一开始工作就比较顺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区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时来电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12月中旬，潘汉年将各种应做的工作安排就绪后，撤离上海，前往香港。刘晓仍留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以后的二三年中，潘汉年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和刘晓在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遥相呼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主要负责人，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并逐渐将上海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和据点。这时，他同刘晓又建立了直接联系，不时在浴室、咖啡馆等公开场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学生党员陈永箴家里交换意见，商量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紧搜集日、伪、蒋之间勾结的政治动态，要加紧进行打入敌伪内部和高层，开展战略情报工作。其中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汉年1939年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工作。潘汉年在决定亲自会见李士群之前，曾和刘晓商量过。他们分析了李士群的处境和矛盾，一致认为争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实证明，李士群以后确曾为我党提供过一些有关日伪“扫荡”、“清乡”动向的情报。在1942年秋，刘晓和潘汉年从上海安全撤退到华中根据地，就是通过李士群的关系。

为配合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刘晓和江苏省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潘汉年加强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解决情报来源。譬如，江苏省委所属职委系统的何荦，学委系统的张征秉，都奉调去协助潘汉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往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发往根据地的重要情报，多是经过何荦等往返传递，及时沟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史永（沙文威，沙文汉的胞弟）和他领导下的人员都划归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史永划归潘汉年领导后，为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原来联系的地下党员赵铮兄弟两人，都打入汪伪“76号”搞内线工作，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地下党员蔡秉贤，从抗战一直到解放长期埋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长期联系的汪维恒，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供的蒋介石发动进攻大别山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943年，潘汉年和刘晓虽然身在华中局淮南根据地，但仍分别领导着上海的情报工作和上海地下党。他们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札配合，成绩卓然。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经口头表扬了潘汉年和刘晓领导的上海地下斗争的成功。这是对潘汉年和刘晓的赞扬，也是他们之间战斗情谊的写照。

于伶心中的汉年

袁鹰

1955年初，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肝病复发，又住进华东医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汉年到病房来看望于伶。

“老于，我刚才专门去详细问过医生，他们说你这病问题不大，很快就会好转的。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吧，不必着急出院。”

于伶微笑点点头：“你事情多，不必来看我，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明天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

“要开多长？”

潘汉年答道：“不会太长吧。现在大家都很忙。”

又谈了几句话，潘汉年说还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战友、烈土的遗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经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说罢，匆匆握别。

一位护士走进病房，轻声问：

“咦，潘副市长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于伶说，“有电话找他吗？”

“他的药。”护士指指手上的药盘：“刚才他要了一瓶药水和安眠药片。怎么办呢？”

于伶看她为难，就安慰说：“不要紧的，你就放在我这里吧。一会儿吴强同志来，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长，我托他带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为两位知心战友之间的永诀。

4月5日，于伶从报上看到党代表会议公报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电话通知于伶立即去参加一个会。

这个会不同于往常，气氛紧张而神秘。他本以为是关于高饶问题的传达，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会议的人用极其严肃的声调读了一份党内通知。

于伶一听到头几句，就如五雷轰顶，整个头脑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听不清通知的具体词句，只是反反复复记住三句话：

一、潘汉年是隐藏在党内的内奸，已于4月3日被捕，关押审查。

二、所有到会的人必须严格保密，相互之间不得议论、打听。

三、每人回去写揭发检举材料，越具体、越详细、越快越好，两天内交。

他如梦如痴，木然地回到医院病房，斜躺在单人沙发上；透过被泪水模糊了的眼镜片，看到对面白色墙壁上只有两个斗大的黑字：“内奸”。

二

潘汉年是内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个结论，他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大了解这位老战友的经历了。

——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汉年就进入中华书局，担任《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是个负责跑印刷厂、捆书、寄书等杂务的“小伙计”。后来又编《洪水》、《幻洲》杂志，开始用“水番三郎”笔名，写嬉笑怒骂、尖锐抨击反动势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汉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担任文委书记。

——1930年，主持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1年，担任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曾经参与清除叛徒顾顺章等敌特、内奸隐患。

——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5年，遵义会议后，奉命只身化装到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与陈云会合后先后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及长征初期情况。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各种外围组织，筹建电台。

——1936年西安事变后，奉党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谈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争取和平解决事变。

——1937年，随同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

——1937年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公开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他风尘仆仆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冒着生命危险，领导地下的革命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逼香港，他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组织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后来，他又几次潜返上海，负责情报工作，用各种身份作掩护，同敌伪上层分子周旋。

——解放战争后期，组织各界知名人士从上海等地转往香港，然后通过海上通道往华北和东北解放区。

——1949年，他随军进入上海，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长。

这样一位为革命奔走半个世纪，为党为人民献出毕生心血，忠贞坚定、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会是内奸？

如果是内奸，在那么多他经手的工作中，只要有一次出卖，就足以使党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损失，使敌人轻易就得到梦想多年而得不到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他多年追随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工作，要向敌人告密，易如反掌，顷刻间就能得到巨额奖金。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时，他为什么不将300多位抗日爱国的文化人拱手交给日寇，反而冒着危险，费尽心血，千方百计将他们营救出来，安全地送到大后方？

如果是内奸，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里掌握地下党组织的许多重大机密和主要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人的住址，他为什么不去邀功请赏？

三

其实，“内奸”这个罪名，从潘汉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据胡愈之后来回忆：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团开会时，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耽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

代表团回上海以后，有人悄悄地向于伶转告了陈老总的话。于伶有点安慰地想：周总理、陈老总他们是了解潘汉年的，中央也还有些同志了解他，最后总能弄清楚。

四

两天里要交检举揭发材料。

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

于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发上，思绪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并不如烟。它们就像资料馆仓库里尘封已久的拷贝，一经开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动在心灵的屏幕上映现出来。

少年时代，于伶在宜兴就听人盛传陆陵潘家的事。潘家是书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当地有名的才子。潘汉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这就是“水番三郎”这个像日本人姓氏的笔名的由来）。于伶在宜兴时并未见到过这位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后，两人先后来上海，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才建立起同乡加同志的友谊。从此患难与共，成为息息相关的亲密战友。

记忆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静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馆。潘汉年约夏衍和于伶见面。他刚刚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又一次秘密来到上海，任务是恢复遭到大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加强力量，迎接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于伶向他汇报了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几年来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文化界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处于苦闷和焦急状态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荡。而上海文化界还卷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影响革命队伍的团结。

潘汉年向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议精神，使他们认清了大局，明确了目前的任务。

1939年的一个秋夜，上海璇宫剧院后台。上海剧艺社正演出于伶的《花溅泪》。

女演员蓝兰轻轻走到于伶身边，悄声说：

“小开来电话，要你马上到DDS去。”

于伶又惊又喜。上海沦为“孤岛，’后，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安排好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及文化界几位著名人士撤离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两年了，音讯不通，于伶时常惦记着“小开”。

于伶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飞路DDS咖啡馆楼上，一眼就看见“小开”正安详地坐在僻静的角落里。

“你们辛苦了。”潘汉年握住于伶的手，用力摇几下，然后放低了声音：“我看报上影剧广告，你们上海剧艺社还在演出。这是个信号，说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你本人也还安全。我就试打个电话，不想这么快就见到你。”

“璇宫离这里很近……”

“今天没有别的事，我刚到。要请你设法转一份密件上去，行吗？”

“没有问题。老孙还在，我立即交给他。”

老孙是地下文委书记孙冶方。

又是两年过去。1941年的一个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园剧场找于伶。于伶一见阿董出现，眼睛立即发亮了，阿董来准有“小开”的消息。

董慧约他走出剧场，到霞飞路底盖世宫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诉他，明天下午去巨泼来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个房间，晚上“小开”和老刘要来找他。

老刘就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

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对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采取突然袭击，指示江苏省委尽快作出应变措施，保存力量，作长期的隐蔽斗争。潘汉年为此事专程从香港来上海。他同刘晓一起先约于伶谈话，讲了党的部署，询问了有关情况，商量了一些办法。后来，又换了个地方，约了更多的同志讨论了应变方案。

就在这次会面时，潘汉年通知于伶，党决定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同潘汉年交往中的一个个镜头，依次在心头映过。这完全是共产党员之间的革命关系，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可揭发的呢？

五

过了“五一”节，于伶这间本来探视者不断的病房，突然变得清静了，有时接连几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们，竟没有一个人来。柏李来时，也是轻声低语，不多说什么。病房里欢快的谈笑声消失了。

小护士倒常常问：

“于局长，怎么这些天来看你的人少了？”

于伶是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只好苦笑一声：“大家工作都忙。清静点好。”

“倒也是。”小护士点点头：“我看你在病床上还要谈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识相，人家病在床上，还要一趟一趟来谈什么剧本，真是寻开心！”

“不，不，”于伶微笑摇摇头：“人家也是诚心诚意的。你要知道，写个剧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病，不碍事的。看着剧本，谈谈话，也是一种休息。”

话虽如此说，他的心头却不能不感到苦涩，分明人们都已风闻于伶同潘汉年案件有牵连，甚至可能还得到通知，暂时不能来往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叶以群同志来看望他。

叶以群同样由于潘汉年案件而遭到靠边审查。他满怀忿感，面容惨淡。他想安慰于伶，又觉得此时此地，也不必说什么；彼此的心情，两人都知道，彼此的疑问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谁都解答不了。

于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边小沙发上，都不开口，默然枯坐，戚然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坐了近两个小时，护士推小车送晚饭来。以群看看手表，站起身，朝于伶望了一眼，轻轻点点头，不辞而别。

望着以群消失的背影，于伶好容易才忍住涌溢出来的泪水。

六

盛夏时节，于伶在病床上读到7月18日报上刊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这样一段话：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在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37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潘汉年和胡风已被“逮捕审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长在人代会上发言，题目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于伶仔细地读了这个发言全文。读来读去，关于潘汉年的罪状只有这么一句：

“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

放下报纸，他感到一阵茫然。

“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多长时间？哪些特务机关？如何勾结？

一阵强烈的怀念紧紧攫住他战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汉年那天到医院来看他时，忘了把药带回去，后来托吴强转送，也不知转到了没有？

七

秋天，于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诉他，市委已经来了通知，要于伶好好在家休息，养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里的工作，已经派了别人在负责。

过了两天，上影厂厂长室的秘书送来两大包信件什物，说厂里出了布告，由电影局任命了代理厂长。她又说，前不久，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在一个会上宣布，叶以群也不再担任上影厂的副厂长，他被免职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小雪。有天下午，于伶走出家门，沿华山路去静安寺买药，路上忽然遇到叶以群。他们的住处相距并不远。却已有好些日子没有来往了。

靠在路边梧桐树下，低声交谈了一会。雪花轻轻飘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脸颊上，带来几分清凉。

“你的问题怎么样了？”于伶关切地问。

“前几天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我写的跟‘小开’有关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声回答。

“可以了？”于伶露出一些宽慰的微笑。

“说是可以了。”

“那就该安排你的工作了。”于伶拍拍比他略矮一头的老友的肩膀，有点高兴，“大约不会回电影厂了吧？”

“谁知道呢？”以群平静地苦笑一声：“等着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协去。”

“作协也好。”于伶安慰他：“那边熟人多些，还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挂着一丝笑意，未置可否。于伶只觉得那笑比哭还苦涩，不由得一阵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协以后，编了几年刊物，搞了几年理论批评，担任书记处书记和理论研究所所长，还曾被选为副主席，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艰危的处境。一到十年风暴，他立即被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代理人、潘汉年同伙”揪了出来。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阳台上，看到作协一名“造反派”好汉正坐着公安局的汽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前，准备上楼来捉他。他就毅然决然从六层楼一跃而下，用自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生命对眼前这个被扭曲的时代作无声的控诉。

就在以群跳楼的三个星期之后，于伶也被捕，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从后边赶上于伶，对他耳语说：

“知道吗？‘小开’和阿董，都已经去世了。”

于伶愕然，回头盯住对方：

“在哪儿？”

“湖南一个劳改农场。他们一直关在那儿。”

“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死的？”于伶紧追着问。

对方摇摇头，沉默地跟他走了几步，然后说：“好象就是前两年。”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夏衍。

夏衍证实了噩耗，并且告诉他具体日期：1977年4月。地点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只有轻微的叹息声。

“夏公，你说‘小开’这案子会平反吗？”

“肯定要平反。”电话机里传来夏衍坚定的声音：“三中全会开过了。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进华东医院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使人振奋欢快的好消息：党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27载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了！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捧读党中央的文件，于伶禁不住一次次热泪奔泻。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知觉，但今天，他倒宁愿相信汉年在九泉有知，能听到党在纠正错误以后终于为自己忠诚坚贞的儿子作出的公正评价。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于今辨伪真。一切对善良无辜的人强加的诬蔑诽谤的罪名终究要推翻，一切对忠贞正直的人制造的冤狱错案终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挥泪写了十四首绝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后，1983年4月，于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刘人寿等几人一起去执行党中央交办的一项任务：到湖南迎回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历史巧合，他们到达长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汉年在长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志安排他们休息、参观，去湘潭韶山冲和宁乡花明楼，于伶都有点心不在焉，也有许多感慨。他的心早飞向湘东山区洣江茶场了。

于伶坐在汽车上，泪水涟涟。汉年——亲爱的好战友，我们来接你了！他仿佛看到潘汉年夫妇正从那崎岖的山间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面走来。“小开”仍然那样潇洒秀逸，睿兽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虚伪、阴谋和险诈。阿董依旧那样爽朗热情，朴实大方，发出南国女性真情的笑声。

茶场职工默默地将潘汉年夫妇仅有的一点遗物交给他们：一堆书籍，几件破旧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汉年临终前交待过：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赠给话剧团当演出服装；董慧坐的轮椅，送给需要的残疾人；他的一支笔，给照顾他俩晚年生活的茶场职工家属黄菊珍，他们不可能送钱给那位心地善良的妇女，他们身边也没有钱，只能以这支用了多年的笔留给她做纪念了。

茶场职工再没有提供有关潘汉年夫妇逝世时的细节。他们是在长沙先后去世的。只有一位老职工记得，潘汉年病重送长沙抢救，几天后董慧得到通知也赶去了。临行前，她对邻居说过一句话：“老潘将来会复活的。”

阿董，你说得对，老潘终于在人们心里复活了！

他们回到长沙，在郊外面对湘江的一块荒坡上，找到潘汉年的埋骨处。一块粗糙的木板标志上写着：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这就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潘汉年的长眠地。

十

3个月后，于伶在《新观察》上读到一篇《潘汉年狱中遗诗》的文章，署名阳江。作者回忆了他在洣江茶场结识潘汉年的经过和他们之间的交往，叙述了潘的最后时刻。于伶噙着热泪，一遍一遍地读文章的有关段落，仿佛见到了故人的最后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赣边九龙山区西麓的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场部要举办全场各队犯人的文艺会演，我们几个人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旧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织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店。商店里人很多。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自己在后面等着。子弟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后边有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我心头骤然一紧，定睛打量，原来他就是潘汉年。

只见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垦空，发出一声长叹。电影终场，潘老在人流的后面推着轮椅，沿着食堂至干部宿舍的林荫道，走到尽头的一栋两开间的小平房前。

22年的冤狱，使他青锋磨尽，虽然意识到平反昭雪是势所必然，但是，他说过，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当我利用一个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处的时候，听说潘老病倒了，场部用救护车把他送往长沙抢救；几天后，董大姐也去了。后来听说，潘老患的是肝癌，于3月23日送湖南医学院第二医院14病室住院治疗。在4月6日以前神志还很清醒，医护人员给他念报，有时念不到十几句，他就不叫念了，要自己看。但他拿着报纸反复浏览一下，又看不下去，脸上流露着失望的神情。因为，粉碎‘四人帮’已经5个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一点足以驱散他忧虑的信息。当他入院治疗时，好心的同志考虑到为了不影响治疗，便向他说明，袭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萧叔安。这对病人精神上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4月14日19点及5分，潘汉年同志含冤逝世。经过解剖检查，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脏烂得象豆腐渣一样了。”

读到此处，于伶已经泪湿衣衫，泣不成声。

他从心底对那位不相识的文章作者涌起一阵阵感激之情。

火车从长沙车站启程，沿着湘江驶往北京。

窗外是辽阔的楚天，脚下是潇湘大地。

车过汨罗江时，于伶忽然想到屈原。

两千年前，那位忧国忧民的屈大夫遭到谗忌，满怀哀伤，行吟泽畔，终于投身汨罗江的清流。

两千年后，一位忠诚、正直、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终于在可以看得见平反昭雪之日到来的时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里？汉年，你在哪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你的英灵在何处飘飏？

魂兮归来！

第九章：抹不掉的记忆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

李一氓

序诗

《无题》（1978年作）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更寻倩女魂。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驻南昌。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每周一次（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从南昌、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同志找来。

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庆，准备进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暂的几个月中，潘汉年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政治活动能力。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20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一时期，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与潘汉年又见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后，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活动分子”或者说是“积极分子”，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少数人叛变了，不少的人消极了；汉年同志不灰心，不丧气，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今天讲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任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汉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据形势，当时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潘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务后，潘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首先团结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合，相应地也发展了戏剧、电影工作，使党在宣传上有能力与国民党反动派、国家主义派、改组派、托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左联、社联的工作，通过党，一直发展到北京、天津、广州、成都……，一直发展到许多大学，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过参加左联和社联的活动，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与潘为了工作，经常见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汉年同志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于是我和他有一个短暂时期互不见面。1932年，我也脱离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这时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迫使党中央无法在上海巩固地领导斗争，而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这一离开，又是汉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在上海时期，从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谅解，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我与他虽处在一个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不常见面。特别是1934年上半年，我经常离开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带，或是去雩都，临到长征出发时我才回瑞金，与汉年见面的机会更少。

长征出发时，汉年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长征开始时，本来想在湖南活动一个时期，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湖南干部营，成员都是湖南人，我当营教导员。湖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干部营解散了，成员各回原单位。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都是党政干部）的指导员。干部队成立后，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又解散了，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编在宣传部。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他离开部队去上海为止。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动。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为军事形势有变动，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都又回到总政治部。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他没有当过兵，又是一个文职人员，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后奉党中央命令，带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的。离开前，就连我，他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总政治部少了一个宣传部长时才觉察到的。在这方面，又可以证明汉年同志是很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

1935年春分别后，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时，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关系，即是和刘湘的统战关系，是在汉年同志手里。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须首先去上海找着他，然后由他介绍，才能去成都进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时局急剧变化，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军，大家都离开延安，又在武汉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终在皖南。他大概总是在香港、上海、重庆、延安跑来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不少艰巨的统战工作、调查工作、联系工作、宣传工作。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我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那时他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党的统战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在香港，我急于只身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汉年同志认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这样，我只得在香港留下来。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上海后惹麻烦。过了三个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在整个香港、上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费用。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我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1955年“潘扬事件”发生后，有好多疑点，使我不大相信这个案子。他要出卖我，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为我着想，是不是看在我们两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出问题，又是为的什么？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那时饶漱石颇不安分，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同志。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了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同志。以后一直到1955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至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关系，我也受到一些嫌疑，虽然时间很短。事后甚至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么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过去了。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1926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党的60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从“潘扬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依前圣以节中兮，。胃凭心而历兹。济沉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站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征引稍烦，聊当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于北京

对潘汉年同志的片断回忆

刘英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央苏区。

1933年6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从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汉年同志比我先到，在党中央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洛甫（即张闻天）兼任的。他们在上海时就很熟，潘汉年负责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临时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区，离党中央局很近。记得刚到瑞金不久，洛甫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回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几个同志就到他们那边去，约了十来个人，到县城馆子里吃了。一顿，不过是熬豆腐、红烧肉之类，却感到是莫大的享受。这十来个人中间就有潘汉年。大家并不喊他名字，都亲切地叫他小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雅号还是20年代他在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

那时大家都年轻，每天晚饭前后，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山歌，还爱搞点体育活动。爱打监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小开和洛甫、陈云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住楼上，博古、陈云住楼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那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亲密无间，精神很愉快。

汉年同志是从文化人成为革命家的。他英俊潇洒，忠诚积极，精明能干，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军响应我们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派代表来苏区谈判共同反蒋抗日。汉年同志是红军和工农政府的全权代表。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徐名鸿、陈公培谈判了一个多月，草签了抗日作战协定，并作为我方驻福州代表赴闽。不久就爆发了“福建事变”。汉年同志从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这时就为党内同志所称道。其时我被派往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以后又留在那里担任团省委书记。汉年同志的这段经历，是后来听说的。

在1934年5月扩大红军工作中，我同汉年同志有过一次深谈。

1934年4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广昌战役拚消耗打硬仗，伤亡很大。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我被派到于都，汉年同志被派到杨殷。在各县任突击队长的还有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杨殷县是赣南的一个边县，为纪念1929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这个县紧挨着白区，红白交错，来回拉锯，情况很复杂。与根据地中心区不同，这里党的影响比较薄弱，群众对我们还不大了解，加上国民党特务活动很猖獗，造谣不说，还搞暗杀，杀害我红军家属。所以“扩红”的困难很大。当年负责领导“扩红”的是李维汉同志，汉年同志到杨殷开展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后，就如实向他反映。说当地群众听说“扩红”，不少壮了跑上山去了，还有的跑到白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他还提出，要求边县象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任务是不可行的。李维汉同志听后，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了。汉年同志被撤职回瑞金，路过于都，他来看我。他很不平，对我说：“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不过这一次撤职并没有对发挥汉年同志的才干产生多少不利的影响。党中央不久就作出决定，红军主力要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在西征行动之前，为减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红军同粤军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这次谈判，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又是潘汉年同志。中央红军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多少阻挡，没有多少伤亡，同谈判成功是有关系的。

我同汉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长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调到地方工作部的。这里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汉年。男同志还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大姐和阿金（金维映），部长是罗迈。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是安置伤病员，伤得比较厉害没有办法跟着走的，就同老乡商量，给一笔钱，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后来又多了一项，叫做“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第二次占领遵义以后，潘汉年同志忽然不见了。他当时已经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他到哪里去了呢？过了一些时候我才知道，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复和重建白区党的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他化装成商贩，编在被红军拘捕的“云土”商贩队里，故意策划他们逃跑。这样一路上得到这些人护送，转辗经香港到了上海。8月间，他同后来到上海的陈云同志会合，即离沪赴莫斯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潘汉年同志在长征途中消失以后再次突然出现，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同闻天结了婚。1936年7月，党中央从瓦窑堡经安塞到达保安，住在保安城外东南郊的一片窑洞里。

汉年同志这次回来，肩负着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被派回国商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达香港，七八月间先后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会晤。其时国民党刚开过五届二中全会，向我党中央提出了新的国共谈判的条件。国民党代表希望潘汉年立即到陕北听取党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他们提出的新的谈判条件的答复。于是汉年同志即从南京赶到保安。

这时，闻天和毛主席、恩来同志等中央领导人也正在研究在国共关系新形势下，怎样调整对蒋介石的策略，答复南京方面的来信。汉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们作了汇报。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当晚我们干脆叫他住在我们的窑洞里，在我们炕前支了一张行军床，彻夜长谈。

汉年同志汇报他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联络的情况，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具体内容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他这次回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可以从他来保安以后党中央的活动明显地看出来。

8月10日，闻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明确指出原来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们就承认其统一指挥，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名义，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会后，为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名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8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9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记得8月份开过会后，潘汉年同志即去西安，准备到南京去谈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讨论统一战线和西南问题被召回来了。这样，他又参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印象中汉年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是刚从共产国际那边回来的，说话有影响。但因为年代久远，具体讲了些什么，我已经无法记起来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查阅会议记录时看到了汉年同志的发言，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对干部问题在几个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说：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群众信服的领导。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应该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意批评，不应借故攻击。汉年同志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进一步巩固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潘汉年同志是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了大功的人。他的功劳不应该埋没，他的智慧值得大家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贞，更要大大发扬。

好党员潘汉年同志

张承宗

40年前，我在淮南根据地认识了潘汉年同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环境越加险恶。江苏省委奉中共中央之命，将领导上海、南京和江苏地区的地下党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去。为了保护地下党干部的安全，培养和训练干部，江苏省委和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文委的领导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我是在1942年8月接到江苏省委刘长胜的通知，调到根据地去的。我当时负责江苏省委直属委员会的工作，领导我们的是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刘长胜。

1942年9月，我到了淮南根据地。江苏省委筹备在新四军军部附近泥沛湾的顾家圩子举办干部训练班，从上海撤退到根据地的干部，陆续到这里学习。江苏省委在淮南区党委总联抗的附近，设立了一个交通接待站，专门接待和审查撤退的干部。省委派石志昂、田辛和我负责接待站的工作。石志昂负责接待事务，田辛负责交通联络，我负责干部审查。这个工作前后约3个月，接待了从上海撤退的干部一百几十人，大部分是区以上的干部。10月，刘长胜到根据地。且互月一个傍晚，刘晓、潘汉年、王尧。山、赵先和张本等，来到根据地，当晚在淮南区党委住宿。我在淮南区党委和刘晓、潘汉年、王尧山等见了面。当时潘汉年用肖开的假名，这时我才认识他。第二天刘晓等去顾家圩子，潘汉年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也就是华中局机关所在地。

潘汉年到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来过几次，每次要住几天。他和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及做机要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做白区工作的，保密观念很强，纪律很严格，互相间不问在敌占区是做什么工作的。潘汉年向大家作过两次讲话，一次是讲长征的故事，一次是讲白区的斗争，大家都感到他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讲话有条理，娓娓动听，特别是他熟悉敌伪和国民党的情况，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同敌伪、国民党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公开谈判和隐蔽斗争，都很有办法。他讲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隐蔽自己，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工作经验。

有的做交通工作的同志，把刘晓、潘汉年等来根据地的交通路线和利用汪伪方面的关系，在少数同志之间传了开来。把刘晓、潘汉年等利用在汪伪镇江站某某的关系，掩护他们在镇江过夜，设法护送过江，由仪征进入我仪扬边区转到淮南区党委的经过都说了。还说潘汉年神通广大。后来我们严肃地对有关的交通工作同志指出，这是自由主义、小广播，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会对党造成损失，很快就加以制止，以后在整风中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潘汉年在领导上海、香港等地的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曾作出过很多的贡献。

1943年三四月间，江苏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结束，华中局成立城工部，领导华中地区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南京等地区的城市工作。同时成立华中局联络部，由潘汉年任部长，徐雪寒任副部长，负责华中地区，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华中局城工部设在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华中局联络部设在附近小王庄。潘汉年就在联络部办公，他的爱人董慧和小王（沈月箴，化名王静娴）也在那里。两个部的工作虽然都是做敌占区工作的，但组织上严格分开，只是领导上互有联系，各有分工，又有配合，机关干部和所属单位都互不相关。根据联络部工作需要，江苏省委曾经调张子良、蒋建忠两位工人党员给联络部当交通。城工部成立后，又继续调张征秉（学生党员）、徐诚（徐百辉，工人党员）、何牵（职员党员）三同志给联络部当交通员。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据地之间，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来往送材料、带干部，从未出过差错，安全准确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以后潘汉年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重回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工作。日本投降前夕，由于华中局联络部派干部进行策反工作的结果，伪军钟剑魂率部起义投诚。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潘汉年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仍领导上海原来所属的系统。上海地下党也互相配合，并得到他的帮助。中央决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保护和撤退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后，上海地下党曾配合潘汉年，动员和保护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到香港，然后由潘汉年在港组织他们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他们冲破重重障碍，分批乘船前去，有的船经过韩国口岸，最后都安全到达，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这是潘汉年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功绩。解放前夕，潘汉年又组织了“两航”（指国民党的中央、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争取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机关档案和工厂企业资材，听候我方接管。并和上海地下党配合，对工商界、文化界人士，进行了长期的统战工作，争取这些人留在上海，有的人还被争取从香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是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第一任市委统战部部长。他积极协助陈毅等同志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接管，恢复秩序，反对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多贡献。

1950年下半年，市人民政府在总结一年多接管城市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时指出：市政府接收工作顺利完成任务，表现在贯彻中央指示，不打乱财政经济机构，没有发生混乱现象；迅速地完成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对应该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及时作了处理；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努力，比较有成绩；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封锁反轰炸，取得了胜利；稳定市场，逐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开展市政建设等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潘汉年协助陈毅，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中央政策方针，以工人、青年、妇女等组织为基础，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解放后城市管理的正确方针。上海贯彻了把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方针，作出了成绩。1952年3月，潘汉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造旧上海为新上海，必须思想上明确以生产为中心，一切为生产服务。在公私关系上，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好方法。一切为了生产，一面保障私营工商业有利可图，一面又要保障工人生活。还指出，新民主主义不是永远不变的，是过渡的，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社会主义，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保卫上海城市方面，潘汉年强调军事防空，要大家在政治、军事上提高认识，建设防空系统，确保上海工业基地。上海工人多，每个大楼、每个工厂都应成为战斗堡垒，有信心、有把握地夺取反封锁、反轰炸的胜利。今天回忆起来，建设上海，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奋斗得来的。有些革命前辈还为保卫和建设上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潘汉年很关心工人生活。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在市委领导下，就决定为工人逐步解决住房问题。当时，我在华东纺织管理局工作，曾经到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宅区进行调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第一个工人新村—一曹杨新村建成了，一些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首批搬进了这个工人新村。党和政府是关心人民生活的，潘汉年也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表现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

潘汉年在任市委统战部长工作期间，协助陈毅，团结党外人士，打开了解放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许多和潘汉年比较熟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反映他能团结、教育党外人士，谦虚坦率，肝胆相照。他对党外的副市长盛丕华、金仲华，非常尊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很多解放后第一批参加民主党派的非党人士，都是和潘汉年同志商量，得到启发和帮助以后才参加的。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帮助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党和青年团组织要挑选一批党团员参加民主党派，帮助开展民主党派工作，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应加强对民主党派工作的领导。这些都是正确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五反运动中，潘汉年担任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他反对片面追求退赔数字，强调要实事求是，使运动发展比较健康，而又稳步地达到了预期目的。潘汉年反对党内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例如认为“解放了，统战工作不重要了”，“民主党派可以消灭了”，以及怕麻烦，要强制改造等错误思想。他要求党员干部大胆放手，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

潘汉年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的决定，负责筹备并建立了第一届上海市、区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上海市、区的人民代表会议。他重视发挥人代会和协商会议各自的作用，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好人代会和协商会议的工作。他曾指出当时市政协协商问题的面不够广，只限于劳资问题，其他文教、市政建设等问题，缺乏协商。他提出各级党委要建立和健全各级统战机构，大的工厂党委设统战部，有基础的支部设统战委员，应该依靠全党推动统战工作。统战部门要做好党的助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这些对于今天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仍然是有用的经验。

潘汉年长期受党的教育，参加过延安整风。他能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在我党接管上海，实现社会安定，财政经济恢复，反对美蒋封锁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上海党组织进行了第一次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潘汉年在总结上海一年多来取得的成绩时，也检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办法。他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指出我们缺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的责任心，在各方面贯彻统战思想做得不够，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以及主观主义。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潘汉年主张要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不搞运动，不能用三反五反的办法。这种精神是实事求是的。

潘汉年这样一个好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竟在1955年蒙受这样大的冤屈，直到1982年才彻底平反，不能不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教训。

有一位因潘案无辜受牵连的同志说了这样几句话：“多年沉冤一朝雪，满座欢笑两眶泪。留得余生有余力，应是分光发分热。”这是我们怀念潘汉年和对他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的共同感受。

1982年9月26日

怀潘汉年同志（诗）

于伶

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27年的冤案平反昭雪，群情振奋，生死同感！汉年一生为党工作的丰功伟绩，我们之间的早年交往与工作关系，我是千言万语抒写不全的。我这曾被诬为“内奸同伙”而受株连的幸存者，自愧才短，有负故人。病中作俚句怀念，感谢党的恩情。情意难尽，工拙未及计了。对敌伪隐蔽斗争的特殊贡献，难于入诗亦不宜写者，从略。

1982年10月于医院

闻耗

风华一代忆潘公，又道湘灵上碧空！①

①1979年四届文代会中，偶步西苑路边。遇一同志低语：汉年、董慧死于湘南劳改地洣水。我木然，不知如何走回住地“国务院一招”的了。

从此荆溪魂与梦，蜜桃枉自陆陵红。①

①辛亥前，宜兴、荆溪二县合署。我俩同属荆溪。潘家陆陵盛产水蜜桃。我曾有散文《陆陵桃》。1927年大革命前后、陆陵一个村庄，我所知者即有中共党团员十多人。

身世

有祖高魁父秀才，清贫破落蕴奇才。①

①潘家两代有“功名”，而家境破落。兄弟多。他行三。

凌霞奋起彭城厄，民瘼编来志壮哉。①

①汉年为官林凌霞学堂高材生。考入和桥彭城中学，外婆借债资助，仍中途辍学。在学时爱好文学戏剧，编演民生疾苦的戏剧，为穷人鸣不平。

创造社·文委

青年编辑《小朋友》，水番三郎唱《幻洲》。①

①汉年19岁参加中华书局《小朋友》编辑，1925年入党，参加“创造社”，编《洪水》、《A11》、《幻洲》等刊。曾用水番三郎等笔名，嬉笑怒骂，殊鲜明尖锐。

进南京

西安事变震人心！狼狈南京宋氏阍。①

①宋子文、宋美龄等。

为促全民同抗日，飞车且闯尧化门。①

①宋氏兄妹急派张冲其人辗转找我党代表商谈。汉年经中央指示去南京谈判。他考虑：如约到南京下关车站，可能会遭到接受日本方面情报的何应钦等的毒手，决定到尧化门小站即下车。进城住宋子文家，商定由二宋与端纳同往西安。并以党代表身份直接与陈立夫、陈果夫见面。西安事变后，党派恩来同志与汉年等任两党谈判的我方正式代表。后李克农与潘先后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七七”、“八一三”抗战中，潘在上海公开活动，起了极大作用。

港沪出没

孤岛情形日日危，奔波为党险如夷！

璇宫剧院寻消息，秘密传书第第斯。①

①上海沦为“孤岛”。汉年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之后，他才与夏衍去香港。1939年秋，汪伪傀儡登场，上海敌特猖狂。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漩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第第斯）咖啡店见面。他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窗口。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事变安排

皖南烽火敌猖狂，相对针锋斗虎狼。

为胜一筹筹久远，辣斐三友计周详。①

①皖南事变发生，省委报经长江局指示应变。汉年从港来作配合。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千秋功

敌垒森森步从容，出生入死立千功。

幸存嗟哦羞才短，咄咄无端梦寐中。①

①此后，汉年同志在香港活动。太平洋战后在上海与群魔斗法，为党的利益作惊人的成功的殊死战。掩护省委全体干部与重要文件以及其他许多重要人员安全撤退到淮南总部。参加延安整风与党的七大。日本投降后从延安到东北。再来上海，在思南路周公馆和我再次见面，托我办事。在香港安排三四百位著名人士进根据地与北京。后又从香港经北京奔丹阳，随军进驻上海。显赫功绩，不能尽述。

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霍潘公冤雪同。①

①刘瞿，指少奇和秋白同志。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战士“覆盆”廿七载

许涤新

一

我知道潘汉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厦门大学，因为那时由他主编的《幻洲》，虽只出版几期就被封闭，但对于当时追求光明的青年颇有影响。记得《幻洲》的创刊号，还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这样，我就不仅读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认识他的相貌了。

我和汉年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他是同刚刚从巴黎回国的陈往天同志（那年夏间，陈就在日寇飞机轰炸下死于非命）一道来的。除了潘梓年之外，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华岗、章汉夫、何云（抗战后期在华北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在突围时光荣牺牲）和我，都参加接待。座谈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他们两人看见我们的办公桌上稿子堆积如山，谈了个把钟头，就告辞了。

大约是1939年的秋天，汉年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经重庆要到上海去。章汉夫同志约我一道去见他。那时他住在重庆上大梁子青年会的旅馆里。那次谈得相当长，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二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几位同志离开重庆到上海来。那时中共代表团设在南京；为了要在上海展开统战工作和宣传活动，因此，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设立一个机构，对外称为“周公馆”，实际是中共代表团的上海据点，恩来、董老、邓大姐和李维汉几位领导同志，每周轮流到上海来主持工作。在代表团之下，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书记是华岗同志，参加委员会的有刘宁一、章汉夫、潘梓年、夏衍、乔冠华和我几个人。“上海工委”的名义并不公开，而参加“工委”的同志则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公开活动。由刘晓同志负责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没有同“上海工委”公开接触。但是，汉年同志却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不过，他来时总是在黄昏以后，这证明他的工作使他还不能公开到“周公馆”来。在我同他接触中，他对于时局的分析，对于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当深刻，而且消息特别灵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时，有了“小开”的代号；到此时，我们也叫他“小开”，这是为了保密的缘故。

那年秋冬之交，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和安东（丹东），政局恶化，日益严重。为了做好准备，周恩来同志除了忙于招待中外记者和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之外，还忙于安排“上海工委”同志的工作。我和汉夫、胡绳、乃超、默涵、冠华等几个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同志则在董老的领导下，坚持到最后一天。有一天夜里，汉年到“周公馆”找恩来同志，谈了很久，当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了保密，那是不能问的。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估计他会留在上海。但我的这个估计是错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达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几天，就在跑马地的走道上碰见汉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总是戴着礼帽走路。但是，汉年却从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不戴帽子，特务一下就会把你认出来。”他却说：“香港同上海的习惯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没有什么事情。”短短几句话，使我觉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随机应变的。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是“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据我所知，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的。

刘邓大军在1947年6月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使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不能不发生难以形容的震动。敏感的香港社会，当然震动得更加厉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沈钧儒等在港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民盟”的领导机关，并恢复活动（因为“民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已经涣散）。同月，国民党的民主派李济深等也在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它们都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不久，我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显然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党的工作和汉年同志的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从1948年秋起，在港的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有计划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既要得到各位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又要保证他们在离港时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据我的记忆，主要负责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系的是汉年和方方两同志（记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经到广东内地搞武装斗争了）。章汉夫和连贯两同志为了陪送几位老先生，先后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来越少，工作更加紧张。在这里，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1949年4月间，大军胜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汉年在九龙弥敦道方方同志住处开完了会之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我们坐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他问我：“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由中央决定吧。”他说：“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讯一到香港，我们就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八楼举行招待各界的庆祝会。这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规模盛大的会。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国记者都出席了。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来宾。记得汉年也在这里露面，但他站在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几位熟人谈话。

大约是在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汉年、夏衍两同志和老夏的女儿“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开赴天津的“东方号”。我们乘的这艘“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只有胡瑞梁（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夫妇和两位华侨姑娘。一个可以眺望天际的宽敞餐厅，在吃了饭之后，只有我们三人在谈天。从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个昼夜。由于空闲，自然就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了。谈话的主角当然是汉年。谈些什么呢？内容现在是回忆不起来了，只能写下一些题目，例如上海地下时期的反特斗争；长征途上的见闻；30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

我们大约是在5月5日从天津到达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先后接见我们，负责对我们安排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时，恩来同志住在中南海的颐年堂侧面的房子里（后来毛泽东同志进城后，恩来同志才搬住西华厅）。他就是在颐年堂同我们三个人谈话的。他告诉我们：“上海现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赶到丹阳，向华东局报到，跟部队进入上海。黄浦江上还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军舰。进入上海之后，要作最困难的准备，准备美帝的军舰开炮，准备水电都被破坏，准备各种可能发生的混乱。你们都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有前敌党委和华东局的领导，有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配合，困难是能够克服下去的。”关于工作，恩来同志对汉年说：“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咬给老夏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交给我的任务是帮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工作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四

进入上海之后，汉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长。不久，提为第三书记。陈总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汉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刚刚解放的几个月，重点是帮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工作重点就在上海了。我那时是上海市委委员，并先后担任市委统战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财委和市府秘书长等职务，而这些工作都是由汉年同志把关的。从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调离上海的3年4个月间，因为工作关系，同汉年几乎天天见面。在这期间，汉年有几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怀的。

进入上海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同志怕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不敢同他们来往。陈总在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远瞩的。解放后一个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的四楼会议室开会。他同汉年都做了长篇发言，用爱国主义去教育出席会议的人们。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他们。当时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见到共产党，是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来开会的，听到这些入情入理的报告之后，情绪逐步稳定了。一些在香港观望的人物，也逐渐回来了。刘鸿生老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香港回来的。鸿老一回到上海，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六七月间，几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请陈总和市政府几位负责人吃饭。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吃资本家的饭，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限，犯政治错误。陈总笑着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伯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汉年支持了陈总的意见。吃那餐饭，我也参加了。实际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时已经参加了统战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汉年经常对我说：“要同资本家搞好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是要同他们交朋友，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从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统战工作，是得到陈总的亲切领导，也得到汉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样，在打击了投机倒把，在财政经济实现了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之后，物价稳定下来了。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虚假购买力，也骤然消失了。为了解决当时的市场困难，中央财委在1950年4月间召开7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海市委接到中财委的电报时，进行了讨论，汉年同志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单工商局长出席还不够，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参加才好，因为他们对市场困难的情况，会比我们的干部更加了解，这样，他提出要副市长盛丕华老先生也出席。陈总和刘晓同志都同意这一意见，并向中财委提出这个建议。陈云同志批准这个意见。这么一来，天津的副市长周叔弢老先生也参加了，连在北京的陈叔通和黄炎培等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不仅因为扩大了加工定货而解决了工商界的困难，而且成为我们党团结守法工商业者，扩大对工商界统一战线的会议。这一点汉年同志是有贡献的。

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1952年进行了“五反”斗争。陈毅同志在市委的会议上提出“两路分兵”的主张，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中，进行交代，互相揭发，而工人群众则在厂里背靠背地对资本家进行揭发。至于其余的资本家则在工厂商店中，由工人群众面对面地进行揭发。中央批准了陈毅同志的这一主张。集中在上海市政协的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共303户，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而以大资本家为主。这个战场是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的。他指定汉年和我参加这一工作。汉年帮助陈总掌握形势，而具体工作则由我出面，陈总交给我们的方针是：“对资本家的五毒问题，马马虎虎是不行的，必须清查清楚。但是，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这就要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在这三百多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失败。”汉年对这个问题体会得很深，他说：“这三百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到市政协来交代，结果如何，就要看我们能否把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我在现场工作，汉年每天总是来电话询查情况。在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有两个资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甚至全身在发抖。有的同志说，他们可能是害了病。我不放心，打电话给汉年，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两个人的发抖决不是伤风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这个问题。事实证明，经过开导之后，他们松了一口气，把口袋里准备自杀的安眠药交出来了。我们把此事向陈总汇报，陈总说：“还要提防第三个准备自杀的人出现，关键就是贯彻党的统战政策。”运动进入后期的时候，如何执行党中央关于处理五类工商户的原则的问题，有几位同志认为应以“退赔”数字做标准。陈总批评了这种意见，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资本大，加工定货的数量大，“退赔”的数字自然大，这个退赔数字必须同加工订货的数量去联系，还要看他们对运动的态度，否则，这303户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成为完全违法户和基本违法户了。汉年同志在这问题上是明确地坚决地支持陈总的意见的。这样，303户中有几个“退赔”超过1000万甚至4000、5000万元的资本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汉年同志代表市政府在会议上宣布这几个大资本家是基本守法户的时候，他们在惊愕中高兴得要发狂了。

是不是汉年同志在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时，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呢？不，不是的。对于极少数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政府的人物，对于那些投机倒把，抗拒加工定货，甚至把假药卖给人民志愿军后勤机关的坏蛋，汉年同志是坚决斗争以至绳之以法（如对王康年的处决）的。总而言之，汉年同志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的。

五

汉年同志被打成“内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点也没有觉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参加了访苏友好代表团到苏联访问，5月中旬我们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北京。当火车进站的时候，突然听到广播说潘汉年是“内奸”。当时，我真不相信我的听觉！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位为党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竟然是一个“内奸”吗？象这样一个了解地下组织情况的“内奸”，为什么不在那时（特别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间）把地下组织和党的同志，出卖给敌人呢？这个疙瘩，多少年来，我是没法解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所谓“潘汉年案件”，做了认真的复审，否定了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党中央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汉年同志，27年来，泼在你身上的血污，党中央已经为你洗涤干净了。你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业绩，终于为党和人民所肯定了。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安息吧！汉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沟宿舍

许涤新与潘汉年的交往

方卓芬

涤新和潘汉年相识是在1938年的武汉。以后在重庆、上海、香港，都有接触。1949年，中央要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涤新一起到北京，商量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从此，他们相处的日子就更多了。

涤新对潘汉年十分敬仰。1982年，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之时，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战士“覆盆”二十七载——一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以饱蘸感情之笔，写下了他们交往的全过程。涤新生前，曾多次向我称颂潘汉年的才能、品德，讲他看问题看得很远，革命经验丰富。1950年4月，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解决当时的市场困难问题。当时涤新是上海市工商局长。潘汉年认为单单工商局长出席还不够，建议工商界代表也参加。后来中央同意了这一意见，上海由副市长盛丕华参加。这个会既解决了工商界困难，又扩大了工商界统一战线。涤新生前几次回忆往事时，十分称道潘汉年这一建议所起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也是涤新多次对我讲的。那是1954年3月，中央决定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先对私营企业进行调查摸底，组织调查小组到工商业集中的上海进行调查。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统战部、重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交通部、商业部等抽调200名干部参加。涤新和沙千里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当时涤新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财委成立第六办公室时，他任主任。调查组到上海调查了四五个月。回到北京后，潘汉年曾给涤新打过长途电话，说：“我有个意见，是不是留几家大厂，不要全部吃掉。无论从加工订货也好，对国际影响也好，留少数几家很必要。”涤新当时很为难地回答道：“这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潘汉年说：“那你向中央反映反映。”回想起来，潘汉年的意见很有道理。此后在总结企业合营的经验时，都感到我们搞企业合营走得太快了。潘汉年看问题很有远见。涤新对潘汉年当时的提醒和建议，一直念念不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讨论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形式时，涤新还讲到潘汉年的见解很有道理。

潘汉年关心朋友，关心同志。他对涤新的关心，我有切身体会。只举1952年涤新煤气中毒这件事。那是1952年的元旦，涤新因几天来十分疲劳，午饭后准备洗个澡。天气冷，他用木炭在浴室里生了个小炉子。谁知煤气中毒，昏倒在浴室地上。当时，杨叔铭来找涤新谈工作。我们在客厅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见他出来，敲门没回声。我们急了。连忙设法把门撬开，并立即联系送华东医院。潘汉年知道后，十分焦急，急忙赶到我们住的宿舍来探望，问长问短，直到他知道涤新到医院后已经清醒过来，才放心地回去。

涤新对潘汉年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2月8日，涤新因肺癌离开了人间。2月9日，我的次子和女婿去北京医院收拾他的用品，从床头柜中捡出他写过的几页纸，字迹歪歪斜斜，有一页写着：《忆汉年》。我们辨认了好久才看清楚。他写道：“长期与魔鬼打交道，履如夷，志益坚，贡献可以比金石，谁料含冤27年。1988年2月在北京医院。”这是涤新怀念潘汉年的心声。涤新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还在追思长期受冤屈的潘汉年，对潘汉年的功绩、贡献，表达了他无比崇敬的心情。

（马福龙、沈忆琴、李小苏整理）

潘汉年和董慧

赵先

初识潘汉年，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当时他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冯雪峰陪同下，他和刘晓来到我的家里。他当时30多岁，已是久经战斗、革命经验丰富的人了。他那时从延安回来还不久，风尘仆仆，紫红色的脸，不象人们常说的“白面书生”的文化人，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潘、冯、刘和我爱人王尧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为商量工作的交接问题，哪些人和事由办事处管，哪些应划交上海地下党管，还有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应介绍去延安或大后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健谈而活泼的人，没有一般老资格党员的那种严谨的神情。

1942年7月，中央指示上海领导机关撤退到新四军地区去。行前，刘晓对王尧山说：“小开（潘汉年别名）也要撤退，他那里的交通线很安全。”不久，约11月初，刘晓通知王尧山和我，晚饭后到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我们如约到旅馆后，刘晓已开了两个房间，不多一会，张本也拎了只皮箱来了。次日黎明，我们四人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店堂里不见有什么货物，象是做转手生意，上海人称之为“申庄”的地方。天未大亮，电灯还亮着，由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招待我们，说小开就要来的。不一会潘从店堂后面出来，似乎住在商号里过夜的，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的样子。他胖了些，也老了些，已不是五年前的样子了。我惊奇他怎会改变得这样快，几乎使我难以辨认了。

谈话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直驶北火车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给送行的商人代办托运手续。另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把我们引进餐室。早餐后，乘上二等车厢去镇江。二等车厢很整洁，除我们五人外，全都空着，座位间的小桌上还有插着鲜花的小花瓶。沿途经过大站时，有几个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车。这样阔绰的旅行，是我生平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我和刘晓、刘长胜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一起，给日本宪兵推推撞撞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

车到镇江时，有穿西装和长衫的两个人到车站接我们。到金山饭店后，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告诉我，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要我当心。到镇江的第二天，潘告诉大家，有个任伪方军官的人要请我们吃饭，刘晓对是否应邀，有些犹豫，面有难色。潘说：“某某等人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没有前途，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某某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刘晓就同意去吃饭，我们则看刘晓的脸色行事，一起去了。汉年为了劝大家去吃饭，费了不少口舌，他还怕刘晓会担心花钱，特别说明这次费用都由对方开支。当时他说服我们这些不习惯用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态，至今想来还是十分感人的。酒菜馆离金山饭店不远，当我们跟着潘到酒菜馆二楼时，这个伪军官已等候在那里，他身穿伪军装，态度拘谨。席间我充当的角色是王太太，张本是张小姐。谈话内容始终是我们到达镇江后第一天下午游览金山寺，以及饭后将要去的竹林寺，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即由穿西装的特工人员带我们去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我们乘上一只去仪征的机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几个年轻的伪军。从这些伪军的和气态度来猜想，他们是当时镇江特工站负责人派来的。下午，到了仪征县城，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仪征在敌伪时期是很萧条的，街上行人稀少。次日天蒙蒙亮，这个特工人员改穿了中装短衫，带来几个青年挑夫，到客栈挑着行李，陪同我们离开客栈。到城门口，只见城门还紧闭着，特工人员和守门的伪军交涉后，开了城门让我们一行十几人（连几个挑夫在内）出城。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停下来，转身抬头看城墙上的伪军，潘对伪军大声喊道：“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一训，伪军只得放下端着的步枪，不响了。潘的这一喊话，确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广大。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华里，向着一条小岔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一排小山岗，两个小男孩探出头来叫“站住，不准动！”我们都一齐停步，服从命令，只派一个人上去讲话。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笑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微笑。潘上去对小孩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于是他们同意我们爬上小山岗，另外两个孩子奔向村庄报信去了。我们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个村庄，休息以后，由乡长招待吃了午饭。饭后特工人员带着挑夫匆匆忙忙转回去了。

我们一行由乡长和两个农民挑着行李去找区公所。路上刘晓一直在和乡长谈话，我们紧跟着走。走着走着，我发现潘掉队了，在后面步履艰难的样子，我停下来等他，他说：“真糟！皮鞋把脚磨出了血泡。”于是我陪着他慢慢地走，凡有岔道的地方，尧山在等着，指引方向。到一个小镇，找到了区公所，已是夕阳西下了。区公所铁将军把门，吃了个闭门羹。乡长把我们带到一处小饭铺里，要我们第二天再去找区公所，他就带着两个农民告辞了。

小饭铺的主人给我们做了晚餐。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睡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扒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

正当我们睡得香甜的时候，一只老母猪咕咕咕地走出来，啃着地上的稻草，在潘的头前粗声粗气地咕噜起来。“哪来的这只猪？真糟糕！”透过门缝的亮光，看到潘一面赶猪，一面坐了起来，他的狼狈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声刚停，我自己的难题也来了，原来晚上天气突然变冷，我只穿一件单旗袍，一条短裤，冷得受不了，只得坐在被窝里不起来。潘笑着对我说：“冷，是吗？”我不作声，心里在嘀咕，不是说一到边区就可换上军装的吗？现在进入边区已有几十里路了，却连一个穿军装的新四军战士还没遇到。潘从他的手提皮箱里拿出条薄呢的西装裤说：“穿这裤子吧！”我还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说：“穿吧！穿吧！在这乡下兴许人们还以为这是城里人的时兴打扮哩！”我无可奈何地穿了，裤脚太长，潘还弯腰帮着把裤脚卷些起来。这时，他真象是大哥一样。

我们在新四军二师淮南驻地步行了三天，吃饭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有天夜里说是有敌情，一连换了两处房子，没睡好，但谁也不觉得苦。我们先找到当时的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他把我们送到淮南区党委，找到了党委书记刘顺元，然后到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张登（即沙文汉）、刘宁一和许多同志都跑来欢迎我们，祝贺我们撤退的胜利，热烈情景颇为激动人心。这是1942年11月6日。为什么我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节，顾家圩子开了庆祝会，主持会议的是大王同志（学生方面的），开头用俄语叫了声同志们，然后庆祝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潘在顾家圩子住了一个时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时，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工作，驻大王庄。这是军直政治部的驻地，潘住在我们隔壁的房子里，有空的时候，总是听他讲山海经，他的山海经特多，听来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汉年的交通员从上海带来一位女同志，她身体结实而丰满，中等个子，相貌一般，穿天蓝色布旗袍，与潘隔张小桌面对面坐着，用广东话交谈。华中局组织部长曹山以为是老潘的部下来了，要我派个通讯员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说慢慢看情况再说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离婚了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处住了半个月，天天学习整风文件。那时干部们都各有一块自己开垦出来的自留地，种出来的蔬菜交给伙房，这叫作生产自给。降霜期到了，董慧抢着收菜，翻晒后送到伙房去加工（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董慧是香港名门之女，其父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著名实业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从广州去北京报考大学，适遇七七事变，充满抗战热情的董慧，不愿进大学而宁愿投奔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她曾听过潘汉年的报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慧对潘汉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爱上了比自己小12岁的董慧。在了解了潘在婚姻与感情中的不幸与苦闷后，同情与爱慕使他俩结合了。但时间长了，董慧对这非正常的关系感到无法忍受，潘汉年自己也很尴尬。如今，这一烦恼的解决，出于他俩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亲自送她直到仪扬边区，眼看着交通员带董慧跨过了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当他独处寒室，情思董慧时，作《寒风曲》一首，诗云：“寒风吹晓月，大道锁青霜。马蹄声声得，方寸益惶惶。此别伤心处，无言泪几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个多月的邻居，深感她朴实厚道、思想单纯、心地善良、劳动积极、作风正派。

潘汉年继续留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主要负责上海、江苏敌占区的情报工作，战绩累累。他在参加华中局甄别委员会工作时，帮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别是扬帆被康生诬陷为大特务头子一案，也是在他的过问下平反的。这期间，他也受到挫折，在黄花塘事件中，饶漱石整陈毅，潘对此不满，在高级干部中为陈呜不平，这样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广播”、“自由主义”。我很为他担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讲话不择对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爱搞小动作的哟！

1946年8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安排潘汉年和夏衍撤离上海，于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飞机抵达香港。

此时的香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港，但各情报机构密布，情况十分复杂。潘汉年有董慧为他所作的社会掩护和经济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动十分活跃和顺利。家务均由董慧操持，如买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亲明知女儿和潘的关系已非一般，但没有正式结婚，这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眼里是很丢面子的。于是在她父亲的主持下，潘、董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时年董慧已29岁。

潘汉年在香港一手抓情报，一手抓统战，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烟台、大连、天津的通航贸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文化界人士，还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西北军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从大陆各地转道香港，再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等地。此事历时一年多，潘汉年在港英当局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云集的困难情况下，没有一次失误。在政治上为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用他的老搭档夏衍同志的话说：“潘汉年在香港，两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就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来在北平约见潘汉年，他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华东局驻扎地丹阳，在这里，集中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干部队伍，他们正紧张地做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次日，潘汉年被通知去陈毅处开会，他换上了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这虽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气质却并无多少改变。陈毅在会上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宣布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解放后，作为一个管理大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更是日理万机。当时，潘汉年和刘长胜（市委副书记）合住在丁香花园的一幢大房子里。晚饭后，大家都在大院里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长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们多数是工商界、文艺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较亲近的部下。从大家毫无顾虑的高谈阔论中，他得到了送上门来的许多信息，也借此联系了群众。人们觉得他谈吐自然，没有官架子，仍是从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园的门不好进，大门口有传达室，找人先要在登记簿上登记，然后打电话通知，因为潘汉年是一级保卫对象。

大概是出于“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汉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门铃，就被人领进潘的会客室。这时，常常仍有客人围着潘谈天说地，他见到我，站起来问；“有事么？”我点点头，不一会客人们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妇女问题，他仔细地听，没有丝毫首长的架势，那亲切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如宣传新婚姻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包工头、恶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几个。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还要把工钱全交给霸头，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传对她们也“不起作用”。潘汉年说：“这些流氓、恶霸都是社会渣滓，只有通过社会镇反，才能把他们铲除掉。”果然不久便开始了社会镇反，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纷纷起来揭发、控诉，人民政府把她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在“五反”时为了避开职工和资方的正面冲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户303户，在和平饭店交待“五毒”。市妇联重点抓了303户的家属工作，要她们帮助丈夫过好“五反”这一关。对此我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听了大为赞赏，他说：“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里回到家里也挨斗，谁能吃得消？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带着一批干部整天泡在和平饭店里，“五反”结束时，303户都被鉴定为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他们皆大欢喜。

潘汉年对上海的过去和现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做报告谈问题也使人感到贴切。他经常衣冠楚楚，身着西装，举止潇洒，为此“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时，我真为他担忧。

市级机关的“三反”开始了，市领导都必须“洗澡”、“下楼”才能轻装上阵。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潘汉年身穿毕挺的人民装，坐在第一排，不断地抽着三五牌香烟。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楼”，接踵而来的运动将由谁来领导？轮到潘汉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说：“官僚主义在我身上是严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至于贪污浪费嘛，我无帐可算，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领过工资，也不管经费开支。我到市政府办公，公务员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于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袜，抽的三五牌香烟，都是我老婆从她家里弄来的，我也没问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就这样，这位市委第三书记轻轻松松地“下了楼”。因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银行家的女儿，从1939年调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就在她父亲设在上海的分行里当职员，党的大量活动经费，都是以董慧的名义，在银行里立的帐户，并由她担保，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在这方面，她是有特殊贡献的。解放后，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长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她也是市妇联的常委，每当常委讨论时，她常常是首先发言，与别人有不同意见时，她从不在会上和人争论，而是会后个别向我提出意见，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副市长夫人的话“有来头”。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苏友好大厦建馆纪念日，上午9时许，潘汉年到会剪彩后，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馆大厅，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开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敦厚长者“胡越明”

叶凡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处弄堂房子里。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她母亲逝世后不容于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进我家的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非常简陋的亭子间。她就在这里开党小组会、支部会……后来，她介绍我入了党。我家周围环境很简单、安全。党的领导同志也常来这里碰头、谈工作。这里先后掩蔽过5个女共产党员；油印过党的秘密文件。后来，区委书记竟把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同志也带到这里。1942年夏初的某日，刘晓同志带了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领导同志来到这里。这位同志非常和蔼，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派斯文。一进房间，他就对我说：“我们年纪比你大得多，不能说是你的同学，你就说我是到你们学校向女学生推销丝袜时认识你的，到你家来是为了请你帮我推销丝袜。他（指刘晓）是我带来的。我的名字是这个，电话号码是这个。你遇到什么问题时，可以打电话找我。”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名片，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就递给我。我一看，铅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写的是10789五个数字，写得潇洒流畅，我至今还记得。另外还印着什么头衔之类的，我没有注意。刘晓同志说：“我们在这里谈话时，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里的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客人关起门来，主人家却要躲在外面。但是，你不要听我们的谈话。”

其实，我哥哥上学去了，母亲出去搓麻将了，别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学们来来往往，他们也都看惯了，不会觉得奇怪。我是入党才一年多的在基层工作的女学生，对党内领导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看书，把思想集中在书本上，没有听他们的谈话，连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们走后，我看着名片想着：这名字当然是假的，胡，胡说八道吆，越胡说越明白；铅印的，还不知是怎么搞来的。电话——我想当然更是假的，刚才现写的；本来是7、8、9、10，假装是外滩一带的1字打头的，成了10、7、8、9。这样一想就记牢了。别的字，反正不是丝袜商人，不记它。“这是怕我听错了，或是听一遍记不住，才给我看的。”于是我就烧掉名片，冲掉纸灰。

之后，我才知道潘汉年真的用过这个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电话也是真的。原来这是留给我的一个护身符。

当时，我家生活是靠父亲从重庆汇款来维持的。有时，款不能按时汇到，就靠典当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闸路底的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挣些钱来供我自己活动和学习之用。为了省下车费，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迟出门时，才坐电车。我舍不得花钱乘头等车厢，总是坐三等车厢。

有一天，刚走进三等车厢，就猛然看见“丝袜商人”坐在通往头等车厢的小门旁。他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西装，戴着一顶高雅的白草帽。我着实吃了一惊。他却坦然一笑，点点头算是对我招呼，我也赶快点一下头就坐下，不敢走过去和他说话。再一看，车厢里稀稀拉拉坐了几个普通市民，才定下心来。过了两三站，他先下车，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算是道别。我一看，没有发现什么人跟着下车。

一次，潘汉年与刘晓在我家碰头时，潘提前来了几分钟，他问我：“我好几次看见大热天你在马路上走，是到哪里去？为什么不坐车？”对党内领导同志，我当然说实话。那时候，共产党员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也用不着难为情。他听后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我却在想：他也常在这条路上坐电车？也坐三等车？为了省钱？那为什么穿那种西装？是在甩掉什么尾巴？解放以后才知道，潘说过，认识他的人一般不会坐三等车，他有时坐三等车，既省钱又安全。

到苏北解放区听了学习班里关于保密工作报告时，才知道“胡越明”原来是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同志。别人在议论他的“神通广大”、“神出鬼没”……，我却总觉得他与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联系起来。我只觉得他待人宽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点点头，总是让人心里充满了温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书房里与我单独谈话时，是那么恳切、关心。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结婚；交代了在那里长期工作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决定我的组织关系留在上海，由“大姑”和我联系。因为她有公开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说他是个好同志，分析了莫洛与我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嘱咐我要与他互让、互谅。他的话使我满心感激，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潘说：“去吧！好好干吧！”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1949年底以后，我和莫洛转业到财贸部门、工业部门工作。经过1955年的风波，历次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们都受到了歧视、排挤和打击。但却始终保持自由之身，还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己所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逐渐与一些多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志见面了。要互相诉说的话是讲不完的。1979年11月，我终于能在吴康和刘人寿两位同志面前说出那么多年郁积在心里的那句话：“我不相信潘汉年是什么敌人、特务！”我相信这是当时许多老同志的共同心声！

冤屈终于得到昭雪，但是人却早已不在了。

有人引用过“大雪压青松”的诗句。我却想：大雪何其多！其实不必等到雪化，人家也看得出那青松的高洁。那静谧的雪景岂非比那尘红陌紫、柳绿桃艳的春光更美，更能表达那难以言传的意境吗？”

附录: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

陶柏康　李小苏　谢黎萍　黄金平

1906年1月12日（农历了已年12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宜兴市）陆林（今陆平）村。

1912年（6岁）至1921年（15岁）

先后在本村初级小学官林镇宜兴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宜兴彭城中学、常州延陵公学读书。

1922年（16岁）

春。因贫退学，返宜兴。在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代课。开始广泛阅读上海出版的报刊。参加编辑《宜兴评论》。

1923年（17岁）

在励进社小学任教。和进步师生一起参加反对腐败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的斗争。

10月12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发表《打破小学教科书之我见》。同日，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新诗《不敢》。

1924年（18岁）

春。应聘到宜兴和桥镇养初小学任教。

秋。到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

1925年（19岁）

春。到上海，进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当校对员，并协助编辑（小朋友》周刊。

秋冬之际，受五卅运动影响，积极投入社会政治活动，由陈铁庵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20岁）

3月1日，正式加入创造社出版部，担任编辑、发行工作。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4月26日，创办《A11》周刊，任主编。6月12日，主编出版《幻洲》周刊。10月1日，与叶灵凤合编《幻洲》半月刊。

1927年（21岁）

2月，应郭沫若、李一氓邀请，前往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4月下旬，在武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纂股长。

7月，随郭沫若到九江参加张发奎部工作。月底奉命撤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文化斗争。9月，与叶灵凤继续合作恢复编辑出版《幻洲》半月刊。10月，参与编辑张秋人主持的秘密刊物《工人》。

1928年（22岁）

1月1日，与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创刊。4月1日，创办《战线》周刊，任主编。5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或称文化党组，后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书记。

1929年（23岁）

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第一任“文委”书记。

10月，在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馆召开党与非党文学界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央对“革命文学”论争的意见，并成立“左联”筹备组织。

1930年（24岁）

2月中，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被选为执行委员，并任党组书记。

3月2日，出席在中华艺大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任左联党团书记。

5月7日，陪李立三在爵禄饭店会见鲁迅。

5月20日，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大会，并代表“文委”讲话。

夏。艺术剧社、南国剧社等先后被查封。主持召开戏剧界会议，研究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的前途问题，决定重新组织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称左翼戏剧家联盟）。

8月15日，社联和左联联合主办的《文化斗争》创刊，任主编。

秋。调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担任上海地区总采访。

10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在上海成立，任党团书记。

冬。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文化出版工作。

1931年（25岁）

春。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5月，调中央特科工作，任情报科科长。6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至1933年5月，一直担任中央保卫工作。

6、7月间，通过情报关系获知向忠发被捕，即向中央报告，采取安全措施，以后又设法获得向忠发口供，证实向已叛变。

1932年（26岁）

2、3月间，参与组织粉碎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伍豪事件”的阴谋。

1933年（27岁）

夏。奉命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六届五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0月，受命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谈判。后任中共驻十九路军常驻代表。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代表中共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抗日停战四条协定。

1934年（28岁）

1月24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6月，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长。

10月，奉命与何长工一起代表红军与国民党广东陈济棠的粤军谈判，达成5项协议，为后来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

10月，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9岁）

2、3月间，遵义会议后，奉命离开红军前往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8月，与陈云在上海会合，并先后乘船离沪，经海参崴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长征初期的情况。10月，在莫斯科列席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1936年（30岁）

1月13日，奉命在莫斯科会见国民党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

2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回国参加国共谈判联络工作。

4月，和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5月，在香港广泛接触救国会在港成员陶行知、邹韬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旧情报系统人员梅龚彬、胡鄂公、钱铁如以及友好柯麟、叶挺等。并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由胡愈之起草告全国同胞这样的文件，后来由邹韬奋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即有名的章乃器、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同时派人去上海打听地下党情况。一面写信给陈果夫望其派代表来港会晤。

7月上旬，在香港会见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去的联络代表张冲。不久，与张冲一起经上海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会面。

7月中旬，由宁抵沪，与冯雪峰会面，共同研究赴陕方案。在沪西一豪华饭店与张学良会面。

7月中、下旬，在沪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他们的充分理解与赞同。

8月8日，由上海经西安到达陕北保安。10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在莫斯科、香港、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情况。随后奉命到西安与张学良会面。

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陶、沈、邹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保安，经西安、南京前往上海。

10月14日，经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中共谈判代表。

10月上、中旬，从西安到达上海，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面交毛泽东致宋庆龄，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向他们转达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与他们建立经常性联系。

10月19日、得悉鲁迅病逝消息后，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中央指示组织葬礼活动。

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和陈立夫举行会谈。

11月12日将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电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21日并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1月23日晚，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潘汉年积极发动营救“七君子”运动。

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到上海询间西安事变内幕的张冲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赴南京与宋美龄、宋子文会面，向他们陈述中共和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向。同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均很好的澳籍顾问端纳陪同他们前往西安。

1937年（31岁）

1、2月间，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奔走于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继续执行中共谈判代表的使命。

春。王稼祥、贺诚候船赴苏联治病，亲自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其间，还亲自将方志敏设法从狱中带出的文章、诗词拍摄成胶卷呈交党中央，原件交冯雪峰保存。

3月下旬，陪同周恩来到杭州和蒋介石会谈。

7月7日，陪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中国饭店与刘晓会面，倾听周恩来有关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与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

7月吕日，安排周恩来与上层民主人士、文化界党员干部见面。

8月2日，与夏衍一起看望自日本返沪的郭沫若。并向郭介绍上海救亡运动情况，决定由夏衍当郭的助手。并帮助郭沫若、夏衍和国民党联合创办《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

8月底，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主任。

9月25日，决定由一批爱国革命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国民党部队工作，并由夏衍、杜国库、钱亦石负责。

10月28日，以“八办”名义，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团军费限制、缺乏防毒设备，极望后方同胞捐助。后杜月笙捐献了1000只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

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界知名人士阐述在日军占领上海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希望他们撤离上海。并妥善安排宋庆龄、何香凝等一批著名人士撤离上海。

12月10日，和夏衍同船撤离上海到香港。

1938年（32岁）

2月，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汇报工作。旋即返香港，与廖承志一起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领导工作，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同时仍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

9月29日至11月6日，以地区负责人身份参加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会后，留中央社会部工作。

1939年（33岁）

4月涸眼疾，去香港治疗，并负责了解敌后的情报工作。行前和社会部领导一起研究敌后情报工作问题，并就争取、分化汉奸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见。

9月下旬，由香港抵达上海，建立上海情报工作班子，先后建立与延安、香港、重庆等地联络的电台。

10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主持第一线情报工作。根据中社部决定，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

1940年（34岁）

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两地，组织指挥上海与华南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

1941年（33岁）

2、3月间，通过秘密交通线，将从皖南事变后突围出来的一批重要干部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向中央提供了“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战略情报，以及日军准备南进的情报。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作重心移至上海。并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取得合法身份，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指示，与各方面配合，在日军严密封锁中，疏散在港的各方面人士800多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

1942年（36岁）

4月，会见李士群。李士群提供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计划。

1943年（37岁）

春，华中局情报委员会成立，任书记。华中局情报部成立，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继续领导上海、南京等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

4月，奉命前往敌占区了解敌伪“扫荡”、“清乡”计划。在南京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与汪精卫会面。随后即返回淮南根据地。

参加华中局整风运动，并向干部作整风辅导报告。对扬帆受诬一案，参加审查，实事求是纠正错案。

1945年（39岁）

2月14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4月，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和接见。会后留在延安，仍在中央社会部工作。‘

1946年（40岁）

3月，离沈阳到北平。旋即奉命到南京参加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工作。

7月，陶行知逝世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正在上海的许多进步人士一一进行了解，并给以多方面的关心与照顾。

9月，根据周恩来指示，与夏衍一起离上海到香港，在港主持统一战线及隐蔽战线工作。

1947年（41岁）

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所属香港分局，被任命为香港分局成员。

1948年（42岁）

5月，就即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事，和各反美反蒋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联系和组织港商同大连、烟台等解放区沿海城市进行贸易往来，为解放区提供紧缺物资。

年底，在港获悉上海李白电台被国民党破坏，电告上海情报负责人刘人寿及部分情报干部撤往香港。

有计划地组织良主党派领导人和各无党派知名人士从上海等地转往香港，然后由香港通过海上通道转移到解放区，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先后共组织20多批，约350人，历时一年，没有一次失误。

1949年（43岁）

春。参与策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两系统的起义。参与组织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港机构和人员的起义。

4月，应中央电召，与夏衍、许涤新同船离香港前往北平，接受接管上海的任务。

5月11日，受周恩来接见，谈上海接管工作。被告知即将担任解放后上海市副市长职务。5月12日，受毛泽东接见。当晚又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讨论上海工作。

5月16日，离开北平。

5月23日，到达丹阳向中共中央华东局报到，参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任上海市副市长。陪同陈毅市长接收上海旧政府。5月31日被任命兼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

在此前后，党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社会部部长、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等。

9月30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44岁）

1月，中共中央决定华东局与上海市委领导机构分开。任市委常委。

1月2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当选为委员。

1951年—一1953年

工作基本上没有变动，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并分管政法工作。

10月16日——24日，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副市长，市协商会议第一副主席。

11月，任市委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51年5月兼任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54年（48岁）

春。华东局撤销，上海市委改组，任第三书记。

8月16日——21日，出席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1日，赴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5年（49岁）

4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通过陈毅，以书面报告形式主动向中央谈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明自己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的原因。经毛泽东批示，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关押在北京北郊功德林公安部看守所。4月17日，上海各大报刊公布潘汉年被捕消息。

1960年（54岁）

3月15日，被转移到昌平县秦城监狱关押。

1963年（57岁）

1月9日，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内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月13日，被“假释交公安部管制”，并与董慧一起到北京南郊团河劳改农场居住。

1967年（61岁）

3月，根据“中央文革”命令被重新收监审查，从团河农场转口秦城监狱关押。7月，患病住院，被怀疑为身患癌症，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仍回监狱。

1970年（64岁）

7月，根据“专案组”的建议，经中共中央批推，被重新加重处理：“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5年（69岁）

5月，与董慧一起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安置，作为“特殊犯人”接受管制。

1976年（70岁）

冬。多种疾病发作，住进茶陵县茶场医院治疗。

1977年（71岁）

3月24日，获准转到长沙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

4月14日，因多种疾病迸发，医治无效，于晚上19点45分逝世。17日遗体火化，骨灰埋放在长沙市金盆岭火葬场墓地。

1979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委托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材料，以查清问题。

1980年

11月3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时，廖承志与刘晓率先提出，潘汉年问题是个冤案，要求中央对潘汉年一案重新审查。

1981年

3月1日，陈云致信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

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复查潘汉年案件。

1982年

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以王尧山为组长的潘汉年案件落实政策清理小组，对受潘汉年案件牵连的同志作全面复查平反工作。

1983年

4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潘汉年在上海》编辑说明

一、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对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 特别是对敌隐蔽斗争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上海市副市长。1996年是他诞辰90周年。为反映潘汉年一生的品格、才干、风范和 功绩，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学习他，研究他，我们编纂了本书。

二、本书的编纂是在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具体指导、督促下进行 的，得到国家安全部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老同 志伍修权、陆定一、黄华、罗青长、童小鹏、于伶热情地为本书题了词。不少领导 和老同志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文章。对此，谨致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三、本书严格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编纂过程中曾查阅、核对有关档案材 料，访问了不少老同志，力求做到全面、准确。本书还以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 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为准绳，努力体现通知精神，完整地再现潘汉年的形 象。

四、潘汉年一生的主要活动阵地在上海，但他的踪迹也涉及香港、延安、淮南 等地，本书以反映他在上海的活动为主，也适当反映他在其他地方有关联的活动。

五、本书以收录老同志的回忆录为主，兼收少量研究人员、作家的专题文章以 及潘汉年本人的文献等，根据潘汉年生平活动的轨迹分成9个部分，以冀对潘汉年的 活动有个立体的、全方位的反映。

六、本书收录的回忆录，其中有一部分曾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在收录本书时， 作者作了某些增补、修订；但有些老同志已去世，他们的文章由编者作了必要的删 节或修订。回忆录中有些内容不同侧面的交叉或技节问题上的不同说法，仍保留原 样，希望读者谅解。

七、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国家安全部谢建华、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中共江 苏省宜兴市党史办等曾给予大力帮助；上海档案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一大” 纪念馆为本书提洪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谨表衷心感谢。